

马克思
法兰西内战

人民出版社



*Voice Of Marxism-Leninism
Group Of EBOOK*

制作

列寧全集

列寧全集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編輯局译
列寧全集

人名索引

KARL MARX
THE CIVIL WAR
IN FRANCE

马 克 思
法 兰 西 内 战

中共中央马克思 恩格斯著作编译局译
列 宁 斯大林

人 大 出 版 社 出 版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武 汉 市 江 汉 印 刷 厂 印 刷

1961年5月第1版 1981年5月第2版
1971年5月湖北第1次印刷
书号1001·475 每册0.48元

目 录

弗·恩格斯写的导言	1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	14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	20
法兰西内战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	31
一	33
二	44
三	52
四	68
附录	83
一	83
二	84
《法兰西内战》草稿	87
《法兰西内战》初稿	89
国防政府	89
公社	125
1. 为工人阶级采取的措施	125
2. 为工人阶级,但主要是为中等阶级采取的措施	126
3. 一般措施	127
4. 公安措施	129
5. 财政措施	131
公社	132
公社的产生和中央委员会	132

公社的性质	135
农民	144
共和联盟(共和同盟)	147
代表着不靠他人劳动为生的社会各阶级的公社革命	148
共和国只有公开宣布为社会共和国才可能存在	149
公社(社会措施)	151
“地主议会”的地方分权和公社	155
*片断	160
《法兰西内战》二稿	168
(1)国防政府。巴黎的议员特罗胥、法夫尔、皮卡尔、费里	168
(2)梯也尔、杜弗尔、普野-克尔蒂约	172
(3)地主议会	176
(5)内战的开始。3月18日的革命。克列芒·托马。 勒康特。旺多姆广场事件	178
(6)公社	187
(7)结束语	193
*片断	196
注释	209

* 用星花(*)标出的篇名是编者加的。

弗·恩格斯写的导言¹

要求再版国际总委员会的宣言《法兰西内战》并给它写一篇导言，这对于我是一件出乎意料的事。所以我在这里只能就最重要的几点简略地谈一下。

在上面提到的这篇篇幅较大的著作前面，我加上了总委员会就普法战争发表的两篇较短的宣言。第一，因为《内战》引证了第二篇宣言，而第二篇宣言若不同第一篇宣言参照，又不是完全能明白的。其次，因为这两篇同为马克思所写的宣言，也和《内战》一样，卓越地表明作者已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²里初次显露出的惊人天才，即在伟大历史事变还在我们眼前展开或者刚刚终结时，就能正确地把握住这些事变的性质、意义及其必然后果。最后，因为我们在德国至今还不得不忍受马克思预言过的这些事变的后果。

第一篇宣言曾经预言，如果德国反对路易·波拿巴的防御战争蜕化为反对法国人民的掠夺战争，德国在所谓解放战争³之后所遭到的那一切不幸，又将更残酷地压到它头上来，这个预言不是已经证实了吗？我们不是又经受了整整二十年的俾斯麦统治，非常法和对社会党人的迫害不是又代替了对蛊惑者的迫害⁴，而且照旧是警察专横，一丝不差地照旧是令人愤恨地解释法律吗？

这样一个预言，即认为吞并阿尔萨斯—洛林就会“迫使法国投入俄国的怀抱”，并且在这种吞并之后，德国或者是不得不公开地变为俄国的奴仆，或者是经过短暂的喘息之后不得不开始准备新

的战争，即“种族战争，反对斯拉夫种族与罗曼语种族联合势力的战争”⁵，难道不是一字不差地证实了吗？难道吞并法国的两省不是已迫使法国投入俄国的怀抱了吗？难道俾斯麦不是在整整二十年内徒劳地追求了沙皇的宠爱，不是比小小的普鲁士在未变成“欧洲第一强国”前惯于在“神圣的罗斯”跟前匍匐跪拜时所做的还要更卑恭地侍候了沙皇吗？难道战争的达摩克利斯剑不是经常悬在我们头上吗？这个战争在开始的第一天就会把各国君主间一切用书面文件结成的联盟化为灰烬；这个战争除了它的结局绝对不能预知可以断定以外，其余都不能确定；这个战争将是种族的战争，它将把整个欧洲交给 1500 万或 2000 万武装士兵去任意蹂躏；这个战争之所以还没有发生，只是因为连军事强国中最强有力者也因这个战争的最终结果绝对不能预知而感到畏惧。

所以，我们也就更应该使德国工人能够重新读到这两篇光辉地证明了 1870 年国际工人政策有远大预见性而大半已为人们所忘却的文件。

我关于这两篇宣言所说的话，对于《法兰西内战》也是同样适用的。5月 28 日，公社的最后一批战士在柏利维尔斜坡一带由于寡不敌众而殉难。只过了两天，即在 5 月 30 日，马克思就向总委员会宣读了自己的著作。他在这部著作中，把巴黎公社的历史意义用简短而有力的几笔描绘了出来，但是描绘得这样鲜明，尤其是描绘得这样真实，以致后来所有关于这个问题的全部浩繁文献都望尘莫及。

由于法国从 1789 年起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巴黎在最近五十年来形成了这样的局面：那里爆发的每次革命都不能不带有无产阶级的性质，就是说，用鲜血换取了胜利的无产阶级，在胜利之后总是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这些要求每次都依巴黎工人发展程

度不同，而或多或少地含意不明，甚至混乱不清；但是，所有这些要求归根到底都是要消灭资本家和工人间的阶级对立。至于这一点如何才能实现，的确谁也不知道。然而，这一要求本身，尽管很不明确，对现存社会制度已经含有一种威胁；提出这个要求的工人们往往还拥有武装；因此，掌握国家大权的资产者的第一信条就是解除工人的武装。于是，在每次工人赢得革命以后就产生新的斗争，其结果总是工人失败。

这种情形第一次发生于 1848 年。属于议会反对派的自由派资产者举行了要求改革的宴会，目的是要实现一种可能使他们的政党获得统治的选举改革。对政府进行的斗争日益迫使他们去求助于人民，于是他们不得不逐步把首位让给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中的急进阶层和共和阶层。可是，在这些阶层后面站有革命的工人，他们从 1830 年起已经得到了比资产者以至共和派所设想的要多得多的政治独立性。当政府和反对派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危机的时候，工人们就开始了巷战；路易-菲力普消失了，选举改革也同他一起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个共和国，而胜利的工人们甚至把它宣布为“社会”共和国。至于这个社会共和国究竟是什么意思，谁也不知道，就是工人们自己也不知道。但是，他们现在已经拥有武装，已经成了国家里的一股力量。所以当政的资产阶级共和派一感到他们脚下的根基已经相当稳固的时候，他们的第一件事就是解除工人的武装。这件事也就发生了，他们以直接违背诺言、公开嘲弄和企图把失业工人流放到僻远省份去而迫使工人举行了 1848 年的六月起义。政府预先为自己保证了压倒的优势力量。工人们经过了五天英勇斗争，终于失败了。接着就开始了对手无寸铁的俘虏的血腥屠杀，其残忍程度是从那招致了罗马共和国复灭的内战以来所未曾见过的。资产阶级第一次表明了，当无产阶级敢于作

为一个具有自己利益和要求的单独阶级来反对它的时候，它会以何等疯狂的残暴手段来向无产阶级报复。然而，和资产阶级在1871年的狂暴比较起来，1848年事件还只能算是一种儿戏。

惩罚接踵而来。如果说无产阶级还不能管理法国，那末资产阶级却是已经不能管理法国了。至少是当时不能，因为当时资产阶级大部分还是保皇主义的，并且分裂为三个皇朝政党和一个共和党。它的内部纷争，使得冒险家路易·波拿巴能把一切命脉，即军队、警察和行政机关等尽行占据，并且在1851年12月2日把资产阶级的最后堡垒即国民议会也炸毁了。这样就开始了第二帝国，即由一帮政治冒险家和金融冒险家剥削法国，同时工业又大大发展起来，这种发展在先前路易-菲力普那种狭隘而怯懦的制度下，在单只由大资产阶级中一小部分人独占统治的条件下，是完全不可能的。路易·波拿巴在一方面借口说要保护资产阶级反对工人，另一方面又借口说要保护工人反对资产阶级的名义下，夺去了资本家手中的政权；但他的统治同时又便利了投机事业与工业活动，简言之，使整个资产阶级的经济繁荣与发财致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不过，得到更大程度发展的还是贪污舞弊和普遍盗窃行为，它们以皇帝宫廷作为中心，从这种发财致富当中抽取巨额的红利。

但第二帝国又是号召崇尚法国沙文主义，即要求归还1814年失去的第一帝国的边疆，或者至少归还第一共和国的边疆。法兰西帝国局限在旧时君主国的疆界内，甚至局限在1815年更被削小了的疆界内的状态，是不能长久维持下去的。由此就需要不时进行战争并扩大疆土。但是，无论向什么地方扩张疆土，都不如靠占领德国莱茵河左岸地区那样厉害地激起法国沙文主义者的幻想。莱茵河上的一平方英里，在他们眼中要比阿尔卑斯山或其他任何

地方的十平方英里更贵重得多。只要第二帝国还存在，要求归还——一下子归还或是分次归还——莱茵河左岸地区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这个时间也就随着 1866 年的普奥战争到来了。波拿巴在期待“领土报酬”时既然受了俾斯麦的欺骗以及他自己的过分狡猾的观望政策的欺骗，也就除战争之外别无他路可走。而这个战争就在 1870 年爆发了，结果是把他推上了色当，随后又把他推上了威廉堡⁶。

必然的后果就是 1870 年 9 月 4 日的巴黎革命。帝国象纸房子一样倒塌了；共和国又重新宣告成立了。但是敌人已站立在门前；帝国的军队有的被围困于麦茨，没有解围的希望，有的在德国当俘虏。在这种危急关头，人民允许前立法团的巴黎议员们组成了“国防政府”。因为此时一切能荷枪作战的巴黎人都为防御目的编入了国民自卫军和武装起来，以致工人此时在国民自卫军中占有绝大多数，人们就更欣然地同意了这一点。但是过后不久，几乎完全由资产者组成的政府和武装的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就暴露出来了。10 月 31 日，有几个工人营攻下了市政厅，并且逮捕了一部分政府成员。可是，由于有人叛变，由于政府直接违背自己的诺言和几个小资产阶级营进行干涉，被捕者得到了释放；同时，为了避免在受敌军围困的城里爆发内战，原有的政府仍被允许继续执政。

最后，备受饥饿折磨的巴黎在 1871 年 1 月 28 日投降了，但它是在战争史上空前光荣的条件下投降的。炮台交出了，城墙上的大炮卸下了，基干团和流动自卫军交出了武器，被宣布为战俘。但是，国民自卫军保存了自己的枪械和大炮，只是同胜利者订立了停战协定。而胜利者不敢凯旋进入巴黎；他们只敢占据巴黎的一个小角落，其中有一部分还是公园，并且这个角落也只被他们占据了几天！在这几天内，曾把巴黎围困了 131 天的胜利者们自己处于

受巴黎武装工人包围的境地，这些工人机警地监视着，不让一个“普鲁士人”越出让给外国侵略者的那个角落的狭窄界限。巴黎的工人们竟使一支使帝国一切军团放下了武器的军队对他们表示这样的尊敬。跑到这里来向革命策源地进行报复的普鲁士容克们，竟不得不正是在这个武装的革命面前恭恭敬敬地停下来，向它敬礼！

在战争时期，巴黎工人只是要求坚决继续进行斗争。可是现在，在巴黎投降后已经缔结了和约⁷的时候，新政府的首脑梯也尔不得不确信，只要巴黎工人还握有武器，有产阶级——大土地占有者和资本家——的统治就时刻处于危险境地。他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企图解除工人的武装。3月18日，他派了基干部队去夺取国民自卫军的大炮，这些大炮是在巴黎被围时期由公众捐款制造的。这个企图没有得逞；全巴黎象一个人一样奋起自卫，于是巴黎和盘踞在凡尔赛的法国政府之间的战争就开始了。3月26日，巴黎公社被选出，3月28日正式宣告成立。在此以前执行政府职能的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在颁布法令废除了声名狼藉的巴黎“风纪警察”之后，把自己的全权交给了公社。3月30日公社取消了征兵制和常备军，宣布由一切能荷枪作战的公民所组成的国民自卫军为唯一的武装力量。公社取消了从1870年10月至1871年4月的一切房租，规定把已经付出的房金转作以后的预付房金，并且制止拍卖城市当铺里所有的典押物品。同日又批准了选入公社的外国人作为公社委员，因为“公社的旗帜是世界共和国的旗帜”⁸。4月1日规定，公社公务人员（因而也包括公社委员本身）的薪金，不得超过6000法郎（4800马克）。次日颁布了一项法令，宣布教会与国家分离，取消国家用于宗教事务的一切开支，并把一切教会财产转为国家财产；4月8日又据此命令把一切宗教象征、神像、教义、祷告，总之，把“有关个人良心的一切”，从学校中革除出去⁹，这道

命令随即逐步实行起来。4月5日，鉴于凡尔赛军队每天都枪毙被俘的公社战士，颁布了拘禁人质的法令，可是这项法令始终没有贯彻执行。4月6日，国民自卫军第一三七营拖出了断头机，并在全民欢呼下把它当众烧毁了。4月12日，公社决定毁掉旺多姆广场上由拿破仑在1809年战争后用夺获的敌军大炮铸成的凯旋柱，因为它是沙文主义和民族仇恨的象征。5月16日，这项决议执行了。4月16日，公社命令登记工厂主停工的工厂，拟定把这些工厂的原有工人联合成一些合作社来开工生产的计划，并拟定把这一切合作社结成一个大联盟的计划。4月20日，公社废止了面包工人的夜工，取消了工作介绍所，因为这些工作介绍所从第二帝国时起已由警察局指派的头等劳工剥削者们独占了；这些工作介绍所都交由巴黎20个区的区政府接管。4月30日，公社下令封闭当铺，因为这些当铺是专供私人用来剥削工人并与工人获取劳动工具和信用借款的权利相抵触的。5月5日，公社决定拆毁专为处死路易十六赎罪而建筑的小教堂。

这样，从3月18日起，先前被抵抗外敌侵犯的斗争所遮蔽了的巴黎运动的阶级性质，便突出而鲜明地表现出来了。因为参加公社的差不多都是工人或公认的工人代表，所以它所通过的决议也就完全是无产阶级性质的。有些决议把共和派资产阶级只是由于怯懦才不肯实行的、而是工人阶级自由活动的必要基础的那些改革以法令形式确定下来，例如实行宗教对国家来说仅仅是私人事的原则。有些决议则直接有利于工人阶级，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深深刺入了旧社会制度的内脏。但是在一个被围困的城市内，实行这一切措施最多只能做出一个开端。从5月初起，全副力量都用到对凡尔赛政府的数量日益增多的军队进行斗争上去了。

4月7日，凡尔赛军队在巴黎西线夺去了讷伊近旁的塞纳河

渡口；但是，4月11日，他们向南线的进攻被艾德将军所击退，并且蒙受了极大的损失。那些曾经斥责普军炮击巴黎是亵渎神圣的人们，现在自己不断地炮击巴黎。这些人现在已在乞求普鲁士政府尽速遣返在色当和麦茨被俘的法国士兵，以便为他们夺取巴黎。由于这些军队逐渐开到，凡尔赛的兵力在5月初获得了决定的优势。这种情况在4月23日已经表现得很明显了，梯也尔在这一天停止了根据公社提议开始进行的谈判，这个谈判的内容是以扣留在巴黎的人质巴黎大主教^①及其他许多神甫交换当时囚禁在克勒伏的两度当选为公社委员的布朗基一人。这种情况在梯也尔改变说话口气中表现得更加明显；他先前说话是很慎重和很含糊的，现在忽然变得蛮横无礼、粗暴和带有威胁了。在南线，凡尔赛军队在5月3日占据了木兰-萨克多面堡，9日占据了伊西堡垒，它被炮火完全轰平，14日占据了旺夫堡垒。在西线，他们占据了一直伸延到城墙跟前的许多村庄和建筑物，逐步推进到了要塞主墙近旁；5月21日，由于有人叛变以及在那里驻防的国民自卫军疏忽大意，他们闯进了城内。控制北部和东部炮台的普鲁士人，让凡尔赛军队通过城市北部按照停战协定条款禁止他们去的地区，从而在一条广阔的战线上实行进攻，这条战线是巴黎人根据停战协定应该认为有保证不受侵犯，因而防御得很弱的。正因为如此，巴黎西半部即最繁华的市区的抵抗比较弱；侵入的敌军愈接近首都的东半部即真正的工人区，所遇到的抵抗就愈激烈愈顽强。只是在经过八天的斗争之后，最后一批公社捍卫者才在柏利维尔和麦尼尔蒙坦的高地上阵亡，于是在整整一个星期内对赤手空拳的男女老幼的愈来愈残酷的屠杀达到了顶点。用后装枪杀人还嫌不够快，于

① 达尔布瓦。——编者注

是便用多管炮去成百成千地屠杀战败者。最后一次大屠杀是在拉雪兹神甫墓地上的一堵墙近旁进行的，这堵“公社社员墙”至今还直立在那里，作为一个哑的但却雄辩的证人，说明当无产阶级敢于起来捍卫自己的权利时，统治阶级的疯狂暴戾能达到何种程度。后来，当发觉不可能把一切人杀尽的时候，就开始了大逮捕，并从俘虏群中任意拉出一些牺牲品来枪毙，其余的人则赶到大营房里去，让他们在那里等待军事法庭的审判。围困巴黎东北部的普鲁士军队奉令不得让一个逃亡者通过，但是军官看见士兵对人道感比对上司命令更加听从时，往往装作没看见。特别的荣誉应该归于萨克森军，它非常人道，放走了许多分明是公社战士的人。

如果我们今天在过了二十年之后来回顾一下 1871 年巴黎公社的活动和历史意义，我们就会发觉，对《法兰西内战》中的叙述还必须做一些补充。

公社委员分为多数和少数两派：多数派是布朗基主义者，他们在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中也占统治地位；少数派是国际工人协会会员，他们多半是蒲鲁东社会主义学派的信徒。那时，绝大多数的布朗基主义者不过凭着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本能才是社会主义者；其中只有很少一些人通过熟悉德国科学社会主义的瓦扬，比较清楚地了解基本原理。因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公社在经济方面忽略了很多据我们现在看来是当时必须做到的事情。最令人难解的，自然是公社对法兰西银行所表示的那种不敢触犯的敬畏心情。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银行掌握在公社手中，这会比扣留一万个人质还有更大的意义。这会迫使整个法国资产阶级对凡尔赛政府施加压力，要它同公社议和。但是，更令人惊异的是，虽然公社是由布朗基主义者和蒲鲁东主义者组成的，但它的措施却往

往是正确的。很明显，对于公社在经济方面的各种法令，无论是这些法令的优点或缺点，首先应当由蒲鲁东主义者负责；而对于公社在政治方面的行动和失策，则应当由布朗基主义者负责。正如政权落到空谈家手中时常有的情形那样，无论是蒲鲁东主义者或布朗基主义者，都按照历史的讽刺，做出了恰恰与他们学派的信条相反的事情。

蒲鲁东这个小农和手工业师傅的社会主义者，对联合简直是切齿痛恨的。他说：联合的坏处多于好处，它在本质上无益而且甚至有害，因为它是束缚工人自由的锁链之一；它是空洞的信条，无用而且累赘，既违反工人的自由，又违反节省劳动的原则；它的缺点比优点发展得更快；与它相反，竞争、分工、私有制则是有益的经济力量。工人的联合只适用于特殊场合，而据蒲鲁东说，这种特殊场合就是大工业和大企业，例如铁路（见《革命的总观念》第3篇¹⁰）。

但是，在1871年，大工业甚至在手工艺品生产中心的巴黎，也已经不是什么特殊现象了，所以公社最重要的法令规定要组织大工业以至工场手工业，这种组织不但应该在每一个工厂内以工人的联合为基础，而且应该把这一切联合体结成一个大的联盟；简言之，这种组织，正如马克思在《内战》中完全正确地指出的，归根到底必然要导至共产主义，即导至与蒲鲁东学说正相反的方面。正因为如此，公社同时是蒲鲁东社会主义学派的坟墓。现在这个学派在法国工人中间已经绝迹了；目前这里在“可能派”中间也象在“马克思主义派”中间一样，完全是由马克思的理论统治着。只有在“急进的”资产阶级中间还可以遇到蒲鲁东主义者。

布朗基主义者的遭遇也并不好些。他们是按阴谋学派的精神培养出来的，是由这个学派所要求的严格纪律团结在一起的，他们

认为少数坚决和组织严密的分子在顺利的条件下不仅能够夺得政权，而且能够用极果断坚决的措施来保持政权，直到把人民群众吸引到革命方面，并使他们聚集在少数领袖的周围。这首先要求把全部权力最严格地专制地集中在新的革命政府手中。大多数正是由这些布朗基主义者构成的公社，在实际上做了些什么呢？它在向法国各省人民发表的一切宣言中，号召他们把法国的所有公社同巴黎联合起来，组成一个自由的联邦，一个第一次真正由国民自己建立的全国性组织。正是军队、政治警察、官僚这种旧的集权政府的压迫权力，即由拿破仑在 1798 年建立，以后一直被每届新政府当做合意的工具接收并利用来反对自己的敌人的权力，应该在全国各地复没，正如它已在巴黎复没一样。

公社一开始就得承认，工人阶级在获得统治时，不能继续运用旧的国家机器来进行管理；工人阶级为了不致失去刚刚争得的统治，一方面应当铲除全部旧的、一直被利用来反对它的压迫机器，另一方面应当以宣布它自己所有的代表和官吏毫无例外地可以随时撤换，来保证自己有可能防范他们。以往国家的特征是什么呢？社会起初用简单分工的办法为自己建立了一些特殊的机关来保护自己共同的利益。但是，后来，这些机关，而其中主要的是国家政权，为了追求自己特殊的利益，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这种情形不但在例如世袭的君主国内可以看到，而且在民主的共和国内也可以看到。正是在美国，“政治家”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厉害地构成国民中一个特殊的和富有权势的部分。那里，两个轮流执政的大政党中的每一个政党，都是由这样一些人操纵的，这些人把政治变成一种收入丰厚的生意，拿合众国国会和各州议会的议席来投机牟利，或是以替本党鼓动为生，而在本党胜利后取得相当职位作为报酬。大家知道，美国人在最近三十年来是如何

千方百计想要摆脱这种难堪的桎梏，可是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愈来愈深地陷入到贪污腐化的泥沼中去。正是从美国的例子上可以最明显地看出，起初只应充当社会的工具的国家政权怎样逐渐脱离社会而独立。那里没有王朝，没有贵族，除了监视印第安人的一小群士兵之外没有常备军，没有那种拥有固定职位与领取年金权利的官僚。然而我们在那里可以看到两大帮政治投机家，他们轮流执掌政权，用最肮脏的手段为最卑鄙的目的运用这个政权，而国民却无力对付这两个大的政客集团，这些人表面上是替国民服务，实际上却是统治和掠夺国民的。

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了两个正确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公社所曾付过的最高薪金是 6 000 法郎。这样，即使公社没有另外给各代议机构的代表规定限权委托书，也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

这种炸毁旧的国家政权并以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来代替的情形，已经在《内战》第三章中作了详细的描述。但是这里再一次简单地谈到这种代替的几个特点，这是必要的，因为恰巧在德国，对国家的迷信，已经从哲学方面转到资产阶级甚至很多工人的一般意识中去了。按照哲学家的学说，国家是“观念的实现”，或是译成了哲学语言的尘世的上帝王国，也就是永恒的真理和正义所借以实现或应当借以实现的场所。由此就产生了对国家以及一切有关国家的事物的崇拜，由于人们从小就习惯于认为全社会的公共事业和公共利益只能用旧的方法来处理和保护，即通过国家及

其收入极多的官吏来处理和保护，这种崇拜就更容易生根。人们以为，如果他们不再迷信世袭君主制而拥护民主共和制，那就已经是非常大胆地向前迈进了一步。实际上，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这一点即使在民主共和制下也丝毫不比在君主制下差。国家最多也不过是无产阶级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胜利以后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能够把这全部国家废物完全抛掉为止。

近来，社会民主党的庸人又是一听到无产阶级专政就吓得大喊救命。先生们，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看巴黎公社吧。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弗·恩格斯

1891年3月18日，巴黎公社
二十周年纪念日于伦敦

载于1890—1891年《新时代》杂志
第28期(第2卷)和1891年在柏林
出版的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一书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俄文第二版第22卷译出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 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¹¹

致国际工人协会欧洲和美国全体会员

在 1864 年 11 月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我们已经说过：“工人阶级的解放既然要求工人们兄弟般的合作，那末当存在着那种为追求罪恶目的而利用民族偏见并在掠夺战争中洒流人民鲜血和浪费人民财富的对外政策时，他们又怎么能完成这个伟大任务呢？”我们当时用这样的话描述了国际所要求的对外政策：“……努力做到使私人关系间应该遵循的那种简单的道德和正义的准则，成为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中的至高无上的准则。”¹²

路易·波拿巴利用法国的阶级斗争篡夺了政权，并且以不时进行的对外战争来延长了自己的统治，难怪他一开始就把国际看做危险的敌人。在全民投票的前夕，他在巴黎、里昂、卢昂、马赛、布勒斯特以及其他地方，即在法国全境向国际工人协会各领导委员会的委员举行进攻，借口说国际是一个秘密团体，正在阴谋杀害他；这种借口之荒唐无稽，不久就由他自己的法官们揭穿了¹³。国际的法国各个支部的真正罪过究竟何在呢？就在于它们曾经公开而断然地告诉法国人民：参加全民投票，就等于投票赞成对内专制和对外战争。的确，由于它们的努力，在法国所有的大城市，所有的工业中心，工人阶级都一致起来反对了全民投票。不幸的是，农村地区的极端愚昧无知占了上风。欧洲各国的交易所、政府、统治

阶级和报刊都欢庆全民投票的成功，认为这是法国皇帝对法国工人阶级的辉煌胜利；实际上，全民投票并不是要杀害某一个人，而是要杀害几国人民的信号。

1870年7月的军事阴谋不过是1851年12月的政变¹⁴的修正版。初看起来，事情是如此的荒谬，以致法国不愿意相信战争传闻的真实性。它宁肯相信那个认为部长们的好战言论不过是交易所把戏的议员①。当7月15日正式向立法团宣布了关于战争的消息时，全体反对派都拒绝批准初步用费，甚至梯也尔也申斥说战争是一种“很讨厌的”事情；巴黎所有一切独立的报纸都谴责了这个战争，并且，说也奇怪，外省的报纸也与它们几乎采取一致行动。

这时，国际的巴黎会员又开始活动起来。在7月12日的《觉醒报》¹⁵上，他们公布了《告全世界各民族工人书》，现在我们从中摘引如下几段：

“在保持欧洲均势和维护民族荣誉的借口下，政治野心又威胁世界和平了。法国、德国、西班牙的工人们！把我们的呼声联合成为共同反对战争的怒吼吧！…… 纠夺霸权的战争，或维护某一王朝利益的战争，在工人看来只能是犯罪的胡作非为。我们渴望和平、劳动和自由，我们坚决反对那些能赎免‘血税’并利用社会灾难来进行新的投机的人的黩武号召！…… 德国弟兄们！我们相互仇视只会使专制制度在莱茵河两岸都获得完全胜利…… 全世界的工人们！不论我们的共同努力在目前会产生怎样的结果，我们这些不分国界的国际工人协会会员，总是代表法国工人向你们表示良好的祝愿和敬意，作为我们牢不可破的团结的保证。”

在我们的巴黎支部发表这个宣言以后，接着法国各地也发出了许多类似的宣言。我们在这里只能引用一个由塞纳河岸讷伊支部发出的宣言，它公布在7月22日的《马赛曲报》¹⁶上，其中说：

① 茹尔·法夫尔。——编者注

“这次战争是正义的吗？不！这次战争是民族的吗？不！这完全是王朝的战争。为了人道，为了民主，为了法国的真正利益，我们完全并坚决赞同国际对战争的抗议。”

这些抗议表达出了法国工人的真实情感，这点不久就为一个有趣的事件所证明了。当时，在路易·波拿巴任总统时初次纠集起来的十二月十日匪帮被换上了工人服装，放到巴黎街道上去表演战争狂热^①，市郊的真正工人们立刻就出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拥护和平的示威，使得警察局长比埃特里不得不立即下令今后完全禁止在街上举行任何示威游行，借口是说忠诚的巴黎人民已经充分表达了自己蕴藏已久的爱国情感，已经发泄了自己无穷尽的战争热情。

不管路易·波拿巴同普鲁士的战争的结局如何，第二帝国的丧钟已经在巴黎敲响了。第二帝国的结局也会象它的开端一样，不过是一场可怜的模仿剧。但是不应该忘记，正是欧洲各国政府和统治阶级让路易·波拿巴在十八年内表演了复辟帝国的残酷笑剧。

在德国方面，这次战争是防御性的战争。但是，究竟是谁把德国弄到必须处于防御的地位呢？是谁使路易·波拿巴有可能对德国进行战争呢？正是普鲁士！正是俾斯麦曾和这个路易·波拿巴暗中勾结，以期摧毁普鲁士内部的民主反对派，并使霍亨索伦王朝兼并德国。如果萨多瓦之役^②不是打胜而是打败了，那末法国军队就会以普鲁士盟友资格蹂躏德国。普鲁士在得胜之后，难道有片刻想过要以一个自由的德国去和一个被奴役的法国相对抗吗？恰恰相反！它细心保存了自己旧制度固有的一切妙处，并且还加上

① 1891年德文版为“用印第安人的战舞煽起战争狂热”。——译者注

了第二帝国的一切奸猾伎俩：它的实际的专制制度和虚伪的民主精神，它的政治欺骗把戏和财政欺诈手腕，它的漂亮的言词和最下流的诈骗行为。这样，以前只是在莱茵河的一岸盛行的波拿巴制度，现在在它的另一岸上也同样盛行起来了。在这种情形下，除了战争，还能期待什么呢？

如果德国工人阶级容许目前这场战争失去纯粹防御性质而变为反对法国人民的战争，那末无论胜利或失败，都同样要产生灾难深重的后果。德国在它的所谓解放战争之后所遭到的那一切不幸，又将更残酷地压到它头上来。

然而，国际的原则在德国工人阶级中间得到了很广泛的传播，并扎下了很深的根，使我们不必担心会发生这种悲惨的结局。法国工人的呼声已经在德国得到了反响。7月16日在不伦瑞克举行的声势浩大的工人大会宣布完全赞同巴黎宣言，坚决排斥任何对法国持民族仇恨态度的思想，并且通过一个决议，其中说道：

“我们反对一切战争，特别是反对王朝战争…… 我们被迫参加这场作为不可免的坏事的防御战争，深感悲痛，但同时我们号召德国全体工人阶级设法防止这种深重社会灾难的重演，力求使各国人民都有权力来自己决定战争与和平问题，从而使各国人民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

在开姆尼斯，代表5万萨克森工人的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了如下的决议：

“我们以德国民主派的名义，特别以参加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名义宣布，目前这场战争完全是王朝战争…… 我们很高兴地握住法国工人们伸给我们的兄弟的手…… 我们谨记着国际工人协会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永远也不会忘记世界各国的工人都是我们的朋友，而世界各国的专制君主都是我们的敌人。”¹⁹

国际的柏林支部也回答巴黎宣言说：

“我们全心全意地支持你们的抗议…… 我们庄严地宣誓：无论是军号

的声音或大炮的轰鸣，无论是胜利或失败，都不能使我们离开我们全世界工人团结的共同事业。”

唯愿如此！

在这场自杀性斗争的背景上，显现出俄国的阴森形象。不祥的征兆是，现今这场战争的信号，恰巧是在俄国政府已经完成了对它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铁道线建筑工程并且已向普鲁特河方面集中了军队的时刻发出的。虽然德国人完全可以指望在自己反对波拿巴侵犯的防御战争中得到同情，但是只要他们容许普鲁士政府请求哥萨克援助或只是接受这种援助，他们便立刻会失去这种同情。他们应该记得，德国在它进行了反对拿破仑第一的解放战争以后，曾经有数十年之久匍匐跪倒在沙皇脚下。

英国工人阶级向法国工人和德国工人伸出了友谊的手。他们深信，不管当前这场可恶的战争怎样结束，全世界工人的联合终究会根绝一切战争。官方的法国和官方的德国彼此进行同室操戈的斗争，而法国的工人和德国的工人却互通和平与友谊的音讯。单是这一件史无前例的伟大事实，就使人们可以展望更加光明的未来。这个事实表明，同那个经济贫困和政治昏聩的旧社会相对立，正在诞生一个新社会，而这个新社会的国际原则将是和平，因为每一个民族都将有同一个统治者——劳动！

这个新社会的先声就是国际工人协会。

* * *

总 委 员 会：

罗伯特·阿普耳加思	乔治·米尔纳
马丁·詹·布恩	托马斯·莫特斯赫德
弗雷德里克·布列德尼克	查理·默里
考威尔·斯特普尼	乔治·奥哲尔

约翰·黑尔斯	詹姆斯·帕涅尔
威廉·黑尔斯	普芬德
乔治·哈里斯	吕耳
弗里德里希·列斯纳	约瑟夫·谢泼德
勒格廖利耶	斯托耳
乌·林特恩	施穆茨
莫里斯·捷维	威·唐森

通 讯 书 记:

欧仁·杜邦 法国
卡尔·马克思 德国
奥·赛拉叶 比利时、荷兰和西班牙
海尔曼·荣克 瑞士
卓万尼·波拉 意大利
安东尼·扎比茨基 波兰
詹姆斯·柯恩 丹麦
约·格·埃卡留斯 美国

执行主席 本杰明·鲁克拉夫特

财务委员 约翰·韦斯顿

总 书 记 约翰·格奥尔格·埃卡留斯

1870年7月23日于伦敦西中央区
海-霍耳博恩街256号

卡·马克思写于1870年7月19—23日

原文是英文

1870年7月用英文以传单形式刊印，
1870年8—9月又用德文、法文和俄文
印成传单，并在期刊上发表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文选》
两卷集1958年英文版第1卷
译出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 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²⁰

致国际工人协会欧洲和美国全体会员

在我们 7 月 23 日发表的第一篇宣言中，我们说过：

“第二帝国的丧钟已经在巴黎敲响了。第二帝国的结局也会象它的开端一样，不过是一场可怜的模仿剧。但是不应该忘记，正是欧洲各国政府和统治阶级让路易·波拿巴在十八年内表演了复辟帝国的残酷笑剧。”①

这样，在军事行动尚未开始以前，我们已把波拿巴主义的肥皂泡看做是过去的事情了。

我们对于第二帝国的生命力没有看错。同样，我们担心在德国方面“战争失去纯粹防御性质而变为反对法国人民的战争”②，也没有错。防御的战争确实是以路易·波拿巴投降、色当失陷和巴黎宣告成立共和国而终结了。但是还在这些事件发生以前很久，当波拿巴军队的腐朽透顶的情况暴露无遗的时候，普鲁士掌权的武人奸党已经决定要进行掠夺了。诚然，当时在这方面有一个相当讨厌的障碍，即国王威廉自己在战争开始时发表的声明。威廉在北德意志联邦国会上发表的御前演说中，曾庄严地声明，他是同法国皇帝作战，不是同法国人民作战。8月11日，他发布了告

① 见本书第 16 页。——译者注

② 见本书第 17 页。——译者注

法兰西民族书，其中说道^①：

“由于拿破仑皇帝在陆上和海上向以前愿意、现在仍然愿意同法国人民和平相处的德意志民族发动了进攻，为了打退他的进攻，我才负起了指挥德国军队的责任，而战争事变的进程使我不免要越过法国的国界。”

威廉为了肯定战争的防御性质，不仅声明说他负起指挥德国军队的责任只是“为了打退进攻”，并且还补充说，只是“战争事变的进程”才使他不免越过了法国的国界。自然，防御战争并不排斥“战争事变的进程”所要求采取的攻势行动。

因此，这个虔诚的国王曾向法国和全世界保证他所进行的是纯粹防御性质的战争。怎样才能使他摆脱这一庄严保证的约束呢？导演这出戏的人们便不得不把事情弄成这样，仿佛威廉是心不由自主地顺从了德意志民族的不可抗拒的要求。他们立刻给了德国自由资产阶级连同它那帮教授和资本家、市议员和新闻记者们一个暗示。这个在1846—1870年间争取公民自由的斗争中曾表现过空前犹豫、无能和怯懦的资产阶级，看到要在欧洲舞台上扮演凶猛吼叫的德国爱国主义狮子的角色，当然是欢欣若狂。它戴上公民独立的假面具，装出一付样子，仿佛它在逼使普鲁士政府执行这个政府自己的秘密计划。它深自忏悔不该那样长久地和近乎虔诚地相信路易·波拿巴毫无罪过，因此它大声疾呼要求把法兰西共和国撕成碎块。让我们略微听一听这些爱国勇士们所用的漂亮论据吧。

他们不敢武断说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居民渴望投入德国怀抱。恰恰相反。为了惩罚这些居民对法国的爱国情感，斯特拉斯堡（一

^① 在马克思翻译并于1870年以单行本刊印的德文本中删去了这句话和以下的引文，引文以后一直到“他们立刻给了……一个暗示”这一段的文字也有所删节。——编者注

个有一座居高临下的独立卫城的城市)被“德意志的”炸弹野蛮地滥轰了六天之久,焚毁了城市,杀害了大批赤手空拳的居民!当然嘛!这两省的领土先前有个时候曾经隶属于早已寿终正寝的德意志帝国。因此,这块领土连同它所有的居民,看来应该当做德国固有财产加以没收。如果依照古玩爱好家的想法恢复昔日欧洲的地图,那就千万不要忘记,先前勃兰登堡选帝侯曾以普鲁士领主身分做过波兰共和国的藩臣²¹。

但是,更加机灵的爱国者们要求阿尔萨斯和洛林德语区的土地,说这是防止法国侵略的“物质保证”。因为这种卑鄙的口实曾把许多头脑迟钝的人弄得糊里糊涂,我们认为有责任比较详细地谈谈这一点。

毫无疑问,阿尔萨斯的一般地势(和莱茵河对岸比较起来),加上有斯特拉斯堡这样一个大筑垒城市几乎位于巴塞尔到盖尔曼尔斯海姆的半路上,使法国入侵南德意志十分容易,而从南德意志入侵法国就特别困难。同样毫无疑问,阿尔萨斯和洛林德语区并入德国,会大大加强南德意志的边防,因为那时南德意志将能够控制全部佛日山脉和作为北面关隘屏障的堡垒。如果麦茨也被并入,那末法国立刻就会失去攻击德国的两个主要作战基地,但是这并不能阻止它在南锡或凡尔登建立新的基地。德国拥有科布伦茨、美因兹、盖尔曼尔斯海姆、拉施塔特和乌尔姆等专门对付法国的作战基地,并且在这次战争中就有效地利用了这些基地。难道德国对有丝毫根据嫉妒在这方面只有两个较重要要塞即麦茨和斯特拉斯堡的法国吗?此外,斯特拉斯堡只有在南德意志与北德意志分离的时候,才能使南德意志受到威胁。从1792年到1795年,南德意志一次也没有从这方面受到侵犯,因为普鲁士当时参加了反对法国革命的战争;但是,当普鲁士于1795年缔结了单独和约²²而把

南方置之不顾的时候，南德意志就开始受到以斯特拉斯堡为作战基地的侵犯，并且一直继续到 1809 年。实际上，统一的德国，只要象在这一次战争中所做的那样，把它的全部军队集中在萨尔鲁伊和兰道之间，并且沿美因兹到麦茨的道路一线进攻或应战，那末它在任何时候都能使斯特拉斯堡以及驻在阿尔萨斯的任何法国军队无以为害。只要德国的大部军队驻扎在那里，那末从斯特拉斯堡向南德意志进犯的任何法国军队，都有被包围和交通线被切断的危险。如果最近这次战役有所证明的话，那就是证明了从德国向法国进攻较为容易。

但是，老实说，把军事上的考虑当成决定国界的原则，岂不完全是一种无稽之谈和时代错误吗？如果按照这条规则行事，那末奥地利还可以要求取得威尼斯，要求取得明乔河一线；而法国为了保护巴黎就可以要求取得莱茵河一线，因为巴黎从东北受到进攻的危险，无疑比柏林从西南受到进攻的危险大得多。如果国界应当根据军事利益决定，那末要求就会毫无止境，因为任何一条战线都必然有其缺点，可能用兼并邻近新地区的办法加以改进；并且这种国界永远也无法最终和公允地划定，因为每一次总是战胜者强迫战败者接受自己的条件，从而播下新战争的种子。

全部历史的教训就是这样。这对于整个民族来说和对于个人来说都是一样的。为了剥夺他们的进攻能力，就必须剥夺他们的防御手段。不但要勒住他们的喉咙，而且要置他们于死地。如果说从前曾经有过一个战胜者力求以“物质保证”来摧毁对方民族的力量的话，那就是拿破仑第一：他缔结过提尔西特和约，并用这个和约来对付普鲁士以及德国的其他地区。然而，几年之后，他那赫赫威势就象一根腐朽的芦苇似的被德国人民摧毁了。但是，普鲁士现在在它最狂妄的幻想中能够或者敢于向法国索取的“物质保

证”，难道能够和拿破仑第一当日向德国本身索取过的相比吗？这一次，结果也会是同样悲惨的。历史将来给予报应的时候，决不会是看你从法国割去了多少平方英里的土地，而是看你在十九世纪下半叶重新推行掠夺政策的这种罪恶有多大。

条顿族的爱国主义的喉舌们会说：但是你们不应该把德国人同法国人混为一谈呀。我们所要的不是荣誉，而是安全。德国人本质上是爱好和平的民族。在他们明智的监视下，甚至掠夺行为也从未来战争的原因变成了永久和平的保证。当然不是德国人在1792年为了用刺刀击溃十八世纪革命的崇高目的而侵入法国呀！也不是德国人在奴役意大利、镇压匈牙利以及瓜分波兰的时候染污了双手呀！在德国现行军事制度下，所有成年男子都被分成现役常备军和归休常备军两部分，并且这两部分都必须绝对服从自己的天赐长上，——这样的制度当然是维护和平的“物质保证”，并且是文明的最高目的！在德国，也如在任何其他地方一样，有权势者的走卒总是用虚伪的自我吹嘘毒化社会舆论。

这帮德国爱国志士看到法国的麦茨和斯特拉斯堡这两个要塞就装出气愤的样子，但是对于俄国在华沙、莫德林、伊万城等处布设的庞大筑垒体系，他们却不认为有什么不好。他们在受波拿巴侵犯的惨象面前周身发抖，而他们对于受俄皇监护的奇耻大辱却置若罔闻。

正如在1865年，路易·波拿巴和俾斯麦相互保证一样，在1870年，哥尔查科夫同样也和俾斯麦相互保证²³。正如路易·波拿巴自鸣得意地认为1866年的战争将使奥地利和普鲁士都筋疲力竭，因而使他成为德国命运的最高主宰一样，亚历山大也自鸣得意地认为1870年的战争将使德国和法国都筋疲力竭，因而使他成为西欧大陆命运的最高主宰。正如第二帝国认为自己不能与北德

意志联邦并存一样，专制的俄国也定会感觉到普鲁士领导的德意志帝国是对它的威胁。这原是旧的政治制度的规律。在这个旧制度范围内，一国之所得即是他国之所失。沙皇能对欧洲发生极大的影响，是由于他对德国有传统的控制力。当俄国内部的那些火山似的社会力量有可能震撼专制制度最深固的根基时，难道沙皇能容许丧失他的这种国外威势吗？俄国的报纸已经用波拿巴的报纸在1866年战争结束后所用的口气说起话来了。难道条顿族的爱国志士真的以为他们迫使法国投入俄国的怀抱，就可以保证德国获得自由与和平^①吗？如果军事上的侥幸、胜利后的骄横以及王朝的阴谋把德国推到宰割法国的道路上去，那末德国就只有两条路可走。它必须不顾一切成为俄国掠夺政策的公开的工具^②，或者是经过短暂的喘息之后重新开始准备进行另一次“防御”战争，但不是进行那种新发明的“局部”战争，而是进行种族战争，即反对斯拉夫种族和罗曼语种族联合势力的战争^③。

德国工人阶级坚决支持了它所无力阻止的这场战争，把这看做是争取德国独立、争取法国和全欧洲从第二帝国这个可恶的梦魔的羁绊下解放出来的战争。正是德国的产业工人，和农村的劳动者一起，撇下了半饥半饱的家庭而组成了英勇的军队的骨干。他们在国外战场上历尽艰辛之后，还要在家里再熬受悲惨境遇的折磨^④。所以他们现在也要求得到“保证”，——保证使他们付出的无

① 1870年德文版中在“自由与和平”前面还有“独立”一词。——编者注

② 1870年德文版中增加“这符合霍亨索伦王朝的传统”等字。——编者注

③ 1870年德文版中增加下列字句：“这就是昏聩的资产阶级爱国者为德国‘保证’的和平前景。”——编者注

④ 1870年德文版中增加下列字句：“而爱国主义的空谈家会安慰他们说，资本无祖国，而工资是由反爱国主义的、国际主义的供求规律来调节的。因此，难道工人阶级还不应该表示自己的态度，不再让资产阶级老爷们用他们的名义来讲话。”——编者注

数牺牲不致虚掷，使他们获得自由，使他们对波拿巴军队的胜利不会象 1815 年那样变成德国人民的失败²⁴。而他们所要求的第一个这样的保证，就是使法国获得光荣的和平并承认法兰西共和国。

德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在 9 月 5 日发表了一个宣言，坚决要求这些保证。宣言说：

“我们抗议兼并阿尔萨斯和洛林。我们了解我们是代表德国工人阶级说话的。为了法国和德国的共同利益，为了和平和自由的利益，为了西欧文明向东方野蛮进行斗争的利益，德国工人决不能容忍兼并阿尔萨斯和洛林……我们将和我们全世界的工人同志们一起，忠实地拥护无产阶级共同的国际事业！”²⁵

不幸，我们不能指望他们马上获得成功。既然法国工人在和平时期尚且不能阻止侵略者，那末德国工人在军事狂热时期又怎么会有较多的希望制止住胜利者呢？德国工人的宣言要求把路易·波拿巴当做普通罪犯引渡给法兰西共和国。他们的统治者却已在竭力设法重新把他扶上土伊勒里宫的宝座，认为他是能葬送法国的最适当的人选。可是无论如何，历史会证明，德国工人决不是象德国资产阶级那样由脆弱的材料造成的。他们一定会尽到自己的责任。

我们同他们一起为法国建立共和国而欢呼，但是同时我们感到不安，我们唯愿这种不安是无根据的。这个共和国并没有推翻王位，而只是^①占据了它所留下的空位子。它不是作为一种社会的成果，而是作为一种民族的防御措施宣告成立的。它掌握在一个临时政府手中；组成这个政府的，一部分人是声名狼藉的奥尔良党人，一部分人是资产阶级的共和党人，而后者中间某些人又在

① 1870 年德文版中有“依靠德国的刺刀”等字。——编者注

1848年六月起义时期²⁶沾染了洗不清的污点。这个政府的成员之间的职务分配情形是不妙的。奥尔良党人夺取了军队和警察这一些重要据点，而冒牌的共和党人则只是分到了一些空谈的部门。这个政府的最初几个步骤中已经明显地表明，这个政府不只是从帝国那里承袭了一大堆残砖断瓦，而且还承袭了它对工人阶级的恐惧。他们现在用共和国的名义狂言大语地允诺一些不可能兑现的事情，其目的不是要掀起一种拥护“可能的”政府的喧嚣吗？这个共和国依照它那帮资产阶级首脑中的某些人的意图，不是只应该充当奥尔良王朝复辟用的跳板和桥梁吗？

由此可见，法国工人阶级正处于极困难的境地。在目前的危机中，当敌人几乎已经在敲巴黎城门的时候，一切推翻新政府的企图都将是绝望的蠢举。法国工人应该执行自己的公民职责^①，但同时他们不应当为1792年的民族回忆所迷惑，就象法国农民曾经为第一帝国的民族回忆所欺骗那样。他们不是应该重复过去，而是应该建设将来。唯愿他们镇静而且坚决地利用共和国的自由所提供的机会，去加强他们自己阶级的组织。这将赋予他们以海格立斯般的新力量，去为法国的复兴和我们的共同事业即劳动解放的事业而斗争。共和国的命运要靠他们的力量和智慧来决定。

英国工人已经采取了一些步骤，以求用外部的有效压力来强迫他们的政府改变不愿承认法兰西共和国的态度²⁷。英国政府现在迟迟不决，大概是想以此抵销反雅各宾战争，以及它过去承认政变时所表现的那种不体面的急性态度吧²⁸。此外，英国工人要求他们的政府用一切力量反对肢解法国，而这种肢解是一部分英国报

① 1870年德文版中在“职责”一词后面有“他们也正是这样做着”等字。——编者注

刊公然无耻地要求的①。正是这部分报刊曾在整整二十年内把路易·波拿巴崇拜为欧洲的救主，并且欢欣若狂地赞扬了美国奴隶主的叛乱。现在，它们也象当时一样，为奴隶主的利益卖力。

国际工人协会的每一个国家的支部都应当号召工人阶级行动起来。如果工人们忘记自己的职责，如果他们仍然采取消极态度，那末现在这场可怕的战争就会成为将来发生新的更可怕的国际战争的预兆，并且会在每一国家内使刀剑、土地和资本的霸主们又一次获得对工人的胜利。

共和国万岁！

总 委 员 会：

罗伯特·阿普耳加思	马丁·詹·布恩
弗雷德里克·布列德尼克	凯希耳
约翰·黑尔斯	威廉·黑尔斯
乔治·哈里斯	弗里德里希·列斯纳
洛帕廷	本·鲁克拉夫特
乔治·米尔纳	托马斯·莫特斯赫德
查理·默里	乔治·奥哲尔
詹姆斯·帕涅尔	普芬德
吕耳	约瑟夫·谢泼德
考威尔·斯特普尼	斯托耳
施穆茨	

通 讯 书 记：

欧仁·杜邦……………法国

卡尔·马克思……………德国和俄国

① 1870年德文版中此句的结尾是：“而英国部分报刊要求这种肢解的叫嚷并不低于德国的爱国者。”——编者注

奥·赛拉叶………比利时、荷兰和西班牙
海尔曼·荣克………瑞士
卓万尼·波拉………意大利
捷维·莫里斯………匈牙利
安东尼·扎比茨基……波兰
詹姆斯·柯恩………丹麦
约·格·埃卡留斯……美国
执行主席 威廉·唐森
财务委员 约翰·韦斯顿
总书记 约翰·格奥尔格·埃卡留斯

1870年9月9日于伦敦西中央区
海-霍耳博恩街256号

卡·马克思写于1870年9月6—9日

原文是英文

1870年9月11—13日用英文以传单形式
刊印，1870年9—12月用德文以传单形式
刊印，并用德文和法文在期刊上发表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文选》
两卷集1958年英文版第1卷
译出

法 兰 西 内 战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²⁹

卡·马克思写于 1871 年 4—5 月

1871 年 6 月中旬以单行本形式
在伦敦出版，并于 1871—1872 年
在欧洲各国和美国出版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文选》
两卷集 1958 年英文版第 1 卷
译出

致协会欧洲和美国全体会员

—

1870年9月4日，当巴黎工人宣告成立共和国而几乎立刻受到法兰西举国一致欢迎的时候，有一伙钻营禄位的律师——梯也尔是他们的政治家，特罗胥是他们的将军——占据了市政厅。这些人在当时是这样地迷信巴黎负有在一切历史动乱时期代表全法国的使命，竟以为只要出示他们业已失效的巴黎议员证书，就完全足以证明他们僭取到的法兰西统治者头衔确有法律根据。在这伙人上台五天以后，我们在关于上次战争的第二篇宣言中已经向你们说明他们究竟是些什么人了^①。然而当时在惊慌无备的混乱中，工人阶级的真正领袖们还囚禁在波拿巴的监狱里，而普鲁士人又已经逼近巴黎，巴黎只得容忍这些人掌握政权，不过附有一个明确的条件，就是他们只为国防的目的运用这个政权。然而要保卫巴黎，就只有武装它的工人阶级，把他们组织成为真正的军事力量，并使他们的队伍在战争中得到锻炼。可是，武装巴黎就无异是武装革命。巴黎战胜普鲁士侵略者，就无异是法国工人战胜法国资本家及其国家寄生虫。国防政府在民族义务和阶级利益二者发生矛盾的时候，没有片刻的犹豫便把自己变成了卖国政府。

这个政府所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派梯也尔游说欧洲各国

^① 见本书第26—27页。——译者注

朝廷，以废共和国、立国王为交换条件，乞求它们出面调解。巴黎被围四个月以后，他们就认为开始谈论投降的适当时机已经到了，于是特罗胥当着茹尔·法夫尔及其他同僚的面，向聚会的巴黎区长们讲了如下一席话：

“我的同僚们在 9 月 4 日当晚向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巴黎有没有些许可能抵住普鲁士军队的围困？我当时毫不迟疑地做了否定的答复。现在在座的同僚中，有几位会证明我说的是实话，并且我一直是坚持着这个看法。我那时对他们就是这样说的：在目前的情况下，巴黎要打算抵住普鲁士军队的围困，那简直是一件蠢举。当然，我当时加了一句，这可能是一件英勇的蠢举，但终究不过是蠢举而已…… 事变的发展（由他自己安排的）①并没有推翻我的预断。”

特罗胥的这篇漂亮而简短的演讲词，后来由当时在场的一位区长科尔崩先生公布了。

可见，还在共和国宣告成立的当天晚上，特罗胥的同僚已经知道他的“计划”就是使巴黎投降。如果国防并不单是梯也尔和法夫尔一流人图谋私人统治地位的幌子，那末 9 月 4 日侥幸得势的人们在 9 月 5 日就应该引退，向巴黎人民宣布特罗胥的“计划”，叫他们或者立即投降，或者自己掌握起自己的命运。这些毫无廉耻的骗子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决定要巴黎饱尝饥饿和残杀的痛苦，借以治好巴黎爱干英勇蠢举的毛病，暂时则用一些冠冕堂皇的宣言来欺蒙它，说特罗胥这个“巴黎总督是永远不会投降的”，外交部长茹尔·法夫尔“决不会让出我们的一寸领土，决不会让出我们碉堡上的一块石头”。而这同一个茹尔·法夫尔在给甘必大的一封信中却承认说，他们“防御”的不是普鲁士的士兵，而是巴黎的工人。由狡黠的特罗胥任命指挥巴黎军队的那些波拿巴强盗们，在整个巴

① 本书引文中尖括号〈 〉内的话和标点符号是马克思加的。——译者注

黎被围期间的私人通信中厚颜无耻地讥嘲他们深悉内幕的这种滑稽防御(例如参看公社《公报》上公布的巴黎卫戍军炮兵司令、荣誉军团大十字勋章获得者阿尔丰斯·西蒙·吉奥写给炮兵师将军苏桑的信³⁰)。到1871年1月28日³¹,骗子们终于揭下了假面具。国防政府在投降时以自甘屈辱到极点的真正英雄气概,表现出了它是由俾斯麦的俘虏组成的法国政府,——这种角色下流之至,甚至连路易·波拿巴在色当时都没有敢于承当。这批投降派³²在三月十八日事变以后仓皇逃往凡尔赛,把一些证明他们的卖国勾当的文件遗落在巴黎手中,正如公社在对外省的宣言中所指出的那样,为了销毁这些文件,

“这些人会不惜把巴黎变为淹没在血海中的一堆瓦砾”³³。

促使国防政府的几个主要成员谋求这种结局的,还有一些完全是特殊的、个人利害的考虑。

在停战协定签订以后不久,国民议会的一位巴黎议员米里哀尔先生(他后来被茹尔·法夫尔特别下令枪毙了)公布过许多确凿的法律文件,证明茹尔·法夫尔在与一个住在阿尔及尔的酒徒的妻子姘居时,前后若干年间大胆地拼凑伪造了一套文据,以他的一些私生子女的名义谋得了一大笔遗产,因而变成了一个财主;后来在合法继承人提出诉讼时,只是由于波拿巴的法庭偏袒他,他的伪证才没有被揭穿。既然无论花多大力气进行诡辩也抹杀不了这些铁面无情的法律文件,于是茹尔·法夫尔就生平第一次不开口,静待国内战争的爆发,好在那时候大骂巴黎人民是一群擅敢反叛家庭、宗教、秩序和财产的逃犯。这个伪证制造犯在9月4日刚一握权,就立即出于同情释放了皮克和泰费尔,这两个人甚至在帝国时代就在《旗帜报》³⁴的丢丑事件中因伪造文件而被判罪。这两位先生中的一位,即泰费尔,竟敢在公社时期回到巴黎,公社立即就

把他监禁起来了。而这时候，茹尔·法夫尔却在国民议会讲坛上大喊，巴黎正在释放它的一切囚犯！

厄内斯特·皮卡尔是国防政府中的约·密勒^①。他在帝国时代钻营内务大臣没有成功，现在自封为共和国的财政部长。他是一个叫做阿尔图尔·皮卡尔的人的哥哥。那个阿尔图尔·皮卡尔曾因诈骗钱财而被逐出巴黎交易所（见 1867 年 7 月 31 日巴黎警察局的报告），并且在任动产信用公司³⁵的一个分公司（帕勒斯特罗街 5 号）经理期间盗用过 30 万法郎，因而根据他的自供被判了罪（见 1868 年 12 月 11 日巴黎警察局的报告）。厄内斯特·皮卡尔正是指派这个阿尔图尔·皮卡尔担任他主办的《自由选民》³⁶的主笔。这家财政部的报纸用官方谎言蒙哄一般的交易所投机者，而阿尔图尔·皮卡尔则经常在财政部和交易所之间跑来跑去，利用法国军队的节节败退大发横财。这一对宝贝兄弟的全部财务信件都落到公社手里了。

茹尔·费里在 9 月 4 日以前是个一文不名的律师，在被围期间以巴黎市长身分巧妙地利用饥馑刮了大笔钱财。当他将来不得不报告他乱政失职的那一天，就会是他受裁判的一天。

这些人只能够在巴黎变成废墟时得到假释证^②；他们正好是俾斯麦所需要的人。稍微经过一番重新摆布，一向躲在幕后操纵政府的梯也尔忽然成了政府的首脑，而假释犯们则成了部长。

梯也尔这个侏儒怪物，将近半世纪以来一直受法国资产阶级倾心崇拜，因为他是这个资产阶级的阶级腐败的最完备的思想代

① 在 1871 年和 1891 年的德文版上不是“约·密勒”，而是“卡尔·福格特”，在 1871 年的法文版上是“福斯泰夫”。——编者注

② 在英国，犯人度过大部分刑期以后，常常给予假释证，犯人持着这种证件可以在狱外自由居住，但应受警察监视。这种证件称为 tickets-of-leave（假释证），持有假释证的人称为 ticket-of-leave men（假释犯）。（恩格斯在 1871 年德文版上加的注。）

表。还在他成为国家要人以前，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就已经显出他的说谎才能了。他的社会活动编年史就是一部法国灾难史。1830年以前，他和共和党人混在一起，在路易-菲力浦统治时代，他背弃了他的恩人拉菲特而钻得了大臣的位置。为了献媚于国王，他煽起了平民暴动来反对僧侣，因而使奥塞鲁瓦的圣热尔门教堂和大主教的宫廷遭受了抢劫；并且在对付贝里公爵夫人上充当了密探大臣和监狱助产婆的角色³⁷。特朗普斯诺南街上屠杀共和党人的事件以及接着颁布的取缔报刊和结社权利的可憎的九月法令，都是他一手干出的³⁸。1840年3月，他再度出任首相，以他的加强巴黎防务的计划震惊了全法国³⁹。在共和党人指责这个计划是一个危害巴黎自由的恶毒阴谋时，他在众议院中答复道：

“什么话？你们竟以为一加强城防就会危害自由！你们首先就是存心毁谤，竟以为有某一个政府为了保持政权而敢于在某个时候轰击巴黎……这样一个政府在胜利后将会比在胜利前更难立足一百倍。”

是的，除了预先已将堡垒交给普鲁士人的政府，再没有哪一个政府敢于从这些堡垒轰击巴黎。

1848年1月，当炮弹国王在巴勒摩城动手的时候⁴⁰，早已不是大臣的梯也尔又在众议院中发表了演说：

“诸位先生！你们都知道在巴勒摩发生的事情。当你们听说有一个大城市竟被连续轰击了48小时之久，你们大家都感到震恐〈在议会的意义上〉。究竟是被谁轰击的呢？是被行使战争权利的外敌轰击的吗？不是的，诸位先生，是被它自己的政府轰击的。究竟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不幸的城市要求享受它的权利。好吧，就是为了要求享受它的权利，它竟得到了48小时的轰击……请允许我向欧洲的舆论呼吁。从这个也许是欧洲最伟大的讲坛上，用愤怒的言辞〈真的是用言辞〉来斥责这种行动，这将是对人类的一种贡献……当为自己祖国效过劳〈这是梯也尔从来没有做过的〉的埃斯帕特罗摄政王，想以炮轰巴塞罗纳城来镇压那里的起义时，全世界各地都发出了共同的愤怒的呼声。”

过了一年半，梯也尔已经是法军炮击罗马⁴¹ 的最狂热的辩护者了。其实，炮弹国王的过错看来只是在于他不该限定只轰击 48 小时而已。

二月革命前几天，因受基佐的排挤、长期不能获得高官厚禄而满腹忿懑的梯也尔，一嗅到人民风暴将临的气息，就用他那曾使他获得“蝇子米拉波”绰号的冒牌英雄的口吻在众议院中声称：

“我属于革命党，不但属于法国的革命党，而且也属于全欧洲的革命党。我希望革命政府留在温和派的手中……但是，即令这个政府转到了热烈人物以至激进派的手中，我也决不因此放弃我所拥护的事业。我将永远属于革命党。”

二月革命爆发了。革命不是象这个小人所梦想的那样，把基佐内阁换成梯也尔内阁，而是用共和国代替了路易-菲力浦。在人民胜利的第一天，他小心翼翼地隐藏起来，殊不知工人们对他的鄙视已使他不致受到他们泄恨的处置。虽然如此，尽管他有无人不知的神奇勇气，他还是继续回避在公共场所抛头露面，直到六月屠杀⁴² 为他这种人的活动扫清道路的时候为止。那时，他就成了秩序党⁴³ 及其议会制共和国的首脑。这个议会制共和国是一种无名的空位王朝，在这个空位王朝时期，统治阶级的所有争权夺利的派系暗中互相勾结起来压制人民，同时它们又因各自企图恢复自己的王朝而互相倾轧。梯也尔当时也如现在一样责备共和党人，说他们是巩固共和国的唯一障碍；他当时也如现在一样，对共和国说过象当初刽子手对唐·卡洛斯说过的话：“我要杀你，是为了你好”。现在也和当时一样，他在他取得胜利以后的第二天就禁不住高喊道：L'Empire est fait——帝国造成了。梯也尔忘记了他那些关于必不可少的自由的虚伪说教，忘记了他因路易·波拿巴愚

弄了他并且一脚踢开了议会制度(没有人为的议会制度的气氛，这个小人就会一钱不值，而这是他知道的)而对路易·波拿巴产生的私怨，竟参加了第二帝国从法国军队攻占罗马起到对普战争的一切可耻勾当；他以对德国统一的恣意攻击挑唆了这场对普战争，因为他并不把这种统一看做是掩盖普鲁士专制制度的假面具，却把它看做是对保持德国的分裂状态这一法国的世袭权利的侵害。这个矮子喜欢在欧洲面前挥舞拿破仑第一的宝剑，——他在自己的历史著作中就是一味替拿破仑第一擦靴子的，——实际上，他的对外政策，从1840年的伦敦公约⁴⁴起到1871年的巴黎投降和目前这场内战止，始终是把法国引到极端屈辱的地步。在这场内战中，他蒙俾斯麦的恩许，把在色当和麦茨被俘的军人驱去攻打巴黎⁴⁵。虽然他有些随机应变的本事，虽然他的主张反复无常，但是他终生都极端墨守陈规。不言而喻，现代社会中比较深刻的变动，始终是他所不能理解的秘密；他那副头脑的全部精力都用来耍嘴皮了，所以甚至连社会表面发生的最明显的变化也不能领悟。例如，他不倦地把一切违反法国陈旧的保护关税制度的东西都指斥为渎犯神明。他在当路易-菲力浦的大臣时，曾经嘲骂铁路是荒诞的怪物；而当他在路易·波拿巴时代处于反对派的地位时，他把任何改革法国陈腐的军事制度的企图都斥为大逆不道了。他在多年的政治生涯中，从来没有办过一件哪怕是极微小的稍有实际益处的事情。梯也尔始终不渝的只是对财富的贪得无厌和对这财富生产者的憎恨。他第一次当路易-菲力浦王朝的大臣时，穷得和约伯一样，而到离职时已经成了百万富翁。在这同一个国王下最后一次当大臣时(自1840年3月1日)，他曾在众议院中被人公开指责侵吞公款。对于这个指责，他那时只限于用眼泪鼻涕来回答，他象茹尔·法夫尔和任何别的鳄鱼一样，随时都能拿出这种货色。在波尔多的时

候^①，他为挽救法国面临的财政崩溃而采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给自己规定了 300 万法郎的年俸；这就是他在 1869 年给他的巴黎选民们描绘的那个理想的“节俭共和国”的全部内容。他的一个 1830 年的众议院同僚贝累先生（本人是一个资本家，然而也是巴黎公社的一个忠诚的委员），最近在一篇公开声明中对梯也尔说了如下一番话：

“使劳动受资本的奴役，一向是你的政策的基础。从你看到劳动共和国在巴黎市政厅内宣告成立的那一天起，你就没有停止过向法国叫喊：这些人都是罪犯！”

梯也尔是一个玩弄政治小骗局的专家，背信弃义和卖身变节的老手，议会党派斗争中施展细小权术、阴谋诡计和卑鄙奸诈的巨匠；他一失势就不惜鼓吹革命，而一旦大权在握则毫不踌躇地把革命浸入血泊；他只有阶级偏见而没有思想，只有虚荣心而没有良心；他的私生活和他的社会生涯同样卑鄙龌龊，——甚至在现在，当他扮演法兰西的苏拉这个角色时，还是情不自禁地用他那可笑的傲慢态度显示出他的行为的卑污。

不仅把巴黎而且把全法国交给普鲁士统治的巴黎投降一举，是一连串通敌卖国阴谋勾当的总结束，而这些阴谋勾当，正如特罗胥自己说的，是 9 月 4 日的窃国大盗们在窃取政权的当天就开始了的。另一方面，这一投降又是他们在普鲁士协助下对共和国和巴黎发动内战的开端。陷阱在投降条件中就已经布设好了。那时候，三分之一以上的国土陷于敌人手中，首都和外省的联系已被割断，一切交通路线已被破坏。在这种情况下，要选出真正能代表法国的人，没有充分的时间进行准备工作是不可能的。正因为这样，

① 1891 年的德文版中作：“1871 年在波尔多的时候”。——编者注

所以在投降书中就规定国民议会必须在一周之内选出；结果法国许多地区只是在选举前夕才接到关于当前选举的消息。并且，根据投降书的专门一项规定，选出国民议会只是为了决定和战问题，而在必要时，则由它缔结和约。人民不能不感觉到：停战条款已经使战争根本不可能继续下去，而为了批准俾斯麦所指定的和约，法国最坏的人是最合适的人。但这些戒备办法还不能使梯也尔放心，于是他在停战的秘密尚未晓示巴黎以前，就动身到全国各地去作竞选旅行，以便把正统派⁴⁶的死尸复活起来；这一派和奥尔良派应该一起替换当时已为全国所唾弃的波拿巴派。他不怕正统派。这些人要成立现代法兰西政府是不可思议的，所以作为对手也就微不足道；这一派的活动，用梯也尔（1833年1月5日在众议院）的话来说，

“一向只限于依靠外敌入侵、国内战争和无政府状态这三根柱石来支持”。

因此，还有什么党比这个党更适合做反革命的工具呢？正统派当真相信，他们期望已久的昔日的黄金时代就要到来。的确，法国又沦于外敌的铁蹄之下，帝国又被推翻了，波拿巴又被俘虏了，而正统派又抬头了。显然，历史的车轮已经向后转，要滚回1816年的“无双议院”^{①47}去。在1848—1851年的共和国时代的国民议会中，代表正统派的是一些颇有素养和富有议会斗争经验的人物；现在打头阵的却是他们党内的庸碌之辈，即法国的所有布索那克。

当这个“地主议会”⁴⁸在波尔多刚刚开会的时候，梯也尔甚至没有让他们进行议会辩论就干脆告诉他们，他们必须立刻接受和约的先决条款，因为只有这样，普鲁士才会准许他们发动反对共和

① 在1871年和1891年的德文版中，这里加有：“（地方官和容克地主的议院）”。——编者注

国及其堡垒巴黎的战争。反革命势力的确没有时间犹豫不决。第二帝国已使国债增加了一倍多，使所有的大城市都负了沉重的地方债务。战争极度地加重了债负，完全耗尽了全国的财源。使灾难达到顶点的，是普鲁士的夏洛克手持票据勒索供养他在法国土地上的 50 万军队的粮饷，要求支付他的 50 亿赔款以及过期补缴的 5% 的利息⁴⁹。这一切应该由谁缴付呢？只有用暴力推翻共和国以后，财富所有者才能希望把他们自己所发动的战争的重担转嫁到财富生产者的肩上。于是，法国空前的经济破坏就推动了这班爱国的地产和资本的代表人物在外国侵略者的监视和卵翼下，用国内战争即奴隶主叛乱来结束对外战争。

阻碍这个阴谋实现的，有一个巨大的障碍——巴黎。解除巴黎的武装，是保证成功的首要条件。因此，梯也尔要求巴黎放下武器。于是采用了一切办法来激怒巴黎：“地主议会”发出反对共和国的极疯狂的叫嚣；梯也尔本人含糊其词地说共和国没有法律根据；威胁要砍去巴黎的头颅并取消它的首都称号；任命奥尔良派人物充任使节；颁布杜弗尔那些要彻底破坏巴黎工商业的关于处理过期商业期票和房租的法令⁵⁰；按普野-克尔蒂约的主张，对任何出版物都每份征收两生丁税金；对布朗基和弗路朗斯判处死刑；查封共和派报纸；把国民议会迁到凡尔赛；恢复由八里桥^①宣布而在 9 月 4 日取消了的戒严；任命十二月分子维努亚⁵¹为巴黎总督，任命波拿巴的宪兵瓦伦顿为警察局长，耶稣会教徒奥雷耳·德·帕拉丹将军为巴黎国民自卫军总司令。

现在我们要向梯也尔先生和听他使唤的国防人士们提出一个问题。大家知道，梯也尔由他的财政部长普野-克尔蒂约先生经手

^① 即古费-蒙多邦，法国将军，1860 年英法联军侵华时曾指挥侵略军，因在北京和通州之间的八里桥战胜清兵，由拿破仑第三授予八里桥伯爵封号。——译者注

借了 20 亿债款。我们要问：

(1) 据说这笔生意有几亿佣金落入了梯也尔、茹尔·法夫尔、厄内斯特·皮卡尔、普野-克尔蒂约和茹尔·西蒙的腰包，此事是真是假？

(2) 据说约定在“平定”巴黎以后才支付债款⁵²，此话是虚是实？

无论如何，总有某种原因迫使他们急急忙忙地去做这件事，因为梯也尔和茹尔·法夫尔曾用波尔多议会大多数的名义最无耻地乞求普鲁士军队立即占领巴黎。但是，俾斯麦的算盘不是这样打的，正如他回到德国以后公开对法兰克福那些衷心叹服的庸人们用讥讽口吻说过的那样。

二

武装的巴黎是阻碍反革命阴谋实现的唯一严重障碍。因此必须解除巴黎的武装。在这一点上，波尔多议会讲得很坦率。如果“地主议员们”的狂暴鼓噪还令人听不出所以然，那末梯也尔把巴黎交给十二月分子维努亚、波拿巴宪兵瓦伦顿和耶稣会教徒奥雷耳·德·帕拉丹将军三人摆布，则已令人不能再有丝毫怀疑了。阴谋分子们厚颜无耻地毫不掩饰他们解除巴黎武装的真正用意，用一种极端露骨、极端卑鄙的谎言作为借口，要求巴黎交出武器。梯也尔宣称，巴黎国民自卫军的大炮是国家的财产，所以应当归还给国家。而事实则是这样：从投降的那一天起，巴黎就已严加戒备，因为俾斯麦的俘虏们按照投降条件把法国出卖给俾斯麦的时候，为自己保留了一支相当可观的护身军队，目的显然是为了镇压巴黎。国民自卫军进行了改组，把最高指挥权交给了由国民自卫军全体官兵（除了某些旧波拿巴军队残部）共同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在普军开进巴黎的前夕，中央委员会已经设法把投降派背叛地故意遗弃在普军即将进驻的那些街区或其邻近街区的大炮和多管炮运到了蒙马特尔、伯利维尔和拉-维勒特。这些大炮是由国民自卫军筹款置备的。在 1 月 28 日的投降书中，正式承认这些大炮是国民自卫军的财产，因而没有列入应该缴给胜利者的属于政府的武器总数之内。梯也尔实在没有对巴黎开战的借口，因此他不得不采用厚颜无耻的撒谎手段，说什么国民自卫军的大炮是国家的财产！

夺取大炮显然只是全面解除巴黎武装，亦即解除 9 月 4 日革命武装的一个开端。可是，这个革命已经成为法国的合法局面。这个革命所产生的共和国，已在投降书上由胜利者予以承认。在投降以后，它又取得了各外强的承认；并用它的名义召集了国民议会。9 月 4 日的巴黎工人革命，是波尔多国民议会及其行政当局的唯一合法的根据。如果没有 9 月 4 日的革命，这个国民议会就势必立即让位给 1869 年在法国人统治下而不是在普鲁士人统治下由普选产生的、后来被革命强迫解散的立法团。梯也尔及其假释犯们就不免要投降，以便取得路易·波拿巴签字的护照，免得到凯恩去旅行⁵³。握有全权去同普鲁士媾和的国民议会，不过是这次革命中的一个插曲，而革命的真正体现者终究是武装的巴黎，因为是巴黎发动了这次革命，它为这个革命忍受了五个月的围困和饥饿的灾难，它不顾特罗胥的计划而以自己的持久抵抗使外省有可能进行顽强的自卫战争。而现在，这个巴黎或者是按照波尔多那帮叛逆奴隶主的羞辱命令不得不自行解除武装，承认 9 月 4 日的革命只不过是把政权从路易·波拿巴手里转交给那些同他竞争的保皇党人掌握；或者是必须为法兰西的事业进行奋不顾身的斗争，当时要把法国从完全复灭的危险中拯救出来并使它获得新生，唯一的途径就是用革命手段推翻那产生了第二帝国并且已在这个帝国庇护下弄到完全腐朽地步的政治条件和社会条件。受过五个月饥饿煎熬的巴黎，片刻都没有犹豫。它英勇无畏地决心经受同法国阴谋分子进行斗争的一切风险，尽管当时有普鲁士的大炮从它自己的堡垒上威吓着它，也在所不顾。但是，中央委员会对于人家硬要巴黎进行的内战，竟抱着厌恶态度，因此它不管国民议会如何挑衅，不管行政当局如何僭越权限，也不管军队在巴黎城内和巴黎周围的集结达到何等威胁的程度，始终是继续保持着纯粹防御的

立场。

于是梯也尔就发动了内战：他派维努亚率领一大队市警和几个常备团去夜袭蒙马特尔，企图出其不意地夺去国民自卫军的大炮。大家知道，由于国民自卫军的抵抗和军民的和好，这个企图没有得逞。奥雷耳·德·帕拉丹事先已经印好了胜利公报，而梯也尔则早已预备好了宣布他的政变措施的告示。这些告示结果只好用一个宣言来代替，宣称梯也尔宽宏大量地决定把国民自卫军自己的武器赏给国民自卫军，他并且还说，相信国民自卫军会拿着这些武器团结在政府周围来反对暴徒。在30万国民自卫军中，只有300人响应了这个号召，团结在小梯也尔的周围来反对他们自己。3月18日的光荣的工人革命完全掌握了巴黎。这个革命的临时政府就是中央委员会。欧洲一时似乎怀疑在它眼前发生的这些惊人的政治和军事事变的真实性，还以为这也许是早已消逝的往事的梦幻。

从3月18日一直到凡尔赛军队进入巴黎，无产阶级的革命完全没有象“上等阶级”的革命，特别是反革命中极为常见的那种暴行，因而它的敌人除了抓住勒康特和克列芒·托马两将军的被杀和旺多姆广场事件，是找不到任何借口来表示愤慨的。

勒康特将军是参加夜袭蒙马特尔的波拿巴军官之一，他曾一连四次命令第八十一常备团开枪射击聚集在皮加尔广场上的手无寸铁的群众，而当士兵们拒绝执行他的命令时，他就百般辱骂他们。他的士兵并没有射击妇孺，而是把他枪毙了。士兵们在工人阶级敌人的训练下所养成的根深蒂固的习惯，自然不会在他们转到工人方面来的一刹那间完全改变。克列芒·托马也是被这些士兵枪毙的。

克列芒·托马“将军”过去是一个不得志的军需中士，在路易-

菲力浦统治的后期被吸收加入共和派的《国民报》⁵⁴ 报馆，在那里起着这家好斗报纸的傀儡负责经理(gérant responsable^①)和决斗手的双重作用。在二月革命以后，《国民报》这派人握得了政权，他们便把这位先前的军需中士升任将军。这是六月屠杀前夕的事情。他和茹尔·法夫尔一样，是这次事件的阴狠毒辣的策划人之一，也是这次屠杀的最卑鄙的刽子手之一。在这以后，他带着他的将军头衔隐沒了很久，直到 1870 年 11 月 1 日才又抛头露面。在这前一天，被执于市政厅中的国防政府曾向布朗基、弗路朗斯和其他工人代表庄严地允诺，担保把他们篡夺的政权转交给巴黎自由选出的公社⁵⁵。但是，国防政府并没有履行自己的诺言，却唆使特罗胥的布列塔尼部队——他们现在代替了波拿巴手下的科西嘉部队⁵⁶——去蹂躏巴黎。当时只有塔米济埃将军一人不愿以这种背信弃义的勾当来玷污自己的名誉，辞去了国民自卫军总司令的职务。代替他担任这个职务的克列芒·托马便又当上了将军。他在任总司令的整个期间，不向普军作战，而向巴黎国民自卫军作战。他竭力阻挠国民自卫军全面武装，嗾使国民自卫军中的资产者营去攻打工人营，他排除那些反对特罗胥“计划”的军官，诬蔑无产者营怯阵而把它们解散，实际上这些无产者营的英勇果敢精神，现在连最狂暴的敌人也为之震惊。克列芒·托马感到洋洋得意的是，他又重新取得了他以前在六月屠杀事件中那种个人充当巴黎工人阶级的仇敌的显赫地位。在 3 月 18 日的前几天，他向陆军部长勒夫洛呈递了他的一份“彻底消灭巴黎暴徒的 la fine fleur (精华)”的计划。在维努亚失败以后，他又情不自禁地以业余密探的身份出场。中央委员会和巴黎工人对克列芒·托马和勒康特两人

① 1871 年和 1891 年的德文版中接着有下面一句：“其职务是遇报纸被控告判罪时由他去受监禁。”——编者注

被杀应负的责任，就象威尔士亲王夫人驾进伦敦城时对被挤死者命运应负的责任一样。

所谓在旺多姆广场上屠杀赤手空拳的公民，原是一种神话，无论怪乎梯也尔和地主议员们在议会中对此严守缄默，只委托那些欧洲报界的走卒去传播。“秩序人物”，即巴黎的反动分子，一听到3月18日胜利的消息就不寒而栗。在他们看来，这个胜利意味着人民报复的时刻已经迫近。从1848年六月事件到1871年1月22日惨遭他们杀害的那些死者的冤魂⁵⁷，都在他们眼前浮现了。但是他们只是受了一场虚惊。甚至对市警都不但没有予以应有的处置——解除武装或逮捕下狱，反而给他们洞开了巴黎城门，让他们安然撤退到凡尔赛。对“秩序人物”不仅毛发未动，而且容许他们集结起来并在巴黎的正中心轻易地夺去许多重要阵地。中央委员会的这种宽容态度，武装工人的这种宽宏大量，与秩序党的习气是如此迥然不同，秩序党竟误认为这只是工人自觉软弱的表现。于是他们就产生了一个愚蠢的计划——试图在举行徒手的游行示威的幌子下做到维努亚用大炮和多管炮所没有做到的事情。3月22日，从最奢华的街区吵吵闹闹地走出了一群“体面人物”，其中有各色各样的纨绔阔少，领头的是埃克朗、科特洛贡、昂利·德·佩恩之流这样一些极有名的帝国猪仔。这一帮流氓怯懦地以和平示威游行作幌子，暗中携带杀人凶器，在街上列队行进，遇到国民自卫军的巡逻队和哨兵，就横加侮辱，并勒令缴械。他们走出和平街时高喊“打倒中央委员会！打倒杀人犯！国民议会万岁！”企图冲过岗哨的警戒线，出其不意地占领设在旺多姆广场上的国民自卫军总参谋部。国民自卫军在受到手枪射击后，起初只是提出通常的sommations（相当于英国的骚扰取缔令）⁵⁸，直到这样做不见效时，国民自卫军的一位将军^①才下令开枪。一排枪就打得这群愚

蠢的花花公子抱头鼠窜，而这些家伙本来以为只要“体面社会”一出现，就会对巴黎革命产生象约书亚的羊角声对耶利哥城墙所产生的那种影响。国民自卫军方面有两人被这些窜逃分子打死，有九人受重伤（其中一人是中央委员会委员^②）。在秩序党的这次伟业发生的地方，到处都抛弃有手枪、匕首和手杖刀这类证明他们“徒手”举行“和平”示威游行的证物。当 1849 年 6 月 13 日国民自卫军为抗议法军穷凶极恶地袭击罗马而举行真正的和平示威游行时，当时的秩序党的将军尚加尔涅曾被国民议会特别是被梯也尔推崇为社会救主，因为他让自己的军队从四面八方冲击徒手的群众，用枪击、刀斩和马队践踏来对付他们。巴黎当时宣布了戒严。杜弗尔急忙经由国民议会通过了许多新的镇压法令。开始了新的逮捕，新的流放，新的恐怖统治。但是在同样情况下，“下等阶级”的做法却迥然不同。1871 年的中央委员会简直没有去理会那些“和平示威”的英雄们，结果他们过了两天又能来一次由海军上将赛塞率领的武装示威，这次示威是以有名的窜奔凡尔赛收场的。当梯也尔已经用夜袭蒙马特尔发动了内战的时候，中央委员会竟坚决不肯把这个内战继续下去，因而犯了一个致命性的错误：本来应该立即向当时毫无防御能力的凡尔赛进军，一举彻底消灭梯也尔及其“地主议会”的阴谋。中央委员会没有这样做，反而使秩序党能够在 3 月 26 日的公社选举中再次进行较量。在这一天，“秩序人物”在巴黎各区政府同他们的过分宽大的胜利者相互说了许多温和的和解话语，而在内心却立下了庄严的誓言，要在适当的时机把他们扑灭干净。

现在来看看这幅图画的背面吧。梯也尔在 4 月初向巴黎作了

① 贝热瑞。——编者注

② 马尔儒纳尔。——编者注

第二次进攻。被解到凡尔赛去的第一批被俘的巴黎人，受到了令人发指的残酷虐待。厄内斯特·皮卡尔把两手插在裤袋里，在他们的行列中间踱来踱去，恣意要笑他们，而梯也尔夫人和法夫尔夫人则由她们尊贵的（？）女侍簇拥着，站在阳台上面拍手喝采，称赏凡尔赛暴徒的卑鄙罪行。被俘的常备团士兵都被冷酷地一律枪毙。我们英勇的朋友、铸造工人杜瓦尔将军没有经过任何审讯就被枪杀了。加利费（即他那个在第二帝国的闹宴上以无耻地卖弄色相闻名的妻子的面首）在一篇宣言中夸耀说，正是由他下令把被他的士兵出其不意地包围缴械的一小队国民自卫军连同队长和副官一起全部杀死。从巴黎逃出的维努亚，由于发布了把从公社方面俘掳来的任何常备军士兵一律枪毙的通令，被梯也尔授予了荣誉军团大十字勋章。宪兵德马列也被授勋，因为他忘恩负义，象屠夫一样把仗义豪侠、光明磊落的弗路朗斯，即在1870年10月31日拯救了国防政府成员生命的那个弗路朗斯⁵⁹，切成了碎块。梯也尔洋洋自得地在国民议会的一次会议上大谈这次屠杀事件的“令人兴奋的细节”。他如同一个被允许扮演塔梅尔兰角色的议会中的大拇指般的小人物一样，带着妄自尊大的虚荣，拒不承认那些反对他这个小人的尊严的叛乱者享有交战一方的权利，甚至不愿对伤兵救护站守中立。再没有比伏尔泰就已预见过的这种可以暂时恣意发挥其老虎本能的猴子更加可恶的了⁶⁰（见附录第35页①）。

公社在4月7日颁布了一项报复法令，宣布公社有责任“保护巴黎不受凡尔赛匪帮的野蛮虐杀，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⁶¹。在公社颁布了这个法令以后，梯也尔对被俘者的野蛮虐待还依然如故，甚至在他的公报上这样侮辱他们说：“正直人士的忧伤的目光，

① 见本书第83—84页。——译者注

还从来没有看到过一种无耻民主制度下的如此无耻的面孔”，——这些正直人士就是梯也尔和他那一帮充当部长的假释犯。不过，枪毙俘虏是暂时停止了。但是，当梯也尔和他那些十二月政变的将军们知道公社的报复法令只不过是一种威胁，甚至连那些在巴黎被捕的伪装国民自卫军的宪兵密探和身上搜出燃烧弹的市警都得到了赦免，他们就又开始大批枪毙俘虏，并且一直继续进行到底。躲藏有国民自卫军士兵的房屋，被宪兵们团团围住，浇上煤油（此种办法在这场战争中首次在这里使用），纵火焚烧；烧焦的尸体后来被特尔纳街区的印刷厂救护队运出去了。4月25日，有四名国民自卫军士兵在贝耳-埃潘向一队骑兵投降，后来被这队骑兵的队长（加利费的忠仆）一个个枪毙了。这四个受害者中有一个被误认为打死了而没有死，他名叫舍弗尔，曾爬回到巴黎的前哨地点，向公社的一个调查团证明了这件事。当托伦就这个调查团的报告向陆军部长勒夫洛提出质问时，“地主议员们”用叫喊声盖住他的发言，并且不让勒夫洛出来答复。谈起他们“光荣的”军队的业绩，就会是对这个军队的侮辱。梯也尔的公报在报道在木兰-萨克用刺刀杀死睡梦中的公社社员和在克拉马尔进行大批枪杀的消息时所用的轻率口气，甚至使不大敏感的伦敦《泰晤士报》也为之震惊。但是今天要试图一一列举出那些轰击巴黎、在外国侵略者的卵翼下发起奴隶主叛乱的人们的一切暴行（而这些暴行仅仅是开始），那就太可笑了。在这一切惨象当中，梯也尔已忘记他的关于在他的侏儒肩膀上负有重大责任的议会辞令，居然在自己的公报上洋洋得意地说 l'Assemblée siège paisiblement（议会在平静地开着会），并且不断地大张筵席，时而同他的十二月政变的将军们欢宴，时而同德国王公们欢宴，以此来证明他依然健啖如初，甚至勒康特和克列芒·托马两人的幽灵也没有败坏他的胃口。

三

1871年3月18日清晨，巴黎被“公社万岁！”的雷鸣般的呼声惊醒了。公社，这个使资产阶级的头脑怎么也捉摸不透的怪物，究竟是什么呢？

中央委员会在它的3月18日宣言中写道：“巴黎的无产者，目睹统治阶级的失职和叛卖行为，已经了解到：由他们自己亲手掌握公共事务的领导以挽救时局的时刻已经到来…… 他们已经了解到：夺取政府权力以掌握自己的命运，是他们必须立即履行的职责和绝对的权利。”⁶²

但是，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及其遍布各地的机关——常备军、警察、官僚、僧侣和法官（这些机关是按照系统的和等级的分工原则建立的），是起源于君主专制时代，当时它充当了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反对封建制度的有力武器。但是，封建领主的特权、地方的特权、城市和行会的专利以及各省的法规等这一切中世纪的垃圾阻碍了它的发展。十八世纪法国革命的大扫帚，把所有这些过去时代的垃圾都扫除干净，从而从社会基地上清除了那些妨碍建立现代国家大厦这个上层建筑的最后障碍。这座大厦是在第一帝国时期建立起来的，而第一帝国本身则是由老朽的半封建的欧洲反对近代法国的几次同盟战争产生的。在以后的各个统治时代，政府被置于服从议会监督，即服从有产阶级直接监督的地位。一方面，它变成了巨额国债和苛捐重税的温床；由于拥有令人倾心的官职、金钱和

权势，它变成了统治阶级中各个争权夺利的党派和冒险家彼此争夺的对象。另一方面，它的政治性质也随着社会的经济变化而发生了变化。现代工业的进步促使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阶级对立更为发展、扩大和深化，国家政权也就随着愈益具有资本压迫劳动的全国政权的性质，具有为进行社会奴役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力量的性质，具有阶级统治机器的性质^①。在每次标志着阶级斗争的一定进步的革命以后，国家政权的纯粹压迫性质就愈益公开地显露出来。1830年的革命把政权从地主手里夺来交给了资本家，也就是从离工人阶级较远的敌人手里夺来转交给了工人阶级的更为直接的敌人。资产阶级的共和党人以二月革命的名义夺取了国家政权，并且利用这个政权进行了六月屠杀。他们用这次屠杀向工人阶级证明，所谓“社会”共和国不外是用共和国来对他们实行社会奴役；同时又向资产阶级的大批保皇派和土地所有者阶级证明，他们可以安心让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去担负管理方面的操心事务和享受管理方面的金钱实惠。但是，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在建树了他们唯一的六月勋业以后，不得不从秩序党的前列退居后列；而秩序党是一个现在已经和生产者阶级公开对抗的占有者阶级中所有一切敌对党派组成的联盟。他们共同管理的最适当形式，原来是由路易·波拿巴任总统的议会制共和国。这是一种公开实行阶级恐怖和有意侮辱“贱民”的政体。据梯也尔说，议会制共和国“使它们〈统治阶级的各个派别〉最少分裂”，可是它在这个人数很少的阶级和这个阶级以外的整个社会机体之间挖成了一道鸿沟。在以往各个政府下面，统治阶级内部的纷争还使国家政权受到相当限制，而现在由于这个阶级的联合，这种限制已经消失了。由于存在无产阶级

^① 1871年德文版中，这句话的末尾稍有改动：“国家政权就愈益具有压迫劳动的社会权力的性质，具有阶级统治机器的性质。”——编者注

起义的威胁，联合起来的统治阶级已在残酷而无耻地利用国家政权作为资本对劳动作战的全国性武器。但是，统治阶级对生产者大众不断进行的十字军讨伐，使它一方面不得不赋予行政机关以愈来愈大的权力来镇压反抗，另一方面不得不逐渐剥夺它自己的议会制堡垒(国民议会)用以防范行政机关的一切手段。于是代表这个行政机关的路易·波拿巴就把统治阶级的代表们驱散了。第二帝国原是秩序党共和国的自然产物。

这个以政变为出生证书，以普选为批准手续，而以宝剑为王笏的第二帝国，声称它倚靠农民阶级，即倚靠没有直接卷入劳资斗争的广大生产者群众。它声称它以破坏议会制度，从而破坏政府对有产阶级的公开屈从状况而拯救了工人阶级。它声称它以支持有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经济统治而拯救了有产阶级。末了，它还声称它已经把一切阶级团结到复活了的国家荣誉的幻想周围。事实上，帝国是在资产阶级已经丧失治国能力而工人阶级又尚未获得这种能力时唯一可能的统治形式。全世界都欢迎这个帝国，认为它是社会救主。在它的统治下，资产阶级社会免除了各种政治牵挂，得到了甚至它自己也梦想不到的高度发展。工商业扩展到极大的规模；金融诈骗庆祝了自己纵横世界的欢乐；民众的贫困，在卑鄙无耻的骄奢淫佚的景象对照下，显得格外刺目。看来高高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政权，实际上正是这个社会的莫大耻辱，是一切龌龊事物的温床。普鲁士本来渴望把这种统治制度的重心从巴黎移到柏林去，而它的刺刀却把这个国家政权的以及由这个政权拯救了的社会的全部腐朽性尽行揭穿了。帝国制度是那由新兴资产阶级社会作为摆脱封建制度的工具建立起来，尔后又由已经充分发展的资产阶级变成了资本奴役劳动的工具的国家政权的最淫贱和最后的形式。

公社就是帝国的直接对立物。巴黎无产阶级用以欢迎二月革命的“社会共和国”口号，不过是表示了希望建立一种不仅应该消灭阶级统治的君主制形式，而且应该消灭阶级统治本身的共和国的模糊意向。公社正是这种共和国的一定的形式。

原是旧政府权力的驻在地和中心，同时又是法国工人阶级的社会活动中心的巴黎，手执武器奋起反对了梯也尔及其“地主议会”要恢复和巩固帝国遗传下来的这个旧政府权力的企图。巴黎所以能够反抗，只是由于被围困使它摆脱了军队，建立了主要由工人组成的国民自卫军。必须使这件事实成为确定的制度，所以，公社的第一个法令就是废除常备军而用武装的人民来代替它。

公社是由巴黎各区普选选出的城市代表组成的。这些代表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者是公认的工人阶级的代表。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同时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一向作为中央政府的工具的警察，立刻失去了一切政治职能，而变为公社的随时可以撤换的负责机关。其他各行政部门的官吏也是一样。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国家高级官吏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支付给他们的办公费，都随着这些官吏的消失而消失了。社会公职已不再是中央政府走卒们的私有物。不仅城市的管理，而且连先前属于国家的全部创议权都已转归公社。

公社在废除了常备军和警察这两种旧政府物质权力的工具以后，立刻着手摧毁精神压迫的工具，即“僧侣势力”，方法是宣布教会与国家分离，并剥夺一切教会所占有的财产。教士们应当重新过私人的清修生活，象他们的前辈即使徒们那样靠信徒的施舍过活。一切学校对人民免费开放，不受教会和国家的干涉。这样，不但学校教育人人都能享受，而且科学也摆脱了阶级成见和政府权

力的桎梏。

法官已失去其表面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只是他们用来掩盖自己向历届政府卑鄙谄媚的假面具，而他们对于这些政府是依次宣誓尽忠，然后又依次背叛的。也如社会其他一切公务人员一样，他们今后应该由选举产生，对选民负责，并且可以撤换。

巴黎公社自然应当作为法国一切大工业中心的榜样。只要公社制度在巴黎和各个次要的中心确立起来，旧的中央集权政府就得也在外省让位给生产者的自治机关。在公社没有来得及进一步加以发挥的全国组织纲要上说得十分清楚，公社应该成为甚至最小村落的政治形式，常备军在农村地区也应该由服役期限极短的国民军来代替。设在专区首府里的代表会议，应当主管本专区所有一切农村公社的公共事务，而这些专区的代表会议则应派代表参加巴黎的全国代表会议；代表必须严格遵守选民的 *mandat impératif*（确切训令），并且随时可以撤换。那时还会留给中央政府的为数不多然而非常重要的职能，则不应该象有人故意捏造的那样予以废除，而应该交给公社的官吏，即交给那些严格负责的官吏。民族的统一不是应该破坏，相反地应该借助于公社制度组织起来，应该通过这样的办法来实现，即消灭以民族统一的体现者自居同时却脱离民族、驾于民族之上的国家政权，这个国家政权只不过是民族躯体上的寄生赘瘤。旧政府权力的纯粹压迫机关应该铲除，而旧政府权力的合理职能应该从妄图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那里夺取过来，交给社会的负责的公仆。普选制不是为了每三年或六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代表和压迫人民，而是应当为组织在公社里的人民服务，正如个人选择的权利为任何一个工厂主服务，使他们能为自己的企业找到工人、监工和会计一样。大家知道，企业正象个人一样，在实际业务活动中总是

能够把适当的人放到适当的位置上去，即使有时会犯错误，也总能很快就纠正过来。另一方面，用等级授职制⁶³去代替普选制是根本违背公社的精神的。

新的历史创举通常遭到的命运就是被误认为是对旧的、甚至已经过时的社会生活形式的抄袭，只要它们稍微与这些形式有点相似。于是这个摧毁现代国家政权的新公社，也就被误认为是在这个国家政权产生以前存在过并且后来构成这个国家政权基础的中世纪公社的复活。公社制度被误认为是企图用孟德斯鸠和吉伦特派⁶⁴所梦想的那种许多小邦的联盟，去代替在各个巨大民族那里虽然最初是用政治强力造成的，可是目前已经成为社会生产强大因素的统一。公社与国家政权间的对抗状态被误认为是反对过分集权的古老斗争的扩大形式。特殊的历史条件可能阻碍象在法国出现过的那种资产阶级统治形式的典型发展，而造成例如英国那样的状态，即主要的中央国家机关由贪污腐败的教区委员会，钻营私利的市参议会议员，城市里凶狠的济贫所监督和郡里事实上世袭的治安法官加以补充。公社制度将把靠社会供养而又阻碍社会自由发展的寄生赘瘤——“国家”迄今所吞食的一切力量归还给社会机体。仅仅这一点就会把法国的复兴向前推进了。法国外省城市的资产阶级以为公社是企图恢复它在路易-菲力浦时代曾经享有过、而在路易-拿破仑时代被乡村对城市的虚假统治所排除了的对乡村的统治。其实，公社制度会使农村生产者在精神上受各省主要城市的领导，保证他们能够得到城市工人做他们利益的天然代表者。公社的存在自然而然会带来地方自治，但这种地方自治已经不是用来对抗现在已被废弃的国家政权的东西了。只有俾斯麦那种除了策划铁血阴谋之外，经常喜欢从事最适合于他的智力的旧业即给《喧声》杂志（柏林的《笨拙》杂志）⁶⁵撰稿的人，才会

异想天开，以为巴黎公社要仿效那种作为对 1791 年法国旧城市制度的拙劣模仿品的普鲁士城市制度，要仿效那种把城市管理机关贬为普鲁士国家警察机构附属轮子的城市制度。

公社实现了所有资产阶级革命都提出的廉价政府的口号，因为它取消了两项最大的开支，即常备军^① 和官吏。公社存在本身就是对那至少在欧洲是阶级统治的通常累赘和必要伪装的君主制度的否定。公社给共和国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础。但是，无论廉价政府或“真正共和国”，都不是它的终极目的，而只是伴随它出现的一些现象。

人们对公社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以及公社代表各种不同的利益，证明公社是一个高度灵活的政治形式，而一切旧有的政府形式在本质上都是压迫性的。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②，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

如果没有最后这个条件，公社制度就没有实现的可能，而是一个骗局。生产者的政治统治不能与他们的社会奴隶地位的永久不变状态同时并存。因此，公社应当成为根除阶级的存在所赖以维持、从而阶级统治的存在所赖以维持的那些经济基础的工具。劳动一被解放，大家都会变成工人，于是生产劳动就不再是某一个阶级的属性了。

说也奇怪，虽然近六十年来写过和讲过不少关于工人解放的话，可是只要工人们在什么地方断然当家做主，那些替两极即资本和雇佣奴隶劳动（土地私有者现在只是资本家的驯顺伙伴）对立的现代社会辩护的人，立刻就弹起辩护的调子来反对他们。仿佛资

① 1871 年和 1891 年德文版为“军队”。——编者注

② 1871 年和 1891 年德文版中“工人阶级的政府”等字有着重号。——编者注

本主义社会还处在童贞和白璧无瑕的状态！仿佛它的对立现象还没有发展，它的自欺欺人的妄想还没有被揭穿，它的淫乱的实况还没有尽行暴露！他们叫喊说，公社想消灭构成全部文明基础的所有权！是的，诸位先生，公社曾想消灭那种将多数人的劳动变为少数人的财富的阶级所有权。它曾想剥夺剥夺者。它曾想把现在主要用作奴役和剥削劳动的工具的生产资料、土地和资本变成自由集体劳动的工具，以实现个人所有权。但这是共产主义，“不可能的”共产主义啊！然而，统治阶级中那些颇为聪明而能领悟到现存制度不能长存下去的人们（这种人并不少），已在令人厌恶地、大声疾呼地鼓吹合作制生产。如果合作制生产不是作为一句空话或一种骗局，如果它要排除资本主义制度，如果联合起来的合作社按照总的计划组织全国生产，从而控制全国生产，制止资本主义生产下不可避免的经常的无政府状态和周期的痉挛现象，那末，请问诸位先生，这不就是共产主义，“可能的”共产主义吗？

工人阶级并没有期望公社做出奇迹。他们并没有想靠人民的法令来实现现成的乌托邦。他们知道，为了谋得自己的解放，同时达到现代社会由于本身经济发展而不可遏制地趋向着的更高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完全改变的历史过程。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在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里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工人阶级充分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满怀着完成这种使命的英勇决心，所以他们能用鄙视的微笑回答奴才报人的粗野漫骂，回答好心肠的资产阶级空谈家的训诫，这些资产阶级空谈家用先知者万无一失的口吻宣讲其不学无术的滥调和宗派主义的臆造。

当巴黎公社亲自领导起革命的时候，当普通工人第一次敢于

侵犯自己的“天然尊长”^① 的管理特权，在空前艰难的条件下虚心、诚恳而卓有成效地执行了这个工作，并且他们所得报酬的最高额，据科学界一位权威^② 说，还不及伦敦国民教育局一个秘书所得最低薪额的五分之一的时候，——旧世界看见象征劳动共和国的红旗在市政厅上空飘扬，简直气得发疯了。

这终究是工人阶级被公认为能够发挥社会首倡作用的唯一阶级的第一次革命；这是除了富有的资本家以外的巴黎中等阶级的广大阶层——小贩、手工业者和商人也都一致公认的。公社英明地解决了一向是中等阶级内部纷争起因的债权和债务问题，因而拯救了这个阶级⁶⁶。中等阶级的这一部分人在 1848 年曾参加镇压六月工人起义，可是随后制宪议会立刻就毫不客气地把他们交给债主们去任意宰割了⁶⁷。可是，他们现在靠拢工人，还不只是因为这个缘故。他们感觉到他们必得在公社和不管打着什么招牌的帝国之间决定取舍。帝国大量盗窃社会财富，庇护大规模的金融诈骗，人为地加速资本集中并因而使一大部分中等阶级遭受剥夺，使他们在经济上遭到破产。帝国在政治上压迫了他们，用狂欢纵饮从道义上激怒了他们；帝国把教育他们子弟的事情交给无知兄弟会⁶⁸，从而侮辱了他们的伏尔泰思想；帝国激怒了他们的法兰西人的民族感情，因为它把他们骤然推入了这次造成许多灾难而结果只落得帝国颠覆的战争。真的，在波拿巴派高官显宦和资本家那帮流氓从巴黎逃跑以后，以共和联盟⁶⁹ 名义出面的中等阶级真正的秩序党，就站到了公社的旗帜下面，并且反驳梯也尔的诬蔑，保卫公社。至于这一大部分中等阶级的感激心情能否经得住目前的严重考验，将来自会知道。

① 在 1871 年和 1891 年的德文版中这里加有：“即有产阶级”。——编者注

② 在德文各版上这里加有：“（赫胥黎教授）”。——编者注

公社对农民说，“公社的胜利是他们的唯一希望”⁷⁰，这是完全正确的。从凡尔赛发出而由著名的欧洲报界雇佣文丐传遍全球的最骇人听闻的谎言，就是硬说“地主议员”代表法国农民。试想一想，法国农民对于他们在 1815 年以后不得不付予 10 亿赔偿金⁷¹的人们竟产生了爱戴心情！在法国农民的心目中，大土地所有者存在本身就是对他们 1789 年的胜利果实的侵犯。1848 年，资产者们对农民的土地征收了每法郎加 45 生丁的附加税，但这是以革命的名义做的；而现在他们却挑起了反对革命的国内战争，借以把他们约定要付给普鲁士人的 50 亿赔款的主要重担转嫁到农民身上。相反地，公社在最初发表的一篇宣言中就已经声明，战争的重担应当由真正的战争发动者负担。公社一定会使农民免除血税，一定会给他们一个廉价政府，一定会用他们自己选举出来并对他们负责的雇佣的公社官吏去代替现今吸吮他们血液的公证人、律师、法警和其他法庭吸血鬼。它一定会使他们免除非乡警、宪兵和省长的专横压迫；它一定会用启发他们智慧的学校教师去代替麻痹他们头脑的教士。而法国农民首先是很会打算盘的。他们会发觉，给教士的款项如果不由税吏们强制征收，而只由各教区的居民依其信神程度自愿捐出，那将是完全合理的。这就是公社的统治——也只有这种统治——能够直接带给法国农民的重大益处。所以这里用不着讲那些只有公社才能够而且必须为了农民的利益去解决的更复杂和真正切身的问题，如关于象梦魔一样压在农民小块土地上的抵押借款问题，关于日益增多的 *prolétariat foncier*（农村无产阶级）问题，关于农民本身由于现代农业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农业经营的竞争而日益加速受到剥夺的问题。

路易·波拿巴是被法国农民选为共和国总统的，然而第二帝国是秩序党创立的。在 1849 年和 1850 年，法国农民以自己的区

长对抗政府的省长，以自己的学校教师对抗政府的教士，以自己本身对抗政府的宪兵，这样他们就开始表示出他们实际需要的是什么。秩序党在 1850 年 1 月和 2 月所颁布的一切法律⁷²，据它自己承认，都是反对农民的。农民曾经是波拿巴主义者，因为他们以为大革命及其带给农民的利益是和拿破仑的名字分不开的。这种在第二帝国时代开始迅速破灭的（而且实质上是和“地主议员”的意向敌对的）幻想，这种过去时代的偏见，怎么能够抵得住公社对于农民切身利益和迫切需要的照顾呢？

“地主议员”知道（并且实际上也最害怕这一点），如果公社的巴黎同外省自由交往起来，那末不出三个月就会爆发普遍的农民起义。正因为这样，他们才如此怯懦地急于对巴黎实行警察封锁，阻止这种传染病的蔓延。

这样，既然公社是法国社会的一切健全成分的真正代表，也就是真正的国民政府，那末，由于它同时又是工人的政府，是争取劳动解放的勇敢战士，它就是十足国际性的。当着把法国两省归并给德国的普鲁士军队的面，公社把全世界的工人都归并到了法国方面。

第二帝国是普天下诈骗勾当的节日。世界各国的坏蛋都响应了它的号召，赶来参加它的闹宴和掠夺法国人民的勾当。甚至在目前，梯也尔也还是以瓦拉几亚的流氓加内斯科为右手，以俄国的暗探马尔科夫斯基为左手。公社则使一切外国人都能享有为不朽事业而牺牲的荣誉。资产阶级在因它叛变而招致失败的对外战争和因它阴谋勾结外国侵略者而挑起的国内战争之间的空隙中，乘机利用在法国全境对德国人进行警察迫害来表现了他们的爱国精神。公社则委任了一个德国工人^① 担任自己的劳动部长。梯也

① 列奥·弗兰克尔。——编者注

尔、资产阶级和第二帝国都不断欺骗波兰人，口头上冠冕堂皇地对他们表示同情，实际上把他们出卖给俄国，并且干着俄国的肮脏勾当。公社则对波兰的英雄儿子^①表示尊敬，让他们领导巴黎的捍卫者。为了更鲜明地表明由公社自觉地开辟的历史新纪元，公社一方面当着普鲁士胜利者，而另一方面当着波拿巴将军率领的波拿巴军队，推倒了象征战争光荣的庞然巨物——旺多姆圆柱⁷³。

公社的伟大社会措施就是它本身的存在，就是它的工作。它所采取的某些措施，只能表明通过人民自己实现的人民管理制的发展方向。属于这类措施的有：禁止面包工人做夜工；用违者严惩的手段禁止利用各种借口课收工人罚金来减低工资——这是雇主们惯用的方法，他们一身兼任立法者、审判官和执行吏，而且把罚金纳入私囊。另一个这一类的措施是把一切企业主已逃跑或已停业的工厂和作坊交给工人协作社，同时保证企业主有权获得补偿。

公社的那些很审慎温和的财政措施，只能适合于城市被围的情况。各大金融公司和建筑包工人们在欧斯曼^②庇护下不知盗窃了巴黎多少财物，所以公社没收他们财产的理由，要比路易·波拿巴没收奥尔良王室财产的理由多得多。霍亨索伦王室和英国寡头执政者们虽然都靠掠夺教会得到大批财富，但是对于只从没收教会财产上得到8 000法郎的公社，当然还是要大发雷霆。

凡尔赛政府稍微恢复了元气，便开始采取极残暴的措施对付公社；它在法国各地压制一切言论自由，甚至禁止召开大城市代表会议；它在凡尔赛和法国其他各地设置暗探，其规模远胜过第二帝

① 雅·东布罗夫斯基和瓦·符卢勃列夫斯基。——编者注

② 欧斯曼男爵 (Haussmann) 在第二帝国时代是塞纳省省长，亦即巴黎市的行政长官。为便于镇压工人起义，他曾进行了一系列改建巴黎街道等的工作。（弗·伊·列宁主编的1905年俄译本注。）——编者注

国时代；它的宪兵检察官焚毁一切在巴黎出版的报纸，拆阅一切寄自巴黎和寄往巴黎的信件；在国民议会中，只要谁稍微想替巴黎说句话，就立刻有疯狂的呵叱声把他压下去，这种情形甚至在1816年的“无双议院”里也未曾有过。凡尔赛人不仅对巴黎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战争，而且还千方百计地在巴黎内部进行收买和阴谋活动。在这种情形下，公社若不愿可耻地背叛自己的使命，能象在太平盛世那样遵守自由主义的程式吗？如果公社政府的性质和梯也尔政府一样，那末巴黎方面就没有理由查封秩序党的报纸，而凡尔赛方面也没有理由查封公社的报纸了。

“地主议员们”宣称法国得救的唯一办法是回到教会的怀抱里去，而不信教的公社却揭露了毕克普斯女修道院和圣劳伦特教堂的秘密⁷⁴，这自然是使这些议员恼火的事情。梯也尔因波拿巴的将军们惯于打败仗、签降书以及在威廉斯赫埃⁷⁵卷香烟而滥发给他们荣誉军团大十字勋章，公社却在自己的将军们稍有失职嫌疑时就予以撤职和逮捕，这对于梯也尔先生是一种尖刻的讽刺。公社把一个曾在里昂因破产被监禁过六天，后来用假名混进公社的委员^①予以撤职和逮捕，对于当时仍担任法国外交部长，向俾斯麦出卖法国并向绝妙的比利时政府发号施令的那个伪造证件的茹尔·法夫尔说来，这难道不是一个响亮的耳光吗？但是，公社并不象一切旧政府那样，自以为永远不会犯错误。公社公布了自己的言论和行动，它把自己的一切缺点都告诉民众。

在任何一次革命中，除了真正代表革命的人物，总还出现另外一种人。这种人当中有些是以前各次革命的遗老和笃信者，他们不了解当前运动的意义，但他们由于具有人人皆知的忠诚和勇敢

① 布朗舍。——编者注

精神或者只是由于传统关系，还保留有对人民的影响；另外有些人则不过是些空喊家，他们年年重复自己反对现存政府的刻板的声明，因而博得第一流革命家的声誉。在3月18日以后，也出现了一些这样的人，他们有时甚至扮演了显要的角色。他们极力阻止工人阶级的真正运动，正象过去这种人阻碍以前各次革命的充分发展一样。他们是一种必不可免的祸害；摆脱他们需要有一段时间，但是公社却没有这样一段时间。

公社简直是奇迹般地改变了巴黎的面貌！第二帝国的那个荒淫无度的巴黎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法国的京城不再是不列颠的大地主、爱尔兰的在外地主⁷⁶、美利坚的前奴隶主和暴发户、俄罗斯的前农奴主和瓦拉几亚的封建贵族麇集的场所。在陈尸场内一具尸首也没有了，夜间抢劫事件不发生了，偷窃现象也几乎绝迹了。自从1848年2月以来，巴黎街道第一次变得平安无事，虽然街道上连一个警察也没有。有一个公社委员说：

“我们再也听不到什么杀人事件、抢劫事件和袭击个人的事情；看来似乎警察已经把他们所有的保守朋友带到凡尔赛去了。”

荡妇们已经跟着自己的庇护者，跟着那些保卫家庭、宗教、尤其是保卫财产的人一起逃光了。现在又由真正的巴黎妇女出现在最前列，她们和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妇女一样英勇、高尚和奋不顾身。努力劳动、用心思索、艰苦奋斗、流血牺牲而又精神奋发地意识到自己的历史创造使命的巴黎，几乎忘记了站在它城墙外面的食人生番，满腔热忱地一心致力于新社会的建设！

和巴黎这个新世界面对面相峙的是凡尔赛的旧世界。那里麇集着一切旧制度的食尸鬼，即渴望撕食人民尸体的正统派和奥尔良派，以及甘做尾巴的陈腐共和派，他们以出席国民议会支持了奴隶主的叛乱。他们希望凭靠那个充当政府首脑的老朽不堪的小丑

的虚荣心，把议会制共和国保持下去；他们拙劣地模仿 1789 年，在 Jeu de Paume^① 召开了幽灵会议。这个代表法国一切腐朽东西的议会，只是靠路易·波拿巴的将军们的军刀，才维持住幽灵般的生命。巴黎全是真理；凡尔赛全是谎言，而这种谎言是从梯也尔嘴里发出的。

梯也尔对塞纳—瓦瑟省的区长代表团说：

“你们可以信赖我的话，我从来不食言。”

他向议会说，“这是法国从未有过的最自由地选出的和最开明的议会”；他向他的杂牌军队说，这是“世界的瑰宝，是法国从未有过的一支最精锐的军队”；他对外省说，由他下令轰击巴黎是无稽之谈：

“如果曾经打了几发炮弹，那也不是凡尔赛军队打的，而是一些叛乱者为了假装他们在作战才打的，可是实际上他们连头都不敢露出来。”

后来他又向外省宣称：

“凡尔赛的炮兵不是轰击巴黎，而只是射击它。”

他向巴黎大主教说，硬推在凡尔赛军队头上的处决和报复行为（！），全是谎言。他向巴黎声明说，他只是想“把巴黎从压迫它的可憎暴君的控制下解放出来”，公社的巴黎“不过是一小撮罪犯”。

梯也尔先生的巴黎并不是“贱民”的真正巴黎，而是幽灵的巴黎，francs-fileurs⁷⁷ 的巴黎，闲逛男女的巴黎，富人的、资本家的、花花公子的、游手好闲者的巴黎。这个巴黎带着它的奴仆、骗子、文丐、荡妇目前正麇集在凡尔赛、圣丹尼、吕埃伊和圣热尔门；这个巴黎认为内战不过是惬意消遣，它从望远镜中欣赏战斗的进行，计

^① 网球厅，国民议会于 1789 年在这里通过了著名的决议。（恩格斯在 1871 年德文版上加的注。）

算放炮的次数，用自己的以及自己媳妇的名誉赌咒发誓说，这里演的戏要比圣马丁门剧场中的好得多。被打死者真的被打死了，伤者的呼声也不是假装的，而且在他们面前演着的这场戏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

这就是梯也尔先生的巴黎，正象科布伦茨城的亡命之徒⁷⁸是卡龙先生的法国一样。

四

奴隶主阴谋用普鲁士军队占领巴黎来征服巴黎的第一次企图，因俾斯麦的拒绝而没有得逞。3月18日实行的第二次企图，结果是军队溃败和政府逃往凡尔赛，接着，按照政府的命令，全部行政机关也停止工作，随之迁往凡尔赛。梯也尔假装同巴黎议和，借以争取时间准备和巴黎作战。但是到哪里去搜罗军队呢？常备团的残部人数很少，而且不大可靠。梯也尔向外省发出紧急呼吁，坚决要求派国民自卫军和志愿军前往援助凡尔赛，但是遭到断然拒绝。只有布列塔尼派去了一小撮朱安兵⁷⁹，他们作战时打着白旗，每人胸前缝着用白布做成的耶稣圣心；他们的战斗口号是 «Vive le Roi!»（“国王万岁！”）。这样，梯也尔就只能匆忙纠集一群杂牌队伍，其中有水兵、海军陆战队士兵、教皇的朱阿夫兵、瓦伦顿手下的宪兵以及比埃特里手下的市警和侦探。假若不是帝国的被俘兵员逐渐到达，那末这支军队就会小得可怜，而俾斯麦放回被俘兵员的数量标准，是使得一方面能够维持内战，另一方面又能够继续保持凡尔赛对普鲁士的卑贱屈从地位。在这次战争中，凡尔赛的警察必须监视凡尔赛的军队，而宪兵则必须站在最危险的岗位上，以便带引军队前进。陷落的堡垒不是夺来的，而是买通的。公社社员的英雄气概向梯也尔表明，要击破巴黎的抵抗，无论是他的战略才干或者是他所支配的军队，都不足以胜任。

同时，他和外省的关系愈来愈紧张了。凡尔赛没有接到过一封可以稍微使梯也尔和他的“地主议员们”感到振奋的表示拥护的

呈文。相反地，从各方面派来的代表团和送来的呼吁书，都是用很不尊敬的口吻坚决要求同巴黎议和，而议和的基础是毫不含糊地承认共和国，确认公社实行的各种自由，解散任期已满的国民议会。代表团和呼吁书是如此之多，致使梯也尔的司法部长杜弗尔在4月23日的通令中饬令国家的检察官把“呼吁议和”当做罪行查办！然而梯也尔看到进攻巴黎没有希望，于是决定改变策略，指定在4月30日按照他强迫国民议会通过的新市政法在全国进行地方选举。他时而利用他那些省长所玩弄的阴谋手段，时而利用他那些警察机关所发出的威胁恫吓，满以为外省进行的选举定会赋予国民议会以它从未有过的道义力量，以为他定会从外省取得征服巴黎的物质力量。

梯也尔一开始就竭力想在进行他那受到他自己的公报赞扬的反对巴黎的强盗战争的同时，在他的部长们企图在全法国建立恐怖统治的同时，演出一出议和的小滑稽剧。这出滑稽剧要达到几个目的：蒙蔽外省视听，把巴黎中等阶级分子拉到梯也尔方面来，并且主要是使国民议会中的冒牌共和党人能借自己对梯也尔的信任来掩盖他们叛卖巴黎的行为。3月21日，即在梯也尔还没有军队的时候，他向国民议会声明说：

“无论如何，我决不派军队到巴黎去。”

3月27日，他又声明说：

“我发现共和国已是既成事实，所以我断然决定要保护它。”

实际上，他用共和国的名义镇压了里昂和马赛的革命⁸⁰，而他的“地主议员们”在凡尔赛只要一听到“共和国”这个词就狂吠起来。做出这番勋业之后，他就把“既成事实”降低成假定的事实。奥尔良王室子弟原是他为慎重起见从波尔多打发走的，现在他们

已被准许明目张胆地违犯法律，在德勒搞阴谋活动了。梯也尔在同巴黎和外省代表的无止境的会谈中讲到的那些条件——尽管他的话随着时间情况而在口气和分寸上经常变化——总是归结于一点：必须向

“那一小撮应对克列芒·托马和勒康特两人的被杀负责的罪犯”报复。

当然，这里有一点是不言而喻的，即巴黎和法国应该无条件地承认梯也尔先生本人是最好的共和国，就象梯也尔本人在1830年曾经承认路易-菲力浦是最好的共和国一样。然而，就连这些让步，他也竭力通过他的部长们在国民议会中提供的官方解释弄得暧昧不明了。不仅如此，他还通过他那位杜弗尔去行动。杜弗尔，这个老牌奥尔良派律师，一向担任戒严状态下的大法官；现在1871年在梯也尔治下是如此，在1839年路易-菲力浦治下和在1849年路易·波拿巴任总统期间⁸¹也是如此。当他不担任部长职务时，他曾以替巴黎资本家辩护而大发横财；同时他又以攻击自己颁布的法律来捞取政治资本。他现在不仅通过国民议会匆忙颁行了许多镇压性的法律，一旦巴黎陷落，就可以用来消灭法国共和制自由的最后残余⁸²；他还仿佛以下述措施预示了巴黎未来的命运：他把他觉得过分冗长的军事法庭的审判程序加以简化⁸³，并且制定了一道新的极残忍的流放法。1848年革命取消了对政治犯的死刑，而代之以流放。路易·波拿巴不敢恢复，至少是不敢公开恢复断头刑。地主议会当时还不敢暗示说巴黎人在它眼中不是叛乱者，而是强盗，所以它暂且只得把报复巴黎的准备工作局限于杜弗尔的新流放法。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梯也尔的议和滑稽剧没有象他所希望的那样引起“地主议员们”的狂怒，梯也尔就不能把自己的滑稽剧继续演下去，那些“地主议员们”由于头脑愚钝，既不能了解他所玩弄的把戏，又不能了解他那种虚伪、造作和延宕的必要性。

梯也尔鉴于 4 月 30 日的市镇选举在即，便于 4 月 27 日演出了一幕议和剧。他在国民议会讲坛上滔滔不绝地说了许多故作多情的漂亮话，其中有这样一段：

“反对共和国的阴谋只有一个，这就是巴黎的阴谋，这个阴谋迫使我们去杀害法国人。但是我要再三重复说：让那些举起渎神武器的人放下他们的武器吧，那我们就会立即停止惩罚来缔结和约，只有那一小撮罪犯需另当别论。”

他对那些打断他讲话的“地主议员们”的狂喊声回答道：

“诸位先生，我恳求你们告诉我，难道我说的不对吗？难道你们听见我如实地说说明罪犯不过是一小撮人，真的觉得可惜吗？忍心杀害克列芒·托马和勒康特将军的人只是罕有的例外，这难道不是不幸中之万幸吗？”

然而，法国对于梯也尔在议会上发表的自以为象海妖的歌声一样迷人的言辞置若罔闻。在法国仅存的 35 000 个市镇所选出的 70 万名市镇参议员中，正统派、奥尔良派和波拿巴派当选者总共还不到 8 000 人。补选和复选的结果对梯也尔政府更加不利。国民议会不但没有从外省方面得到它所必需的物质援助，而且连最后一点起道义力量作用的权利，即认为自己是全国普遍意志表达者的权利，也完全丧失了。而使它彻底失败的，是法国所有城市新选出的市镇参议会决定在波尔多召集一个反议会，这就公开地威胁了篡夺政权的凡尔赛议会。

在俾斯麦看来，期待已久的采取断然行动的时刻已经到来。他用统治者的口吻命令梯也尔派全权代表到法兰克福去最后签订和约。梯也尔卑躬屈膝、唯命是从地遵循自己主子的吩咐，急忙派了自己的亲信茹尔·法夫尔在普野-克尔蒂约的陪同下到法兰克福去。普野-克尔蒂约是卢昂“著名的”棉纺织厂主，是第二帝国的狂热的甚至卑躬屈膝的拥护者，在他看来，第二帝国除了同英国签

订过损害了他这个企业家利益的商约⁸⁴ 以外，是无可非议的。当梯也尔还在波尔多刚一任命他当财政部长的时候，他马上就开始攻击这个“邪恶的”条约，暗示说这个条约很快就会被废除，甚至厚颜无耻地立即试图——虽然徒劳无益(因为没有请示俾斯麦)——恢复旧日的保护关税制来打击阿尔萨斯，而这样做据他说是与任何旧有的国际条约都不抵触的。此人把反革命看做在卢昂降低工资的手段，把割让法国两省看做在法国抬高他的货物价格的手段。这种人岂不是命定要被梯也尔挑选为茹尔·法夫尔的助手去最后完成他的卖国勾当吗？

当这绝妙的一对全权代表到达法兰克福的时候，盛气凌人的俾斯麦就立即粗暴地要他们二者择一：“或者是恢复帝国，或者是无条件地接受我的媾和条件！”而他的条件就是缩短军事赔款偿付期限，并由普鲁士军队占领巴黎各堡垒，直到将来俾斯麦对法国形势感到满意时为止。这样一来，普鲁士就被承认为法国内政的最高裁决者。为此，俾斯麦欣然应允释放被俘的波拿巴兵团去消灭巴黎，并调派威廉皇帝的军队直接援助他们。为了保证他不食言，他把第一批赔款的支付期延到“平定”巴黎之后。梯也尔和他的全权代表们当然贪婪地急忙吞下了这一钓饵。5月10日，他们签订了和约；5月18日，这个条约就在他们的努力下经国民议会批准了。

从缔结和约到被俘的波拿巴兵团被放回这一段期间，梯也尔觉得比以往更需要把他的议和滑稽剧继续演下去，因为他的共和党走卒们极需要一个借口，以便装做看不见对巴黎进行血腥屠杀的准备工作。一直到5月8日，他还对劝他议和的中等阶级代表团说：

“只要暴乱者同意投降，巴黎的城门就可以对一切人洞开一个星期，只有

杀害克列芒·托马和勒康特两将军的凶手除外。”

几天以后，当“地主议员们”坚决要求他解释这个诺言的时候，他避而不答，但意味深长地暗示说：

“我对你们说，你们当中有些没有耐心的人，他们未免太性急了。请他们再忍耐一个星期吧。一个星期以后就再不会有危险了，那时任务就会和他们的豪勇和能力相称了。”

一到麦克马洪能向梯也尔保证说他很快就会打进巴黎时，梯也尔就向国民议会声明，说他

“将手持法律走进巴黎，迫使那些洒流了士兵鲜血和毁坏了公共纪念物的恶棍们全部抵偿自己的罪责”。

当决定的时刻已近的时候，他对国民议会声明说，我是不会留情的。他向巴黎声明说，对巴黎已经宣判了；对自己的那些波拿巴强盗们声明说，政府允许他们任意向巴黎报复。最后，当叛徒于5月21日给杜埃将军打开了巴黎城门时，梯也尔就于5月22日向“地主议员们”揭开了他们先前硬不愿了解的他那出议和滑稽剧的“目的”：

“几天前我对你们说过，我们正在接近我们的目的；今天我来告诉你们吧，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了。秩序、正义和文明，终于获得胜利了！”

确实如此。每当资产阶级制度的奴隶和被压迫者起来反对主人的时候，这种制度的文明和正义就显示出自己真正的凶残面目。那时，这种文明和这种正义就是赤裸裸的野蛮行为和无法无天的报复行为。财富占有者和财富生产者之间的阶级斗争中的每一次新危机，都愈益明显地证明这一事实。和1871年的空前未有的卑鄙行为比较起来，甚至资产阶级的1848年6月的暴行也要相形见绌。巴黎全体人民——男人、妇女和儿童——在凡尔赛人攻进城内以后还战斗了一个星期的那种自我牺牲的英雄气概，反映出他

们事业的伟大，正象兵痞们的残暴兽行反映出雇佣他们作为保护者和报复者的文明社会所固有的精神一样。这种在战事结束以后还大肆杀戮，以致为如何处置成堆的尸首感到困难的文明社会，真是太出色啦！

要想找到与梯也尔和他那些嗜血豺狼的行为多少相象的东西，就必须回到苏拉和前后罗马三执政的时代去⁸⁵。同样是冷酷无情地大批杀人；同样是不分男女老幼地屠杀；同样是拷打俘虏；同样是残酷迫害，不过这一次是迫害整个阶级；同样是野蛮地追究隐藏起来的领袖，使他们无一幸免；同样是纷纷告发政治仇敌和私敌；同样是任意摧残根本和斗争无关的人们。不同处只在于罗马人没有多管炮来整批整批地击毙俘虏，他们没有“手持法律”，没有口号“文明”罢了。

看了这一切惨象之后，现在再来看一看这个资产阶级文明由它自己的报刊所描写的另一面、更加丑恶的一面吧。

一家伦敦托利党报纸驻巴黎记者写道：

“远处还响着零星的枪声；受伤的人躺在拉雪兹神甫墓地的墓石间听天由命地死去；临死前绝望挣扎的6000个暴乱者，在迷宫似的地道中徘徊踯躅；街上到处追逐着不幸的人群，用多管炮击毙他们。在这个时候令人看了气愤的是，咖啡馆里挤满了爱好喝酒、打弹子、玩骨牌的人，荡妇们在林荫道上无耻地逛来逛去，纵酒狂欢的喧嚷声从大饭店的特别间中传出来，打破深夜的寂静！”

爱德华·爱尔威先生在曾被公社查封的一家凡尔赛报纸《巴黎报》⁸⁶上写道：

“巴黎居民（！）昨天表现他们的欢乐的方式，实在是太轻佻了，恐怕还要每下愈况。巴黎笼罩着节日的气氛，而这是完全不合适的；要是我们不愿得到堕落时代的巴黎人的称号，就必须制止这种情形。”

接着，他引用了塔西陀的一段话：

“于是在这场可怕的斗争的第二天早晨，甚至在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以前，下贱和放荡的罗马又滚到毁坏过它的身体和玷污过它的心灵的那种淫乱泥坑里去了。——*alibi proelia et vulnera, alibi balneae popinaeque*（这里是战斗和创伤，那里是澡堂和筵席）。”⁸⁷

不过爱尔威先生忘记了一点：他所说的“巴黎居民”只是梯也尔的巴黎的居民，是从凡尔赛、圣丹尼、吕埃伊和圣热尔门大批奔回的那些 *francs-fileurs*⁷⁷ 的巴黎的居民；这真是“堕落时代”的巴黎。

这个建立在劳动奴役制上的罪恶的文明社会，每次取得血腥的胜利时，都要发出受到世界各处响应的毁谤的狂吠，来淹没它的受害者即为争取美好的新社会而英勇牺牲的战士们的喊声。工人们的平静的巴黎，公社的巴黎，突然被这批维护“秩序”的嗜血恶狗们变成了一个魔窟。这场骇人听闻的变化在世界各国资产阶级的意识中证明什么呢？不过是证明公社搞了一次反对文明社会的阴谋！巴黎人民满腔热血地为公社牺牲生命，自古以来没有一次战斗有这么多人自我牺牲。这证明什么呢？不过是证明这个公社不是人民自己的政府，而是一小撮罪犯用暴力夺取的政权！巴黎妇女在街垒里和刑场上都是视死如归。这证明什么呢？不过是证明公社的邪恶魔鬼把她们变成麦格拉和赫加特！公社在实行绝对统治的两个月内采取的温和态度，只能同它进行保卫时表现的英勇精神相比拟。这证明什么呢？不过是证明公社在两个月内用温和态度和人道精神遮盖了它那恶魔般的嗜血本性，好让这种嗜血本性能在临死挣扎时随意发泄！

工人的巴黎在英勇地自我牺牲时，也曾把一些房屋和纪念碑付之一炬。既然无产阶级的奴役者们要把无产阶级千刀万剐，那他们就休想凯旋回到完好无损的住宅里去。凡尔赛政府叫喊道：

“放火啦！”同时向它的远及穷乡僻壤的走卒们低声下达这样一个口号：“把我的一切敌人都当做一般放火犯来搜杀”。全世界的资产阶级看见在战斗结束后进行的大屠杀，心里感到高兴，而看到人们“亵渎”砖瓦和灰泥却愤怒万分！

某些政府正式准许自己的海军“杀人、放火和破坏”，试问这是不是准许放火？英国军队毫无道理地烧毁了华盛顿的国会大厦和中国皇帝的夏宫⁸⁸，试问这是不是放火？普鲁士人不是为了军事上的理由，而只是为了报复泄愤，就用煤油烧毁了许多象夏托登那样的城市和无数乡村，试问这是不是放火？梯也尔向巴黎轰击了六个星期，借口是只想把里面有人的房屋烧毁，试问这是不是放火？在战争当中，火也和任何其他武器一样，是一种正当的武器。轰击敌人占据的房屋，是为了把这些房屋烧毁。防御者不得不撤离这些房屋时，他们自己就把这些房屋付之一炬，使进攻者不能利用这些房屋巩固阵地。妨碍世界上任何正规军作战的一切房屋，都是不免要被烧毁的。可是，在奴隶们反对他们的压迫者的战争中，在这场有史以来唯一合理的战争中，却根本不许用这种方法！公社把火当做最严格意义上的防御工具来使用。它使用火是为了不让凡尔赛军队开进欧斯曼特意修建得适合炮击的那些又长又直的街道上去；它使用火是为了掩护自己退却，这同凡尔赛军队在进攻时往前面投掷手榴弹一样，这种手榴弹破坏的房屋并不比公社用火烧毁的房屋少。直到现在还不能肯定，究竟哪些房屋是防御者烧毁的，哪些是进攻者烧毁的。况且防御者只是在凡尔赛军队已经开始大批枪杀俘虏时，才开始使用火。而且，公社早就公开宣布过，公社一旦被逼到绝境，就会把自身埋葬在巴黎的废墟中，并把巴黎变成第二个莫斯科。以前国防政府也曾说过要这样做，但是，它这样说自然只是为了掩盖自己的叛变而已。为此，特罗胥还预备了大量

煤油。公社知道，它的敌人毫不爱惜巴黎人民的生命，但是十分爱惜他们的巴黎住宅。何况梯也尔又宣布说他将毫不留情地报复。当他的军队已经准备就绪，而普鲁士人又已经封锁了一切出口的时候，他就喊道：“我是不会留情的！赎罪应该不打折扣，审判应该严酷无情！”如果说巴黎工人象汪达尔人一样行动过，那末这是誓死防御的汪达尔人行为^①，而不是凯旋胜利者的汪达尔人行为，如那些毁灭了古代邪教世界极宝贵文物的基督徒有过的汪达尔人行为；然而就是后一种汪达尔人行为也被历史家认为是正当的行为，因为它是正在诞生的新社会对正在崩溃的旧社会所进行的规模巨大的斗争中不可避免和比较不关紧要的事情。巴黎工人的这些措施与欧斯曼为了给游手好闲者的巴黎腾出地盘而把历史的巴黎毁灭的那种汪达尔人行为更是不相同了！

但是，公社处死了以巴黎大主教为首的 64 个人质啊！1848 年 6 月，资产阶级及其军队恢复了早已绝迹的枪毙没有自卫能力的俘虏的战争风俗。自此以后，欧洲和印度一切民众起义的镇压者们就比较严格地遵照这种野蛮风俗行事了。这证明它真是“文明社会的一个进步”！另一方面，普鲁士人在法国又恢复了扣留人质的风俗——硬要一些完全无辜的人们用自己的性命去为别人的行动负责。我们已经说过，由于梯也尔在战争开始时就采取了枪毙被俘公社社员的人道做法，所以公社不得不为拯救这些被俘者的生命而采用了普鲁士人扣留人质的做法。既然凡尔赛人还继续枪毙俘虏，那他们就是一次又一次地要自己的人质去替死。在麦克马洪的御用军^②为庆祝自己开进巴黎而进行了那场血腥屠杀以后，试问公社怎么还能继续饶恕那些人的生命呢？难道连这个用以

^① 汪达尔人是古代日耳曼的一个部落，曾多次与罗马作战，公元 455 年曾占领罗马，破坏了无数文物。汪达尔人行为指破坏文物的行为。——译者注

抵御资产阶级政府肆无忌惮的兽行的最后抵制办法——扣留人质——也只应当是开玩笑吗？杀死大主教达尔布瓦的真正凶手是梯也尔。公社再三提议以大主教和许多其他教士来交换梯也尔扣留住的布朗基一人。但是，梯也尔执拗地拒绝这种交换。他知道，放走布朗基就是给公社一个首脑，而大主教则在成了死尸之后对他更加有用。在这里，梯也尔仿效了卡芬雅克。在 1848 年 6 月，卡芬雅克和他那些“秩序人物”曾经多么愤激地高声责备起义者杀死了大主教阿弗尔啊！其实他们很清楚，大主教是被秩序党的士兵们杀死的。大主教的大司铎雅克美先生曾目睹此事，他在事件发生后立刻就向他们证明了这一点。

秩序党在举行自己的血宴时总是散播许多诽谤自己的受害者的言论，这只是证明现代资产者自认是从前的封建主们的合法继承人；从前的封建主们认为自己有权使用各种武器对付平民，而平民手里有任何武器都是犯罪。

统治阶级为了在外国侵略者的庇护下发动内战来镇压革命而进行的阴谋，即我们从 9 月 4 日事件起一直考察到麦克马洪的御用军进入圣克鲁门止的这个阴谋，是以巴黎的血腥屠杀为终结的。俾斯麦洋洋自得地望着巴黎的废墟，大概认为这些废墟是普遍毁灭各大城市的第一步，关于这种普遍毁灭，当他还只是一个普通地主身分充当普鲁士 1849 年无双议院的议员⁹⁰时就梦想过了。他洋洋自得地望着巴黎无产者的尸体。在他看来，这不但是革命的绝灭，而且也是法国的灭亡，这个法国现在已经真正被砍掉了头颅，而且是由法国政府自己砍掉的。他和一切飞黄腾达的国家要人一样，目光短浅，只看到了这个巨大历史事件的外表。难道历史上有过一个战胜者决定采取不仅替战败政府充当宪兵，而且充当雇佣凶手的办法来完成自己的胜利吗？普鲁士和公社之间没有发

生过战争。相反地，公社接受了和约的初步条件，普鲁士宣布了中立。可见，普鲁士不是交战一方。它干得象一个卑鄙的凶手，因为这不会招致任何危险；它是一个雇佣凶手，因为它曾事先讲定一旦巴黎陷落就要付给它五亿行凶赏钱。上天注定要假手于信神的和仁义道德的德国去惩罚不信神的和荒淫无耻的法国的这场战争的真正性质，就在这里表现出来了！这种甚至在旧世界的律师看来也是空前违反国际公法的行为，并未迫使欧洲各国“文明”政府把纯系圣彼得堡内阁御用工具的罪恶的普鲁士政府宣布为违法罪犯，却只是激起它们去讨论这样一个问题：是不是要把侥幸逃出巴黎双重包围圈的少数受害者引渡给凡尔赛刽子手！

在这场现代最可怕的战争结束以后，战胜的军队和战败的军队联合起来共同残酷杀害无产阶级。这个前所未闻的事件，并不是象俾斯麦所想的那样，证明正为自己开辟道路的新社会遭到了彻底失败，而是证明资产阶级旧社会已经完全腐朽了。旧社会还能创造的最高英雄伟绩不过是民族战争，而这种战争现在表明是政府玩弄的十足的欺骗勾当，这种欺骗勾当的唯一目的不过是要推迟阶级斗争，当阶级斗争变成内战的熊熊火焰时，这种欺骗勾当也就被抛在一边了。阶级的统治已经不能拿民族的外衣来掩盖了；在反对无产阶级时，各民族政府是一致的！

在 1871 年的圣灵降临节^①以后，法国工人和他们的劳动产品的占有者之间，已经既不能有什么和平，也不能有什么停战了。雇佣兵痞的铁腕可能暂时把这两个阶级都压服一下。但是，它们之间的斗争定会一次又一次地爆发，并且规模愈来愈大，所以归根到底谁将取得胜利——是少数占有者还是绝大多数劳动者将取得胜

① 在复活节后的第七个星期日，约在春末夏初。这里指的是 5 月 28 日，即公社的最后一日。——译者注

利，那是毫无疑问的。而法国工人阶级不过是整个现代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罢了。

欧洲各国政府在巴黎面前表明了阶级统治的国际性质，而现在它们却向全世界大喊大叫，说这一切灾难的主要原因在于国际工人协会，即在于反对全世界资本阴谋的国际劳动组织。梯也尔责备这个组织是劳动的暴君，而把自己说成劳动的解放者。皮卡尔下令禁止国际的法国会员跟国外的国际会员保持任何联系；梯也尔的1835年同谋者，那个已成为老古董的若贝尔伯爵声称，铲除国际是每个文明国家政府的主要任务。“地主议员们”狂吠起来反对国际，而欧洲各国报刊则随声附和。有一位同我们协会毫无关系的可敬的法国作家^①对国际做出这样的评论：

“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大部分公社委员，都是国际工人协会的最积极、最有见识和最刚毅的成员……这是些完全忠实的、真诚的、有见识的、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纯洁的和正面意义上的狂信的人物。”

满脑子警察气味的资产阶级，自然要把国际工人协会看做一种秘密阴谋团体，其中央机构不时命令在各国举行暴动。实际上，我们的协会只是文明世界各国先进工人之间的国际纽带。阶级斗争无论在何处、以何种形式、在何种条件下表现出来，自然总是由我们协会的会员站在最前列。产生这个协会的土壤就是现代社会本身。无论屠杀多少人，都不能把这个协会铲除。要铲除它，各国政府首先必须铲除资本对劳动的专横统治，即铲除它们自身的寄生性生存的条件。

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受人敬仰。它的英烈们已永远铭记在工人阶级的伟大心坎里。那些杀害

① 大概是指罗比耐。——编者注

它的刽子手们已经被历史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不论他们的教士们怎样祷告也不能把他们解脱。

总 委 员 会：

马·詹·布恩	弗·布列德尼克
G. H. 巴特里	凯希耳
德拉埃	威廉·黑尔斯
阿·埃尔曼	科尔布
弗·列斯纳	罗赫纳
詹·帕·麦克唐奈	乔治·米尔纳
托马斯·莫特斯赫德	查·米尔斯
查理·默里	普芬德
罗奇	罗沙
吕耳	萨德勒
奥·赛拉叶	考威尔·斯特普尼
阿尔弗勒德·泰勒	威廉·唐森

通 讯 书 记：

欧仁·杜邦 法国
卡尔·马克思 德国和荷兰
弗·恩格斯 比利时和西班牙
海尔曼·荣克 瑞士
P. 卓瓦基尼 意大利
捷维·莫里斯 匈牙利
安东尼·扎比茨基 波兰
詹姆斯·柯恩 丹麦
约·格·埃卡留斯 美国

执行主席 海尔曼·荣克

财务委员 约翰·韦斯顿

财务书记 乔治·哈里斯

总 书 记 约翰·黑尔斯

1871年5月30日于伦敦西中央区
海-霍耳博恩街256号

附录

“一队囚犯在乌里克大街停下来，在人行道上脸向着马路排成四五行。侯爵加利费将军和他的参谋下了马，从左侧开始巡视。将军慢慢地走动，查阅着行列，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停下来，拍拍某一个人的肩膀，或是向某一个站在后排的人点点头。这样挑选出来的人，多半是不问情由就被赶到街中心去，于是那里很快就形成了另外一个较小的队伍……很明显，这里出错的可能性很大。一个军官骑在马上向加利费将军指出了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仿佛他们犯过什么特别的罪恶。那个女人连忙从行列里冲出来，伸出双手跪倒在地上，用痛切的言语来申诉她没有犯什么罪。将军停了一会，然后带着冷酷的面孔和毫不介意的神情说道：‘夫人，巴黎的所有戏院我都去过，你的表演对我不会有什么效果 (*ce n'est pas la peine de jouer la comédie*)’…… 在这一天，凡是一个人比自己的近邻显然长得高一些，穿得脏一些或者干净一些，年长一些或者是相貌丑一些，都要倒霉。有一个人特别使我吃惊。显然，他迅速摆脱了人世的烦恼，只因为他长有一个破鼻子…… 象这样挑选出了一百多人并且指定了行刑队以后，那队囚犯又继续前进，而把他们留在后面。过了几分钟，在我们后面响起了一阵枪声，这枪声继续了一刻多钟。这就是把那些被仓猝定罪的可怜虫执行枪决。”（《每日新闻》驻巴黎记者 6月8日报道）

这个加利费，即“他的那个在第二帝国的闹宴上以无耻地卖弄色相闻名的妻子的面首”，就是在战时曾以法国的“毕斯托军曹”知名的人。

“《时报》（它是一家立论谨慎而不求耸人听闻的报纸）登载过一条消息，记述一些没被当场击毙尚存一息的人们被活埋的凄惨情景。有大批这样的人被活埋在圣雅克-拉-布希埃尔附近的广场上，其中有许多人埋得很浅。白

天街上的嘈杂声使人们察觉不到这种情景，但是到夜深人静的时候，邻近的居民常被隐约传来的呻吟声惊醒，到第二天早晨，他们看见一只握得紧紧的拳头从地里伸出来。由于这样，当局下令把被掩埋的人挖出来…… 我丝毫不怀疑，有许多受伤的人被活埋了。我能够证明一件事实。布律涅耳同他的爱人一起于上月 24 日在旺多姆广场的一座庭院中被枪杀，尸体在那里横陈到 27 日午后。掩埋队来抬走尸体的时候，发觉这个女人还活着，于是把她送到医院。虽然她中了四颗子弹，可是现在她已经没有生命危险。”（《旗帜晚报》⁹¹驻巴黎记者 6 月 8 日报道）

二

6 月 13 日的伦敦《泰晤士报》登载了如下一封信⁹²：

致《泰晤士报》编辑

阁下：

1871 年 6 月 6 日，茹尔·法夫尔向欧洲各国发出了一个通告，号召它们对国际工人协会进行斗争，直到把国际消灭。为了评价这个文件，只要举出几件事实就够了。

在我们章程的前言中已经指出，国际是“1864 年 9 月 28 日在伦敦朗-爱克街圣马丁堂举行的公开大会上”⁹³ 成立的。茹尔·法夫尔由于他自己最清楚的原因，把国际成立日期推到 1862 年以前。

为了解释我们的原则，他就引证“它〈国际〉在 1869 年 3 月 25 日发的传单”。但是他实际上引证的是什么呢？是一个并非国际的团体的传单。当他还只是一个颇为年轻的律师的时候，为了替被卡贝控以诽谤罪的巴黎《国民报》辩护，他就施展过这种伎俩。当时他硬说他宣读的是卡贝著的小册子中的一些摘录，实际上他宣读的是他自己加进去的一些话。这一欺骗行为在法庭审判时被揭

发出来了，要不是卡贝的宽容，茹尔·法夫尔就要受到开除出巴黎律师公会的惩罚。茹尔·法夫尔用来作为国际文件引证的一切文件，没有一件是国际的文件。例如，他说：

“如1869年7月在伦敦建立的总委员会所说，同盟宣布自己是无神论的团体。”

总委员会从未发表过这一类文件。相反地，它发表了一个正是将同盟即日内瓦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章程——茹尔·法夫尔引证的就是这个章程——宣布为无效的文件⁹⁴。

茹尔·法夫尔在他这个仿佛有一部分也是反对帝国的通告中，从头到尾都只是重复波拿巴检察官所捏造的警察言论来反对国际，这些言论甚至在帝国自己的法庭上就已被驳倒了。

大家知道，国际总委员会在关于前次战争的两篇宣言中（去年7月和9月发表的）^①，揭露了普鲁士对法国的侵略计划。后来，茹尔·法夫尔的私人秘书雷特兰热尔先生曾向总委员会的若干委员请求——自然是徒劳无益——由总委员会发动游行示威来反对俾斯麦，以支持国防政府；同时特别请求他们不要提到共和国。由于预期茹尔·法夫尔将到伦敦来，游行示威的准备工作已经做好了（无疑是本着最善良的愿望），然而这是违背总委员会的意愿的，因为总委员会在9月9日的宣言中曾明确地警告过巴黎工人要防范茹尔·法夫尔和他的同僚。

如果国际也向欧洲各国内阁发出一个关于茹尔·法夫尔的通告，请它们特别注意已故的米里哀尔先生在巴黎公布的文件，那末这位茹尔·法夫尔将说些什么呢？

阁下，我仍然是您的顺从的仆人

① 见本书第14—19、20—29页。——译者注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书记 约翰·黑尔斯

6月12日于伦敦西中央区
海-霍耳博恩街 256号

在一篇《国际协会及其目的》的文章中，伦敦《旁观者》⁸⁵（6月24日）充当了虔诚的告密者的角色，引证了——除了其他类似的玩意之外——同盟的上述文件作为国际发表的文件，并且引证得甚至比茹尔·法夫尔更加彻底。它刊载这篇文章是在上述那封辟谣信已发表于《泰晤士报》十一天以后。我们对此并不感到惊奇。弗里德里希大帝早就说过：所有耶稣会教徒中最坏的是新教徒。

《法兰西内战》草稿⁹⁶

卡·马克思写于1871年4—5月
第一次用英文和俄文全文载于
《马克思恩格斯文库》1934年版
第3(8)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文库》
英文译出

《法兰西内战》初稿

国防政府

战争开始以后四个月，当国防政府投给了巴黎国民自卫军一点小惠，即允许他们在比桑瓦耳⁹⁷显示他们的战斗能力的时候，这个政府认为促使巴黎投降的有利时机已经到了。在专为讨论投降问题而召开的巴黎区长会议上，特罗胥在茹尔·法夫尔和他的其他同僚在场和支持下，终于透露了他的“计划”。他的原话是这样讲的：

“我的同僚们在9月4日晚间向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巴黎有没有些许可能抵住普鲁士军队的围困？我当时毫不迟疑地做了否定的答复。现在在座的同僚中，有几位会证明我说的这些是实话，并且我一直是坚持着这个看法。我那时对他们就是这样说的：在目前的情况下，巴黎要打算抵住普鲁士军队的围困，那简直是一件蠢举。当然，我当时加了一句，这可能是一件英勇的蠢举，但终究不过是蠢举而已……事变的发展并没有推翻我的预断。”

从共和国宣告成立的那一天起，特罗胥的计划就是要巴黎和法国投降。实际上，他是普鲁士军队的总司令。茹尔·法夫尔自己在给甘必大的一封信里就曾这样露骨地供认：应当打倒的敌人不是普鲁士士兵，而是巴黎的（革命者）“蛊惑家”。由此可见，国防政府对人民的种种冠冕堂皇的许诺不过都是些存心骗人的谎言罢了。国防政府有步骤地实施这一“计划”——派波拿巴的将军们负责巴黎防务、瓦解国民自卫军、借茹尔·费里的渎职失政制造饥

馑。巴黎工人在 10 月 5 日、10 月 31 日等日子里几次想用公社来代替这批卖国贼的尝试，竟被当做与普鲁士人的串谋而遭镇压⁹⁸！投降之后，假面具揭下了（被扔到一边）。仰仗着俾斯麦的恩典，这批投降派变成了一个政府。他们作为俾斯麦的阶下囚，同俾斯麦缔结了全面停战协定，停战协定的各项条款解除了法国的武装，使任何继续抵抗成为不可能。正是这批投降派，在波尔多以共和国政府姿态重新复活之后，通过自己的前任大使梯也尔和外交部长茹尔·法夫尔，以所谓国民议会的多数的名义，远在巴黎起义之前便急切地哀求俾斯麦来解除巴黎的武装、占领巴黎、镇压“它的暴徒”，这些都是俾斯麦从法国返回柏林途中在法兰克福亲口对他的膜拜者们以冷嘲热讽的口吻讲出的。让普鲁士人占领巴黎，是国防政府“计划”的底蕴。这帮人从在凡尔赛粉墨登场以来为了央求普鲁士进行武装干涉而表现的一副恬不知耻的嘴脸，甚至使欧洲的待价而沽的报纸也为之瞠目失色。自从巴黎国民自卫军不再在投降派指挥之下而是把枪口指向投降派以来，他们的英雄业绩甚至使那些最抱怀疑态度的人也不得不把“卖国贼”一词烙到特罗胥、茹尔·法夫尔及其一伙的无耻额角上。公社缴获的文件最后提供了这些人叛国大罪的法律证据。这些文件中有一些是受命执行特罗胥“计划”的波拿巴派武人的信件；这些丑恶的家伙在这些信件里就嘲弄讥笑他们自己的“巴黎防务”（例如参看公社《公报》上公布的巴黎卫戍军炮兵司令、荣誉军团大十字勋章获得者阿尔丰斯·西蒙·吉奥写给炮兵师将军苏桑的信）。

因此，很明显，现在组成凡尔赛政府的这批人，只有发动内战、断送共和国、在普鲁士的刺刀庇护下使君主制度复辟，才能逃脱铁案如山的卖国贼应有的命运。

但是，——而这对第二帝国的人物，以及那些只有靠第二帝国

的土壤和空气才能变成冒牌人民喉舌的人物，是最具特征意义的，——共和国如果胜利，就不仅要给他们烫上卖国贼的烙印，而且还要把他们当做普通罪犯交付刑事法庭审理。只要看看茹尔·法夫尔、厄内斯特·皮卡尔、茹尔·费里这帮梯也尔手下的国防政府的要人就够了！

国民议会的一位议员米里哀尔先生公布过一系列在时间上前后分属二十来年的证据确凿的法律文件，证明茹尔·法夫尔在与一个住在阿尔及尔的酒徒的妻子姘居时，凭着一大堆无比复杂的大胆捏造的文据，以他的一些私生子女的名义谋得了一大笔遗产，因而变成了一个财主；后来在合法继承人提出诉讼时，只是由于波拿巴的法庭偏袒他，他的伪证才没有被揭穿。所以，茹尔·法夫尔这个口甜似蜜的家庭、宗教、财产、秩序的辩护士，原来老早就该受刑法究办了。遇到任何一个公正的政府，他都免不了被判处终身苦役的命运。

厄内斯特·皮卡尔是凡尔赛现任内务部长，他钻营路易·波拿巴的官位没有成功，在9月4日自封为国防政府的内务部长^①。这位厄内斯特·皮卡尔是一个叫做阿尔图尔·皮卡尔的人的哥哥。从前，当厄内斯特·皮卡尔跟茹尔·法夫尔之流恬不知耻地提名他那位宝贝兄弟为塞纳—瓦瑟省的立法团议员候选人的时候，第二帝国政府曾公布两份文件：一份是巴黎警察局的报告（1867年7月31日），说这位阿尔图尔·皮卡尔曾经作为一个“骗子手”而被逐出巴黎交易所；另一份是1868年12月11日的文件，根据这份文件阿尔图尔自己供认了当他在帕勒斯特罗街5号动产信用公司的一个分公司任经理期间，曾经盗用过30万法郎。厄内

^①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定稿中作了订正：厄内斯特·皮卡尔是国防政府的财政部长（见本书第36页）。——编者注

斯特不仅派他的这位宝贝阿尔图尔担任他主办的《自由选民》(该报创刊于帝国时期,一直出版到今日,这是一份天天诋毁共和主义者为“强盗、土匪、均产者”的报纸)的**主笔**,而且在他一当上“国防政府”的内务部长以后,还用阿尔图尔在内务部和股票交易所之间给他当财务纤手,利用他得到的国家机密去大发横财。

厄内斯特和阿尔图尔的全部“财务”信件都已落到公社手里了。正如多泪善哭的茹尔·法夫尔一样,厄内斯特·皮卡尔这个凡尔赛政府中的约·密勒,也是一个应受刑法究办、该被判处苦役的人。

这个三人合唱队中的最后一人茹尔·费里,在9月4日以前还是一个吃不上饭的穷律师;他不满足于制造巴黎的饥馑,而且还巧妙地利用这饥馑刮了大笔钱财。当他将来不得不报告他在巴黎被围期间侵吞公款的经过的那一天,就会是他受裁判的一天!

因此,无怪乎正是这帮只有在受普鲁士刺刀保护的王朝下才可望免于苦役刑的人,正是这帮只有乘内战的混乱才能得到假释证的人,正是这些亡命之徒,才被梯也尔一眼挑中,被“地主议会”作为最可靠的反革命工具接受下来!

无怪乎当4月初被俘的国民自卫军在凡尔赛受到比埃特里的“羔羊们”和凡尔赛的暴徒们残暴至极的虐待时,厄内斯特·皮卡尔先生“双手插在裤袋里,在一群一群的俘虏中间踱来踱去,恣意拿他们要笑”,同时,“梯也尔夫人、茹尔·法夫尔夫人以及一伙与她们类似的容光焕发、兴高采烈的贵妇们,在省政府的阳台上”看着令人发指的景象拍手喝采。无怪乎正当法兰西的一部分在征服者的铁蹄下痛苦地挣扎着,正当巴黎——法兰西的心脏和头脑——为反抗内奸进行自卫而终日不断流着它的最宝贵的鲜血时……梯也尔们、法夫尔们及其同伙却沉湎于路易十四皇宫里的

狂饮闹宴；如梯也尔为庆贺茹尔·法夫尔从卢昂（他是被派去和普鲁士人进行勾结（向普鲁士人乞怜）的）返回而举办的盛大宴会就是一例。这是漏网罪犯们的恬不知耻的狂欢暴饮。

如果说国防政府最初曾用梯也尔做他们的外交大使，派他去向欧洲各国宫廷乞求，以法国重立国王为代价来换得各宫廷对普鲁士的干涉；其后，他们又派他巡视法国各省，同各地的封建主寨堡进行串谋，并暗暗地准备那应和投降一起猝不及防地加到法国头上的大选，那末梯也尔则用这些人做了他手下的部长和高级官员。他们是靠得住的人。

在梯也尔的行动中，有一点颇为神秘难解，这就是他在加速巴黎革命上的轻率冒失行为。梯也尔用了这样一些办法来激怒巴黎：要他的“地主议员们”发出反对共和国的叫嚣，威胁要砍去巴黎的头颅并取消它的首都称号，颁布杜弗尔（梯也尔的司法部长）的使巴黎商业濒于破产的、关于商业期票支付期限的三月十日法令，任命奥尔良派人物充任使节，把国民议会迁到凡尔赛，课征新的报刊税，查封巴黎的共和派报刊，恢复最初由八里桥宣布的、但随着帝国政府在9月4日倾复而取消了的戒严，任命十二月分子、前参议院议员维努亚为巴黎总督，任命波拿巴的宪兵瓦伦顿为警察局长、任命耶稣会教徒奥雷耳·德·帕拉丹将军为巴黎国民自卫军总司令——他做了这些事还不满足，竟以微弱的兵力挑起了内战，让维努亚进攻蒙马特尔高地，并企图首先从国民自卫军那里夺走属于他们的，而且只因为是他们的财产才依巴黎投降协定留在他们手中的大炮，以便解除巴黎的武装。

这种把它解决掉的狂热是从哪儿来的呢？解除巴黎武装、镇压巴黎，当然是进行王朝反革命的首要条件，但是，象梯也尔这样

一个老奸巨猾的阴谋家，若非为压倒一切的极其紧迫的动力所驱使，是不会在缺乏应有的准备的情况下，手头只有少得可笑的力量就贸然着手而使这桩棘手事业遭到失败的危险的。动机原来是这样。梯也尔由他的财政部长普野-克尔蒂约经手借了一笔债款，按规定是立即支付 20 亿，以后再分期陆续支付数十亿。在这项借款交易中，为梯也尔、茹尔·法夫尔、厄内斯特·皮卡尔、茹尔·西蒙、普野-克尔蒂约等这些显贵公民准备了一笔真正的御用 *pot-de-vin*（酒钱）。但是，在这项交易上有一层障碍。在合同最后签字盖章之前，立约一方要求一项保证——平定巴黎。所以才有梯也尔的孟浪行动。所以才对竟敢干涉这桩好买卖的巴黎工人表现出那样野蛮的仇恨。

关于茹尔·法夫尔们、皮卡尔们等等，我们所说的已足以证明他们是这种假公济私勾当的宝贝同谋者。至于梯也尔本人，尽人皆知，在路易-菲力浦治下他两度组阁，捞了 200 万；在他任首相时（1840 年 3 月），众议院曾指责他从事交易所投机活动，为了回答这个指责，他那时流了眼泪鼻涕；他象茹尔·法夫尔以及著名喜剧演员弗雷德里克·勒美特尔一样，随时都能拿出这种货色。人们同样也都知道，为了挽救法国由战争造成的财政危机，梯也尔先生采取的第一项措施就是给自己规定了 300 万法郎的年俸，这个数目恰恰和路易·波拿巴在 1850 年因允许梯也尔先生及其在立法议会中的党羽废除普选权而从他们那里得到的数目相等⁹⁹。梯也尔先生自定年俸为 300 万法郎，这就是他在 1869 年给他的巴黎选民描绘的那个“节俭共和国”的第一着。说到普野-克尔蒂约，此人是卢昂的一位棉纱厂厂主。1869 年，厂主会议宣布为“征服”英国市场而必须普遍降低工资，他就是那个厂主会议的领导人——这条毒计当时被国际挫败了¹⁰⁰。普野-克尔蒂约在各方面都狂热地、

甚至可以说是卑躬屈膝地拥护第二帝国，只是在一点上他觉得第二帝国不好，那就是第二帝国和英国缔结的商约损害到他自己开办的工厂的利益。作为梯也尔先生的财政部长，他的第一步是痛斥那个“可恨的”商约，并宣布必须恢复旧日的保护关税来保护他自己的工厂。他的第二步是这样一个爱国的尝试，即以恢复旧日的保护关税来打击亚尔萨斯，借口是没有任何国际条约阻挡着他对亚尔萨斯重新实施保护关税。借助这一妙着，他自己在卢昂的工厂就会摆脱牟罗兹的那些敌对工厂的危险竞争。他的最后一步是赏给他的女婿罗什-朗贝尔先生一份礼物——派他为卢瓦尔总收税官，这是落到统治的资产阶级手里的肥赃之一；普野-克尔蒂约曾经对他的帝国时代的前任曼涅先生十分不满，就是因为曼涅先生曾把这一大肥缺赏给了自己的儿子。所以，这位普野-克尔蒂约确实是执行上述那项勾当的适当人选。

3月30日《号召报》¹⁰¹载，前任巴黎市长茹尔·费里于3月28日向市税稽征所的官员发出通令，禁止……继续为巴黎课征任何市税。

种种政治小骗局，——小人的肚肠……溃烂的良心……无休无止的议会阴谋策划者……无聊的权术和计谋……重复他的关于自由主义、关于“必不可少的自由”的说教……热衷于……以有力的理由反驳认为有失败的可能……头头是道的反驳论据……一种卑劣透顶的英雄主义……侥幸得逞的议会计谋……

厄·皮卡尔先生是一名强盗，在整个巴黎被围困期间，他一直在交易所利用我们军队的失败投机取巧。

屠杀，叛卖，纵火，暗杀，诽谤，造谣。

梯也尔自己在区长等会议上(4月25日)的演说中说：

“杀害克列芒·托马和勒康特的人”不过是一小撮罪犯，——“以及那些有充分证据可以被认为是这些罪行的共谋犯或是协助犯的人，就是说**极少的一小撮人**”。

杜 弗 尔

杜弗尔想用对外省报纸进行法律起诉的办法击溃巴黎。因报刊鼓吹“**和解**”而对之进行审讯，实在荒唐。

杜弗尔在梯也尔的阴谋策划中起着很大的作用。他用他的三月十日法令搅动了负债累累的整个巴黎商业；用他的关于巴黎房租的法令威胁了整个巴黎。颁布这两项法令都是为了惩罚巴黎，因为它曾经挽救了法国的荣誉，延缓了向俾斯麦投降达六个月之久。杜弗尔是一个奥尔良党人，是一个就议会意义而言的“自由派”。因此，他一向是镇压部长和戒严部长。

他第一次出任大臣是在1839年5月13日，即在共和党的最后一次武装起义失败以后¹⁰²，所以他是当时七月政府的残酷无情的镇压大臣。

1849年6月2日¹⁰³，曾被迫于(1848年)10月29日取消戒严的卡芬雅克，召来两位路易-菲力浦的大臣进入他的内阁(杜弗尔任内务部长，还有维维延)。他是在普瓦提埃大街¹⁰⁴(梯也尔)要求之下任命他们的，因为普瓦提埃大街要求保证。他希望用这种办法在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中获得保皇党的支持。杜弗尔使用了最非法的手段使卡芬雅克当上了候选人。恫吓和贿选达到前所未

见的程度。杜弗尔在法国散布大量诋毁别人的印刷品来攻击其他候选人，尤其是攻击路易·波拿巴，这一点并没有妨碍他后来成为路易·波拿巴的部长。杜弗尔再度成为 **1849年6月13日的戒严** 部长（这次戒严是为了对付国民自卫军为反对法军炮轰罗马等事所举行的示威）。现在，他又成为戒严部长，这次戒严是在凡尔赛宣布的（戒严地区是塞纳一瓦瑟省）。宣布任何省戒严的大权已授予梯也尔。现在，正象 1839 年和 1849 年一样，杜弗尔要求新的镇压法、新的出版法、“简化军法审判手续”法。他在分发给各总检察官的一份通告里，痛斥“**议和**”这种呼声是报界的一项罪行，应严惩不贷。对法国司法界具有特征意义的是，只有一位总检察官（马延省的）^①写信给杜弗尔提出辞职……

“当此内战之际，行政当局命令我卷入党派斗争，对那些我的良心认为完全无辜的公民仅为他们呼出和解这一字眼而予以迫害，因此，我无法给这样一个行政当局效力。”

杜弗尔在 1847 年属于阴谋反对基佐的“自由联盟”，正如他属于 1869 年的阴谋反对路易·波拿巴的“自由联盟”一样¹⁰⁵。

至于说到三月十日法令和房租法令，应当指出，杜弗尔也好，皮卡尔也好（两人都是律师），他们的最好的顾主都是属于不愿由于巴黎被围而损失一个小钱的房东和阔老们。

现在，也和 1848 年二月革命后一样，这些人对共和国说的是当初刽子手对唐·卡洛斯说过的话： «Je vais t'assassiner, mais c'est pour ton bien.»（“我要杀你，是为了你好。”）

① 路·瓦什隆。——编者注

勒康特和克列芒·托马

在维努亚企图占领蒙马特尔高地以后（3月18日4点钟，他们在红宫花园被枪决），勒康特将军和克列芒·托马就被第八十一常备团的那些情绪激昂的士兵们抓起来枪毙了。这是一项不顾中央委员会的几位代表的力劝而执行的私审的即决行动。勒康特这个带着肩章的凶手，在皮加尔广场上曾一连四次命令他的军队开枪射击一群手无寸铁的妇孺。士兵没有射击人群，而是把他枪毙了。克列芒·托马曾做过军需官，是一个在六月屠杀（1848年）前夕被国民报派（他做过该报的经理）临时提拔起来的“将军”；他的军刀除了染满巴黎工人阶级的鲜血之外，从未沾濡过其他敌人的血迹。他是蓄意激起六月起义的阴狠毒辣的策划人之一，也是那次起义的最残暴的刽子手之一。1870年10月31日，巴黎无产阶级的国民自卫军突然袭击设在市政厅的“国防政府”并且将政府人员逮捕起来的时候，这些自封官爵的人们，这些被他们的一个同伙皮卡尔最近称为说话算话的人，都立下了信誓：他们一定让位给公社。他们以此获释之后，随即把特罗胥的布列塔尼兵开来进攻那些过于轻信而释放了他们的人。然而，他们之中有一个人，即塔米济埃先生，辞去了国民自卫军总司令的显职。他拒绝背弃自己的信誓。于是克列芒·托马的运气又来了。他被任命为国民自卫军总司令来代替塔米济埃。他是执行特罗胥“计划”的最合适的人选。“他从不向普鲁士人作战”，他只向国民自卫军作战，他瓦解、分裂、诽谤中伤国民自卫军，把国民自卫军中反对特罗胥“计划”的军官全部清洗掉，唆使国民自卫军的一部分人去反对另一部分人，布置使国民自卫军损兵折将的“出击”，好让它备受嘲笑。这个家伙被六月屠杀中的冤魂所缠定，当他在3月18日嗅到又要屠杀巴

黎人民的气息时，他完全不是出于官方差遣而是情不自禁地又重新登上战争舞台。人民的怒火一爆发，他就成了私审的牺牲品。而那批把巴黎交给十二月分子维努亚处置以便断送共和国、并根据普野-克尔蒂约所立合同领取酒钱的人们，现在居然大嚷大叫：杀人犯！杀人犯！急于吮吸“无产者”鲜血的欧洲报纸也响应了他们的这种嚎叫。“地主议会”里上演了一场歇斯底里的“痛心”的闹剧；这回仍和从前一样，他们这两位朋友的尸首，是他们求之不得的对付敌人的武器。他们要巴黎和中央委员会对它们无法控制的一桩事件负责。人们都知道，在1848年6月的日子里，“秩序人物”怎样就巴黎大主教被杀事件掀起了震荡全欧的反对起义者的愤怒叫嚣。其实，他们甚至在当时就已经从大主教手下的那位陪伴他到街垒去的大司铎雅克美先生的证词中完全知道，大主教是被卡芬雅克的军队而不是被起义者射杀的，可是，大主教的尸体正好服务于他们的目的。现任巴黎大主教达尔布瓦先生是公社为了对付凡尔赛政府的野蛮暴行、进行自卫而扣押的人质之一，从他给梯也尔的一封信看来，他似乎有一种奇特的预感，即特朗斯诺南爸爸¹⁰⁶切望在他身上投机，想利用他的尸体激起一种神圣的愤怒情绪。凡尔赛的报刊几乎没有一天不宣告达尔布瓦已被处死；要是从“秩序人物”的层出不穷的暴行、违反所有战争公法来说，如果不是公社，任何别的政府早就会批准把达尔布瓦处死了。凡尔赛政府刚刚取得第一次军事胜利，率领宪兵杀害仗义豪侠的弗路朗斯的德马列上尉便立即得到梯也尔的勋绶。弗路朗斯在10月31日救了“国防”政府成员的生命。从巴黎逃出的维努亚（逃亡者）被授予荣誉军团大十字勋章，因为他在多面堡里枪杀了我们被俘的英勇同志杜瓦尔，因为他的第二件功绩是枪决了几十名被俘的站到巴黎人民方面的常备军士兵，并且用“十二月的方式”¹⁰⁷揭开了这次内

战。加利费将军——用伦敦的一个廉价文丐的微妙形容语来说，是“在化装舞会上素以服饰号称第二帝国奇观之一的那位迷人的侯爵夫人的丈夫”——在吕埃伊附近对国民自卫军的一个队长、副官和士兵发动“突袭”，立即把他们枪决，随即发布一份公告来夸耀他的这项功绩。这些只是凡尔赛政府正式谈到的并引以为荣的谋杀事件中的几桩。第八十常备团的25名士兵被第七十五常备团作为“叛逆”执行枪决。

“每个从共产主义者队伍中俘获的穿着常备军制服的人立即就地枪决，毫无宽赦。政府军极端凶暴。”

“梯也尔先生向议会报告了处死弗路朗斯的令人兴奋的细节”。

凡尔赛。4月4日。梯也尔这个其貌不扬的侏儒，谈到押往凡尔赛的俘虏时说(在他的公告中)：

“正直人士^(比埃特里的爪牙!)的忧伤的目光，还从来没有看到过一种无耻民主制度下的如此无耻的面孔。”

“维努亚抗议对起义的军官或常备军士兵表示任何怜悯。”

4月6日。公社关于报复(和人质)的法令：

“鉴于凡尔赛政府公开蹂躏人道的法律和战争的法律，它犯下了连入侵法国的外敌都干不出来的骇人暴行……特此决定……”(法令各条列后)¹⁰⁸

4月5日。公社公告：

“凡尔赛匪徒每天都在屠杀和枪决我们的俘虏，每时每刻我们都获悉又干下新血案的消息……人民，甚至当他们愤怒的时候，仍象憎恶内战一样地憎恶流血，但是，他们有责任保卫自己不受敌人的野蛮虐杀，因此，无论代价多大，都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¹⁰⁹

“对巴黎作战的市警每天领10个法郎。”

凡尔赛。4月11日。高级军官和其他目击者津津有味地叙述战俘(并非逃兵)遭到冷酷枪杀的骇人听闻的细节。

达尔布瓦在给梯也尔的信中抗议

“以过分的残暴行动增加自相残杀的战争恐怖”。

德盖里(马德兰教堂主持)也以同样的语气写道：

“这些处决激起了巴黎的强烈愤怒，可能导致可怕的报复”。“已经这样决定：今后再有一人被处死，这里就从拘禁的许多人质中处死二人。请你考虑，我以教士身分向你提出的要求是多么迫切、多么绝对地必要。”

在这种种暴行发生时，梯也尔却告诉各省省长说：“议会在平静地开着会。”(议会也很轻松^①)

梯也尔和他的“地主议会”十五人委员会¹¹⁰ 恬不知耻地“正式否认”“硬推在凡尔赛军队头上的臆造的就地处决和报复行为”。但是，特朗斯诺南爸爸在他的关于炮轰巴黎的4月16日通告中说：

“如果曾经打了几发炮弹，那也不是凡尔赛军队打的，而是一些叛乱者为了假装他们在作战才打的，可是实际上他们连头都不敢露出来。”

梯也尔表明了，他至少在一件事上，即在发表谎话连篇的公报上，超过了他膜拜的英雄拿破仑第一。(当然，巴黎是在自己轰击自己，以便能够中伤梯也尔先生！)

为了回答波拿巴派恶棍们的这些凶暴的挑衅行为，公社只限于拘禁一些人质，提出要进行报复的威胁，但是它的威胁一直没有见诸行动！甚至于化装为军官的宪兵，甚至于身上搜出炸弹的被捕市警，都没有交付军事法庭！公社不肯让这些爪牙鹰犬的血玷污自己的双手！

3月18日之前的几天，克列芒·托马向陆军部长勒夫洛呈递了一份将四分之三的国民自卫军解除武装的计划。他说：

“暴徒的精华集聚在蒙马特尔周围，并且和伯利维尔一致行动。”

① 这是借用内阁首相奥利维耶的话。向普鲁士宣战前夕奥利维耶声称，他“轻松地”承担战争的责任。——编者注

国民议会

那批在凡尔赛当权的人物早将所有要塞交给了敌人，出卖了毫无防御的巴黎。2月8日在敌人的压力下选出了国民议会，这个凡尔赛议会只有一个目的——根据1月28日在凡尔赛签字的投降协定明白规定的唯一目的，即决定是继续战争，还是签订和约；如果要签订和约，便商定和约的条件，并保证尽可能迅速地使普军从法国领土上撤退。

尚济，巴黎大主教等人

尚济的被释放几乎是和赛塞的撤退同时发生的。保皇派记者们都一致认定这位将军要被处死的。他们想把这项可爱的行动加在红色党人头上。他们说曾三度下令要将他处决，这次他真的要被枪毙了。

旺多姆广场事件^①以后，凡尔赛是一片慌乱。预料3月23日会向凡尔赛进攻，因为公社运动的领袖们已经宣布了：如果国民议会采取任何敌对行动，他们就要向凡尔赛进军。议会没有采取什么敌对行动。相反地，它通过了一项同样紧急的动议，决定在巴黎进行公社选举等等。议会用这些让步承认了它的无力。就在同时，保皇党在凡尔赛酝酿着种种阴谋。波拿巴的将军们和奥马尔公爵¹¹¹。法夫尔公开承认他已经接到了俾斯麦的一封信，信中宣称如果到3月26日还不恢复秩序，德军就要占领巴黎。红色分子看穿了他的小把戏。旺多姆广场事件是这个赝造文契的老手、卑鄙恶劣的耶稣会教徒茹尔·法夫尔挑起的，他（在3月21日？）登

① 见本书第165—166页。——译者注

上凡尔赛议会的讲坛，来侮辱那些把他从卑微中提拔起来的人民，挑拨巴黎和外省的对立。

3月30日。公社公告：

“今天，那些你们甚至不屑追击的罪犯们，竟滥用你们的宽大胸怀，就在巴黎城的大门口筑起了一个进行保皇阴谋的巢穴。他们制造内战；他们使用一切腐败的手法；他们愿与任何人结伙共谋；他们竟无耻到乞求外国的帮助。”¹¹²

梯也尔

4月25日，梯也尔在接待塞纳省各区区长、区长助理、城郊市镇参议员时说：

“共和国确实存在着。行政首脑不过是一个普通公民。”

依梯也尔看来，法国从1830年到1871年的进展就在于：在1830年，路易-菲力浦是“最好的共和国”；到了1871年，路易-菲力浦王朝时的大臣化石，小梯也尔本人是**最好的共和国**。

梯也尔先生是以僭越开始他的统治的。国民议会任命他为议会内阁的首脑；他把自己任命为法国行政的首脑。

国民议会和巴黎革命

在外国侵略者的命令下召开的国民议会，根据1月28日凡尔赛协定的明文规定，只是为着一个目的选出的：或是决定继续战争，或是确定议和条件。巴黎的投降派在号召法国人民参加投票的时候，自己就明白地规定了议会的这项特殊任务，议会的成分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可以用这一点来解释。投降派奴颜婢膝地接受了停战协定，这个协定的条款本身已经使战争根本不可能继续下去，因而议会在实际上只能签订一个屈辱的和约；为了完成这项特

殊工作，法国最坏的人是最合适的人。

共和国是在 9 月 4 日由巴黎人民宣告成立的，而不是由在市政厅中擅自建立国防政府的讼棍们宣告成立的。它受到法国举国一致的欢迎。它通过以巴黎的长期抵抗为基础的五个月的战争为自己争得了存在的权利。如果没有共和国进行的、并且是以共和国名义进行的这一战争，那末，在色当投降以后，帝国就会被俾斯麦恢复起来，而以梯也尔先生为首的讼棍们就不会是代表巴黎投降，而是为了保证他们自己不至于到凯恩去旅行而投降，也根本就不会有什么地主议会。只是由于巴黎开始了共和革命，地主议会才集聚起来。地主议会并不是一个制宪议会，象梯也尔先生重复说得令人发呕的那样；如果不是仅仅作为共和革命中发生的事件的记录者，那它连宣布波拿巴王朝被推翻的权利都没有。因此，法国的唯一的合法权力就是以巴黎为中心的革命本身。进行这次革命不是为了反对小拿破仑，而是为了铲除产生第二帝国的、并在第二帝国政权下得到登峰造极发展的那些社会条件和政治条件；如果这些社会条件和政治条件不被法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生力量所铲除，法国就会变成一具尸体，象这次对普鲁士的战争鲜明地揭示的那样。地主议会只从革命手中取得了代表权去签订由现任“行政当局”承担起来的卖身给外国侵略者的灾难性条约。因此这个地主议会竟企图把革命说成自愿的投降派，乃是骇人的僭越。它对巴黎的战争不过是在普鲁士刺刀庇护下的一次怯懦的朱安叛乱¹¹³。这是谋害法国的露骨阴谋，其目的在保持堕落的、衰退的、腐烂的阶级的特权、垄断地位和奢侈生活，正是这些阶级已把法国拖向深渊，只有真正社会革命的海格力斯的巨手才能把它挽救出来。

梯也尔的最精锐的军队

还在成为“国家要人”以前，梯也尔先生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就已经显出他的说谎才能了。但是，矮人所特有的虚荣心这一回却使他丢丑，使他受到无以复加的嘲笑。他的秩序军是：出于俾斯麦的恩典刚从普鲁士监狱中遣送回来的波拿巴兵痞的渣滓、教皇的朱阿夫兵、沙列特的朱安兵、卡特利诺的万第兵、瓦伦顿的“市警备队”¹¹⁴、比埃特里的过去的市警以及在路易·波拿巴时代不过是军队里的密探、而在梯也尔先生手下构成军队精华的瓦伦顿的科西嘉宪兵，而且所有这些人都处在带着肩章的侦探监视之下，由丧尽廉耻、临阵脱逃的十二月分子元帅们指挥。就是这一批乌七八糟的该绞杀的东西，梯也尔先生美其名为“**法国从未有过的一支最精锐的军队**”！如果说他允许普鲁士人还驻扎在圣丹尼，这只是他想要用凡尔赛的这支“最精锐的军队”的军容去吓唬吓唬他们。

梯 也 尔

种种政治小骗局。无休无止的议会阴谋策划者梯也尔先生，一向只不过是一个“能干的”报人，一个巧鼓舌簧的“辩客”，一个玩弄议会骗局的专家，背信弃义的老手，议会党派斗争中的细小权术、卑鄙奸诈和阴谋诡计的巨匠。这个邪恶的侏儒在半个世纪中一直受法国资产阶级倾心崇拜，因为他是这个资产阶级的阶级腐败的最真实的思想代表。当他置身在反对派之列时，他喋喋不休地重复着他那必不可少的自由的陈腐说教，轮到他上台时便压制这些自由。当他在野时，他常常用法兰西的宝剑来恫吓欧洲。他的外交成就实际上是什么呢？那就是：在 1841 年咽下了伦敦公约的耻辱¹¹⁵；以反对德国统一的激昂言论加速了对普战争；1870 年，

他遍访欧洲各宫廷进行乞求，给法国丢脸；1871年他签署了巴黎投降书，接受了“不惜任何代价的和平”，并向普鲁士央求到了一个让步——让他在自己的被蹂躏的国家里发动内战并给他以发动内战的手段。当然，现代社会中隐藏着的活力始终是他这号人所不知道的，可是他竟连现代社会表面发生的最明显的变化也不能领悟。例如，他把一切违反法国陈旧的保护关税制度的东西都指斥为渎犯神明；他在当路易-菲力浦的大臣时，竟然轻蔑地把修铁路指斥为荒诞的怪事；甚至在路易·波拿巴时代，他也激烈反对任何改革法国陈腐的军事制度的措施。这是一个没有思想、没有信念、没有胆识的人。

由于渴望着炫耀自己、舞权弄势、染指国库，所以当他被排挤到反对派地位时，他总是不择手段地煽动民众情绪，挑起大祸，以便取代对手。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一个职业“革命家”。他同时也是一个最浅薄的墨守陈规的人，等等。他辱骂工人阶级为“贱民”。他的一个从前在立法议会中的同僚贝累先生（是和他同时的人，一个资本家，然而也是巴黎公社的一个委员）在一篇公开声明中对他这样说：

“使劳动受资本的奴役（asservissement），一向是你的政策的基础。从你看到劳动共和国在巴黎市政厅内宣告成立的那一天起，你就没有停止过向法国叫喊：他们都是些罪犯！”

无怪乎梯也尔先生已经叫他的内务部长厄内斯特·皮卡尔下令防止“国际协会”和巴黎通消息了（3月28日议会会议）。梯也尔给他的省长和专区区长的通告说：

“人数远远超过坏工人的善良工人们应当了解：如果面包又一次从嘴边飞掉了，那他们应该责怪那些搞国际的能手，那些人自封为劳动的解放者而实际是劳动的暴君。”

没有国际……①

(现在谈谈钱的事)。(他和法夫尔已经把他们的钱汇到伦敦去了。)谚语说：匪盗失和，真相败露。因此，我们要结束他的脸谱的描绘，最好不过是援引一下在伦敦出版的、属于他的凡尔赛将领们的主子的机关报。3月28日的《形势报》¹¹⁶写道：

“梯也尔先生每次出任大臣总是推动士兵去屠杀人民。他杀父乱伦，侵吞公款，抄袭剽窃，叛卖暗算，野心勃勃，毫无才能。”

狡诈诡计、托辞推诿的能手。

七月革命以前，他和共和党人混在一起，在路易-菲力浦统治时代，他挤掉了他旧日的恩人拉菲特而第一次钻得了大臣的位置。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是把他旧日的合作者阿尔芒·加莱尔投入监狱。他靠着充当对付贝里公爵夫人的密探和监狱助产婆而博得了路易-菲力浦的宠信。但是他的活动的中心内容，是在特朗普斯诺南街屠杀起义的巴黎共和党人和制订取缔报刊的九月法令，后来这些法令被当做已经用钝的工具一样丢开了。1840年，他再度凭权谋登台后，提出了加强巴黎防务的方案。整个民主党人，除了《国民报》派资产阶级共和党人，都反对这个方案，认为这是企图危害巴黎的自由。梯也尔先生在众议院讲坛上答复他们的强烈指责时说：

“什么话？你们以为一加强城防就会危害自由吗？……这样的设想是不顾一切现实。你们首先就是存心毁谤，竟以为有某一个政府为了保持政权而敢于在某个时候轰击巴黎。什么话？一个政府用炸弹炸开残废军人院或名人纪念堂的穹顶，纵火烧掉你们家庭的住宅以后，还能站在你们面前请求

① 手稿中这一句话没有写完。——编者注

你们批准它的存在么！这样一个政府在胜利后将会比在胜利前更难立足一百倍。”

是的，路易-菲力浦的政府也好，波拿巴摄政的政府也好，都没有敢从巴黎撤走，然后来轰击它。对城防工事的这种使用法，留给了这些工事的最初策划人梯也尔先生。

1848年1月，当那不勒斯的炮弹国王^①炮击巴勒摩城的时候，梯也尔先生又在众议院发表演讲说：

“诸位先生，你们都知道在巴勒摩发生的事情：当你们听说有一个大城市竟被连续轰击了48小时之久，你们大家都感到震恐。究竟是被谁轰击的呢？是被行使战争权利的外敌轰击的吗？不是的，诸位先生，是被它自己的政府轰击的。究竟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不幸的城市要求享受它的权利。好吧，就是为了要求享受它的权利，它竟得到了48小时的轰击。请允许我向欧洲的舆论呼吁。从这个也许是欧洲最伟大的讲坛上，用愤怒的言辞斥责这种行动，这将是对人类的一种贡献。诸位先生，五十年前，当奥地利人行使战争权利，为了避免长期围困而想炮轰利尔城的时候，后来，当英国人也是行使战争权利而炮轰哥本哈根的时候，最近，当为自己祖国效过劳的埃斯帕特罗摄政王想以炮轰巴塞罗纳城来镇压那里的起义时，全世界各地都发出了共同的愤怒的呼声。”

过了一年多一点，梯也尔就成了法兰西共和国军队炮击罗马的最狂热的辩护者了，他百般颂扬他的朋友尚加尔涅将军，因为他的这位朋友用大刀挥砍那些对这一破坏法国宪法行为表示抗议的巴黎国民自卫军。

1848年二月革命前几天，因受基佐的排挤、长期不能获得权位而满腹忿懑的梯也尔，一嗅到了人民风暴将临的气息，就希望这能帮助他撵走对手而强使路易-菲力浦任用他。于是梯也尔在众议院中喊叫道：

① 斐迪南二世。——编者注

“我属于革命党，不但属于法国的革命党，而且也属于全欧洲的革命党。我希望革命政府留在温和派的手中……但是，即令这个政府转到了热烈人物以至激进派的手中，我也决不因此放弃我所拥护的事业。我将永远属于革命党。”

从共和国宣告成立起直到政变止，镇压二月革命就成为他的唯一工作。

二月革命爆发后最初几天，他忧心忡忡地隐藏了起来，而巴黎工人却对他如此鄙视，甚至不屑于恨他了。但是，他那种尽人皆知的怯懦——这曾使阿尔芒·加莱尔在听到梯也尔自己吹嘘“有一天要死在莱茵河岸上”以后回答说：“你将死在阴沟里”——使他不敢在六月起义者被屠杀、亦即人民力量被击溃以前，在公共场所抛头露面。最初，他只限于秘密指挥普瓦提埃大街总会的阴谋，这个阴谋后来导致帝国的复辟；直到局势相当明朗，他才重新公开露面。

巴黎被围期间，有人问巴黎是否准备投降，茹尔·法夫尔回答说：要说出“投降”一语，先得炮击巴黎！这也就说明他对普鲁士人炮击的抗议不过是演戏，表明普鲁士人的炮击不过是一种虚张声势，而梯也尔的炮击才是冷酷的现实。

议会小丑。

他在官场上已经混了四十年。在政治或生活的任何方面，他从来没有倡导过一项有益的措施。他好虚荣、喜猜疑、贪图享乐，从来没有写过和谈过正经事。在他看来，事物本身只是供他动笔杆耍嘴皮的因由。除了对高官厚禄和自我炫耀的渴求之外，他身上没有任何真实的东西，甚至于他的沙文主义也不例外。

他以他那庸俗的职业报人的本色，时而在他的公报里嘲笑他

的凡尔赛俘虏的样子难看，时而报道地主议会“轻松愉快”，时而发布占领“木兰-萨克”（5月4日）并俘掳300人的公报，使自己成为笑料。

“其余叛乱分子拔腿奔逃，在战场上遗弃150名伤亡者”，他恶狠狠地补充说：“这就是明天公社在它的公报中所能庆贺的胜利。”“巴黎不久即将从压迫它的凶残暴君下解放出来。”

巴黎——这个对他作战的巴黎人民群众的巴黎，不是“巴黎”。“巴黎——那是富人的、资本家的、游手好闲者的巴黎”（难道不是世界妓院？）。这就是梯也尔先生的巴黎。真正的巴黎，劳动的、思想的、战斗的巴黎，人民的巴黎，公社的巴黎，是一群“贱民”。梯也尔先生对待巴黎乃至对待法国的整个态度就是这样。以“和平游行”和赛塞的逃窜来表现其勇气的巴黎；目前麇集在凡尔赛、吕埃伊、圣丹尼、勒河岸圣热尔门的那批人以及随着跟去的那些依附于“宗教、家庭、秩序、财产人物”的荡妇们的巴黎；（真正“危险的”，剥削和游堕阶级的巴黎）（*«francs-fileurs»*⁷⁷），从望远镜中欣赏战斗的进行、把“内战只当做惬意消遣”的巴黎——这才是梯也尔先生的巴黎（正象科布伦茨城的亡命之徒是卡龙先生的法国一样）。他带着庸俗报人的本色，连维持表面的尊严都不会，但是他为了不违背“正统派”的礼节而杀害妇女和儿童（被害者的尸体是在讷伊的废墟中发现的）。他硬要用汽油弹燃烧克拉马尔来点缀他下令在法国举行的市镇选举。罗马历史学家们在描述尼禄的性格时，最后都以这个魔君自诩有吟歪诗、演喜剧的天才这一点作结语。但是，若把一个象梯也尔那样的区区职业报人、议会小丑扶上台去，他一定会使尼禄相形见绌。

他允许波拿巴“将军们”肆意对巴黎进行报复，这只是在起着他作为阶级利益的盲目工具的作用；但是，他在公报、演说、宣言的

小插剧里流露出他这个报人的虚荣、庸俗和低级趣味，这倒是在起着他个人的作用。

他把自己比做林肯，把巴黎人比做南方叛乱的奴隶主。南方人是为着劳动奴隶制和脱离合众国而战。而巴黎是为着劳动的解放和使政权脱离梯也尔这帮想成为法国的奴隶主的国家寄生虫而战！

他在对区长们的演说中说：

“你们可以信赖我的话，我从来不食言！”

“本届议会是法国所曾选出的最开明的议会之一。”

“只要秩序和劳动不受到那些自封为共和国利益的特别保护人的经常危害”，

他就要拯救共和国。

他在议会的 4 月 27 日会议上说：“议会比他本人还要开明！”

他在辩嘴时一向以痛斥维也纳条约作为王牌，但他自己签订的巴黎条约¹¹⁷，不仅割让了法国的一部分（不仅使将近半个法国被占领），而且甚至不要求俾斯麦具体列出并证明他所花的战费就承担了几十亿赔款！他甚至于不让波尔多的议会逐节讨论他的降书！

他一辈子都在责难波旁分子，责难他们是跟在外国军队屁股后面回来的，责难他们在缔结和约¹¹⁸后对待占领法国的盟国上有失尊严，可是他自己在他签订的条约里对俾斯麦要求的唯一的一件事，就是给他 4 万军队来制服巴黎（这是俾斯麦在德国国会中讲

的）。就安内攘外来说，巴黎有它的武装的国民自卫军，完全足以保障安全。但是，梯也尔除了使巴黎向外国人投降之外，还要使巴黎向他本人及其同伙投降。规定这一条款就是规定要打内战。他开始这场战争不仅是在普鲁士的默许下，而且还依靠它提供的便利，即依靠普鲁士慷慨地从德国监狱里遣返给他的法军俘虏！他在他的公报里，在他以及法夫尔的议会发言里，对普鲁士卑躬屈膝；在他要求俾斯麦进行干涉未果（正如俾斯麦自己声明的）之后，他还是每隔一星期就用普鲁士的干涉来威胁巴黎。和这个小丑、这个沙文主义的大信徒相比，波旁分子简直可说是尊严的化身了！

普鲁士被击溃后（1807 年的提尔西特和约），它的政府感到，只有经过一次巨大的社会更新（大变动）才能挽救它自己和全国。它在封建王朝的范围内，把法国革命的成果小规模地移植到普鲁士去。它解放了农民，等等¹¹⁹。

俄国在克里木的战败——虽然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或许可能为它挽回荣誉，在巴黎的外交胜利也可能使外国人感到眩惑——在国内揭示了它的社会制度和行政制度的腐朽；于是它的政府在战后解放了农奴，改革了全部行政制度和司法制度¹²⁰。在这两个国家里，大胆的社会改革都受到了阻碍，都有其局限性，因为这些改革都是由君主赏赐的，而不是（并非）由人民夺得的。虽然如此，仍然发生了一些巨大的社会变革，这些变革取消了统治阶级的最恶劣的特权，改变了旧社会的经济基础。这两个国家感到，沉疴大病只能用勇敢的措施来医疗。它们感到，只有进行社会改革，唤起民众振兴的因素，才能对付胜利者。1870 年法国的灾祸在近代世界历史中是无与伦比的事！它表明：官方的法国、路易·波拿巴的法国、统治阶级及其国家寄生虫的法国是一具腐烂的尸体。这批趁

人民惊慌失措时攫取政权，并依靠与外国侵略者勾结而继续控制政权的无耻之徒，他们的第一个企图是什么呢？就是在普鲁士的庇护之下，用路易·波拿巴的兵卒和比埃特里的警察来谋杀从巴黎开始的民众振兴的光荣事业；召唤所有被七月革命打倒的旧正统派的幽灵和被二月革命打倒的路易-菲力浦时代的冥顽不化的骗子手，共同举行一次反革命的庆宴！这种太不自爱的英雄行为是历史记载中闻所未闻的！但是，最能说明时代特点的是：它并没有引起官方的欧洲和美国方面普遍的愤怒呼声，反而激起了一股同情和对巴黎狂暴诋毁的逆流！这证明忠实于自己历史先例的巴黎是在谋求法国人民的复兴；使他们成为复兴旧社会的斗士，使人类的社会复兴成为法国的民族事业！这是使生产阶级摆脱剥削阶级以及它们的仆从和国家寄生虫而得到解放；这些剥削阶级的仆从和国家寄生虫证明这句法国谚语的正确：“小鬼比阎王厉害”。巴黎已经举起了人类的旗帜！

3月18日：政府对

“所有期刊不分性质每份征印花税两生丁”。“在戒严状态解除之前，禁止发行新报刊。”

法国资产阶级的不同集团都曾依次执掌政权：在（旧波旁分子）复辟时期是大土地所有主；在（路易-菲力浦）七月议会王朝时期是资本家，而波拿巴派和共和派分子则一直在幕后挟怨争斗。他们的种种党争和阴谋当然都是打着公众福利的幌子进行的，这些王朝被人民革命打倒了，另一个又登台了。（二月）共和国的建立使一切都发生了变化。这时，资产阶级的所有各集团联合为秩序党，这是土地所有主和资本家为维持对劳动的经济奴役、维护保障这种奴役的国家压迫机器而结成的党。共和代替了王朝，因为单单王朝这个名称就意味着资产阶级的一个集团驾驭另一集团，

意味着一方的胜利和另一方的失败（意味着一方的得胜和另一方的屈辱），而共和则是联合起来的资产阶级各集团的、集所有人民剥削者之大成的无名股份公司；实际上，正统派、波拿巴派、奥尔良派、资产阶级共和派、耶稣会教徒、伏尔泰信徒，彼此抱成了一团。他们已经不再躲藏在王冠的庇护之下，已经不能再把他们的那些党争粉饰为争取人民利益的斗争从而使人民对它们发生兴趣，已经不再彼此分高下。他们的阶级统治是与生产群众的解放直接公开对抗的——秩序是他们的阶级统治的经济政治条件的代称，是奴役劳动的代称；资产阶级制度的这种无名形式或共和形式——这种资产阶级共和国，这种秩序党的共和国，是一切政治制度中最可憎的制度。它的直接任务，它的唯一的存在意义就是镇压人民。它是阶级统治的恐怖。做法是这样的：人民奋身战斗、完成革命之后，宣布共和，为召开国民议会扫清了道路，然后，那些以有名的共和言论为其“共和国”保证的资产者们，就被这个由战败的共和死敌组成的议会的多数推上前台。这些共和派受命负责激怒人民，使他们落入举行起义的圈套，然后用火和剑加以消灭。以卡芬雅克为首的《国民报》派在二月革命以后就起了这一作用（六月起义）。这些共和派对群众犯下了这桩罪行之后就失势了。他们已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尽管他们还被允许在反对无产阶级的共同斗争中支持秩序党，但同时他们却被逐出政府，不得不退至后排，而且只是受到“宽容”而已。这时候，联合起来的保皇派资产者变成了共和国之父，“秩序党”的真正统治开始了。人民的物质力量暂时被破坏，反动派的勾当——消灭由四次革命争得的一切成果——开始一桩一桩地干了起来。秩序党的种种行为，加上这帮下流坯的厚颜无耻——他们竟把人民当做战败者来对待，竟用人民自己的名义，用共和国的名义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这把人民弄到了

愤怒欲狂的地步。当然，这种无名的阶级专制的短暂形式是不能延续长久的，它只可能是一种过渡阶段。它知道它是坐在革命的火山口上。另一方面，即使秩序党在对工人阶级的作战中、在发挥其秩序党的作用方面是团结一致的，然而它的不同派系彼此勾心斗角的斗争，在革命的物质力量已被破坏，它的统治因而似乎稳固下来（得到了保证）的时候，立即全面爆发起来：每一派都想使它的特殊利益在旧社会制度内占得上风，每一派都想使本派的谋位者登基复辟，使个人的野心得逞。反人民的共同战争和反共和国的共同阴谋相结合的这种情况，加上统治者内部纷争和勾心斗角的阴谋，造成了社会的瘫痪，引起了中等阶级群众的厌恶和迷惘，“扰乱”他们的生意，使他们陷于一种长期的动荡不安状态中。在这种制度下创造了（产生了）专制制度的一切条件，但这是不安定的、以议会的无政府状态为首的专制制度。于是政变的时刻来到了，这帮无能的坏蛋不得不让位给随便哪一个侥幸得逞的野心分子，这样就结束了阶级统治的无名形式。路易·波拿巴就是这样把已存在四年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结束了。在这整个时期内，梯也尔是秩序党的“忠实走狗”；这个党曾以共和国名义对共和国进行战争，即对人民进行阶级战争，实际上创造了帝国。现在梯也尔起着完全和那时候一样的作用，只不过那时他仅仅是议会的一个阴谋家，而现在是行政首脑罢了。如果他不被革命击败，那他现在也会和那时一样不过是一个权宜的工具。不管换来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它的第一项措施必然是踢开那个将法国交给普鲁士和炮轰巴黎的人。

梯也尔对路易·波拿巴有满腹牢骚。这个人曾把他当做工具和傻瓜使用。波拿巴在政变之后逮捕了他，使他受了惊（把他吓破了胆）。波拿巴取消了议会制，从而把他一笔勾销，因为象梯也尔这样一个纯粹的国家寄生虫、一个只会饶舌的人只有在议会制度

下才能起政治作用。最后的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在自己的历史著作中一味为拿破仑擦皮靴的梯也尔曾如此长久地描述拿破仑的功勋，以致产生一种幻想，仿佛这些功勋是他自己完成的。在他看来，拿破仑第一的合法模仿者不是小拿破仑，而是小梯也尔。尽管如此，路易·波拿巴所干的每一桩卑鄙勾当——从法国军队占领罗马起到对普鲁士作战止，没有一桩没有得到梯也尔的支持。

只有他这种头脑空虚浅陋的人才居然会产生这样的幻想，仿佛一个以他作为首脑，其国民议会一半属正统派、一半属奥尔良派，其军队由波拿巴的将军们掌握的共和国，一旦得到胜利，不会把他一脚踢开。

再没有比一个大拇指般的小人物装模作样地想扮演（正在扮演）帖木儿-塔梅尔兰的角色更令人作呕的了。对他说来，采取残暴行动不仅是一项职务，而且是他的想入非非的虚荣心的戏剧性表演（舞台效果）。他要写“他的”公报，表现“他的”严峻，要有“他的”军队，“他的”战略，“他的”炮击，“他的”汽油弹，要以让十二月匪帮对巴黎进行报复的冷酷来掩饰“他的”怯懦！真是卑鄙到无以复加的英雄行为！他对自己所起的重要作用以及他在全世界制造的喧嚣洋洋得意！他满以为自己是一个伟人：他这个侏儒，这个淌口水的议会小丑，在世人眼里该是多么高大（雄伟）！在这次战争的一幕一幕可怕的场面中，看到爱好虚荣的梯也尔所装出的滑稽像，的确令人忍俊不禁！梯也尔先生是一位有丰富想象力的人，他身上具有艺术家的气质和艺术家的虚荣，甚至能骗得他自己也相信了自己的谎言和自己的伟大。

梯也尔的所有演说、公报等等里贯穿着一股趾高气扬的虚荣

气息。

这个令人作呕的特里布累。

从蒙瓦勒里安高地（用汽油弹）进行的漂亮的轰击毁坏了特尔纳街区要塞围墙内的一部分房屋，引起一场大火和震动整个巴黎的一次可怕的大炮轰鸣。炸弹是蓄意投向特尔纳街区和爱丽舍园的。

爆炸弹，汽油弹。

公 社

光荣的英国廉价文丐有一个辉煌的发现：公社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自治政府的那类东西。当然不是。它不是饱食终日的市议员们、假公济私的教区委员们和穷凶极恶的习艺所监工们操纵的那种城市自治。它不是大块土地拥有者、满袋金银、头脑空空的蠢材们操纵的那种郡的自治。它不是“无俸法官”¹²¹的司法丑物。它不是借助于寡头俱乐部和阅读《泰晤士报》来管理国家的那种政治自治。它是由人民自己当自己的家。

在这场食人生番进行的战争中，最令人厌恶的就是坐在政府首席上的可憎矮鬼的“文雅的”尖叫声！

凡尔赛对俘虏的残暴虐待从未停止片刻，而且一当凡尔赛确信公社因过分仁慈而不至执行其报复法令时，他们就立即恢复灭绝人性的残杀！

（凡尔赛的）《巴黎报》说：13名在克拉马尔火车站被俘虏的常备军士兵被就地枪决，所有押到凡尔赛的穿常备军制服的俘虏，其身分一经核对属实，也将就地枪决！

小仲马先生叙述说：一个虽然没有将军头衔但执行着将军职务的年轻人，（被押解着）沿一条道路才走了几百码便被射杀。

5月5日。《口令报》¹²²报道：据凡尔赛出版的《自由》晚报报道，“在克拉马尔叛乱分子中间找出的正规军士兵，全部（被那位自比林肯的梯也尔！）就地枪决”（林肯承认对方的交战权利）。“而在所有法国的市镇墙上诋毁巴黎人是凶手的正是这些人！”这些匪徒！

德马列。

公社特派代表团（在4月27日）前往比塞特尔调查国民自卫军第一八五步兵营的四名兵士遇害事件，在那里，代表们访问了仅得生存（重伤）的舍弗尔。

“伤者声称，4月25日在维耳茹伊弗附近的贝耳-埃潘地方，他和那三位战友遭到骑兵的突袭，并且要他们投降。由于当时已不可能对包围他们的队伍进行有效抵抗，他们就扔下了武器投降。敌兵们当即围住他们，将他们俘虏，但对他们并没有施加任何暴力或威吓。他们被俘才几分钟，来了一个骑兵队长，举着手枪冲向他们，一句话也没说，就对他们中间的一个人开枪，后者当即被击毙，然后他又照样对国民自卫军舍弗尔开枪，舍弗尔胸部中弹，倒在他的战友旁边。另外两名国民自卫军慑于这种卑鄙凶焰，向后退避，但是疯狂的队长直趋他们，又开了两枪把他们打死。这批骑兵干完这桩凶残卑鄙的暴行之后，和他们的队长一起撤走，留下惨遭他们毒手的牺牲者直躺在地上。”¹²³

《纽约论坛报》¹²⁴ 超越伦敦报纸。

梯也尔先生的“法国从来没有过的最开明的、最自由地选举出来的国民议会”和他的那个“法国从未有过的一支最精锐的军队”，正是异曲同工。在欺诈的口实下选举出来的这个衰老的无双议院几乎完全由正统派和奥尔良派组成。4月30日在梯也尔亲自主持下进行的市镇选举表明了这些人与法国人民之间的关系如何！

在被肢解的法国境内残存的 35 000 个市镇所选出的 70 万名（取其整数）市镇参议员中，正统派占 200 名，奥尔良派占 600 名，公开的波拿巴派占 7 000 名，其余的全是共和派或共产主义者^①（5月 5 日《每日新闻》驻凡尔赛记者）。以奥尔良派的木乃伊梯也尔为首的这个议会正是代表着少数人的篡夺，这难道还需要什么别的证据吗？

巴 黎

梯也尔先生再三把公社说成是一小撮“罪犯”和“假释犯”的工具，巴黎的渣滓的工具。然而这“一小撮”亡命之徒六个多星期以来却一直抵挡着由战无不胜的麦克马洪统率的、受梯也尔本人的天才所鼓舞的“法国从未有过的一支最精锐的军队”！

巴黎人的壮举不仅驳倒了他。巴黎的各阶层都发表了意见。

“决不当把巴黎的运动和蒙马特尔遭到的突袭混为一谈，后者只不过是这一运动的导因和起点；这一运动是普遍的，是深入巴黎人心的；甚至那些由于某种原因置身局外的大多数人也不否认这一运动的社会合法性。”

这一番话是谁说的呢？是**工商会代表**，亦即代表着七八千名工商业者发言的一些人。他们去到凡尔赛讲了这番话……**共和联合同盟**……**共济会会员的示威游行**¹²⁵ 等等。

外 省

调皮捣蛋的外省人。

如果梯也尔哪怕是在刹那间曾经认为外省的确实都是和巴黎的运动相敌对的，那他也会竭尽全力向它们提供最大限度的方便来

① 指公社的拥护者。——译者注

使它们了解这一运动及其“种种惨象”了。他会邀请外省人来观察这一运动的全部真实的情况，让他们通过自己的耳闻目睹确信这一运动原来真是如此。但他决不！梯也尔和他的“国防人士”为了防备外省发生拥护巴黎的总起义，企图用一道谎言的墙壁把它们包围起来，象他们在普鲁士人包围巴黎时期不使消息从外省透入巴黎的做法一样。只许外省通过凡尔赛的 camera obscura (变形镜) 来观察巴黎 (只有凡尔赛报刊散布的谎言和诽谤传到各省，垄断视听)。两万名假释犯在打劫杀人——这种诽谤败坏着首都的声誉。

“同盟认为它的头一项义务就在于阐明真相，恢复外省和巴黎之间的正常关系。”¹²⁸

现在，轮到他们来围困巴黎的时候，他们还和他们自己被困在巴黎时一样。

“象从前一样，造谣是他们钟爱的武器。他们取缔、没收首都的报纸，拦截通讯，拆查信件，因此，外省只能得到茹尔·法夫尔、皮卡尔一伙人愿意发给他们的那些消息，根本不可能核对那些话是否确实。”

梯也尔的公报、皮卡尔的通告、杜弗尔的…… 各市镇的招贴。凡尔赛的强盗报纸和德国人。小《通报》¹²⁷。重新实行异地旅行须持通行证的制度。无孔不入的侦探大军。(在普鲁士权力管制下的卢昂等地)不断逮捕，等等。散布在巴黎四郊的成千上万的警官接到宪兵、警察局长瓦伦顿的命令：凡是在这座叛乱的城市里刊印的报纸，不问其倾向如何，一律予以没收，并当众销毁，与神圣的宗教裁判所鼎盛时期的做法一模一样。

梯也尔政府最初呼吁^①各省组织国民自卫军战斗营，并把它

① 手稿中在这几个字上面还写着：“在从俾斯麦那儿获得被俘的军队以前……恐慌地呼吁……”——编者注

们开到凡尔赛来对付巴黎。

正如里摩日的报纸¹²⁸所载，“外省拒绝派遣梯也尔及其‘地主议会’要求的志愿战斗营，以此表示了它们的不满。”

在梯也尔周围聚集起来的唯一的“外省”军队是少数布列塔尼省蠢物，他们作战时打着白旗，每人胸前缝着用白布做成的耶稣圣心，口里喊着“国王万岁！”

选举。5月6日《复仇者报》¹²⁹。

杜弗尔先生的出版法（4月8日）。公开宣布是为了对付外省报纸的“过激言论”。

其次是在外省进行的大批逮捕。外省被置于**嫌疑犯处治法¹³⁰**统制之下。

对外省的思想封锁和警察封锁。

4月23日。哈佛尔讯。市镇参议会曾派出三个参议员前往巴黎和凡尔赛，其使命是进行斡旋调停，以便在维持共和、赋予全法国以市镇选举权的基础上结束内战…… **4月23日，皮卡尔和梯也尔接见了里昂来的代表**——他们的答复是：“不惜一切战争到底。”

里昂代表们的呈文于4月24日由格雷波提交议会¹³¹。

外省各城的市镇参议会派代表团到凡尔赛去请求当局答应巴黎所提出的要求，这是极大的冒犯行动；全法国没有一个市镇发出赞许梯也尔和“地主议会”的行动的声明；各省的报纸，据杜弗尔在发给各地总检察官的反对议和的通告中抱怨说，也象这些市镇参议会一样，

“竟把由普选产生的国民议会和自行僭位的巴黎公社相提并论，并且斥责前者没有承认巴黎的市政权等等”，

而更糟的是，这些市镇参议会，例如奥希的市镇参议会，

“一致要求它立即向巴黎提出停战，并要求 2 月 8 日选出的议会自行解散，因为它的任期已满”（杜弗尔 4 月 26 日在凡尔赛议会的发言）。

应当记住，这些还都是旧的市镇参议会¹³²，而不是在 4 月 30 日选出的市镇参议会。它们派出的代表团是如此之多，以至于梯也尔决定不再亲自接见它们，而指派一个内阁助理去接待它们。

最后，4 月 30 日的选举——这是对国民议会和对产生国民议会的那次突然选举的最后判决。如果说，各省到这时为止只对凡尔赛进行消极的抵抗，没有以起义来支持巴黎，这是由于旧政权在各省仍然保有据点，帝国使外省陷入了昏迷状态，而战争又使这种状态维持下来。显而易见，矗立在外省和巴黎之间的仅仅是凡尔赛军队、凡尔赛政府和谎言的长城。一旦这条长城坍塌下来，外省和巴黎便会联合起来。

最突出的特点是：这些人（梯也尔等这一伙人）因为普选权在共和制度下仍可能给他们带来不测风云，所以在 1850 年借助一次议会阴谋取消了普选权（波拿巴当时帮助了他们，以便使他们落入圈套，使他们陷入完全听凭他摆布的境地，以便在政变之后宣布他自己不顾秩序党及其议会的反对，恢复了普选权）；而现在，当普选在波拿巴统治下已经被弄成了仅仅是行政当局手中的玩物，仅仅是行政当局从事欺骗、意外行动和弄虚作假的机器之后，同是这一帮人又成了普选权的狂热拥护者了，他们把普选作为自己对付巴黎的“合法”依据。（城市联盟代表大会）（5 月 6 日《号召报》！）¹³³

特罗胥、茹尔·法夫尔和梯也尔，外省人

有人可能要问，象梯也尔、法夫尔、杜弗尔、加尔涅-帕热斯（另外只有少数几个同类的流氓）这批衰朽不堪的议会小丑和阴谋家，怎么会在每次革命之后不断重新浮到表面上来，篡夺行政大权呢？

这帮一贯利用革命和叛卖革命、枪杀实现革命的人民、夺回人民从以前各届政府争得的少数自由主义让步的人们，怎么能做到这点呢？（他们自己就曾反对这些让步。）

这很简单。首先，那些人尽管非常不得人心，象二月革命后的梯也尔那样，而人民出于宽宏大量还是把他们放过去了。每次人民顺利起义以后，人民的不共戴天的敌人就喊出和解的呼声，这种呼声在人民陶醉于自己胜利的最初阶段得到人民的响应。在这最初阶段过去之后，只要人民还掌握物质力量，象梯也尔和杜弗尔这种人就隐蔽起来，暗中干他们的勾当。一旦人民被解除武装，他们立刻重新抛头露面，并被资产阶级捧为他们的头领。

或者是象法夫尔、加尔涅-帕热斯、茹尔·西蒙等人（另外还有几个较年轻的同类人物）和9月4日以后的梯也尔本人那样，原先是路易-菲力浦治下的“体面的”共和反对派，后来是路易·波拿巴治下的议会反对派。他们在革命把他们推上台时自己奠定的反动制度，保证他们获得反对派的地位，而对真正的革命家则加以流徙、处死和放逐。人民忘记他们的过去，中等阶级把他们看做是自己人；他们的声名狼藉的过去既被遗忘，于是他们又出来重新开始他们的叛卖活动和无耻勾当。

5月1日深夜：克拉马尔村已落入军队手中，火车站在起义者手里（这座车站控制着伊西堡垒）。第二十二猎兵营突然出现（值勤哨兵把他们的侦察队放了进来，因为口令已被叛徒泄漏给他们），出其不意地袭击了多数在床上酣睡的守军，只俘虏60人，用刺刀挑死起义军300名。而且俘虏中的常备军士兵随后不经审讯即被枪决。梯也尔在他5月2日给各省长、民政当局和军事当局的通告中厚颜无耻地说：

“它（公社）逮捕了一些将军（克吕泽烈！）只是为了要枪毙他们，它组织了一个完全不象样的社会拯救委员会！”

拉克雷特尔将军指挥下的军队以奇袭占领了位于伊西堡垒和蒙鲁日之间的木兰-萨克多面堡。守军由于指挥官加里安叛变、把口令出卖给凡尔赛军队而遭到了突袭。150名公社社员被刺刀挑死，300余名被俘。《泰晤士报》的记者说，梯也尔先生在应当表现坚决的时候很软弱（这个懦夫在不得不为自己的安危担忧的时候永远是软弱的），而在可用某些让步取得一切的时候却又很坚决（这个流氓在他使用实力屠杀法兰西、大模大样地装腔作势而个人又能确保安全的时候，永远是坚决的。他的全部智力就在于此，象安东尼所说的那样，梯也尔是一个“正人君子”^①）。

梯也尔关于木兰-萨克的公报（5月4日）：

“巴黎从压迫它的可憎暴君的控制下得到解放”（“凡尔赛人装扮成国民自卫军。”）（“大多数的公社社员正在酣睡，在睡梦中被杀或被俘”）。

皮卡尔：“我们的炮兵没有轰击，但是诚然射击过”（皮卡尔的报纸《市镇通报》）。

“被关在囚牢中的奄奄一息的布朗基、被宪兵砍头的弗路朗斯、被维努亚下令枪决的杜瓦尔，在10月31日曾把他们抓到手中，但并没有伤害他们。”

^① 见莎士比亚《尤利乌斯·凯撒》第三幕第二场（安东尼关于布鲁图斯的话）。——编者注

公 社

1. 为工人阶级采取的措施

面包工人的夜班工作被禁止(4月20日)。

在公、私工厂里，废除了厂主等(制造商)(大小雇主)擅自僭取的私人裁判权(这些厂主在诉讼中身兼法官、执行吏、胜利者和当事人)；废除了他们擅自制定使他们能够用罚金、扣款等处分来掠夺劳动者工资的刑法典的权利；雇主违反这条法令时将受处罚；3月18日以后勒取的罚金和扣款必须发还工人(4月27日)。当铺里的典当物品停止出售(3月29日)。

巴黎的一大批作坊和工厂已经关闭，因其所有者业已逃跑。这是工业资本家的老办法，他们认为，“根据政治经济学规律的自发作用”，他们不仅有权利从工人劳动中汲取利润，把这当做工人劳动的条件，而且有权利截然停工，把工人抛到街头——在任何胜利的革命威胁到他们“制度”的“秩序”的时候制造一次人为的危机。公社非常英明地任命了一个公社委员会，由它同各行各业选出的代表合作，共同商讨如何把业主遗弃的作坊和工厂转交给工人合作团体，并给予逃亡的资本家以若干补偿(4月16日)；(这个委员会还负责统计被业主遗弃的工厂的数目)。

公社向各区政府下令，在发放75生丁的补助金时，对国民自卫军的所谓非正式配偶、母亲、寡妇，应一视同仁，不得有所区别。

至今在巴黎专为“秩序人物”蓄养的公娼——但为着这些人物的“安全”起见曾被置于警察淫威的人身奴役之下，——公社把她

们从这种含垢忍辱的奴隶处境中解放了出来，而且扫除了培植卖淫制度的土壤和人物。那些高级娼妓——荡妇们——在秩序的统治下当然不是警察和官长们的奴隶，而是他们的主人。

当然，公社没有时间来改组国民教学（教育）；但是，公社清除了其中的宗教和教权主义成分，因而在人民的思想解放上开了一个端。它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组织（初级的和职业的）教育（4月28日）。公社下令，所有学习用品如书籍、地图、纸张等等，概由学校教师分别向所属的区政府领取，然后免费分发给学生；任何教师都不得以任何借口向学生收取这些学习用品的费用（4月28日）。

当铺：凡1871年4月25日以前典押的价值不超过20法郎的衣物、家具、内衣、书籍、被褥、劳动工具，可以从本年5月12日起凭当票无偿取回（5月7日）。

2. 为工人阶级，但主要是为 中等阶级采取的措施

4月份以前的最近三个季度的房租全部免缴：凡已付出这三个季度中任一季度的房金的人，有权把这笔付款转作今后的预付房金。此项法令也适用于有家具设备的公寓。房主限令房客搬家的通知，在未来的三个月内无效（3月29日）。

Échéances（到期票据的支付）（**票据满期**）：对过期票据暂停追索（4月12日）。

所有这一类商务票据从本年7月15日起在两年内（分期分批）偿还，债款不得索取利息。到期的债款总额均分为八份，按每三个月为一期逐期支付（第一期从7月15日计起）。只有这些应分批偿付的债款过期未付时，才允许根据法律进行追索（4月16

日)。杜弗尔的租借和期票法已经使巴黎大多数的循规蹈矩的店主陷于破产。

直到今天以前利用职务发财的公证人、法警、拍卖人、捕役以及其他司法官吏，都转变为公社的公职人员，象其他工人一样从公社领取固定的工资。

由于医学院的教授们已经逃走，公社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建立一些不再寄生于国家的**自由大学**；给予考试及格的大学生们以行医的条件，不论有无医学博士学位(学位由学院授予)。

由于象其他司法人员一样始终愿意在任何阶级政府下供职的塞纳省民事法庭的法官们，已逃亡一空，公社任命了一位律师来处理最紧迫的事务，直到各级法庭通过普选改组后为止(4月26日)。

3. 一般措施

废止征兵制。在当前的战争中，每个能服军役的人都应服役(国民自卫军)，这是清除所有隐藏在巴黎的奸细和懦夫的最好措施(3月29日)。

禁止赌博(4月2日)。

教会与国家分离；取消宗教预算；全部教会产业被宣布为国家财产(4月3日)。

公社根据私人报告进行了调查，发现“秩序政府”在原有的一架断头机以外，又下令制造一架新的(更合用、更便于搬运的)断头机，并且预付了造价。公社下令在4月6日将新旧两架断头机当众烧毁。凡尔赛的报纸，在全世界的“秩序”报纸的呼应唱和下，把这件事说成这样：巴黎人民所以烧毁这两架断头机，是为了对公社

委员们的嗜血行为表示抗议！（4月6日）三月十八日革命之后，所有政治犯被立即释放。但是公社知道，在路易·波拿巴及其宝贝继承者国防政府的统治下，很多人并没有任何罪状，纯粹出于政治嫌疑而被禁锢在牢狱之中。因此，公社责成它的一位委员——普罗托进行调查。他开释了150名已被囚禁六个月而始终没有受过一次审讯的人；其中很多人还是在波拿巴统治时被捕的，他们已被囚禁一年，但没有任何罪名，也没有经过审讯（4月9日）。这个最足以说明国防政府特征的事实，使他们暴跳如雷。他们咬定公社释放了全部罪犯。但是究竟是谁释放了已定罪的罪犯的呢？是伪造文件犯茹尔·法夫尔。他上台之后坐席未温，就赶紧释放了在《旗帜报》事件中因盗窃和伪造文件而被判刑的皮克和泰费尔。这两位先生中的一位，即泰费尔，竟然胆敢返回巴黎，但是他被重新送回到适合他身分的住所里。不仅如此，凡尔赛政府还释放了全法国的各中心监狱里的被判罪的小偷，条件是参加梯也尔先生的军队！

下令毁除旺多姆圆柱，因该柱

“纪念野蛮行为，象征粗暴武力和虚假荣誉，推崇军国主义，否定国际权利”（4月12日）¹³⁴。

弗兰克尔（德国人，国际会员）当选为公社委员一事被宣布有效：“因为巴黎公社的旗帜就是世界共和国的旗帜，外国人能成为公社之一员”（4月4日）¹³⁵；稍后，弗兰克尔被选为公社执行委员会委员（4月21日）。

《公报》开始公布公社会议的记录（4月15日）。

巴斯噶尔·格鲁赛颁布保障外国人财产免受征用的法令。巴黎从来没有一个政府这样礼遇外国人（4月27日）。

公社废除了政治宣誓和职业宣誓（5月4日）。

拆除圣奥诺莱区昂茹街上的（1816年无双议院建立的）名为“路易十六赎罪教堂”的纪念建筑物（5月7日）。

4. 公 安 措 施

解除“忠诚的”国民自卫军的武装（**3月30日**）。

公社宣布，公社的队伍里不允许既在公社占有席位，又在凡尔赛议会占有席位（**3月29日**）。

报复法令。从未执行。被捕的只有神职人员：巴黎大主教和马德兰教堂主持；耶稣会教团的所有头目；所有主要教堂的受俸神甫；这些人一部分是作为人质被捕，一部分是由于与凡尔赛方面串通，再一部分是由于企图逃避把教堂财产交给公社（**4月6日**）。

“保皇党人作战如同野人；他们枪毙俘虏，杀害伤员，炮轰野战医院，他们的军队把枪托举到空中，然后阴险地突然开火。”《公社的公告》¹³⁶。

关于这些报复法令，应当指出：

首先，巴黎社会上各阶层的人在资本家、有闲者、寄生虫们出走之后，除巴黎的僧侣之外，都向凡尔赛交涉要求停止内战。巴黎大主教和马德兰教堂主持只是在成为人质之后，怕“他们自己流血”，才给梯也尔写了信。

其次，在公社公布关于报复、拘捕人质等法令之后，比埃特里手下的羔羊和瓦伦顿手下的宪兵并没有停止残暴虐待凡尔赛手中的俘虏，对被俘的巴黎士兵和国民自卫军的屠杀只是暂时中止，但在凡尔赛政府一看到公社宽厚过分，不会执行它的四月六日法令时，便立即加倍凶狠地恢复屠杀。这时，大规模的屠杀又重新开始。公社没有处决一个人质，一个俘虏，甚至那些化装成国民自卫军潜入巴黎充当间谍的宪兵军官也未处死，只将他们逮捕而已。

克拉马尔多面堡被突袭（5月2日）。火车站在巴黎人手中，屠杀，用刺刀挑死，第二十二猎兵营（加利费？）不经过任何手续就地枪毙常备军士兵（5月2日）。位于伊西堡垒和蒙鲁日之间的木兰-萨克多面堡，由于指挥官加里安叛变，把口令出卖给凡尔赛军队，而在夜间遭到突袭。公社社员在床上酣睡时突遭袭击，他们的大部分被屠杀（5月4日？）。

4月25日，四名国民自卫军士兵（此事已被公社派往比塞特尔的特派代表们证实，在维耳茹伊弗附近的贝耳-埃潘地方遭残害的四人中仅存的一人在那里，他的名字叫舍弗尔）。这四名士兵被骑兵包围了，由于无法抵抗，在骑兵迫令下投降，并被解除武装。这些骑兵丝毫未伤害他们。但是骑兵队长随后跑来了，用手枪把他们逐个击倒。他们被弃置原地。舍弗尔身受重伤，但得残存。

十三名在克拉马尔火车站被俘的常备军士兵被就地枪毙，解到凡尔赛的所有穿常备军制服的俘虏，一俟他们的身分核对清楚也将被处决（凡尔赛的《自由报》）。目前正在凡尔赛的小仲马叙述说：一位虽然没有将军头衔但执行着将军职务的年轻人，被押解着沿一条道路才走了几百码，便被一个波拿巴的将军下令射杀。宪兵把巴黎部队和国民自卫军包围在一些住宅中，将房屋浇上煤油，然后纵火焚烧。一些国民自卫军士兵的尸体（被烧焦的）被特尔纳街区的印刷厂救护队运出（4月20日《口令报》）。“他们无权得到救护。”

梯也尔、布朗基、大主教、尚济将军。（梯也尔说，他的波拿巴分子们宁愿被枪毙。）

搜索住宅等等。卡季米尔·布伊被任命为一个调查团的主席，调查9月4日独裁者们所干的勾当（4月14日）。私人住宅被搜查，文件被没收，但家具未搬走，也未被拍卖。（被没收的文件是

属于 9 月 4 日人物、梯也尔等人以及波拿巴警察的。) 例如在监狱总督察拉丰私邸中的搜查 (4 月 11 日)。梯也尔一伙因为是卖国贼, 他们的住宅(财产)受到搜查, 但是只有文件被没收。

在自己内部的逮捕: 这使特别需要政治偶像和“大人物”的资产者为之大吃一惊。

(5 月 6 日《每日新闻》巴黎通讯)“不管公社掌握的是怎样一种权力, 但是这个权力经常在易手, 我们今天不能知道明天大权将操在谁的手中, 这种情况令人恼怒, 然而也令人沮丧…… 在这一切无穷无尽的更替变动中, 人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感到缺乏一只手来总理一切。公社是一簇等量原子的聚合体, 他们彼此相互猜忌, 没有一个人被赋予约束别人的最高权力。”

封闭报纸!

5. 财 政 措 施

见 5 月 6 日《每日新闻》。

主要开支用于战争!

从没收得来的只有 8 928 法郎, 并且全部取自神职人员等。

5 月 6 日《复仇者报》。

公 社

公社的产生和中央委员会

色当之后，在里昂、然后在马赛、土鲁斯等地相继宣告成立公社。甘必大用尽了全力加以镇压¹³⁷。

10月初巴黎的种种运动，目的都在于建立公社，借以防御外敌入侵和完成9月4日起义的任务。10月31日的运动没有建成公社，原因只在于布朗基、弗路朗斯和其他当时的运动领袖们轻信了这些说话算话的人，这些人当时曾立下信誓：引退下台，让位给由巴黎所有各区自由选举出来的公社。10月31日的运动之所以失败，还因为它的领袖们救了这些人的命，而这些人却迫不及待地要杀害他们的救命恩人。运动的领袖们刚一允许特罗胥和费里逃命，后者就开来了特罗胥的布列塔尼兵向他们突袭。应当记住，在10月31日，自封的“国防政府”只是在人民的容忍之下存在着。那时它甚至还没经过一次全民投票的笑剧¹³⁸。在这种情况下，当然最容易做到的莫过于歪曲运动的性质，诬蔑它是和普鲁士人串通的阴谋，并且乘他们中间仅有的一人不愿食言而提出辞职^①的机会，用任命克列芒·托马为国民自卫军总司令的办法来加强特罗胥的布列塔尼兵——这些布列塔尼兵替国防政府起的作用正象科西嘉匪徒替路易·波拿巴起的作用一样；对于这些制造恐慌局面的老手们，当时最容易做到的就是：利用中等阶级对于已操主动

① 塔米济埃。——编者注

权的工人营的那种胆小恐惧心理，利用爱国情绪，在各工人营之间散布猜忌与不和，以便制造一个盲目反动和致命误会的局面，这是他们企图保持他们篡夺的政权的一贯手法。因为他们在 9 月 4 日以猝不及防的手段窃得了政权，所以现在他们就能够通过一次反动恐怖时期的真正波拿巴式的全民投票，使这个政权得到一个伪造的民意批准。

如果 1870 年 11 月初在巴黎胜利地建立了公社（当时，法国其他各大城市已开始成立，全国各地势将纷纷仿效），那不仅会把卫国的事业从卖国贼手里夺取过来，赋予它以奋发的热情，正如目前巴黎的英勇斗争所表现的那样，而且会完全改变战争的性质。它会转变成共和主义法国的战争，高举起十九世纪的社会革命的旗帜，反抗普鲁士这个侵略和反革命的旗手。它可能象电流似地激发起新旧世界的生产群众，而不会派一个腐朽不堪的阴谋老手到欧洲的所有宫廷去乞求。由于 10 月 31 日的公社受骗流产，茹尔·法夫尔一伙人才得以促成法国向普鲁士的投降，并且发动了目前这次内战。

但是，有一点很清楚：9 月 4 日的革命不仅意味着由于篡位者在色当投降，帝位出缺，共和得以恢复；它不仅由于巴黎进行了长期抵抗——虽然这种抵抗是在它的敌人领导下进行的——从而从外国侵略者手中争得了这个共和；而且，这一革命还在向工人阶级的心灵逐步深入。共和不再是某种已经过去了的事物的名称。它孕育着一个新的世界。它的真正倾向虽被一帮阴险的律师和花言巧语的辩客用欺骗、谎言、庸俗的歪曲向世人遮蔽起来，但是却一次又一次地在巴黎（以及法国南部）工人阶级时断时续的运动中表现出来，他们的口号永远是一致的——公社！

公社——这是反对帝国及其存在条件的革命的积极形式，最

初在法国南部的一些城市曾试图建立；巴黎被围期间，在断断续续的运动中曾一再宣布成立公社，但国防政府和“投降计划”的主角特罗胥的布列塔尼兵使用手法使它流产；最后公社终于在3月26日胜利地宣告成立，但它不是在这一天突然产生的。它是工人革命的既定不移的目标。巴黎的投降、波尔多的公开的反共和国阴谋、由夜袭蒙马特尔所开始的政变，都促使巴黎的全部有生力量团结到它的周围，使“国防人士”无法再把它限制为只是巴黎工人阶级中最自觉最革命部分的孤立奋斗。

国防政府只是在最初意外的情况下，作为一种下策、作为战争中的必要措施才被容忍的。而巴黎人民对于第二帝国这个谎言帝国的真正答复是——公社。

因此也可以说，全部巴黎的有生力量（除了波拿巴主义的支柱及其御用反对派、大资本家、金融经纪人、骗子手、懒汉以及老朽的国家寄生虫以外）反对国防政府的起义，虽然是在3月18日争得了它反对串谋的首次胜利，但是这一起义并不是从这一天，而是从1月28日，即投降的那一天开始的。国民自卫军——即巴黎的全部男性武装居民——自己组织了起来，并且从那一天起就在实际上统治着巴黎，独立于靠俾斯麦的恩典成立的投降派的僭权政府之外。他们拒绝交出来本来属于他们的、因而在投降时才留在他们手中的武器和大炮。这些武器之所以没有落到俾斯麦手里，并不是由于茹尔·法夫尔的宽宏大量，而是由于武装的巴黎为了保持这些武器不惜与茹尔·法夫尔和俾斯麦一战。鉴于外敌当头、和谈正在进行，巴黎不愿使局势复杂化。它恐怕发生内战。它恪守纯粹防御的立场，满足于巴黎实际上的自治。但是，它在镇静地、坚定地进行着组织工作，准备抵抗。（投降派甚至在投降条款里也毫不含糊地表明，他们想借法国对普鲁士的投降一举控制巴黎。他们

向普鲁士坚持要求的唯一让步——这一点即使他们不作为一项让步向俾斯麦乞求，俾斯麦也会作为一项条件强加在他们身上——就是要 4 万名士兵来镇压巴黎。巴黎有 30 万国民自卫军，守卫巴黎、应付外敌和维护内部秩序绰有余裕，在这种情况下，还要求这 4 万名士兵，就不可能有其他目的了，而且这点也是公开承认的。) 巴黎根据一项非常简单的计划，在现行军事组织上增加了一套政治的联合组织。这个政治联合是全体国民自卫军通过每一个连的代表彼此联结起来的联盟；连代表们选举营代表，营代表们再选出总代表、团长，由他们来代表一个区，和其他 19 个区的代表进行合作。由国民自卫军大多数战斗营选出的这 20 位代表组成 **中央委员会**，正是它在 3 月 18 日掀起了本世纪最伟大的革命，并且在巴黎目前的光荣斗争中至今还坚持着它的岗位。从来还没有过在选拔上进行得这样认真仔细的选举，也从来没有过这样充分地代表着选举他们的群众的代表。局外人提出反对意见，说这些代表都是些无名之士——诚然，他们只为工人阶级所熟悉，他们不是老奸巨猾的家伙，也不是因过去种种劣迹和孜孜钻营名利地位而声名显赫的人物——对于这种反对意见，他们骄傲地回答道：“当年十二使徒就是这样”；他们还用自己的行动回答了这种指责。

公社的性质

以其无孔不入而且极其复杂的军事、官僚、僧侣和司法机构象蟒蛇一样地把活生生的市民社会从四面八方网罗起来(缠绕起来)的中央集权国家机器，最初是在君主专制时代创造出来的，当时它是作为新兴的现代社会在争取摆脱封建制度束缚斗争中的一个武器。中世纪贵族的、城市的和僧侣的领主特权都转变为一个统一

的国家政权的从属物；这个统一的国家政权以领薪的国家官吏代替封建显贵，把中世纪地主的门客仆从和市民团体手中的武器转交给一支常备军队，以系统的按等级分工的国家政权的统一计划代替中世纪的互相冲突的势力所造成的错综复杂的（光怪陆离的）无政府状态。以建立民族统一（创立民族国家）为任务的第一次法国革命，必须消除一切地方的、疆域的、城市的、省份的独立性。因此，这次革命不得不继续发展君主专制制度已经开始的工作，即使国家政权更集中更有组织，并扩大这一政权的辖制范围和职能，增加它的机构、它的独立性和它控制现实社会的超自然威势，这种威势实际上取代了中世纪的超自然的天堂及其圣徒的作用。由各社会集团的彼此关系产生出来的各个细小的个别的利益，从社会中分离出来并以国家利益的形式固定起来，成为独立于社会之上又与社会对立的利益，这种国家利益交由那些担任经严格规定的、等级分明的职务的国务祭司们管理。

市民社会身上的这个冒充为其完美反映的寄生赘瘤，在第一个波拿巴的统治下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复辟王朝和七月王朝除了使这个寄生赘瘤有更大程度的分工之外，并未增添什么新东西；这种分工是随着市民社会内部分工创造出新利益集团，从而为国家活动创造出新对象而扩大的。法国的议会制共和国和整个欧洲大陆上的各国政府，在它们与 1848 年革命作斗争中，由于对人民运动采取各种镇压措施，不得不加强它们的政府权力的行动工具和集中程度。由此可见，所有的革命只是使国家机器更加完善，而没有摈弃这个令人窒息的梦魔。轮流争夺霸权的统治阶级中的各集团各党派，都把占据（控制）（夺得）和左右这个庞大的政府机器看做胜利者的主要掠夺品。这个政府机器集中力量建立庞大的常备军、制造大批的国家寄生虫和巨额的国债。在君主专制时代，它是

现代社会反封建的斗争工具，这一斗争到法国革命时达到了顶点；在第一个波拿巴时代，它不仅被用来压制革命，取消人民的一切自由权利，而且是法兰西革命的一种工具，用来对外攻击，用来为法国在大陆上建立大体与法国相仿佛的一些国家来代替封建王朝。在复辟王朝和七月王朝统治时期，它不仅成为资产阶级的强力阶级统治的一种手段，而且成为补充直接经济剥削的第二重剥削人民的手段，因为它保证资产阶级的家族在国家事务管理中取得所有肥缺。最后，在 1848 年革命斗争时期，它成为扑灭革命、扼杀人民群众的一切解放要求的工具。但是，这种国家寄生物只是在第二帝国时期才得到它最后的发展。有着常备军、无所不管的官僚制度、愚民的僧侣、奴性的司法体系的政府权力，脱离社会已经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致一个以一伙饿鬼般的亡命徒作后盾的、低能到可笑地步的冒险分子，都可以来运用它。这时，它已无需乎用旧欧洲为反对 1789 年革命建立的现代世界而结成的武装同盟来作借口了。它看起来不再象是一个从属于议会内阁或立法议会的阶级统治工具了。这种国家政权在第二帝国得到了它的最后、最高的表现：它甚至于践踏统治阶级的利益；它用它自己挑选的立法团和由它付薪俸的参议院来代替统治阶级的装饰性的议会；它的无限权势得到了普选的批准，它被公认为维护“秩序”亦即维护地主和资本家统治生产者的“秩序”的必要条件；它用昔日的破旧面具来掩盖今天的贪污腐化的闹宴，掩盖最腐朽的寄生集团——金融骗子们的得逞；它放纵过去的一切反动势力——下流勾当的万恶渊薮。乍看起来，这是这个政府权力对于社会的最后胜利；实际上，这是这个社会里一切腐败分子的胡作非为。在不明真相的人看来，这好象只是行政权力战胜了立法权力，好象是以超越于社会之上的权力自居的阶级统治形式最终击败了以社会自治自居的阶

级统治形式。但是，事实上，这只是那个阶级统治的最后的、堕落的、唯一可能的形式，它既给统治阶级本身带来耻辱，也给受它束缚的工人阶级带来耻辱。

9月4日只是击败那个曾扼杀共和国的邪恶冒险分子而使共和国重新恢复。**公社才是帝国本身**的真正对立物，也就是国家政权、集中化行政权力的对立物，第二帝国只不过是这种权力的最完备的表现形式。事实上，这个国家政权是资产阶级创造的，最初作为破坏封建制度的手段，后来作为压制生产者、工人阶级的解放要求的手段。历次的反动和革命所起的作用都只是把这一组织起来的权力——组织起来奴役劳动的强力——从这一手中转到另一手中，从统治阶级的这一集团转到另一集团。它一直是统治阶级进行奴役和牟利的手段。它在每一次新变动中都吸吮了新的力量。它充当了镇压每一次人民起义的工具；在工人阶级进行了战斗，并被利用来把国家政权从他们的压迫者的这一集团转交给另一集团之后，它又被用去压制工人阶级。因此，这次革命不是一次反对哪一种国家政权形式——正统的、立宪的、共和的或帝制的国家政权形式的革命。它是反对国家本身、这个社会的超自然的怪胎的革命，是人民为着自己的利益重新掌握自己的社会生活。它不是为了把国家政权从统治阶级这一集团转给另一集团而进行的革命，它是为了粉碎这个阶级统治的凶恶机器本身而进行的革命。它不是阶级统治的行政权形式和议会形式之间所进行的无聊斗争，而是同时对这两种形式进行的反抗，这两种形式是互为补充的，议会形式只是行政权用以骗人的附属物而已。第二帝国是这种国家篡夺的最后形式。公社是它的绝对否定，因此，公社也是十九世纪社会革命的开端。因此，无论公社在巴黎的命运怎样，它必然将**屹立于全世界**。公社立刻被欧美工人阶级作为求解放的口偈加以热烈

欢迎。相形之下，普鲁士征服者的光荣和陈年业绩只不过象往事中的虚幻错觉而已。

只有工人阶级才能以“公社”这个字眼来表达，并以战斗的巴黎公社来开创这一新的憧憬。就连第二帝国所体现的国家政权最后表现形式，虽然对统治阶级的自尊心有所损伤，虽然将他们的妄图实行议会自治的希望一笔勾销，但它仍然只是他们的阶级统治的最后可能形式。它虽然剥夺了统治阶级以前的政治地位，但却是他们制度中经济方面和社会方面的种种败德辱行可以放肆发展的闹宴。中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由于他们生存的经济条件而不可能创始一个新的革命；他们只能或者跟着统治阶级走，或者做工人阶级的追随者。农民是第二帝国的消极经济基础；那个与社会分离而独立于社会之上的国家，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获得它最后一次胜利的。只有因对全社会负有新社会使命而得到鼓舞力量的无产阶级，即负有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统治使命的无产阶级，才能够粉碎阶级统治的工具——国家，也就是集中化的组织起来的窃居社会主人地位而不是充当社会公仆的政府权力。第二帝国就是在统治阶级依靠着农民消极支持同无产阶级进行的积极斗争中产生的。它是取代了中世纪教会的国家发展到登峰造极的最后形式，同时又是最露骨淫贱的形式。第二帝国是在反对无产阶级中产生的。摧毁它的也是无产阶级，但无产阶级摧毁它，并不是把它当做政府（集中化）权力的一种特殊形式，而是把它当做这种权力的最强大的、外表上似乎独立于社会之上的表现形式，因而也就是把它当做这种权力的最淫贱的实体，这个实体的集中表现是对内腐败透顶，对外昏愦无能，从头到脚卑鄙龌龊。

但是，当阶级统治的这一种形式被破坏后，行政权、国家政府机器就变成了革命所要打击的、最大的、唯一的对象了。

议会制在法国已经完结了。它的最后的和最发达的时期是从1848年5月到政变为止的议会制共和国。扼杀了议会制的帝国，正是这个制度自身的产物。第二帝国时期的议会制虽设有立法团和参议院，——普鲁士和奥地利这两个军事君主国家已照这种式样加以复制，——但它也只是一种笑剧，只是专制制度的最劣等的附属品而已。在法国，议会制那时已经寿终正寝了，工人阶级革命当然不会去复活它。

公社——这是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把它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生命力；这是人民群众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他们组成自己的力量去代替压迫他们的有组织的力量；这是人民群众获得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这种政治形式代替了被人民群众的敌人用来压迫他们的社会人为力量（即被人民群众的压迫者所篡夺的力量）（原为人民群众自己的力量，但被组织起来反对和打击他们）。这种形式很简单，象一切伟大事物一样。在过去的所有革命中，一切历史发展所需的时间总是虚掷了；而且就在人民胜利之日，人民刚放下胜利的武器，这些武器就被转用来反对人民自己。这回一反过去革命的惯例，首先就以国民自卫军代替了军队。

“9月4日以来，共和国第一次从它的敌人的政府下解放出来……为本城建立了保卫公民不受当局（政府）侵犯的国民军，来代替保卫政府反对公民的常备军。”（3月22日中央委员会公告）¹³⁹

（人民只要在全国规模内组织这种国民军，就足以根除常备军；这是一切社会进步在经济方面的第一个必要条件，它立刻消除捐税和国债的这种根源和阶级统治——不论是通常的阶级统治，还是一个自称拯救所有阶级的冒险家的统治——篡夺政府的这种经常危险。）同时它也是抵御外国侵略的最可靠的保障，而且在事

实际上使所有其他国家也不可能维持耗费资财的军事机器：它使农民免除了血税和那要求无止境地增加一切国税和国债的根源。仅就这一点来说，公社就是**农民的一大幸运**，是农民解放之先声。同时废除了“独立警察”，以公社的勤务员代替这些贼匪。普选权在此以前一直被滥用，或者被当做以议会方式批准神圣国家政权的工具，或者被当做统治阶级手中的玩物，只是让人民每隔几年行使一次，来批准议会制的阶级统治（选择这种统治的工具）；而现在，普选权已被应用于它的真正目的：由各公社选举它们的行政的和创制法律的公职人员。从前有一种错觉，以为行政和政治管理是神秘的事情，是高不可攀的职务，只能委托给一个受过训练的特殊阶层，即国家寄生虫、高俸厚禄的阿谀之徒、闲职大员等高位权贵们，这个阶层从群众中吸取有教养的分子，并利用他们去反对居于等级社会下层的群众自己。现在这种错觉已经消除。彻底清除了国家等级制，以随时可以罢免的勤务员来代替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们，以真正的负责制来代替虚伪的负责制，因为这些勤务员经常是在公众监督之下进行工作的。他们所得的报酬只相当于一个熟练工人的收入，每月 12 英镑，最高薪金每年也不超过 240 英镑；根据一位科学界权威赫胥黎教授的估计，这种薪金只略高于伦敦国民教育局秘书工资的五分之一。所谓国家事务的神秘性和特殊性这一整套骗局被公社一扫而尽；公社主要是由普通工人组成，它组织着巴黎的防务，对波拿巴的御用军队作战，保证这座庞大城市的粮食供应，担负着原先由政府、警察局和省政府分担的全部职务，在最困难、最复杂的情况下，公开地、朴实地做它的工作；它象密尔顿写他的《失乐园》一样所得的报酬只是几英镑；它光明正大地进行工作，不刚愎自用，不埋头在文牍主义的办公室里，不以承认错误为耻而勇于改正。公社一举而把所有的职务——军

事、行政、政治的职务变成真正工人的职务，使它们不再归一个受过训练的特殊阶层所私有。（在内战和革命的紊乱情况中维持秩序）（采取措施以求全面的振兴）。不管公社的个别措施的价值如何，公社的最重要的措施就是它本身的组织，这个组织是在同时面临外国敌人和阶级敌人威胁的情况下未经准备就成立的，公社以它的存在表现了它的活力，以它的行动证实了它的理论。它的出现就是对征服法国的胜利者的一个胜利，已被俘获的巴黎英勇地一跃而重新取得了欧洲的领导地位，而这个领导地位并不是依靠野蛮的暴力取得的，而是由于巴黎率先领导起社会运动，体现了世界各国工人阶级的愿望。

如果所有大城市都按照巴黎的榜样组成公社，那末，任何政府都不可能以猝不及防的反动行动来镇压这个运动。甚至通过这一初步行动，就可以赢得培育实力的时间，使运动胜利得到保证。全法国都会组织起独立工作的、自治的公社；国民军会代替常备军；大批国家寄生虫会被排除；教师会代替僧侣等级；国家法官会改换为公社的机构；国民代表的选举会不再是总揽一切大权的政府玩弄手腕的事情，而是组织起来的各公社的意志的自觉表现；国家的职务会只限于几项符合于普遍性、全国性目的的职务。

这就是公社——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把劳动从垄断劳动者自己所创造的或是自然所赐予的劳动资料的那批人篡夺的权力（奴役）下解放出来的政治形式。正如国家机器与议会制只是统治阶级进行统治的有组织的总机构，只是旧秩序的政治保障、形式和表现，而不是统治阶级的真正生命，公社也不是工人阶级的社会运动，从而也不是全人类复兴的运动，而只是有组织的行动手段。公社并不取消阶级斗争，工人阶级正是通过阶级斗争致力于消灭一切阶级，从而消灭一切阶级统治（因为公社并不代表一种特殊利

益；它代表着“劳动”的解放，而劳动是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基本的、自然的条件，唯有靠篡夺、欺骗、权诈才能由少数人把它转嫁到多数人身上），但是，公社提供合理的环境，使阶级斗争能够以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经历它的几个不同阶段。公社可能引起激烈的反动和同样激烈的革命。公社以下述措施来开始解放劳动——它的伟大目标：它一方面取缔国家寄生虫的非生产性活动和为非作歹的活动，杜绝把大宗国民产品浪费在供养国家恶魔上的根源，另一方面，以工人的工资执行地方性和全国性的实际行政职务。由此可见，公社是以大规模的节约，不但以政治改造，而且以经济改革来开始其工作的。

如果公社的组织在全国范围内牢固地建立起来，它还可能要经受的灾难，就是奴隶主们的一些分散零星的暴动，这些暴动尽管暂时会阻挠和平进步的事业，但只会使社会革命加强武装，从而加速运动的发展。

工人阶级知道，他们必须经历阶级斗争的几个不同阶段。他们知道，以自由的联合的劳动条件去代替劳动受奴役的经济条件，需要相当一段时间才能逐步完成（这是经济改造）；这里不仅需要改变分配方法，而且需要一种新的生产组织，或者勿宁说是使目前（现代工业所造成的）有组织的劳动中存在着的各种生产社会形式摆脱掉（解除掉）奴役的锁链和它们的目前的阶级性质，还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和国际范围内进行协调的合作。他们知道，这个复兴事业将不断地遭到既得利益和阶级自私的反抗，因而被延缓、被阻挠。他们知道，目前“资本和土地所有权的自然规律的自发作用”只有经过新条件的漫长发展过程才能被“自由的、联合的劳动的社会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所代替，正如过去“奴隶制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和“农奴制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之被代替一样。但是，工

人阶级同时也知道，通过公社的政治组织形式，可以立即向前大步迈进，他们知道，为了他们自己和为了人类开始这一运动的时刻已经到来了。

农 民

(战争赔款)。还在公社成立之前，中央委员会就通过它的《公报》宣布：“大部分的战争赔款应该由战争的祸首们缴付。”¹⁴⁰这是“秩序人物”最害怕的“反文明大阴谋”。这是最实际的问题。如果公社得胜，战争的祸首们就必须缴付这笔赔款；如果凡尔赛得胜，那末，已经付出鲜血、遭受摧残破坏、承担费用的生产者群众就还得支付这笔赔款，而财阀们甚至还要在经办这笔生意上牟利。由谁来清偿战费，这将取决于内战。在这个切身攸关的问题上，公社不仅代表着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实际上也代表着除了**资产阶级**（富有的资本家）（富有的地主，以及他们的国家寄生虫）以外的全体中等阶级的利益。它首先代表着**法国农民**的利益。如果梯也尔和他的“地主议员”得胜的话，大部分的战税就会转嫁到他们的肩头。可是有人竟糊涂到这个地步，居然重复着“地主议员”的叫喊说：他们——大地主们——“代表农民”，这种农民当然出于心地质朴，非常急切地想为那些已经强迫他们付出了十亿赔偿金——革命赔偿金¹⁴¹的好“地主们”再缴纳几十亿战争赔款。

正是这一批人对农民增收了 45 生丁的附加税¹⁴²，用这种办法蓄意损害二月共和国的威信；不过，当时他们是用革命的名义、用革命创造的“临时政府”的名义增加这笔税的。现在，他们是以自己的名义进行反对公社共和国的内战，以便把战争赔款从他们自己的肩头上卸到农民的肩头上去！农民当然会为此而高兴的！

公社要废除征兵制，秩序党则要把这种血税牢缚在农民身上。秩序党要派税吏牢牢抓住农民，向他们索取寄生的、糜费的国家机器的费用，公社则要给他们一个廉价政府。秩序党要使城市的高利贷者继续敲骨吸髓地压榨他们，公社则要把他们从盘踞在他们那小块土地上的典押债魔手中解放出来。公社要用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而不是靠农民劳动以自肥的公社工作人员来代替吞噬着农民的主要收入的、寄生的司法人员——公证人、法警等等。公社要捣毁这个缠绕在法国农民身上的全部司法蜘蛛网，即上面伏着吸吮农民血汗的资产阶级蜘蛛——法官和区长——的司法蜘蛛网！秩序党要使他们处在宪兵统治之下，公社则要恢复他们的独立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公社要让他们在教师的教导下学到知识，秩序党则要强使他们接受僧侣的愚民统治！但是，法国农民首先是善于打算盘的人！如果神职人员的薪俸不再由税吏向他们威逼勒索，而是取决于他们自己的宗教本能的“自发行动”，他一定会认为这样非常合理！

路易·波拿巴是被法国农民选为共和国总统的，然而第二帝国是（在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下的共和国的无名统治时期）由秩序党创立的！在1849年和1850年，法国农民以自己的区长对抗政府的省长，以自己的学校教师对抗政府的教士，以自己本身对抗政府的宪兵，这样他们就开始表示出他们实际需要的是什么！秩序党在1849年、特别是在1850年1月和2月颁布的各项反动法令¹⁴³，按其实质是专门针对法国农民的！如果说，法国农民之所以选举路易·波拿巴为总统是因为他们习惯于把自己从第一次革命里获得的全部利益错误地归之于第一个拿破仑的话，那末，政变之后，法国若干省的农民的武装起义和宪兵对他们的搜捕恰恰证明：这种错觉正在迅速地破灭！第二帝国是建立在将错觉人为地培育

为力量的基础上，建立在传统偏见的基础上的，而公社则将建立在农民的切身利益和他们的实际需要的基础上。

法国农民的仇恨正在集中到地主议员、寨堡领主、榨取 10 亿赔偿金的那些人以及以土地所有主面目出现的城市资本家身上。这些人对农民的侵夺在第二帝国下进展得空前迅速，这种情况一部分是国家的人为措施所促成的，一部分是现代农业发展本身的自然结果。地主议员们知道，法兰西的公社共和国的三个月统治，可能成为农民和农业无产阶级举行反对他们的起义的信号。因此他们疯狂地仇恨公社！农民的解放对他们来说甚至比城市无产阶级的解放更加可怕。农民会很快欣然接受城市无产阶级为他们自己的领导者和老大哥。当然，在法国，象在绝大多数的欧洲大陆国家一样，在城市生产者和农村生产者之间、在工业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是存在着深刻的矛盾的。大规模的有组织的劳动，生产资料的集中，这是无产阶级追求的希望，也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物质基础，尽管目前劳动的组织是专制式的，生产资料不仅作为生产手段，而且作为剥削和奴役生产者的手段集中在垄断者的手中。无产阶级要做的事就是改变这种有组织的劳动和这些集中的劳动资料目前所具有的资本主义性质，把它们从阶级统治和阶级剥削的手段改变为自由联合的劳动形式和社会的生产资料。另一方面，农民的劳动则是孤立的，他们的生产资料是零星分散的。在这些经济差异的基础上，作为上层建筑，建立起来了一整套迥然不同的社会政治观点。但是这种农民所有制早已越过自己发展的正常阶段，即它还是一种现实存在，还是符合于社会经济需要的、使农村生产者本身处于正常生活条件中的那种生产方式和财产形式的阶段。它已经进入了自己的没落时期。一方面，从它里面已经成长起来了一支巨大的、与城市雇佣工人利益完全一致的 prolétariat

foncier (农村无产阶级)。由于农艺学的新发展,这种生产方式本身已经老朽了。最后,农民所有权本身也变得徒有其名,他们自己劳动的果实已被夺走,留给他们的不过是所有权的幻觉。大农场主的竞争、血税、国家捐税、城市典当主的高利盘剥以及缠附在他们身上的司法制度的种种巧取豪夺,把他们压低到印度农民的地位;同时,他们随时随刻遭到剥夺——甚至他们名义上的所有权也被剥夺——和被贬到农村无产者的地位。因此,造成农民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隔阂的东西已经不是农民的实际利益,而是他们的错觉偏见。如果说,公社象我们已经说明的那样,是唯一即使在其目前经济条件下也能立即给农民带来莫大好处的政权的话,那末,也只有公社这种政府形式才能够保证他们改变他们目前的经济状况;能够一方面拯救他们免遭地主的剥夺,另一方面使他们不至于为了所有权的名义而遭受榨取、苦役和贫困的煎熬;能够把他们名义上的土地所有权变成他们对自己劳动果实的实际所有权;能够使他们既享受应社会需要而产生的、而目前则作为一种敌对因素不断侵犯着他们利益的现代农艺学之利,又保留他们作为真正独立生产者的地位。他们既然能立即受惠于公社共和国,必将很快地对它产生信任。

共和联盟(共和同盟)

无秩序党在第二帝国的弊政下,达到了它统治的顶点,这个党在它的随从仆役、婆罗、国家寄生虫、侦探、“荡妇”,以及那一大群作为高等流氓的补充的下等流氓(一般刑事犯)跟随下,已离开了巴黎(从巴黎出走)。但是,中等阶级里面的真正有生力量,由于工人的革命而得以摆脱他们的伪代表,在法国历次革命的历史中第

一次和这个无秩序党分道扬镳，并且带着他们的真正特色挺身而出。这就是“共和自由同盟”¹⁴⁴，它在巴黎和外省之间起着中介作用，拒绝承认凡尔赛，并在公社的旗帜下前进。

代表着不靠他人劳动为生的 社会各阶级的公社革命

我们已经看到：巴黎的无产者是为维护法国农民而战斗，凡尔赛是为反对法国农民而战斗；“地主议员”最焦虑的是怕农民听到巴黎的声音，不能再靠封锁把两者隔离开来；归根到底，他们对巴黎作战是企图使农民继续做他们的奴隶，把农民照旧当做他们的“可以任意勒索租税的”对象。

在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公开地团结在工人革命的周围，他们宣布这个革命是拯救他们自己和拯救法国的唯一手段！他们和工人一起构成国民自卫军的主体，他们和工人在公社里一起开会，他们在共和联盟里为工人做中介人！

公社实施的主要措施是为着拯救巴黎的中等阶级即债务阶级而反对债权阶级！在六月起义（1848年）里，这个中等阶级曾集结在资本家阶级及其将军、国家寄生虫的旗帜下反对无产阶级。他们立刻在1848年9月19日由于“友好合同”¹⁴⁵被否决而受到了惩罚。对六月起义的胜利立即暴露它同时也是债主的胜利，是富有的资本家对债务人即中等阶级的胜利。他们冷酷地索取他们该得的那“一磅肉”^①。1849年6月13日，这个中等阶级的国民自卫军被解除了武装，并遭到资产阶级军队的杀戮！在第二帝国时期，

① 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第四幕第一场。——编者注

由于国家资财被滥用浪费，富有的资本家借以自肥，这个中等阶级遭受着股票经纪人、铁路大王、动产信用公司之类诈骗公司的掠夺，遭受着资本家的联合组织（股份公司）的抢劫。如果说，这个阶级在政治地位上受着贬抑，在经济利益上受着打击，那末，它在精神上则被这个制度的无耻闹宴所激怒。战争中的种种丑行使他们感到忍无可忍，激发了他们作为法国人的情感。在法国经受着这场战争带来的种种灾难，经受着民族崩溃的危机和经济破产的情况下，这个中等阶级感到：唯一能够救亡济危的是工人阶级的宏伟的志向和巨人般的力量，而不是妄想当法国奴隶主的那个腐败的阶级！

他们感到：只有工人阶级能够把他们从僧侣统治下解放出来，把科学从阶级统治的工具变为人民的力量，把科学家本人从阶级偏见的兜售者、追逐名利的国家寄生虫、资本的同盟者，变成自由的思想工作者！只有在劳动共和国里面，科学才能起它的真正的作用。

共和国只有公开宣布为社会 共和国才可能存在

正象第二帝国曾经破除了对操于国家宪兵和教士之手的无组织的“普选”的幻想一样，这次内战破除了对“共和国”的最后幻想。法国所有的有生力量都承认：在法国和在欧洲，共和国只有作为“社会共和国”才有可能存在；这种共和国应该夺去资本家和地主阶级手中的国家机器，而代之以公社；公社应该公开宣布“社会解放”为共和国的伟大目标，从而以公社的组织来保证这种社会改造。任何别种共和国只能是以跨进某种形式的帝国为其最后目标

的所有保皇党派——联合在一起的正统派、奥尔良派、波拿巴派——的无名恐怖，只能是干完了自己的肮脏事以后总要以帝国告终的阶级统治的无名恐怖！

地主议会里面的职业共和党人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对 1848—1851 年的试验、镇压巴黎的内战熟视无睹，而真心相信阶级专制的共和形式是一种可能的、持久的形式；其实，秩序党之需要共和，只是把它当做一种阴谋组织形式，用来反对共和、重建唯一适合于这个党的阶级专制形式——君主制度，或更确切地说，帝国制度。在 1848 年，这些甘愿受骗的笨蛋被推到前台，直到由于六月起义被镇压，他们为所有那些妄想当法国奴隶主的集团扫清了建立无名统治的道路时为止。1871 年，在凡尔赛，他们从一开始就被挤到后台，去给梯也尔的统治当“共和主义的”装饰品，并以他们的在场使波拿巴的将军们反巴黎的战争合法化！这些可怜虫陷于自我嘲讽而不自觉，还在 Salle des Paume（网球厅）里举行他们党的会议，来表明与他们的 1789 年前辈相比，他们已堕落到怎样的地步¹⁴⁶！他们试图通过他们的舍耳歌之流哄诱巴黎把武器交给梯也尔，试图借助赛塞手下的“秩序”国民自卫军来迫使巴黎解除武装！我们更不用谈象路易·勃朗之类的所谓巴黎的社会主义议员了。他们驯顺地忍受杜弗尔这样的人和“地主议员”对他们的侮辱，沉醉于梯也尔的“合法”权利，而且竟在匪徒面前唉声叹气，使自己备受羞辱！

工人和孔德

工人的发展现在已经越过了社会主义宗派的阶段，但不应忘记，他们从来也不曾被孔德派操纵过。这个宗派所给予国际的，不

过是大约六七个人的一个支部，这个支部的纲领被总委员会所拒绝¹⁴⁷。巴黎工人知道：孔德在政治方面是帝国制度（个人独裁）的代言人；在政治经济学方面是资本家统治的代言人；在人类活动的所有范围内，甚至在科学范围内是等级制度的代言人；巴黎工人还知道：他是一部新的教义问答的作者，这部新的教义问答用新的教皇和新的圣徒代替了旧教皇和旧圣徒。

如果说，孔德的信徒在英国比在法国受人民欢迎些，那倒不是由于他们鼓吹了他们的宗派教义，而是由于他们个人的优良品质，还由于他们接受了那些不是由他们创造的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形式，例如英国的工联和罢工。顺便提一下，这些斗争形式是被他们在巴黎的同宗道友们斥为异端的。

公社（社会措施）

巴黎工人发动了目前这次革命，并且以英勇的自我牺牲精神承担着这场战斗带来的主要打击——这并不是新鲜事。这是历次法国革命的突出特点！这只是往事的重复！革命以人民群众的名义，并且是公开为着人民群众即生产者群众的利益进行的这一点，也是这次革命和以前历次革命相同之点。这次革命的新的特点在于人民在首次起义之后没有解除自己的武装，没有把他们的权力拱手交给统治阶级的一群共和主义骗子手里；这次革命的新的特点还在于他们组成了公社，从而把他们这次革命的真正领导权握在自己手中，同时找到了在革命胜利时把这一权力保持在人民自己手中的办法，即用他们自己的政府机器去代替统治阶级的国家机器、政府机器。这就是他们的滔天大罪！工人们竟敢侵犯“一万个上层人”的统治特权，竟敢宣布他们决心破坏这种为了自己的利

益而运用着社会的有组织的国家力量的阶级专制的经济基础！使欧洲的以及美国的尊贵阶级狂怒的正是这一点；这也说明他们为什么大叫这是亵渎神圣，说明他们为什么要疯狂号召屠杀人民，要从他们的议会讲坛和他们的仆从报社发出种种辱骂和诽谤！

公社的最伟大的措施就是它本身的存在，它在闻所未闻的困难状况下工作着、行动着！巴黎公社升起的红旗实际上只是标志着巴黎的工人政府的建立！他们已经清楚地、有意识地宣告他们的目的是解放劳动和改造社会！但是他们的共和国的真正“社会”性质仅仅在于工人们管理着巴黎公社这一点！至于他们的各项措施，由于实际情况所决定，不得不主要限于巴黎的军事防卫和粮食供应！

工人阶级的一些以保护人自居的朋友们，一方面甚至对很少的几项他们认为是“社会主义的”措施（其实这些措施除了倾向之外根本没有什么社会主义的东西）也很难掩饰他们的厌恶；另一方面他们又表示满意，并企图用他们的重大发现来诱导“士绅们”同情巴黎公社。他们的大发现是：工人们毕竟是有理智的人，他们无论何时执掌政权，总是要坚决背弃社会主义的创举的！事实上，他们确实不想在巴黎成立什么法伦斯泰尔，也不想成立什么伊加利亚¹⁴⁸。真是当代的聪明人！这些对于工人阶级的真正理想和真正运动一窍不通的好心的保护人忘记了一点。所有的社会主义宗派的创始人都属于那样一个时期，那时工人阶级自己一方面还没有在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发展进程中得到足够的锻炼并被充分地组织起来，以便作为历史动力登上世界舞台；另一方面，他们取得解放的物质条件在旧世界本身内部也还没有充分成熟起来。工人阶级的贫困状态是存在着的，但是他们开展自己的运动的条件尚未具备。各乌托邦宗派的创始人虽然在批判现存社会时明确地描述

了社会运动的目的——废除雇佣劳动制度及其一切实行阶级统治的经济条件，但是他们既不能在社会本身中找到改造它的物质条件，也不能在工人阶级身上找到运动的有组织的力量和对运动的认识。他们企图用新社会的幻想图景和方案来弥补运动所缺乏的历史条件，并且认为宣传这些空想的图景和方案是真正的救世之道。从工人阶级运动成为现实运动的时刻起，各种幻想的乌托邦消逝了，——这不是因为工人阶级放弃了这些乌托邦主义者所追求的目的，而是因为他们找到了实现这一目的的现实手段，——但是起来代替乌托邦的，是对运动的历史条件的真正洞见以及工人阶级的战斗组织的日益积聚力量。但是，乌托邦主义者宣布的运动的两个最后目的，也是巴黎革命和国际所宣布的最后目的。只是手段不同了，运动的现实条件也不再掩没在乌托邦寓言的云雾之中了。因此，无产阶级的这些以保护人自居的朋友们之百般曲解这次革命所响亮地宣布的社会主义趋向，只不过是受自己无知的欺骗而已。如果这些人认为工人运动的先知们的那些乌托邦创造仍然是“社会革命”，也就是说，如果他们认为社会革命仍然是“乌托邦的”，那末过错并不在巴黎无产阶级身上。

3月20日中央委员会的《公报》：

“首都的无产者，目睹执政（统治）阶级的失职和叛卖行为，已经了解到（compris），由他们自己亲手掌握公共事务（国家事务）的领导（管理）以挽救时局的时刻已经到来。”

他们指出“资产阶级的政治无能和精神衰朽”是“法国不幸”的根源并加以痛斥。

“工人们生产一切然而享受不到任何东西，他们目睹用自己的劳动与血汗创造出来的产品堆积如山，而自己却受着贫困的折磨……难道他们永远不

许致力于自己的解放事业吗?…… 无产阶级眼看着自身的权利经常受到威胁,自己的正当企望一概被否认,祖国山河破碎,自己的一切希望归于毁灭,他们已经了解到:夺取政权 (*en s'emparant du pouvoir*) 以掌握自己的命运、保证他们的胜利,是他们必须立即履行的职责和绝对权利。”¹⁴⁹

这里说得很清楚:工人阶级的政府首先是为拯救法国,使它免于统治阶级强加于它的毁灭和腐化所必需的;夺去这些阶级(已经丧失了治理法国能力的阶级)的政权是拯救民族的必要条件。

但是,这里也说得很明白:工人阶级的政府只有致力于工人阶级自身的解放才能拯救法国,完成民族事业,因为工人阶级解放的条件同时也就是法国复兴的条件。

工人阶级的政府被宣布为劳动对劳动资料的垄断者、对资本的战争。

资产阶级的沙文主义只不过是一种虚假的装饰,它给资产阶级的种种无理要求罩上一件民族的外衣。沙文主义是借助常备军来延续国际斗争的手段,是用挑拨本国的生产者反对另一国生产者弟兄的办法以压服本国生产者的手段,是防止工人阶级的国际合作的手段,而这种合作是工人阶级解放的首要条件。在色当之后的自卫战争中,沙文主义资产阶级到处起着瘫痪作用,于是这种沙文主义(它早已成为一句空话)的真正性质就暴露出来了:表现在法国的投降上,表现在梯也尔这位沙文主义最高祭司在俾斯麦的恩准下进行的国内战争上!也表现在反德同盟的鬼祟的警察伎俩上^①,表现在投降之后巴黎城内对外国人的搜捕上。他们希望,巴黎人民(和全体法国人民)会被民族仇恨的情绪所愚弄,会被对

① 巴黎公社时期,反动的《巴黎日报》发表了诬蔑性的报道,说国际的巴黎支部依照反德同盟的意旨,开除了国际中的全体德国人。(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7 卷第 312—313 页)——译者注

外国人的蓄意迫害所迷惑，而忘记自己的真正愿望，忘记内奸！

这种蓄意挑起的运动是怎样在革命的巴黎的呼声前消散（消失）的呀！巴黎响亮地宣布了它的国际倾向——因为生产者的事业到处是一样的，他们的敌人不论属何国籍（不论穿着什么样的民族服装）也到处是一样的，——它把允许外国人加入公社当做一条原则加以宣布，它甚至把一位外国工人^①（国际会员）选入执行委员会，它下令毁除法国沙文主义的象征——旺多姆圆柱！

当资产阶级沙文主义者已肢解了法国并在外国侵略者的专断命令下行动起来的时候，巴黎的工人打击了他们本国的阶级统治者，从而痛击了外敌；他们争得了作为所有国家工人的先锋的地位，从而消除了派系集团！

资产阶级的纯正的爱国主义，对真正的各国“民族”产业所有者说来是很自然的，但是，由于他们的财政、商业和工业活动已带有世界的性质，这种爱国主义现在已只剩下一个骗人幌子。在类似的条件下，这个幌子在所有国家也会象在法国一样被戳穿。

“地主议会”的地方分权和公社

有人说，巴黎以及其他法国城市都是处在农民统治的压迫下，巴黎现在的斗争是为了从农民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从来也没有比这更愚蠢的谎言了！

作为中央所在地和集权政府机器根据地的巴黎，使农民受着宪兵、税吏、省长、僧侣和土地巨头的统治，也就是使农民受着农民敌人的专制统治，使农民的全部生计被剥夺（将他们置于死地）。它

^① 列奥·弗兰克尔。——编者注

取缔了农业地区的一切独立生活的机构。另一方面，以巴黎为大本营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把外省的全部权势既然这样交给了政府、土地巨头、宪兵和僧侣，这些人就利用这种权势为政府和政府所代表的阶级服务，不去反对政府、寄生虫、资本家、懒虫的那个充当着世界妓院的巴黎，而去反对工人和思想家的巴黎。这样，由于存在着以巴黎为基地的政府集权，农民就受着政府的和资本家的巴黎的镇压，而工人的巴黎则受着操在农民的敌人手中的外省权力的镇压。

凡尔赛的《通报》(3月29日)宣称：

“巴黎不能是一个自由的城市，因为它是首都。”

这倒是实话。巴黎这个统治阶级及其政府的首都，不能是一个“自由的城市”；各省因为有着这样一个巴黎作首都，也不能“自由”。只有有了巴黎公社，各省才能自由。**秩序党**之所以如此疯狂地痛恨巴黎，首先是因为巴黎宣布了自己摆脱秩序党及其政府的统治，其次才是因为巴黎用这种行动发出了使农民以及各省摆脱秩序党统治的信号。

公社《公报》，4月1日：

“三月十八日革命不是以保证巴黎获得一个民选的、但仍处在一个十分集中的全国政权的专制控制下的公社代表机构作为唯一的目的。它要为法国所有的市镇争得和确保独立，也要为所有更高的地方单位——省、大行政区——争得和确保独立，这些地方单位将为了它们的共同利益联合在一个真正的民族公约之下；它要保障共和国，并使之长存……巴黎放弃了它的表面上大权独揽的地位，——这种大权独揽事实上是巴黎滥用权力，——但它并没有放弃它的道义力量和思想影响，这种道义力量和思想影响已使它的宣传工作在法国和欧洲屡获胜利。”¹⁵⁰

“这一次，巴黎再度为着整个法国而工作和忍受苦难；它进行战斗，作出牺牲，以此准备着法国的思想、道德、行政、经济的复兴，法国的光荣和繁荣。”
(用气球发出去的巴黎公社的纲领)¹⁵¹

梯也尔先生在巡游各省的时候，安排了选举事宜，首先是安排他自己在各地的选举。但是有一桩困难。外省的波拿巴派当时已不中用。（而且，他不需要他们，他们也不需要他。）很多奥尔良派的老角色也与波拿巴派同流合污了。因此必须求援于乡居的正统派地主。他们一直不问政治，正是易受愚弄之辈。就是这批人赋予了凡尔赛议会以它的类似路易十八的“无双议院”的明显性质，它的“地主议会”的性质。由于虚荣心的驱使，他们当然相信，随着波拿巴的第二帝国的崩溃，在外国侵略者的庇护下，他们的时机终于又象 1814 年和 1815 年那样到来了。可是，他们仍然只是受人利用的工具。随他们怎样行动，他们也只能象 1848—1851 年一样，作为秩序党的一分子以及它的“无名的”恐怖主义的工具而行动。他们所发表的带有自己党派特点的狂语不过为上述那种结伴合伙增添滑稽性质而已。因此，他们只好容忍贝里公爵夫人的监狱助产婆当他们的首领，容忍国防政府中的假共和主义者当他们的部长。他们的任务一旦完成，就会被一脚踢开。但是——这是历史的恶作剧——由于各种情况的这种奇异配合，他们不得不向巴黎进攻，惩罚它的背叛“统一而不可分的共和国”（这是路易·勃朗的说法，梯也尔称之为法兰西的统一）；可是他们自己的头一项举动恰恰是背叛统一，因为他们声称要“砍去巴黎的头颅和取消它的首都称号”，并要把议会设在一个外省城市里。其实，他们真正希望的是：恢复中央集权制国家机器出现以前的情况，多少摆脱这个国家机器的省长和部长的约束，而代之以封建主寨堡在本省和本地的领主权势。他们所要的是一种反动的法兰西**地方分权**。而巴黎所要的却是：以法国社会本身通过公社组织而取得的政治统一去代替曾起过反封建作用的中央集权制，这种中央集权制现在已经变成为只是人为机体的统一，它依靠着宪兵和红黑军队，压制着现实

社会的生活，象梦魔一样骑在社会头上，用孤立巴黎、排斥外省的办法给予巴黎一个“表面上大权独揽”的地位。巴黎就是要用前述的政治统一去代替这种存在于法国社会之外的中央集权的法国。

因此，真正主张破坏法国统一的是那些“地主议员”，他们反对统一的国家机器，因为统一的国家机器损害了他们在地方上的权势（领主权利），因为统一的国家机器是和封建制度相对抗的。

巴黎所要的则是破坏那种人为的单一制，因为它是和法国真正的有生命力的统一相对抗的，因为它无非是阶级统治的一种手段而已。

孔德派的观点

对现存经济制度完全无知的人，当然更不能理解工人为什么要否定这种制度。他们当然不能理解，工人阶级企图实现的社会变革正是目前制度本身的必然的、历史的、不可避免的产物。他们以遗憾的口吻谈论消灭“财产”的威胁，因为在他们看来，他们现在的财产的阶级形式——一种过渡性的历史形式——就是财产本身，因而消灭这种财产形式就是消灭财产。正象他们现在为资本统治的“恩德”和雇佣劳动制度进行辩护一样，如果他们生在封建时代或奴隶制度时代，他们会同样地把封建制度和奴隶制度当做建立在事物本性基础上的制度、当做自发地成长起来的自然产物而加以保卫；他们也会猛烈抨击这些制度的种种“弊端”，但同时他们会由于自己极端无知而用什么这些制度是“永恒的”，是有“道德节制”（“限制”）加以纠正的说教，来反驳预言这些制度将被消灭的主张。

他们对巴黎工人阶级的目的的理解的正确程度和俾斯麦先生

一样，俾斯麦曾宣称：公社所要建立的是普鲁士式的城市组织。

可怜的人们！他们甚至不知道，财产的任何一种社会形式都有各自的“道德”与之相适应，而那种使财产成为劳动附属品的社会财产形式，绝不会制造个人的“道德限制”，而会将个人的“道德”从阶级束缚下解放出来。

人民革命的气息使巴黎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二月革命曾被唤做痛恨道德堕落的革命。人民以“打倒大窃贼！打倒杀人犯！”的呼声宣布这次革命。这是人民的情感。至于资产阶级，他们却要求贪污有更广阔的场所！在路易·波拿巴（小拿破仑）的统治时期，他们的这种要求得到了满足。巴黎这个巨大的城市，这个具有历史首创精神的城市，被弄成了世界上所有懒虫和骗子手的安乐窝，弄成了一个世界妓院！在“上等人”出走以后，工人阶级的巴黎才重新现身，巴黎是英勇的，富于自我牺牲的精神，对自己的巨大任务满怀热情！陈尸场上一具尸体也没有，街道上平安无事。巴黎界内从来没有这样平静过。巴黎的英勇妇女代替了荡妇！刚毅的、坚定的、战斗着、劳动着、思想着的巴黎！雄伟豁达的巴黎！鉴于敌人的野蛮暴行，巴黎只不过使敌俘无力伤人而已！巴黎所决不愿再容忍的，是荡妇和轻薄少年的存在。它决心驱逐或改造这批曾经掌握这座巨大城市并且把它据为私有的、无用的、多疑的、自私的败类。任何第二帝国的头面人物将无权再说这样的话：“巴黎的最好的街区其乐融融，但是其他街区里贫民太多。”

（4月23日《真理报》）：

“巴黎的犯罪案件惊人地减少了。小偷和荡妇没有了，暗杀和路劫没有了；所有的保守分子都逃到凡尔赛去了！”

“自从公民自己担任警察职务以来，即使是在最地僻人稀的街区也没有一次夜间抢劫事件报案。”

“片 断”

梯也尔论地主议员

这个党

“只会使用三种手段：外敌入侵、国内战争和无政府状态…… 这样一种政府永远不会成为法国的政府”（1833年1月5日众议院）。

国 防 政 府

就是这个特罗胥在他的著名纲领里说：“巴黎总督是永远不会投降的”；茹尔·法夫尔在通告里说：“决不会让出我们碉堡上的一块石头，决不会让出我们的一尺领土”；杜克罗也这样表示：“或死或胜，不然誓不回见巴黎”。后来杜克罗在波尔多发觉，原来他那条命还必须用来镇压巴黎“叛乱者”（这些坏蛋知道，他们在逃往凡尔赛的时候，没有把自己的各种罪证带走，为了消灭这些罪证，他们不惜把巴黎变为淹没在血海中的一堆瓦砾）。（用气球发出去的告各省宣言¹⁵²）

“迄今由帝国制度、君主制度和议会政府所强加于我们的统一，无非是专制的、违背理智的、横暴的、苛敛无厌的中央集权制度。巴黎所要的政治统一是由所有地方的起首创作用的力量的自愿联合……”所有的联合起来的公社的一种中央代表组织。“结束那属于政府和僧侣的旧世界，结束军阀统治、官僚制度，结束利用专利与特权投机取巧的行为——正是由于这一切，无产阶级才沦于奴隶地位，国家才遭受种种不幸和灾难。”（4月19日公社公告）¹⁵³

宪兵和警察

20 000 名宪兵(由法国全国各地调到凡尔赛来的，在第二帝国时总共有 30 000 名)和 12 000 名巴黎警察，这就是法国从来未有过的最精锐的军队的基干。

巴黎的共和派议员

“巴黎的共和派议员既没有对炮轰巴黎提出抗议，也没有对就地处决俘虏和中伤诬蔑巴黎人民提出抗议。相反，他们以出席议会，保持沉默，去为所有这些行为捧场，以他们作为共和派所享有的威信去支持这些行动。他们已变成了保皇党的同盟者和自觉的帮凶。我们宣布他们出卖了他们的代表当选证书，出卖了共和国。”(共和国保卫者总协会154)(5月9日)

“中央集权使巴黎陷于瘫痪，使所有其他各地丧失生气。”(拉梅耐)

“今天，一切都归于一个中心，而这个中心，可以这样说，就是国家本身。”
(孟德斯鸠)155

旺多姆广场事件，等等

由各连推举代表组成的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在普军进入巴黎时，把国民自卫军自己募款铸造的大炮和多管炮运到蒙马特尔、伯利维尔和拉-维勒特。这些大炮和多管炮被国防政府恰好遗弃在普鲁士人即将占领的街区。

3月18日清晨，政府向国民自卫军强烈呼吁，但是40万名国民自卫军中只有300人响应。

3月18日晨3时，警察和几营常备军到达蒙马特尔、伯利维尔、拉-维勒特，准备突袭看守大炮的警卫兵，用强力夺取大炮。

国民自卫军进行了抵抗。常备军士兵不顾勒康特将军的威胁和命令把枪托高举到空中，当天，勒康特和克列芒·托马在同一个

时候被部下士兵们枪毙。

(“常备军士兵把枪托高举到空中，和起义者携起手来。”)

奥雷耳·德·帕拉丹的告捷书已经印好，关于在巴黎准备 décembrisation^① 的文件也已被发现。

3月19日，中央委员会宣布解除巴黎戒严状态；20日，皮卡尔宣布塞纳一瓦瑟省处于戒严状态。

3月18日(晨：他仍相信自己可以获胜)张贴在墙上的梯也尔公告宣称：

“政府已决定采取行动。擅自企图建立政府的罪犯必须依法究办，被夺去的大炮必须交还军械库。”

到傍晚，由于夜袭已经失败，他就向国民自卫军呼吁：

“政府并不准备进行一次政变。共和国政府除了共和国的安全外，没有也不可能有其他的目的。”

他只是要

“取缔叛乱委员会”……“他们几乎全部都是居民不熟悉的人。”

深夜，由皮卡尔和奥雷耳签署致国民自卫军的第三个公告宣称：

“一些被引入迷途的人们……顽强抵抗国民自卫军和军队…… 政府决定让你们保持你们的武器。坚决地紧握着武器，以便建立法纪，挽救共和国，使它免于陷入无政府状态。”

(17日，舍耳歇企图诱使他们解除武装。)

3月19日中央委员会公告：

“戒严状态已解除。兹召集巴黎人民进行公社选举。”

中央委员会在同一文件中告诉国民自卫军：

① 意即1851年12月2日式的政变。——编者注

“你们曾责成我们组织巴黎的防御，保卫你们的权利……此刻我们的当选证书已告期满；我们将它交还给你们，我们不愿意占据那些被民愤刚推翻的人的位置。”¹⁵⁶

他们让政府成员安然地向凡尔赛撤退（甚至包括那些已在他们掌握中的人，如费里）。

原定于3月22日举行的公社选举，由于秩序党的示威，延期至3月26日。

3月21日，国民议会狂呼反对在《致公民和军队（士兵）》的公告结尾处写上“共和国万岁！”的字样。梯也尔：“这可能是一个很合法的提议”云云（“地主议员”的异议）。茹尔·法夫尔大声疾呼，反对共和国高于普选权的说法，向“地主议员”的多数献媚，用普鲁士的干涉来威胁巴黎人民，并挑起——秩序党的示威。梯也尔：“无论如何，他不会派遣武装力量去攻击巴黎。”（当时做不到，因为还没有军队。）

中央委员会对于自己的胜利是如此无把握，以致他们急切地接受了巴黎的区长们和代表们的调停……梯也尔的固执使它（委员会）多维持了一两天，而这时委员会认识了自己还有力量。革命者犯了无数错误。他们不去解除警察的武装，反而给他们打开大门；他们奔向凡尔赛，在那里被当做救星来欢迎；让第四十三常备团撤离巴黎；把所有和人民联欢的士兵都遣散回家；允许反动派就在巴黎中心组织起来；不去惊动凡尔赛。特里东、雅克拉尔、瓦尔兰、瓦扬认为必须立刻赶走保皇派……法夫尔和梯也尔拼命向普鲁士当局乞求援助……以便镇压巴黎的起义运动。

特罗胥和克列芒·托马一心一意想阻挠国民自卫军加强武装、加强组织的一切试图。中央委员会已决定准备向凡尔赛进军并开始行动，这件事公社并不知道，甚至是和公社明确表示的意愿

直接违背的……

贝热瑞……由于蒙瓦勒里安以及设在库尔贝瓦的炮台，公社士兵不能固守住讷伊桥，但他不把这座桥炸毁，结果保皇派得以占领这座桥，在那里加强防御工事从而保持一条通向巴黎的交通路线……

正如**李特列**先生在一封信里所说（4月20日《每日新闻》）：

“既然巴黎被解除了武装，既然巴黎被维努亚、瓦伦顿、帕拉丹之流缚住了手脚，共和国已被断送了。巴黎人已了解到这点。面临着不战而降和冒险投入一场结果难料的可怕斗争的抉择，他们宁愿战斗；而我不得不为此对他们表示钦佩。”

向罗马进军，是卡芬雅克、茹尔·法夫尔和梯也尔干的事情。

“一个具有共和政体一切内部优点和君主政体外部力量的政府。我指的是**联邦共和国**……这是一个由许多社会组成的新社会，它能够随着新加入的成员的数目的增加不断扩大，直到它的力量增强到足以保证其成员的安全。这类共和国……能够维持其巨大规模，内部也不会腐化。这种社会的形式能防止一切困难。”（**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第9章第1节）157

1793年宪法158：

第七十八条——共和国每一市镇设市镇行政机关；每一专区设中介行政机关；每一省设中心行政机关。**第七十九条**——市镇官吏由市镇会议选出。**第八十条**——地方行政官吏由省的和专区的复选人会议选任。**第八十一条**——市镇政府和行政机关每年更换其成员的半数。

执行委员会。第六十二条——由二十四名委员组成。**第六十三条**——每省的复选人会议选出一名候选人。立法团从总名单中选择委员会成员。**第六十四条**——执行委员会在每届立法团任期的最后一个月的会议上更换其成员的半数。**第六十五条**——执行委员会负责领导和监督总政务。**第六十六条**——执行委员会在其成员之外任命负责共和国总政务的首脑官吏。**第六十八条**——这些首脑官吏并不组成一个委员会，他们是分立的，彼此间没有直接的联系；他们没有任何个人权力。**第七十三条**——执行委员会可将其所任命的官吏免职和撤换。

巴黎的秩序党一方面受到了茹尔·法夫尔在国民议会中发出内战号召的鼓动——他说普鲁士人已提出威胁：如果巴黎人不立刻投降，就要进行干涉——另一方面又看到了人民对他们的忍耐和中央委员会对他们采取的消极态度，因而大胆决定进行一次奇袭；于是他们就在 3 月 22 日在和平游行——反对革命政府的和平示威的幌子下，闹了起来。这的确是一次奇特无比的和平示威。

“整个运动好象是突如其来。对它事先毫无防备。”

“一群吵吵闹闹的绅士们”，在他们的前列有埃克朗、科特洛贡和昂利·德·佩恩等这样一些帝国猪仔，这一群人对个别的国民自卫军哨兵（岗哨）横加侮辱并勒令缴械，哨兵们奔回旺多姆广场，国民自卫军立刻从广场开向新小街。与骚动者相遇时，他们奉命不得开枪，而骚动者却叫喊着“打倒杀人犯！打倒委员会！”前进，侮辱国民自卫军，夺取他们的枪枝，用手枪向公民马尔儒纳尔（旺多姆广场参谋部的中尉）（中央委员会委员）射击。贝热瑞将军要骚动者撤退（解散、后退）。大约经过五分钟的击鼓和 sommations（相当于英国的宣读骚扰取缔令）。他们以诬蔑的叫嚣作答。两名国民自卫军受重伤倒下。这时，他们的战友们还犹豫不决，向天空开枪。骚动者企图强行冲破警戒线，并解除他们的武装。贝热瑞下令开枪，那些胆小鬼就飞奔窜逃。骚动立即被粉碎，射击也停止了。有人从几所房子里向国民自卫军开枪。两人——瓦兰和弗朗斯瓦——被打死，八人受伤。在那些“和平人士”作鸟兽散的街道上，到处都抛弃有手枪和手杖刀（在和平街上可以拾到许多）。莫利奈子爵从背后（被他自己的人）击毙，身上还发现有一柄用链条系住的匕首。

集合的军鼓敲过了。在这次“徒手”示威通过的街道上扔着许多手杖刀、手枪、匕首。在起义军未接到向这群人开枪的命令以

前，对方已用手枪射击。示威者就是进犯者（谢里敦将军从窗口亲眼看到这种情况）。

这不过是用手枪、手杖刀和匕首武装起来的巴黎反动派企图达到维努亚以他的市警、士兵、大炮和多管炮所没有达到的目的。巴黎的“下等人”竟然不让巴黎的“绅士们”解除他们的武装，这真是太糟了！

1849年6月13日，当巴黎国民自卫军为了抗议法国军队进攻罗马的罪行，举行一次真正“徒手的”、“和平的”示威游行的时候，尚加尔涅将军用刀斩、枪击的手段对付他们，他的密友梯也尔对他倍加称赞。宣布了戒严，新的镇压法令，新的流放，一个新的恐怖统治！中央委员会和巴黎工人不去做这些事，却在这次冲突中严格地保持守势，允许袭击者（带着匕首的绅士们）安静地回家去；由于纵容了他们，又没有向他们追究这次冒险行动的责任，以致他们胆大到竟敢在两天以后，在凡尔赛派来的海军上将塞塞指挥下，又一次纠合起来，再度试图发动内战。

而这次旺多姆事件却在凡尔赛激起了一阵响彻全世界的“屠杀赤手空拳的公民”的叫喊。请注意，甚至梯也尔，尽管他老是谈论两个将军被杀害事件，但一次也不敢向外界提起这次“屠杀赤手空拳的公民”的事件。

正象在中世纪那样，只许骑士对平民使用任何武器，而不许平民进行自卫。

（3月27日。凡尔赛。梯也尔：

“有人指责我在谋求建立君主制，我正式否认。当我就职时，共和国已是一个既成事实。在上帝和人面前，我宣布我决不出卖它。”）

在秩序党第二次暴动后，巴黎人民没有采取任何报复行动。中央委员会甚至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不听它那些最有毅力的成

员的劝告，没有立即向凡尔赛进军，而凡尔赛当时在海军上将塞塞逃亡和秩序党的国民自卫军可耻失败以后，正惊慌失措，乱成一团，因为那里还没有组织起任何抵抗力量。

在公社选举时，秩序党通过投票又进行了较量，他们在再度失败之后，完成了从巴黎的大出走。在选举进行中，资产阶级分子（在区政府院子里）与国民自卫军起义者握手言欢，但他们私下所谈的不外是“大批处决”、“多管炮”、“放逐到凯恩去受煎熬”、“集体枪杀”。

“昨天的逃窜者今天想用甜言蜜语把市政厅中的人们稳住，以待聚集在凡尔赛的地主议员们和波拿巴的将军们有足够力量对他们开火。”

梯也尔通过**4月2日**事件第二次对国民自卫军开始了武装攻击。战斗在靠近巴黎的库尔贝瓦和讷伊之间进行。国民自卫军被打败，讷伊桥被梯也尔士兵占领。从巴黎出击并一度占领库尔贝瓦、皮托、讷伊桥的几千名国民自卫军失利。许多人被俘。许多起义者被当做叛逆立即枪杀。凡尔赛军队首先开的火。

公社：

“凡尔赛政府已向我们进攻。它不可能指靠军队，所以派遣了沙列特的教皇的朱阿夫兵、特罗胥的布列塔尼兵、瓦伦顿的宪兵去轰击讷伊。”¹⁵⁹

4月2日，凡尔赛政府派出了主要是由**宪兵、海军陆战队、林警、警察**组成的一师军队。维努亚率领两个步兵旅、加利费率领一个骑兵旅和一个炮兵连向库尔贝瓦推进。

巴黎。**4月4日**。米里哀尔。（声明）

“巴黎人民没有任何进攻意图……这时政府命令由前帝国士兵组成的御用军队，在前参议院议员统率下向巴黎进攻。”¹⁶⁰

《法兰西内战》二稿

(1) 国防政府。巴黎的议员特罗胥、 法夫尔、皮卡尔、费里

巴黎工人在 9 月 4 日宣告成立的共和国，受到了法兰西举国一致的欢迎。以巴黎的抵抗为基础（核心）的五个月的防御战争，为共和国争得了存在的权利。如果没有这次以共和国名义进行的防御战争，征服者威廉^①是会恢复他的“好兄弟”路易·波拿巴的帝国的。在巴黎工人阶级的真正领袖们还囚禁在波拿巴的监狱里，而普鲁士军队已经逼近巴黎的惊慌无备的时刻，有一伙律师——梯也尔是他们的政治家，特罗胥是他们的将军——擅自在市政厅里就职。梯也尔、茹尔·法夫尔、皮卡尔之流在当时是这样地深信巴黎负有领导法国的历史使命，他们竟举出了他们曾在 1869 年被选入立法团的事实，来证明他们有资格组成国防政府。

在这伙人上台五天以后，我们在关于前次战争的第二篇宣言中已经向你们说明他们究竟是些什么货色了^②。如果说，他们没有征询巴黎的意见就攫取了政府，那末，巴黎也没有理会他们的抗拒而径自宣布成立了共和国。而他们的第一个步骤就是派梯也尔去向欧洲各国的宫廷乞求，如果可能，就以废共和国、立国王为交换

① 指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法国历史上曾有一个“征服者威廉”，于 1066 年征服英国，马克思在这里作了讽刺性的对比。——译者注

② 见本书第 26—27 页。——译者注

条件来买得外国的调解。巴黎之所以容忍这些人的统治（容忍他们僭取政权），是因为这些人曾郑重其事地宣誓保证：只为国防的目的运用这个政权。然而，要认真保卫巴黎，就只有（不能不）武装工人阶级，把他们组织成为国民自卫军，并使他们在战争中得到锻炼。可是，武装巴黎就无异是武装社会革命。巴黎战胜普鲁士人就无异是共和国战胜法国的阶级统治。国防政府在民族义务和阶级利益二者发生矛盾的时候，没有片刻的犹豫便把自己变成了卖国政府。茹尔·法夫尔在给甘必大的一封信里承认，特罗胥防御的不是普鲁士的士兵，而是巴黎的工人。巴黎被围四个月以后，他们认为开始谈论投降的适当时机已经到了；于是特罗胥当着茹尔·法夫尔及其他同僚的面，向巴黎区长会议讲了如下一席话：

“我的同僚们在9月4日当晚向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巴黎有没有些许可能抵住普鲁士军队的围困？我当时毫不迟疑地做了否定的答复。现在在座的同僚中，有几位会证明我说的是实话，并且我一直是坚持着这个看法。我那时对他们就是这样说的：在目前的情况下，巴黎要打算抵住普鲁士军队的围困，那简直是一件蠢举。当然，我当时加了一句，这可能是一件英勇的蠢举，但终究不过是蠢举而已……事变的发展（由他自己安排的）并没有推翻我的预断。”

（特罗胥的这篇简短的演讲词，在停战以后由当时在场的一位区长科尔崩先生公布了）。可见，还在共和国宣告成立的当天晚上，特罗胥的同僚已经知道他的“计划”不过是使巴黎和法国投降而已。为了治好巴黎爱干“英勇蠢举”的毛病，他们要使巴黎经受血腥屠杀和饥馑的痛苦，并且要使这段时间延续到掩护这些9月4日的篡位者不致再遭十二月分子报复的时候。如果“国防”并不单是“政府”的虚伪幌子，那末这些擅自就职的政府成员在9月5日就应该引退，公开宣布特罗胥的“计划”，叫巴黎人民或者立即向征服者投降，或者自己掌握防务。这些骗子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发表

了一些冠冕堂皇的宣言，说特罗胥这位“总督是永远不会投降的”，外交部长茹尔·法夫尔“决不会让出我们碉堡上的一块石头，决不会让出我们的一尺领土”。在整个巴黎被围期间，特罗胥的计划有步骤地被付诸实现。实际上，被任命统率巴黎军队的那些万恶的波拿巴强盗们，在私人通信中厚颜无耻地讥嘲他们深悉内幕的这种可笑防御（例如参看公社《公报》上公布的巴黎卫戍军炮兵司令、荣誉军团大十字勋章获得者阿尔丰斯·西蒙·吉奥写给炮兵师将军苏桑的信）。在巴黎投降的时候，骗子们揭下了假面具。“**国防政府**”暴露了自己（现了原形）：它是“由俾斯麦的俘虏组成的法国政府”——甚至连路易·波拿巴在色当投降时也认为充当这种角色对他那号人说来都太无耻了。这批投降派在三月十八日事变以后仓皇逃往凡尔赛，把一些证明他们卖国勾当的文件遗落在巴黎手中，正如公社在**对外省的宣言**中所指出的那样，为了销毁这些文件，

“他们会不惜把巴黎变为淹没在血海中的一堆瓦砾”¹⁶¹。

国防政府的一些最有影响的成员之所以热衷于谋求这种结局，还有一些十分急切的个人利害的考虑。只看看茹尔·法夫尔、厄内斯特·皮卡尔和茹尔·费里吧！

在停战协定签订以后不久，国民议会的一位巴黎议员米里哀先生公布过许多确凿的法律文件，证明茹尔·法夫尔在与一个住在阿尔及尔的酒徒的妻子姘居时，前后若干年间大胆地拼凑伪造了一套文据，以他的一些私生子女的名义谋得了一大笔遗产，因而变成了一个财主；后来在合法继承人提出诉讼时，只是因为波拿巴的法庭偏袒他，他的伪证才没有被揭穿。既然无论花多大力气进行诡辩也抹杀不了这些铁面无情的法律文件，于是茹尔·法夫尔本着同样的自我诅咒的英雄精神，闭了一次嘴，直到内战的动乱

给他机会，他才在凡尔赛议会里大骂巴黎人民是一群擅敢反叛家庭、宗教、秩序和财产的“逃犯”！

（皮克事件）就是这个伪证制造犯，刚一握权，就立即出于同情释放了两位同行兄弟皮克和泰费尔。这两个人甚至在第二帝国时代就已经因为犯盗窃和伪造文件罪而被判处苦役，其中的一个泰费尔竟敢在公社成立以后回到巴黎，不过立刻就被送回到适合于他的地点。而这时候，茹尔·法夫尔却对全欧洲说，巴黎正在释放它的监狱里的所有罪犯！

厄内斯特·皮卡尔钻营路易·波拿巴的内务大臣没有成功，在9月4日自封为法兰西共和国的内务部长。他是一个叫做阿尔图尔·皮卡尔的人的哥哥。那个阿尔图尔·皮卡尔曾因诈骗钱财而被逐出巴黎交易所（见1867年7月31日巴黎警察局的报告），并且在任动产信用公司的一个分公司经理期间盗用过30万法郎，因而根据他的自供被判了罪（见1868年12月11日巴黎警察局的报告）。这两份报告在第二帝国时代就已经公布过了。厄内斯特·皮卡尔正是把这个阿尔图尔·皮卡尔指派为他主办的《自由选民》的主笔，在整个巴黎被围困期间把他这位兄弟当成他的财务纤手；阿尔图尔利用厄内斯特掌握的国家机密在交易所里大发横财，万无一失地利用法国军队的节节败退进行投机活动，同时用内务部机关报《自由选民》^①上发表的失实新闻和官方谎言蒙哄交易所的一般投机分子。这一对宝贝兄弟的全部财务信件都已落到公社手里了。难怪乎当第一批被俘的巴黎国民自卫军在凡尔赛受到比埃特里的“羔羊们”的残暴至极的虐待时，厄内斯特·皮卡尔这个凡尔赛政府中的约·密勒“双手插在裤袋里，在一群一群的俘虏

^①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定稿中作了订正：厄内斯特·皮卡尔是国防政府的财政部长；《自由选民》是财政部的机关报（见本书第36页）。——编者注

中间踱来踱去，恣意拿他们耍笑”了。

茹尔·费里在9月4日以前是个一文不名的律师，在被围期间以巴黎市长的身份巧妙地利用城内的饥馑刮了大批钱财，而这种饥饿情况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他的乱政失职造成的。文件证据现在已经落在公社手中。当他将来不得不报告他乱政失职的那一天，就会是他受裁判的一天。

因此，这些人之所以成为工人的巴黎的死敌，不仅因为他们是统治阶级的寄生虫，被围期间的巴黎叛卖者，而且首先因为他们是一些普通的罪犯，这些罪犯只能够在巴黎这个法国革命的堡垒变成废墟时，才有希望得到假释证。这些亡命之徒最适合当梯也尔的部长。

(2) 梯也尔、杜弗尔、普野-克尔蒂约

从“议会意义”上说，事物只是发表议论的借口，用来陷害对手，伏击人民，或者作为演说者本人卖弄技巧的题目。

这方面的能手梯也尔先生，这个邪恶的侏儒，将近半世纪以来一直受法国资产阶级倾心崇拜，因为他是这个资产阶级的阶级腐败的最完备的思想代表。还在他成为国家要人以前，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就已经显出他的说谎才能了。象所有的矮人一样，他渴望着炫耀自己，贪求名利地位；他智力贫乏，却富于奢想；追求享乐，怀疑一切；他渊博机敏，善于掌握(学到)事物的表面，并借此发挥大套废话；他是才能少见的辩客，浅薄透顶的作者；玩弄政治小骗局的专家，背信弃义的老手，议会党派斗争中的细小权术、阴谋诡计和卑鄙奸诈的巨匠；他只有民族偏见和阶级偏见而没有思想，只有虚荣心而没有良心；为了绞杀革命，他时刻准备排挤对手，枪

杀人民；当处于反对派地位时，他恶毒阴险；一旦执掌大权，他面目可憎；要挑起革命时，他不择手段；此人的社会活动史也就是他的国家的灾难编年史。这个矮子喜欢在欧洲面前挥舞拿破仑第一的宝剑，他在自己的历史著作中就是一味替拿破仑第一擦靴子的。他的对外政策，从 1841 年的伦敦公约起到 1871 年的巴黎投降和目前这场他在普鲁士侵略者庇护下进行的内战止，始终是把法国引到极端屈辱的地步。不言而喻，对这样一个人来说，现代社会中比较深刻的变动，始终是一部天书；他那副头脑的全部精力都用来耍嘴皮了，所以甚至连社会表面发生的最明显的变化也不能理解。例如，他不倦地把一切违反法国陈旧的保护关税制度的东西指责为渎犯神明。他在当路易-菲力浦的大臣时，曾经嘲骂铁路是荒诞的怪物；而在路易·波拿巴时代，他把对法国陈腐的军事制度的任何改革都斥为大逆不道。虽然他有些随机应变的本事，虽然他的主张反复无常，但他冥顽不化地死守着陈规旧例的传统；他在多年的官场生涯中，从来没有办过一件哪怕是极微小的稍有实际益处的事情。恐怕只有旧世界才会因为自己的大厦顶上冠有小拿破仑和小梯也尔这样两个人物而感到骄傲。在这种人身上，所谓文化成就只不过表现在精心讲求荒淫生活和……^① 自私自利上。

曾在复辟时期同共和党人混在一起的梯也尔，靠着充当对付贝里公爵夫人的密探和监狱助产婆而博得了路易-菲力浦的宠信，但是当他第一次当上大臣时（1834—1835 年），他的活动的中心内容还是在特朗普南街屠杀起义的共和党人和制订取缔报刊的残暴的九月法令¹⁶²。

1840 年 3 月，他再度出任首相，提出了加强巴黎防务的计划。

^① 原稿此处漏字。——编者注

在共和党对这个危害巴黎自由的恶毒企图提出抗议时，他回答道：

“什么话？你们竟以为一加强城防就会危害自由！你们首先就是存心毁谤，竟以为有某一个政府为了保持政权而企图在某个时候轰击首都……这样一个政府在胜利后将会比在胜利前更难立足一百倍。”

是的，除了梯也尔先生本人和他的那些持假释证的部长以及象畜性般的“地主议员”的政府以外，再没有哪一个法国政府敢这样干了！而且干得这么典型，把一部分设防工事交到普鲁士战胜者和庇护者手里。

1848年1月，当炮弹国王^①在巴勒摩城动手的时候，梯也尔在众议院中发表了演说：

“诸位先生！你们都知道在巴勒摩发生的事情。当你们听说有一个大城市竟被连续轰击了48小时之久，你们大家都感到震恐（在‘议会’的意义上）。究竟是被谁轰击的呢？是被行使战争权利的外敌轰击的吗？不是的，诸位先生，是被它自己的政府轰击的。”

（如果是被自己的政府在外敌注视和纵容之下轰击的，那当然一切都会是正确的了。）

“究竟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不幸的城市要求享受它的权利。对，就是为了要求享受它的权利，它竟得到了48小时的轰击。”

（如果轰击延续四个星期以上，那一切又会是正确的了。）

“请允许我向欧洲的舆论呼吁。从这个也许是欧洲最伟大的讲坛上，用愤怒的言辞（真的，是用言辞！）来斥责这种行动，这将是对人类的一种贡献……当为自己祖国效过劳（这是梯也尔从来没有做过的）的埃斯帕特罗摄政王想以炮轰巴塞罗纳城来镇压那里的起义时，全世界各地都发出了共同的愤怒的呼声。”

好，过了一年光景，这位心地高洁的人变成了正统派乌迪诺统

① 费迪南二世。——编者注

率的法兰西共和国军队炮击罗马的阴险倡议人和最狂热的辩护者(辩解者)了。

二月革命前几天，因受基佐的排挤、长期不能获得权势而满腹忿懑的梯也尔，一嗅到了风暴的气息，就又在众议院中喊道：

“我属于革命党，不但属于法国的革命党，而且也属于全欧洲的革命党。我希望革命政府留在温和派的手中。但是，即令这个政府转到了热烈人物以至激进派的手中，我也决不因此背弃(放弃)我所拥护的事业。我将永远属于革命党。”

二月革命爆发了。革命不是象这个小人所梦想的那样，把基佐内阁换成梯也尔内阁，而是用共和国替代了路易-菲力浦。从共和宣告成立起直到政变止，镇压这次革命就成了梯也尔先生的唯一工作。在人民胜利的第一天，他忧心忡忡地隐藏起来，殊不知人民对他的鄙视已使他不致受到人民泄恨的处置。虽然如此，尽管他有无人不知的神奇勇气，他还是继续回避在公共场所抛头露面，直到卡芬雅克这个资产阶级共和党人把巴黎无产阶级的物质力量淹没在血泊中的时候为止。这时，供他这种人活动的场地已被扫清。他的时运再次降临。他变成了“秩序党”及其“议会制共和国”的思想领袖，这个议会制共和国是一种无名王朝，在这个无名王朝时期，统治阶级的所有争权夺利的派系暗中互相勾结起来压制工人阶级，同时它们又因各自企图恢复自己的王朝而互相倾轧。

(复辟王朝是贵族地主的王朝，七月王朝是资本家的王朝，卡芬雅克的共和国是资产阶级“共和”派的王朝，在所有这些王朝统治时期，一群组成波拿巴党的贪得无厌的冒险分子渴望掠夺法国但没有成功，这倒使他们有资格充当“秩序、财产、家庭、宗教的救主”了。

这个共和国是联合在一起的正统派、奥尔良派、波拿巴派以及

作为他们尾巴的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无名王朝。)

(3) 地主议会

如果说这个政府是由在波尔多开会的地主议会产生的话，那末那个议会则是由“国防人士的政府”事先策划成立的。为了这个目的，他们曾派梯也尔巡游各省，要他在各地预告未来的事态发展，并且为突然举行大选作好准备。梯也尔必须克服一桩困难。且不说波拿巴派已引起法国人民的厌恶，即使他们大批当选，也会立即恢复帝国，并且会把梯也尔先生一伙人打发到凯恩去旅行。奥尔良党又人少势孤，填不满他们自己的席位和波拿巴派所腾出来的席位。因此，势必要复活正统派。梯也尔并不惧怕这项差使。正统派要成立现代法兰西政府是不可思议的，所以作为争权夺利的对手也就微不足道；这个党的全部活动，用梯也尔的话来说，一向只限于依靠“外敌入侵、国内战争和无政府状态”这三种手段（**1833年1月5日梯也尔在众议院的演说**），因此，这个党是反革命势力最合适的目标工具。一小部分被1789年的革命剥夺了财产的正统派，由于当上了拿破仑第一的奴仆而恢复了原有产业，但大部分的正统派是由于在复辟时期分发的10亿法郎的赔偿金和私下的封赠而重置了产业。在路易-菲力浦和小拿破仑两个前后相续的王朝统治下，他们退出了积极的政治活动，甚至这种情况也成为他们重建财产而成为土地所有者的条件。他们免除了在巴黎的宫廷花费和当代表的花费，只是在法国外省的各个角落里坐收从现代工业树上落到他们寨堡里来的金苹果，因为铁路抬高了他们的地价，农业资本家把农艺学应用到他们的土地上来又提高了土地的出产，迅速膨胀的城市人口的无穷无尽的需求保证了他们的产品的

市场扩大。正是这些使他们恢复物质财富、重新提高他们作为现代奴隶主股份公司的合伙者的重要地位的社会因素，也障蔽着他们受不到现代思想的沾染，使他们可能处在农村的闭塞无知状态中，什么也不忘记，什么也不学会。他们这些人纯粹是供梯也尔这种人进行加工的消极材料。这个邪恶的矮鬼在执行国防政府委托给他的使命时，越出了他的权限，而为自己获得了这样多的选票，以致要把国防人士从与他分庭抗礼的主子变成对他甘拜下风的奴仆。

选举的圈套既然已经这样设好，巴黎的投降派便突然吩咐法国人民要在一周之内选举一个国民议会，这个议会的任务，根据俾斯麦口授的 1 月 28 日协定的条款，只是决定和战问题。这次选举是在非常特殊的环境下举行的：没有考虑商议的时间，半个法国处在普鲁士刺刀统治之下，另一半正受着政府阴谋的暗中摆布，巴黎又和外省隔绝；尽管处在这种种特殊情况下，法国人民却本能地感到：投降派所承受的停战条款本身除了决定不管怎样也要接受和平以外，根本没有留给法国任何的抉择（选择）余地，而为了批准这个决定，法国最坏的人是最合适的人。因此便产生了在波尔多出现的地主议会。

但是对于旧制度下的闹宴和地主议员们的真正历史事业，我们仍须加以区别。地主议员们突然发现，在由他们自己和奥尔良派组成的、夹杂有一些资产阶级共和派以及少量波拿巴派的巨大多数中，他们居然是最强大的集团，于是便当真相信了他们盼望已久的昔日的黄金时代就要到来。的确，法国又沦于外敌的铁蹄之下，帝国又被推翻了，波拿巴又被俘虏了，而正统派又抬头了。显然历史的车轮已经向后转，要滚回到 1816 年的“无双议院”去——它的疯狂而愤怒地诅咒革命洪水及其吓人惨象、它的要求“砍去巴黎的头颅并取消它的首都称号”、它的以封建主寨堡的地方势力突

破国家统治网的“地方分权制”、它的宗教说教、它的陈腐已极的政治教条、它的绅士架子和轻浮粗鲁的作风、它的世世代代对劳苦大众的蔑视、以及它的从 *oeil de boeuf*^① 中观察世界的观点，都将恢复。然而实际上，这些正统派只能作为生产资料垄断者而充当秩序党的股东。从 1848 年到 1851 年，他们只不过是“议会制共和国”这个空位王朝的一个派别，所不同的是当年代表他们的一些颇有素养和富有议会斗争经验的人物（如贝利耶、法卢、拉罗什雅克兰之流），而现在他们只得从农村地主这种庸碌之辈中物色自己的代表人物了，因而给议会添上了另外一种情调，以封建色彩掩盖了它的资产阶级的现实。他们种种荒唐的大话（说教）只不过更加烘托出他们的强盗政府的自由主义。他们被诱而僭取了超出选民委托的大权，他们只好看着那些自封的统治者的脸色过日子。虽然 1814 年和 1815 年的外敌入侵¹⁶³ 是资产阶级暴发户用来反对他们的致命武器，他们却出于毫无见识的盲目愚昧，自己承担起来他们的资产阶级敌人这次将法国拱手送给外敌的史无先例的投降的责任。法国人民起初以为所有高贵的布索那克们久已被埋葬，如今看到他们重又出现，感到惊讶和耻辱，他们已经明白：不仅需要进行十九世纪的革命，而且必须彻底完成 1789 年的革命，即把这些畜牲赶到农村中一切牲畜的最后归宿——屠宰场里去。

（5）内战的开始。3月18日的革命。克列芒·托马。勒康特。旺多姆广场事件

解除巴黎的武装，假如只是作为实现反革命阴谋的一个必要

^① 直译是：“公牛的眼睛”。这里指的是凡尔赛宫廷中一个装有椭圆形窗户的前厅，廷臣都在这里等候觐见。——编者注

条件，本来可以从长计议，审慎从事；但是既然解除巴黎的武装是那急迫的、具有不可抵抗的吸引力的财政条约中的一款，它就是刻不容缓的了。因此，梯也尔必须来一个政变的尝试。于是他就发动了内战：他派十二月分子维努亚率领一大队市警和几团常备军去夜袭蒙马特尔高地。由于国民自卫军的抵抗和国民自卫军与兵士们的和好，他的这个罪恶企图没有得逞，第二天，他在一份贴到巴黎墙上的宣言里告诉国民自卫军说：他宽宏大量地决定把他们的武器赏给他们，他并且还说，相信国民自卫军会拿着这些武器团结在政府周围来反对“暴徒”。在 30 万名国民自卫军中，只有 300 人响应了他的号召。3 月 18 日的光荣的工人革命完全控制（掌握）了巴黎。

指挥蒙马特尔的防卫工作并在 3 月 18 日清晨成为革命领导者的中央委员会，既不是一时权宜的机构，也不是密谋的产物。从投降的那一天起，巴黎就已严加戒备，因为国防政府按照投降条件解除法国的武装的时候，为自己保留了一支 4 万人的护身军队，目的是为了镇压巴黎。国民自卫军进行了改组，把最高指挥权交给了由各连代表——大多数是工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它的主要力量是在工人居住的郊区，但是它很快地就得到了除旧波拿巴军队之外的全体国民自卫军的承认。在普军开进巴黎的前夕，中央委员会已经设法把投降派背叛地故意遗弃在普军即将进驻的那些街区的大炮和多管炮运到了蒙马特尔、伯利维尔和拉-维勒特。这样便保全了由国民自卫军筹款置备的大炮。在 1 月 28 日的协定中，正式承认这些大炮是国民自卫军的财产，因而没有列入应该缴出的武器总数之内。从国民议会在波尔多集会起到 3 月 18 日止这一整个期间，中央委员会一直是首都的人民政府，它强大到能够不管国民议会如何挑衅，不管行政当局采取如何激烈的措施，也

不管军队的集结达到如何威胁的程度，而始终保持着坚定的防御立场。

9月4日的革命恢复了共和国。围困期间巴黎的顽强抵抗构成了外省进行防御战争的基础，同时迫使外国侵略者承认了共和国。它的真正意义和目的要到3月18日的革命才能显示出来，而这种显示就是一次革命。这次革命是要铲除旧世界制度所依据的阶级统治的社会条件和政治条件，这些社会条件和政治条件产生了第二帝国，并且已在这个帝国庇护下弄到完全腐朽的地步。欧洲好象受到一次电击而竦然一震。它一时似乎怀疑在它眼前发生的这些惊人的政治和军事事变的真实性，还以为这也许是早已消逝的往事的一些幻觉而已。

国民自卫军击溃维努亚，只是给予统治阶级策划的反革命阴谋的一次挫败，但是，巴黎人民立刻把他们这一自卫的事件变成了社会革命的第一个行动。在篡位者的王位出缺之后，9月4日的革命恢复了共和国。围困期间巴黎的顽强抵抗构成了外省进行防御战争的基础，同时迫使外国侵略者承认了共和国，但是它的真正意义和目的要到3月18日才能显示出来。3月18日的革命是要铲除旧世界制度所依据的阶级统治的社会条件和政治条件，这些条件产生了第二帝国，并且已在这个帝国庇护下弄到完全腐朽的地步。欧洲好象受到一次电击而竦然一震。它一时似乎怀疑在它眼前发生的这些惊人的政治和军事事变的真实性，还以为这也许是早已消逝的往事的一些血腥的恶梦而已。巴黎工人阶级在脸上还带着因长期挨饿而出现的皱纹，而且又处在普鲁士军队的刺刀之下，却一跃而夺得了维护进步等等旗手的地位。

洋溢着历史首创性的崇高热诚的巴黎工人的革命，认为保持无产阶级不犯他们的天然尊长（上等人）的革命特别是反革命中极

为常见的那种罪行，是与它的荣誉攸关的事情。

克列芒·托马、勒康特等等

但是，玷污这次革命的那些可怕的“暴行”又是怎么回事呢？

在他们的敌人硬加在他们身上的所有暴行中，只有两件事情不是凡尔赛的蓄意诬蔑或廉价文丐杜撰的谰言，即勒康特和克列芒·托马两将军的被杀和旺多姆广场事件。关于这两件事，我们要简单交代几句。

勒康特将军是被选出执行夜袭蒙马特尔（罪恶工作）的雇佣凶手之一，他在皮加尔广场上曾一连四次命令他的第八十一常备团的兵士开枪射击手无寸铁的群众；而当士兵们拒绝执行他的命令时，他就百般辱骂他们。他的士兵并没有射击妇孺，而是在3月18日下午在红宫花园里把他抓起来枪毙了。法国土兵在工人阶级敌人的训练下所养成的根深蒂固的习惯，自然不会在他们转到工人方面来的一刹那间完全改变。克列芒·托马也是被这些士兵枪毙的。

克列芒·托马“将军”过去是一个不得志的军需中士，在路易-菲力浦的统治后期被吸收加入“共和派的”《国民报》报馆，在里面起着傀儡（负责的经理）和打手的双重作用。《国民报》一派人利用了二月革命，靠欺诈取得了政权，他们便把这位先前的军需中士升任“将军”。这是六月大屠杀前夕的事情。他和茹尔·法夫尔一样，是这次事件的阴狠毒辣的策划人之一，也是这次大屠杀的最凶狠的刽子手之一。在这以后，他的将军头衔突然中止。他隐没起来，直到1870年11月1日才又出头露面。在这前一天，被执于市政厅的国防政府曾向布朗基、弗路朗斯和其他工人阶级代表们庄严地允诺，担保把他们篡夺的政权转交给巴黎自由选出的公社。

当然，他们没有履行他们的诺言，却嗾使特罗胥的布列塔尼部队——他们现在代替了路易·波拿巴手下的科西嘉部队——去蹂躏误信他们的誓言的人民。当时只有塔米济埃先生一人不愿以这种背信弃义的勾当来玷污自己的名誉，立即辞去了国民自卫军总司令的职务；克列芒·托马“将军”便被推上他的职位。此人在任总司令的整个期间，不向普军作战，而向巴黎国民自卫军作战。他无尽无休地制造借口阻挠国民自卫军全面武装，千方百计地嗾使国民自卫军中的资产阶级分子去反对工人分子以瓦解国民自卫军，排除那些反对特罗胥“计划”的军官，对无产者营妄加以怯阵的罪名而把它们解散，实际上这些无产者营的英勇果敢精神现在连最狂暴的敌人也为之震惊。克列芒·托马感到得意的是，他又重新取得了他以前在六月屠杀事件中那种个人充当巴黎工人阶级仇敌的显赫地位。在 3 月 18 日的前几天，他向陆军部长勒夫洛呈递了他的一份彻底消灭“巴黎暴徒的 la fine fleur (精华)”的计划。好象被六月的冤魂所缠住似的，在维努亚失败以后，他又情不自禁地以一个业余密探的身份出场！

中央委员会竭力想从士兵们的粗鲁的私审判决下救出勒康特和克列芒·托马这两个罪犯，但没有成功。在这方面，中央委员会和巴黎工人应负的责任，就象亚历山得拉公主驾进伦敦城时对被挤死者应负的责任一样。茹尔·法夫尔假慈假悲地咒骂巴黎这个凶手的渊薮。地主议会扮演了一场歇斯底里的“痛心”剧。这些人除非为了寻找使人民流血的借口，是从来不流他们的鳄鱼之泪的。利用头面人物的尸体当做内战的武器一向就是秩序党爱用的诡计。在 1848 年，他们曾经怎样就巴黎大主教仿佛被六月起义者杀害的事件而掀起了震荡全欧的恐怖叫嚣！其实他们从大主教的大司铎雅克美先生这个目击者的证词中，完全知道大主教是被卡芬

雅克自己的士兵枪杀的！在现任巴黎大主教^①——一个毫无殉道者气质的人——写给梯也尔的信中，透露出一种敏锐的疑虑，即他的凡尔赛的朋友们将以他被公社处决引为快事，因为他们急切希望根据这项可爱的举动来定公社的罪！然而，当大喊“杀人犯”的目的已达时，梯也尔便在国民议会的讲坛上宣布“凶杀案”是“很少”几个不知名人物私下干的事情，从而淡然了结了这件事。

“秩序人物”，即巴黎的反动分子，一听到人民胜利的消息——报复的信号——就不寒而栗，他们对人民的行动与他们自己历来庆祝人民失败的传统方式迥然不同而极其惊讶。甚至对市警都不但没有解除武装和逮捕下狱，反而给他们洞开了巴黎城门，让他们安然撤退到凡尔赛；对“秩序人物”不仅毛发未动，而且容许他们在巴黎正中心集结起来，并在巴黎的正中心轻易地夺去一些重要阵地。当然，他们把中央委员会的这种宽容态度和武装工人的这种宽宏大量，解释为只是工人自觉软弱的表现。于是他们就产生了一个计划——试图在举行“徒手”游行示威的幌子下，做到四天以前维努亚用大炮和多管炮所没有做到的事情。一群吵吵闹闹的“绅士们”从最奢华的街区出发，其中有各色各样的纨绔阔少，领头的是埃克朗、科特洛贡、昂利·德·佩恩之流这样一些帝国猪仔。这些人列队行进，沿途喊叫着“打倒杀人犯！打倒中央委员会！国民议会万岁！”在他们行进中遇到国民自卫军的散兵哨的时候，就横加侮辱，并勒令缴械。最后，他们汇合在旺多姆广场上，企图在辱骂的喊叫中把国民自卫军赶出他们的总参谋部，并冲过警戒线。国民自卫军在受到手枪射击后，起初只是提出通常的 sommations（相当于英国宣读骚扰取缔令），但是这样做对于阻止进犯者并不见效。于

① 达尔布瓦。——编者注

是国民自卫军的一位将军^①才下令开枪，这些暴徒立刻抱头鼠窜。有两名国民自卫军士兵被打死，八名受重伤；在暴徒们作鸟兽散的街道上，到处都抛弃有手枪、匕首、手杖刀，这些清楚地证明了他们的“和平”游行的“徒手”性质。当 1849 年 6 月 13 日巴黎国民自卫军为抗议法军穷凶极恶地袭击罗马而举行真正的“徒手”示威游行时，秩序党的将军尚加尔涅曾用刀斩、马队践踏和枪击对付游行队伍。当时立即宣布了戒严，开始了新的逮捕、新的流放、新的恐怖统治。但是在同类情况下，“下等阶级”的做法却迥然不同。3 月 22 日的窜逃分子既没有受追袭，他们在逃窜中也并未受扰，事后也没有受到法院侦查员(juge d'instruction)的传讯，所以他们过了两天又能来一次由海军上将赛塞率领的“武装”示威。甚至在他们第二次滋事的可耻失败以后，他们象巴黎其他市民一样仍被允许参加公社的投票，在选举中进行较量。他们在这场不流血的战斗中打输了，最后撤出了巴黎，没受任何损伤地完成了他们的大出走，身后拖带着荡妇、瘪三和首都的其他危险分子。所谓 3 月 22 日“赤手空拳的市民”被屠杀，原是一种神话，难怪乎梯也尔及其“地主议会”都不敢喋喋不休地谈论，只委托那些欧洲报界的走卒去传播。

如果要挑剔中央委员会和巴黎工人从 3 月 18 日到这些“秩序人物”大出走时期内在对待这些人的行动上的过错，那就是他们过分温和，温和得近似软弱了。

现在来看看这幅图画的另一面吧！

秩序党在他们夜袭蒙马特尔失败以后，于 4 月初开始了他们

① 贝热瑞。——编者注

向巴黎的正规进攻。从巴黎逃出的维努亚，因为用十二月的方式揭开了内战，因为冷酷无情地屠杀被俘的常备军士兵，因为卑鄙地谋害了我们的英勇朋友杜瓦尔，竟被梯也尔授予荣誉军团大十字勋章！加利费，即那个在第二帝国的闹宴上以无耻的装扮而闻名的女人的心上人，在一篇正式宣言中，夸耀他如何用突袭和收买叛徒的办法，卑鄙地杀害了连同副官和队长在内的一队巴黎国民自卫军。宪兵德马列也得了勋绶，因为他象屠夫一样地把光明磊落、仗义豪侠的弗路朗斯切成了碎块；关于这次暴行的“令人兴奋的”细节，梯也尔洋洋自得地向议会作了传达。扮演着帖木儿-塔梅尔兰角色的这个大姆指般的小人物梯也尔，在万分可耻的得意忘形中，拒不承认那些反对他这个小人的尊严的“叛乱者”享有交战一方的一切权利和惯例，甚至于拒绝给予“伤兵救护站”的权利。

公社在4月7日颁布了一项报复法令，宣布公社有责任保卫自己不受凡尔赛匪帮的野蛮虐杀，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时候，枪决俘虏是停止了，但凡尔赛对俘虏的残暴虐待并没有停止；关于这些俘虏，梯也尔在他的一份公报中竟然说：

“正直人士的忧伤的目光，还从来没有看到过一种无耻民主制度下的如此无耻的面孔。”

但是，当梯也尔和他那些十二月政变的将军们知道公社的法令只不过是一种威胁，甚至连那些在巴黎被捕的伪装国民自卫军的宪兵密探和身上搜出爆炸弹的市警都得到了赦免，他们就又全盘恢复了旧的一套干法，并且一直继续到今天。一些国民自卫军士兵在贝耳-埃潘向一队占压倒优势的骑兵投降，后来被骑在马上的骑兵队长一个个枪毙了；躲藏有巴黎军队和国民自卫军士兵的房屋，被宪兵们团团围住，浇上煤油，纵火焚烧；烧焦的尸体后来被巴黎的救护队运出去了；木兰-萨克多面堡中的国民自卫军士兵由

于叛徒出卖遭到突袭，在睡梦中被刺刀挑杀（公社社员在睡梦中受到突袭）；克拉马尔的大屠杀（枪杀），穿着常备军制服的俘虏们被就地枪决，——所有这些在梯也尔公报里用轻率口气报道的功绩，只不过是这次奴隶主叛乱中的几桩事件而已！但是面对着为最卑鄙的阶级利益所驱使的凡尔赛阴谋分子在法国废墟上制造的目前这次国内战争，面对着在俾斯麦的庇护下和在俾斯麦士兵的监视下对巴黎进行的轰击，只列举几桩个别的残酷事实，未免荒唐可笑！梯也尔在公报中报告这些事情的轻率态度，甚至使不大敏感的《泰晤士报》也为之震惊。然而，正象西班牙人常说的，这些都是“正常的”。在统治阶级与威胁着他们的特权的生产阶级进行的战斗中，总是充满着这类暴行，但没有一次象在这次战斗中那样，被压迫者显示了这样过分的人道，而他们的敌人表现得如此卑鄙无耻…… 梯也尔永远遵循着中世纪浪游骑士的老格言：一切武器只要是用来反对平民的都是正当的武器。

梯也尔给各省省长写道：“议会在平静地开着会”。

贝耳-埃潘事件

在维耳茹伊弗附近的贝耳-埃潘发生这样的事件：4月25日，四名国民自卫军士兵被一队骑兵包围，并被勒令缴械投降。由于无法抵抗，他们服从了，并没有受到骑兵的伤害。稍后，骑兵队长（加利费手下的一位宝贝军官）疾驰而来，用手枪一个个地枪毙了俘虏，然后和他的骑兵队离开了。三名自卫军士兵牺牲，一位名叫舍弗尔的身受重伤，但活下来了，后来被送到比塞特尔的医院。公社派了一个调查团到医院记下了这位奄奄一息的士兵的证词，并发表在它的报告上。当国民议会中的一位巴黎议员就这份报告向陆军部长提出质问时，“地主议员们”用叫喊声盖住他的发言，并且

不让陆军部长出来答复。干这种谋杀罪行倒无所谓，但加以谈论就会是对他们“光荣的”军队的侮辱。

梯也尔在发给他的省长们的一份公报中说：“议会在平静地开着会”（象奥利维耶那样轻松^①），这句话充分说明了议会是以怎样恬静的心情来看待内战中的暴行的；行政当局和它的那些假释犯在梯也尔举办的珍馐盛宴上，在德国王公们的筵席上大吃大喝，这表明甚至勒康特和克列芒·托马两人的幽灵也没有败坏他们的胃口。

(6) 公 社

在色当之后，里昂、马赛和土鲁斯的工人，都宣告成立公社¹⁶⁴。甘必大用尽全力扑灭它。在巴黎被围期间，工人们不断举行的起义（它们被堪与路易·波拿巴的科西嘉兵匹配的特罗胥的布列塔尼兵用虚假的借口，一次又一次地镇压了下去）就都是公社推翻骗子政府的尝试。当时默默地酝酿着的公社，正是九月四日革命的真正秘密所在。正因为如此，3月18日清晨，在反革命被击败以后，巴黎雷鸣般的“公社万岁！”的呼声把睡意朦胧的欧洲从梦见普鲁士帝国的睡梦中惊醒过来！

公社这个使资产阶级的头脑怎么也捉摸不透的怪物，究竟是什么呢？

按最简单的理解，这是工人阶级在他们的社会堡垒——巴黎和其他工业中心——里执掌政权的形式。

中央委员会在它的3月20日宣言中说：

① 这是借用内阁首相奥利维耶的话（见本书第101页）。——编者注

“首都的无产者，目睹统治阶级的失职和叛卖行为，已经了解到：由他们自己亲手掌握公共事务的领导以挽救时局的时刻已经到来…… 他们已经了解到：夺取政权（国家权力）以掌握自己的命运，是他们必须立即履行的职责和绝对权利。”

但是，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存的国家机体，并运用这个现成的工具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象统治阶级及其各个争权夺利的党派以往在它们相继获得胜利的时刻所做的那样。掌握政权的第一个条件是改造传统的国家工作机器，把它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消灭掉。这个庞大的政府机器，象蟒蛇一样地用常备军、等级制的官僚、驯顺的警察、僧侣、卑贱的法官把现实社会机体从四面八方缠绕起来。它最初是在君主专制时代创造出来的，当时它充当了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在争取摆脱封建制度束缚的斗争中的武器。以给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提供自由发展的充分地盘为任务的第一次法国革命，必须把地方的、区域的、城镇的、外省的一切封建制度堡垒都扫除净尽，为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这一上层建筑准备社会基地。这种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有它的按照系统的和等级的分工原则建立的分枝庞杂、遍布各地的机关。

但是，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奴役他们的政治工具不能当成解放他们的政治工具来使用。

现代资产阶级国家体现在议会和政府这两大机构上。在1848—1851年秩序党共和国时期，议会的大权独揽产生了它自身的否定——第二帝国，而以议会仅仅作为点缀的帝国制度是目前大陆上多数军事大国所盛行的制度。乍看起来，这种政府机构的僭取的专政仿佛是对社会本身的专政，它既同样地凌驾于一切阶级之上，也同样地贬低一切阶级，实际上，它现在已经成了——至

少在欧洲大陆上是如此——占有者阶级能继续统治生产者阶级的唯一可能的国家形式。所有已经死亡的法国议会留下来的、还栖息在凡尔赛的那一群幽灵，掌握的实际力量除第二帝国下形成的政府机器外，就什么也没有了。

象蟒蛇一样地用官僚、警察、常备军、僧侣、法官把社会机体从四面八方缠绕起来的庞大的政府寄生虫，是起源于君主专制时代。当时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必须充当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在争取摆脱封建制度束缚的斗争中的有力武器。以扫除领主的、地方的、城镇的、各省的特权这些中世纪垃圾为任务的十八世纪的法国革命，不能不同时从社会基地上清除那些妨碍着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充分发展的最后障碍，这种国家政权有它的按系统的和等级的分工原则建立的遍布各地的机关。这样的国家政权是在第一帝国时期产生的，而第一帝国本身则是由老朽的半封建的欧洲反对近代法国的几次同盟战争产生的。在以后的复辟、七月王朝、秩序党共和国的议会制度下，这个拥有令人倾心的官职、金钱和权势的国家机器最高管理权，不仅变成了统治阶级中各个争权夺利的党派争夺的对象，而且，随着现代社会经济进展使得工人阶级队伍更加扩大、处境更加困难、抵抗更加有组织、要求解放的趋势更加发展，一句话，随着现代阶级斗争——劳动与资本的斗争——采取更鲜明的形式和规模，国家政权的面貌和性质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它一直是一种维护秩序、即维护现存社会制度从而也就是维护占有者阶级对生产者阶级的压迫和剥削的权力。但是，只要这种秩序还被人当做不容异议、无可争辩的必然现象，国家政权就能够摆出无所偏袒的样子。这种政权把群众现存的屈从地位作为不容变更的常规，作为群众默默忍受而他们的“天然尊长”则安然利用的社会事实维持下去。随着社会本身进入一个新阶段，即阶级斗争

阶段，它的有组织的社会力量的性质，即国家政权的性质，也不能不跟着改变（也经历一次显著的改变），并且越来越发展它作为阶级专制工具的性质、作为用强力长久保持财富占有者对财富生产者的社会奴役，资本对劳动的经济统治的政治机器的性质。每一次新的人民革命总是使国家机器管理权从一些统治阶级手中转到另一些统治阶级手中，在每次这样的革命之后，国家政权的压迫性质就更充分地发展，并且更无情地被运用，因为革命所许下的、似乎保证了的那些诺言只有使用暴力才能破坏。此外，后来陆续发生的革命所带来的变化，只是给予资本势力日益增长这个社会事实以政治上的肯定，因而越来越直接地把国家政权交给工人阶级的直接的敌人。就是这样，七月革命把政权从地主手里夺来转交给大制造商（大资本家），二月革命又把政权转交给联合在一起的统治阶级各党派，这些党派是为了共同对抗工人阶级、为了维护自己阶级的统治秩序而联合成为“秩序党”的。在议会制共和国时期，国家政权最后变成了占有者阶级进行反对从事生产的人民群众的公开的战争工具。但是作为公开的内战工具，它只能在有内战的时候使用；因此，议会制共和国的生存条件就是延续已经公开宣布了的内战状态，也就是否定这一内战以其名义进行的那种“秩序”。这可能是一种一时的、例外的情况。它不可能作为社会的正常的政治形式，甚至于对大部分资产阶级说来也是不能忍受的。因此，当人民抵抗的一切因素都被消除以后，议会制共和国不得不在第二帝国前面消逝（让位给第二帝国）。

帝国声称它依靠构成全国多数的生产者，——即依靠似乎是置身在资本和劳动的阶级斗争之外的（对两大对抗的社会力量都表示漠视和敌视的）农民；它把国家政权当做凌驾于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上的一种力量来使用；强使两个阶级暂时休战（使政治

的也就是革命的阶级斗争形式沉寂下去);以摧毁议会权力亦即占有者阶级的直接政治权力而剥去了国家政权的阶级专制的直接外形。这个帝国是唯一能够使旧的社会秩序苟延一时的国家形式。因此,全世界都欢迎这个帝国,认为它是“秩序的救主”,世界各国想当奴隶主的人们二十年来一直赞美它。在它的统治下——这时正好加利福尼亚、澳大利亚使世界市场发生了变化¹⁶⁵,美国有了惊人的发展,——开始了工业空前活跃的时期,交易所投机、金融诈骗、股份公司冒险行径盛极一时,而所有这些通过对中等阶级的剥夺,导致资本的迅速集中,并使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鸿沟日益扩大。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趋势获得了充分发展的机会,于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部卑鄙龌龊就无阻拦地泛滥起来。这同时也是穷奢极欲、粉饰升平的闹宴,是“上等阶级”的一切下流欲望的鬼魅世界。政府权力的这种最后形式同时也是它的最淫贱的形式,是一帮冒险分子对国家资源的无耻掠夺,是造成大宗国债的温床,是对变节卖身的赞美,是一种虚饰矫作的荒诞生活。这一从头到脚披着华美外衣的政府权力已陷入污泥。普鲁士本来渴望把这种纸醉金迷的、血腥的、污秽的制度在欧洲的重心从巴黎移到柏林去,而它的刺刀把国家机器本身的彻底腐朽性以及在这种制度下繁荣滋长的整个社会机体的糜烂尽行揭穿了。

巴黎工人阶级所要打倒的就是国家政权的这种最后和最淫贱的形式,它的最高和最卑鄙的现实,而且也只有这个阶级能够使社会摆脱它。至于议会制度,它早已被它自己的胜利和帝国葬送了。工人阶级所要做的就是不去恢复它。

工人应当打碎的已不是旧社会的那个比较不完整的政府权力形式,而是具有最后、最完备形式的这一权力本身,就是帝国。公社就是帝国的直接对立物。

用最简单的概念来说，公社意味着在旧政府机器的中心所在地——巴黎和法国其他大城市——初步破坏这个机器，代之以真正的自治，这种自治在工人阶级的社会堡垒——巴黎和其他大城市中就是工人阶级的政府。由于被围，巴黎摆脱了军队，而代之以主要由巴黎工人组成的国民自卫军。只是由于这一情况，3月18日的起义才成为可能。必须使这件事实成为确定的制度；必须以各大城市的国民自卫军，即武装起来反对政府篡夺行为的人民来代替保护政府反对人民的常备军。公社必须由各区全民投票选出的城市代表组成（因为巴黎是公社的首倡者和楷模，我们应引为范例），这些城市代表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其中大多数自然是工人，或者是公认的工人阶级的代表。它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同时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警察不再是中央政府的工具，而应成为公社的勤务员，象所有其他行政部门的公职人员一样由公社任命，而且随时可以撤换；一切公职人员象公社委员一样，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法官也应该由选举产生，随时可以撤换，并且对选民负责。一切有关社会生活事务的创议权都留归公社。总之，一切社会公职，甚至原应属于中央政府的为数不多的几项职能，都要由公社的官吏执行，从而也就处在公社的监督之下。硬说中央的职能——不是指政府控制人民的权威，而是指由于国家的一般的共同需要而必须执行的职能——会变得不可能，是极其荒谬的。这些职能会存在；不过，行使这些职能的人已经不能够象在旧的国家机器里面那样使自己凌驾于现实社会之上了，因为这些职能应由公社的官吏执行，因而总是处于切实的监督之下。社会公职不会再是中央政府赏赐给它的爪牙的私有财产。随着常备军和政府警察的被废除，实行压迫的物质力量会被摧毁。宣布教会与国家分离并剥夺一切教会所占有的财产；从一

切公立学校中取消宗教教育（同时实施免费教育），使其回到私人清修生活的范围里去，靠信徒的施舍维持；使一切学校不受政府的监护和奴役，——所有这一切必然要摧毁精神压迫的力量，使科学不仅成为人人有份的东西，而且也摆脱掉政府压制和阶级成见的桎梏。市税由公社规定和征收，用于全国性的公共需要上的税款由公社公职人员征收，并由公社自己拨给各项公共需要（用在各项公共需要上的开支由公社自己监督）。

政府的镇压力量和控制社会的权威会这样随着它的纯粹压迫性机构的废除而被摧毁，而理应属于政府权力的职能，应当不是由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机构，而是由社会本身的负责勤务员来执行。

（7）结 束 语

艰苦奋斗、努力劳动、用心思索的巴黎，为历史首创精神的热诚所激发，充满着现实的英雄气概，这是正处在诞生的阵痛中的新社会；和它截然对立的是凡尔赛的旧社会，即彻底虚伪、塞满谎言的世界。它的真正代表就是地主议会，那里面麇集着体现法国历代阶级统治的一切旧制度的咿呦作语的食尸鬼，领头的是一个老朽不堪的议会小丑，他们的剑柄握在一群当着自己的普鲁士征服者炮轰巴黎的帝国投降派手中。

法国在第二帝国崩溃时堆集起来的大量废墟，对他们说来只是把以前的全部废墟垃圾，即正统派或奥尔良派的垃圾挖掘出来并抛到地面上来的好机会。

他们努力在一切过去的流亡集团的尸臭气氛中燃起生命的火焰。（他们呼吸的空气就是一切过去的流亡集团的尸臭。）

他们共同谋害生命，只顾自己的阶级私利，妄想撕食法国社会

的尸体，维护奴隶主的共同利益，憎恨现在，对巴黎作战——除此以外，在他们身上没有任何真实的东西。

他们的一切一切都是滑稽可笑的，从路易-菲力浦统治时期的那个老古董若贝尔伯爵起，此人在路易十四宫里召开的国民议会上喊道：“我们是国家”（“国家就是我们”）¹⁶⁶（他们的确是脱离社会的国家的幽灵），到那些向梯也尔卑躬屈膝的共和派止，他们在*Jeu de Paume*（网球厅）集会，来表明与他们的 1789 年前辈相比已堕落到什么地步。

他们的领头是梯也尔，他们的大多数分裂为正统派和奥尔良派这两个集团，追随在他们后面的是“旧式的”共和派。这两个集团各自策划着自己的复辟；共和派则图谋议会制共和国的复辟，他们把希望寄托在梯也尔的老年人的虚荣心上，而暂且为梯也尔的统治充当共和的装饰，并且当他们尽力诱骗巴黎投入梯也尔的怀抱、企图令塞塞解除巴黎武装未果之后，以自己的在场认可波拿巴的将军们对巴黎的战争！真是一些愁容骑士！他们甘愿忍受的屈辱表明，作为阶级统治的一种特殊形式的共和制度已堕落到怎样的地步。梯也尔正是针对着这些人间聚集开会的塞纳一瓦瑟省的区长们，他们还需要什么：“不是他这个普通的公民在做国家的首脑么？”从 1830 年到 1870 年的进展在于：从前路易-菲力浦是最好的共和国，现在路易-菲力浦的大臣——小梯也尔本人是最好的共和国。

他们不得不借助于退休的波拿巴派将军所指挥的帝国士兵、宪兵、警察来于他们的真正工作即对巴黎作战，当他们怀疑他们——象 1848—1851 年当政时一样——只不过是制造帝国再度复辟的工具，他们又不寒而栗了。教皇的朱阿夫兵、卡特利诺的万第兵、沙列特的布列塔尼兵，实际上是他们的“议会”军队，与帝国

的现实力量相比仅仅是军队的幻影而已。他们一听到“共和国”这个名称就怒气冲天，同时他们却以它的名义接受了俾斯麦的口授条件，以它的名义把法国剩余的财富滥花在内战上，以它的名义诋毁巴黎，以它的名义制定将来对叛乱者定罪的法律，以它的名义篡夺号令法国的权力。

他们统治的根据是普选制。但他们在 1815 年到 1848 年当政期间一直反对普选；共和国建立反对他们的普选制之后，他们于 1850 年 5 月把它废除了；而现在他们又把它当做帝国的淫贱遗产接受下来，忘记了这样一来就是接受了由全民投票产生的帝国！他们这些人即使用普选也无法立足了。

他们指责巴黎背叛民族的统一，可是他们的头一句话就是以取消巴黎的首都称号砍去民族统一的头颅。巴黎所做的事似乎也是他们所需要的，不过做得不象他们所希望的那样——梦想恢复反动的过去，——而是维护革命的未来。梯也尔这个沙文主义者，从 3 月 18 日以来就用“普鲁士干涉”威胁巴黎，在波尔多坚决主张“普鲁士干涉”，事实上，他也是只用普鲁士授予他的工具来反对巴黎。和这个沙文主义的小丑相比，波旁分子简直可说是尊严的化身了。

万一他们得逞，不管他们的复辟采取什么名目，不管哪个侥幸成功的谋位者成为首脑，复辟实际上只能恢复帝国，即恢复这些腐朽阶级的统治的最后的、不可缺少的政治形式。如果他们恢复了帝国，——一旦他们的任何一个复辟计划成功，他们势必要恢复帝国，——他们只会加速他们所代表的旧社会的腐朽，加速他们所反抗的新社会的成熟。他们的幽暗目光只看到那些旧制度的政治门面，而且他们梦想在这些制度的头上安一个亨利五世或巴黎伯爵来恢复这些制度。他们看不到，这些政治上层建筑所依据的社会

机体已经消逝，这些制度只可能在如今已过时的那些条件下、在法国社会的那些过去的阶段中一度存在；法国社会现在只能容许或者是作为其腐烂状态的帝国制度，或者是作为其新生状态的劳动共和国。他们看不到，政治形式的更替只是社会本身经历的现实变化的政治表现。

普鲁士人怀着对战争胜利的狂喜心情注视着法国社会的痛苦挣扎，并以夏洛克的卑鄙贪心，以顽固守旧的容克地主的粗暴无耻趁火打劫。其实把帝国移植到德国土地上，对他们自己已经是一种惩罚。他们注定要解放法国的潜在力量，这些力量必将把他们连同旧秩序一起全部吞没。巴黎公社可能倒下，但是它所创始的社会革命必将胜利。它的策源地遍于全球。

*片 断

梯也尔公报里的谎言

凡尔赛的大骗局，它的虚伪性质，没有比在梯也尔这个职业说谎家身上体现和集中得更完全的了，对于他说来，“事物的真实性”只就其“议会意义”而言才存在，也就是说，只作为谎言而存在。

他在答复大主教的信里冷冰冰地否认“硬推在凡尔赛军队头上的臆造的处决和报复行为<1>”，并由他的“地主议会”专门指派一个调查团来证实这无耻谎言。他当然知道波拿巴的将军们洋洋自得地宣布的种种暴行。不过，从“议会意义”上说，这些都是虚构。

他在 4 月 16 日就炮轰巴黎一事发表的通报中说：

“如果曾经打了几发炮弹，那也不是凡尔赛军队打的，而是一些叛乱者为了假装他们在作战才打的，可是实际上他们连头都不敢露出来。”

当然，巴黎是在炮轰自己，好使世界相信它在作战！

稍后又说：“我们的炮兵没有轰击，但是诚然射击过。”

梯也尔关于木兰-萨克的公报（5月4日）：“巴黎从压迫它的可憎暴君的控制下得到解放”（采取杀害睡梦中的国民自卫军士兵的手段）。

一支杂牌军队——这是蒙俾斯麦的恩典从监狱里释放回来的波拿巴军队残部，以瓦伦顿的宪兵和比埃特里的市警为核心，以教皇的朱阿夫兵、沙列特的朱安兵、卡特利诺的万第兵为装饰，全部由临阵脱逃的十二月分子投降派将军们指挥，——这样一支军队被他颂扬为“**法国从未有过的一支最精锐的军队**”。当然，如果普鲁士军队到现在还驻扎在圣丹尼，那只是因为梯也尔想用这支“精锐军队中的最精锐军队”的军容去吓唬吓唬他们。

如果“最精锐的军队”是这样，那末，凡尔赛的颠倒时代的议会也就是“法国从未有过的最开明的和最自由地选出的议会”了。但是，梯也尔颠倒反常达到的顶点，是他对区长们说他是“一个从来不食言的人”，当然，他的守信是议会意义上的守信。

他是最真挚的共和党人，而“议会比他本人还要开明”（4月27日的会议）。

他对区长们说：“你们可以信赖我的话，我从来不食言”，——而从非议会的意义上讲，是我从来不守信用。“本届议会是法国所曾选出的最开明的议会之一。”

他把自己比做林肯，把巴黎人比做南方叛乱的奴隶主。南方人是为了保持劳动奴隶制而想从合众国脱离出来。而巴黎是为了劳动的解放而想使政权脱离梯也尔先生和他所代表的利益。

波拿巴的将军、宪兵和朱安兵对巴黎发泄的报复行为，是反对劳动的阶级战争的一种必然行为。但是，梯也尔在他的公报小插

曲里，却借这种暴行可笑地自比为他的偶像——拿破仑第一，并且给全欧洲留下了笑柄，因为他竟厚颜无耻地宣称，法国军队由于对巴黎人作战，已经挽回了在对普鲁士军队作战中所丧失的声誉。所以，整个战争仿佛只是儿戏，好使这个矮鬼的幼稚的虚荣心得到表现，当他想到居然能描述他自己的军队在他自己的秘密统率下所进行的他自己的战役时，就飘飘然起来。

在巴黎和外省问题上，他的说谎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巴黎实际上已抗击了“法国从未有过的最精锐的军队”达两个月之久，尽管这支军队得到普鲁士人的秘密援助；原来这个巴黎只是想要梯也尔使它摆脱“凶残的暴君”，所以才对梯也尔进行战争，虽然只是一小撮罪犯。

梯也尔不倦地把公社说成一小撮罪犯、假释犯、渣滓。巴黎所以对他作战，是因为巴黎想要他来使它摆脱“压迫它的可憎暴君”。然而就是这一“小撮”亡命之徒，却抗击了由百战百胜的麦克马洪统率的、受梯也尔本人的拿破仑式天才所鼓舞的“法国从未有过的最精锐的军队”达两个月之久！

巴黎的抵抗仿佛并非真实，而梯也尔关于巴黎的谎言则是真实的。

巴黎的一切有生力量不满足于只用行动壮举来驳斥他，还企图用言词说服他，使他脱离他的说谎世界，但终于无效。

“决不当把巴黎的运动和蒙马特尔遭到的突袭混为一谈，后者只不过是这一运动的导因和起点；这一运动是普遍的，是深入巴黎人心的；甚至那些由于某种原因置身局外（不干预其中）的大多数人，也不否认这一运动的社会合法性。”

这一番话是谁对他说的呢？是工商会代表，亦即代表着七八千名工商业者发言的一些人。他们去到凡尔赛亲口告诉他这一番

话。还有共和同盟、各共济会分会¹⁶⁷也派出代表，举行示威游行，作了同样表示。但他顽固到底。

他在关于木兰-萨克的公报中说（5月4日）：

“俘虏300人，其余叛乱分子拔腿奔逃，在战场上遗弃150名伤亡者……这就是公社在它的公报中所能庆贺的胜利。巴黎不久即将从压迫它的凶残暴君下解放出来。”

但是，这个战斗的巴黎、真正的巴黎并不是他的那个巴黎。他的巴黎，本身就是一个议会谎言。“富人的、游手好闲者的、资本家的巴黎”、世界妓院——那才是他的巴黎、那才是想重归于梯也尔的巴黎。真正的巴黎是“贱民”的巴黎。以“和平游行”和赛塞的仓皇逃跑来表示其勇气的巴黎，目前麇集在凡尔赛、吕埃伊、圣丹尼、勒河岸圣热尔门的那批人的巴黎，以及随着跟去的那些依附于“家庭、宗教、秩序人物”、首先是依附于“财产人物”的荡妇们的巴黎，游堕阶级的巴黎，从望远镜中欣赏战斗的进行、把内战只当做惬意消遣的 frances-fileurs⁷⁷ 的巴黎，——这才是梯也尔先生的巴黎。正象科布伦茨城的亡命之徒是卡龙先生的法国一样，凡尔赛的亡命之徒是梯也尔先生的法国。

如果说，巴黎想靠梯也尔、他的“地主议会”、十二月分子、宪兵来摆脱公社是无稽之谈，那末，说他的“外省”想靠他和他的“地主议会”来摆脱巴黎也同样是无稽之谈。

在和约还没有在法兰克福最后签订以前¹⁶⁸，他呼吁各省把它们的国民自卫军战斗营和志愿军开到凡尔赛来对巴黎作战。各省断然予以拒绝。只有布列塔尼省派去了一小撮朱安兵，“他们作战时打着白旗，每人胸前缝着用白布做成的耶稣圣心，口里喊着‘国王万岁！’”法国外省就是这样响应他的号召的，所以，他不得不从俾斯麦那里要回被俘的法军，使用教皇的朱阿夫兵（这是他的法国

外省的真正武装代表)，并把 20 000 名宪兵和 12 000 名市警当成他的军队的核心。

尽管他力图用谎言的城墙、思想封锁和警察封锁把巴黎和各省隔绝(隔离)开来，但各省不仅不给他送来对巴黎作战的战斗营，还向他派遣了这样多的坚持与巴黎议和的代表团，以致他决定不再亲自接见它们。各省递交的大部分呈文建议：立即和巴黎缔结停战协定，解散国民议会，“因为它的任期已满”，给予巴黎所要求的市政权利；这些呈文的语调是如此不堪入耳，以致杜弗尔在发给各省省长的“反对议和的通告”中对之大加诋毁。另一方面，“地主议会”和梯也尔却没有从外省接到一份表示拥护的呈文。

但是，外省揭破梯也尔捏造的关于外省“谎言”的最大**挑战**是 4 月 30 日的市镇选举。这次选举是根据他的议会的一项法令、在他的政府领导下进行的。在被肢解的法国境内残存的 35 000 个市镇所选出的 70 万名(取其整数)市镇参议员中，正统派、奥尔良派、波拿巴派当选者总共还不到 8 000 名！补选的结果对他们更加不利！这一情况清楚地表明：靠出人不意和虚伪借口而当选的**国民议会**是在多大程度上代表法国、外省的法国、不算巴黎在内的法国！

但是，外省大城市准备在波尔多召开市镇参议员代表大会的计划，被梯也尔根据 1834 年他颁布的一项法令和 1855 年的一项帝国法令¹⁶⁹禁止了，这一计划迫使梯也尔招认了“他的外省”，正如“他的”巴黎一样，原是一个谎言。他指控外省，说它们也和“背信弃义的”巴黎相象，切望“奠立共产主义和叛乱的基石”。南特、维恩、莎姆伯里、利木、卡尔卡松、翁热、卡尔庞特腊、蒙彼利埃、普里瓦、格勒诺布尔等城的市镇参议会最近通过的决议又一次回答了他；这项决议要求并且坚持与巴黎议和，

“绝对肯定共和国，承认公社权利”，正如维恩市镇参议会所说，“这种权利是2月8日当选人在他们竞选公告书中作过许诺的。为了终止对外战争，它（国民议会）都割让了两省，答应了给普鲁士50亿法郎，那末，为了结束内战，它还有什么不应该做的呢？”

（恰恰相反，这两省不是他们的“私有”财产；至于那50亿法郎的付款单，那末全部问题在于这是应由法国人民而不是由他们来支付的。）

因此，虽然巴黎能正当地埋怨外省只限于和平请愿，没有援助巴黎来反对政府的全部力量……外省还是毫不含糊地揭破了梯也尔和国民议会所说的似乎他们是外省的代表的谎言，外省宣布了，他们所谓的外省是谎言，正象他们的整个存在都是欺诈和招摇撞骗一样。

总委员会引以自豪的是，国际的巴黎各支部在这次巴黎的光辉革命中起了卓越的作用。事实并不是象一些蠢才所想象的那样，仿佛巴黎或任何其他的国际支部从一个中心接受命令。事实是，既然所有文明国家的工人阶级的精华都属于国际，而且都浸透了国际的思想，他们在各地的工人阶级运动中就定然会走在最前面。

从①投降的那天起，巴黎就已严加戒备，因为俾斯麦的俘虏政府按照投降条件把法国出卖给俾斯麦的时候为自己保留了一支护身军队，目的显然是为了镇压巴黎。国民自卫军进行了改组，把最高指挥权交给了由首都的所有连、营、炮队（除了某些旧波拿巴军

① 原稿中从此处起有三页没有标记页码，在第二段前写有“第9页”的字样。——编者注

队残部)共同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在普军开进巴黎的前夕,中央委员会已经设法把投降派背叛地故意遗弃在普军即将进驻的那些街区的大炮和多管炮运到了蒙马特尔、伯利维尔、拉-维勒特。

武装的巴黎是阻碍反革命阴谋实现的唯一严重障碍。因此必须解除巴黎的武装。在这一点上,波尔多议会讲得很坦率。如果“地主议员们”的狂暴鼓噪还令人听不清楚究竟,那末,梯也尔把巴黎交给十二月分子维努亚、波拿巴的宪兵瓦伦顿和耶稣会教徒奥雷耳·德·帕拉丹将军三人宰割这一事实,则已令人对他们想解除巴黎武装的最后目的不能再有丝毫怀疑了。但是,如果说,这批穷凶极恶的罪犯对他们的目的直言不讳,那末,他们用来挑起内战的借口则是极端无耻的、极端卑鄙的(极端露骨的)谎言。梯也尔宣称,巴黎国民自卫军的大炮是国家的财产,所以应当归还给国家。而事实则是这样:从投降的那一天起,巴黎就已严加戒备,因为俾斯麦的俘虏们按照投降条件把法国出卖给俾斯麦的时候,为自己保留了一支相当可观的护身军队,目的显然是为了镇压巴黎。国民自卫军进行了改组,把最高指挥权交给了由国民自卫军全体官兵(除了某些旧波拿巴军队残部)共同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在普军开进巴黎的前夕,他们的中央委员会已经设法把投降派背叛地故意遗弃在普军即将进驻的那些街区的大炮和多管炮运到了蒙马特尔、伯利维尔、拉-维勒特。这些大炮是由国民自卫军筹款置备的。在1月28日的协定中,正式承认这些大炮是国民自卫军的财产,因而没有列入应该缴给征服者的政府武器总数之内。但梯也尔竟敢用国民自卫军的大炮是国家的财产这种捏造的借口挑起内战!

夺取这些大炮显然只是全面解除巴黎国民自卫军武装,亦即

解除 9 月 4 日革命武装的一项准备措施。可是，这个革命已经成为法国的合法局面。这个革命所产生的共和国，已在投降书上由胜利者予以承认。在投降以后，它又取得了各外强的承认；并用它的名义召集了国民议会。9 月 4 日的巴黎工人革命，是波尔多国民议会及其行政当局的唯一合法的根据。如果没有 9 月 4 日的革命，这个国民议会就势必立即让位给由普选产生的、后来被革命强迫解散的立法团。梯也尔及其假释犯们就一定会投降，以便取得护照和保护证书，免得到凯恩去旅行。握有全权去同普鲁士媾和的国民议会，不过是这次革命中的一个插曲。革命的真正体现者是武装的巴黎，因为是巴黎发动了这次革命，它为这个革命忍受了五个月的围困和饥饿的灾难，它不顾特罗胥的“计划”而以自己的持久抵抗使外省有可能进行大规模自卫战争。而现在，这个巴黎或者是按照波尔多那帮叛逆奴隶主的羞辱命令不得不自行解除武装，承认 9 月 4 日人民革命的唯一目的只不过是把政权从路易·波拿巴及其宠臣手里转交给那些同他竞争的保皇党人掌握；或者是为法兰西的事业进行奋不顾身的斗争，当时要把法国从完全复灭的危险中拯救出来并使它获得新生，唯一的途径就是用革命手段推翻那产生了第二帝国并且已在这个帝国庇护下弄到完全腐朽地步的政治条件和社会条件。受过五个月饥饿煎熬的巴黎，片刻都没有犹豫。它英勇无畏地决心经受在驻扎城下的普鲁士军队的监视下去同法国阴谋分子进行斗争的一切风险。但是，巴黎的人民政府——国民自卫军的中央委员会，竟对内战抱着厌恶的态度，因此它不管国民议会如何挑衅，不管行政当局如何僭越权限，也不管军队在巴黎城内和巴黎周围的集结达到如何威胁的程度，始终是继续保持着手无寸铁的立场。

3 月 18 日清晨，巴黎被“公社万岁！”的雷鸣般的呼声惊醒了。

公社这个使资产阶级的头脑怎么也捉摸不透的怪物，究竟是什么呢？

中央委员会在它的3月18日宣言中说：“首都的无产者，目睹统治阶级的失职和叛卖行为，已经了解到：由他们自己亲手掌握公共事务的领导以挽救时局的时刻已经到来…… 他们已经了解到：夺取政权以掌握自己的命运，是他们必须立即履行的职责和绝对权利。”

但是，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象占有者阶级中的各个争权夺利的党派在胜利时刻所做的那样。

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及其遍布各地的机关——常备军、警察、官僚、僧侣和法官（这些机关是按照系统的和等级的分工原则建立的），是起源于君主专制时代，当时它充当了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在争取摆脱封建制度束缚的斗争中的有力武器。十八世纪法国革命把领主的、地方的、城镇的、各省的特权的垃圾扫除干净，从而从社会基地上清除了那些妨碍最终地建立国家上层建筑的最后的中世纪障碍。在第一帝国时期，它取得了它的最终的形式，而第一帝国本身则是在老朽的半封建的欧洲联合反对近代法国的几次战争中的产物。在以后的那些议会统治时期，由于政府拥有令人倾心的官职、金钱和权势，掌握政府权力就变成了统治阶级中各个争权夺利的党派争夺的对象。它的政治性质随着社会的经济变化而发生了变化。工业的进步促使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阶级对立更为发展、扩大和深化，与此同时，政府权力就愈益具有资本压迫劳动的全国政权的性质，具有为以暴力保证社会奴役而组织起来的政治力量的性质，具有纯粹是阶级统治机器的性质。在每次人民革命以后——这些革命标志着阶级斗争进程（发展过程）中的新进展阶段——国家政权的压迫性质就表现得更加残酷无情、更加赤裸无

隐。七月革命把国家机器的管理权从地主手里夺来转交给了资本家，这也就是从离工人较远的敌人手里夺来转交给了工人的直接的敌人。正因为如此，所以国家权力对于工人阶级采取了表现得更加露骨的敌视和镇压态度。二月革命升起了“社会共和国”的旗帜，这样它从一开始就证明了：国家政权的真正意义已被揭露；它冒充为维护公共利益的武装力量、假装体现着社会的共同利益——站在相互敌对的私人利益之上并把它们保持在各自的活动范围之内——的面具已被戳破；它作为阶级专制的工具的秘密已被识破；工人们要求共和制，已不再把它当做旧的阶级统治制度的一种政治变形，而是把它当做消灭阶级统治本身的革命手段。统治阶级面对着“社会共和国”的威胁，本能地感觉到：过去的那些王朝的称号本身就意味着某一集团的胜利和另一集团的失败，统治阶级的一部分人的利益压倒另外一部分人的利益，土地压过资本或者资本压过土地；而无名的议会制共和国的统治则能够变成统治阶级所有相互敌对的集团的股份公司。与工人阶级对立的、迄今仍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不管它以怎样的特殊形式占有群众的劳动，但是它有一个共同一致的经济利益，这就是或者作为地主和资本家直接地，或者作为地主与资本家的国家寄生虫间接地来保持劳动受奴役的地位、坐享劳动的果实；这就是强制推行那种使生产者群众，“贱民”，成为只是上等人汲取财富和进行统治的泉源的“秩序”。因此，急于以首先大肆掠夺财产来证明自己是财产保护者的正统派、奥尔良派、资产阶级共和派以及波拿巴派冒险分子，便纠合起来，组成“**秩序党**”——这是无产阶级在欢呼“**社会共和国**”声中进行的这次革命的实际结果。秩序党的议会制共和国不仅是统治阶级的恐怖统治。国家政权到了他们的手里就变成了资本家、地主、他们的国家寄生虫用来压制生产者的革命愿望的公开

的内战的工具。

在君主制度下，统治阶级的在野集团还往往在人民面前谴责当权政府的镇压措施及其宣布的原则；统治阶级的反对派集团采用为人民利益呼吁、装出人民保护者姿态、要求维护人民自由权利的办法来使人民关心他们的派系争执。但是，在无名的共和制度下，统治阶级的各个集团把过去旧制度的一切镇压手段都混合起来（从所有过去制度的武库里取出一切镇压的武器），无情地加以运用，共同举行叛逆的庆宴。他们卑鄙无耻地否认他们过去的声明许诺，践踏他们的“所谓”原则，诅咒他们自己以这些原则的名义挑起的革命，并且诅咒共和国这个名称本身，虽然只有这种共和国的无名统治才能广泛地容纳他们共同参加反对人民的十字军。

由此可见，这一最残酷的阶级统治形式同时也就是最丑恶的、最令人恶心的形式。它只是把国家政权当做进行内战的工具，所以它只有靠延续内战才能保持这种政权。秩序党的统治是以议会的无政府状态为首，加上它的各个集团不断进行阴谋活动，企图恢复各自偏爱的制度，而与存在于其狭隘圈子以外的整个社会公开作战，因此秩序党的统治就成了令人最难容忍的无秩序的统治。当秩序党在对人民群众的战争中摧毁了人民群众的一切抵抗手段，把束手无策的人民群众置于行政当局的刀剑之下时候，秩序党本身以及它的议会制度也被行政当局的刀剑赶出舞台了。因此，秩序党的议会制共和国只能是一个空位王朝。它的自然结果是帝国制度，不管它是第几帝国。采取帝国形式的、以宝剑为王笏的国家政权，声称它依靠农民阶级，即依靠似乎是置身在劳动和资本的阶级斗争之外的广大生产者群众；它声称它以破坏议会制度，从而破坏国家政权对统治阶级的直接屈从状况而拯救了工人阶级；它声称它以不侮辱工人阶级但使工人阶级屈服而拯救了统治

阶级；它声称它所谋求的即使不是公共福利，至少也是国家荣誉。因此，它被宣布为“秩序的救主”。虽然它有损于统治阶级及其国家寄生虫的政治自尊心，但是它表明它确是资产阶级“秩序”的最合适制度，它为资产阶级的一切工业欲望、卑鄙龌龊的投机活动、整个骄奢淫佚的生活提供了充分发展的活动范围。表面上凌驾于市民社会之上的国家，实际上正是这个社会的一切龌龊事物的温床。普鲁士的刺刀揭穿了这个国家的彻底腐朽性以及似乎应由这个国家拯救的社会的全部腐朽性，但是，这种帝国制度是“秩序”的、即资产阶级社会“秩序”的如此不可避免的政治形式，以至于普鲁士自己之所以要把它的巴黎中心所在地推翻，无非是为了把它移到柏林去。

帝国并不象它的前驱正统王朝、立宪王朝、议会制共和国那样，只是资产阶级社会的一种政治形式，它同时还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最淫贱、最完整、最后的政治形式。它是近代阶级统治的国家政权，至少在欧洲大陆上是如此。

注 释

1 这篇导言是恩格斯为柏林《前进报》出版社在 1891 年巴黎公社二十周年时出版的马克思的著作《法兰西内战》德文第三版（纪念版）写的。恩格斯在这篇导言中指出了巴黎公社的经验以及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对这些经验所做的理论概括的历史意义，同时也就巴黎公社的历史，其中包括参加公社的布朗基主义者和蒲鲁东主义者的活动，做了一系列补充。恩格斯在纪念版中还收入了由马克思写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和第二篇宣言。以后用各种文字出版的《法兰西内战》的单行本，通常都包括有恩格斯的导言。

起初，恩格斯的导言经他同意以《论法兰西内战》为标题发表在《新时代》杂志 1890—1891 年第 2 卷第 28 期上。在发表时，编辑部对原文进行了篡改：在最后一段，原稿中所用的“社会民主党的庸人”一语被改成了“德国的庸人”。从费舍尔 1891 年 3 月 17 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可以看出，恩格斯对这种任意篡改是不同意的，但是，大概由于不想使自己的著作在同一时期发表的几种文本中出现异文，他在单行本中也保留了改换的字眼。本版恢复了原稿的文字。

恩格斯的导言与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一起用俄文发表，第一次是 1893 年在日内瓦。1905 年“海燕”出版社（敖德萨）出版了按 1891 年德文第三版翻译并由弗·伊·列宁校订的《法兰西内战》和恩格斯的导言。列宁在校订译文时，消除了 1905 年由同一个出版社出的前一版中的许多歪曲原意和不确切的地方，并且把《法兰西内战》和导言中先前被沙皇书报检查机关删去的文句恢复了。后来弗·伊·列宁在他的《国家与革命》等著作中引证导言时，又对其中的许多段落重新进行了翻译。——第 1 页。

2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121—227 页。——第 1 页。

3 指 1813—1814 年德国人民反对拿破仑统治的民族解放战争。——第 1 页。

4 在德国与拿破仑法国战争结束后，展开了反政府的运动，这个运动的参

加者反对德意志各邦的反动制度，组织要求统一德国的政治示威。这个运动在知识界和大学生中，特别是在大学生的体操社团中得到了推广。他们被德国的反动集团称做蛊惑者。反动当局对“蛊惑者”进行了迫害。——第 1 页。

- 5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第 2 页。
- 6 1870 年 9 月 1—2 日在色当附近进行了普法战争中的一次决定性的会战，结果是法军完全被击溃。按照法军司令部 1870 年 9 月 2 日签字的投降书，以拿破仑第三为首的 8 万多名兵士、军官和将军做了俘虏。拿破仑第三从 1870 年 9 月 5 日至 1871 年 3 月 19 日被监禁于威廉堡（在加塞耳附近，是普鲁士国王的城堡）。色当惨败加速了第二帝国的崩溃，结果是 1870 年 9 月 4 日法国宣布为共和国。——第 5 页。
- 7 指以梯也尔和茹·法夫尔为一方、俾斯麦为另一方于 1871 年 2 月 26 日在凡尔赛签订的法德初步和约。按照这个条约的条件，法国把阿尔萨斯和洛林东部割让给德国，并缴付 50 亿法郎的赔款；在赔款付清以前，德国军队继续占领法国的部分领土。最后和约是 1871 年 5 月 10 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签订的。——第 6 页。
- 8 引自公社选举委员会的报告，这个报告发表在公社的机关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1871 年 3 月 31 日第 90 号上。——第 6 页。
- 9 恩格斯说的大概是巴黎公社教育代表爱·瓦扬 1871 年 5 月 11 日命令的内容，这项命令发表在《法兰西共和国公报》1871 年 5 月 12 日第 132 号上。——第 6 页。
- 10 指蒲鲁东的著作《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巴黎，1851 年版（*« Idée générale de la Révolution au XIX siècle », Paris, 1851*）。马克思 1851 年 8 月 8 日给恩格斯的信和恩格斯的著作《对蒲鲁东的〈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一书的批判分析》（《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 10 卷第 13—17 页），对蒲鲁东在这部著作中的观点进行了批判。——第 10 页。
- 11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 The General Council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 on the War »*）是马克思在 1870 年 7 月 19—23 日写成的。1870 年 7 月 19 日，即普法战争爆发的当天，总委员会委托马克思起草关于这次战争的宣言。宣言在 7 月 23 日为总委员会常委会通过，接着在 1870 年 7 月 26 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被一致批准。宣言首先用英文刊登在伦敦 1870 年 7 月 28 日《派尔-麦尔新闻》第 1702 号上，几天以后以传

单的形式印行了一千份。英国的许多地方报纸也全文或摘要转载了宣言。宣言曾送交《泰晤士报》编辑部，但该报拒绝发表。

鉴于宣言的第一版很快就销售一空，所印的册数远远不能满足需要，总委员会在1870年8月2日决定再增印一千份。1870年9月，第一篇宣言又和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一起用英文再版；在这一版中，马克思改正了第一篇宣言在第一版中的刊误。

8月9日，总委员会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负责把第一篇宣言翻译成德文和法文并加以传布。参加这个委员会的有：马克思、荣克、赛拉叶和埃卡留斯。宣言用德文首次发表在莱比锡《人民国家报》1870年8月7日第63号上，译者是威·李卜克内西。马克思得到宣言的这个德文本之后，对译文作了彻底的加工，对全文的几乎一半重新进行了翻译。宣言用这个新的德译本发表在1870年8月的《先驱》杂志第8期上，同时以传单的形式单独出版。1891年纪念巴黎公社二十周年的时候，恩格斯在柏林《前进报》出版社出版的《法兰西内战》德文版中发表了总委员会的第一、第二两篇宣言。为这一版翻译第一、第二两篇宣言的是路易莎·考茨基夫人，她在翻译时得到恩格斯的帮助。

宣言用法文发表于1870年8月《平等报》、1870年8月7日《国际报》第82号和1870年8月7日《米拉波报》第55号。宣言也用总委员会所设委员会译成的法文以传单形式出版。

第一篇宣言于1870年8—9月首次用俄文发表在日内瓦出版的《人民事业》第6—7期上；在1905年，第一、二两篇宣言收入了由列宁审订的按1891年德文版翻译的《法兰西内战》的版本中（见注29）。后来，这两篇关于普法战争的宣言又多次用俄文和《法兰西内战》本文一起发表过。

《人民国家报》（*<Der Volksstaat>*）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的中央机关报，从1869年10月2日至1876年9月29日在莱比锡出版（每周两次，自1873年7月起改为每周三次）。该报代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革命派的观点。这家报纸因为发表大胆的革命言论而经常受到政府和警察的迫害。由于编辑被逮捕，该报编辑部成员不断变动，但报纸的总的领导仍然握在威·李卜克内西手里。主持《人民国家报》出版工作的奥·倍倍尔在该报中起了卓越的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该报创刊起就是它的撰稿人，经常帮助编辑部并且一贯地为它纠正路线。尽管《人民国家报》有某些缺点和错误，它仍不失为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优秀的工人报纸之一。

《先驱》(«Der Vorbote»)月刊是瑞士的国际德国人支部的正式机关刊物，1866年至1871年在日内瓦以德文出版；主编是约·菲·贝克尔。杂志总的说来执行马克思和总委员会的路线，有系统地发表国际的文件，报道协会的各国支部的活动情况。

《平等报》(«L'Égalité»)是瑞士的一家周报，国际罗曼语区联合会的机关报；从1868年12月至1872年12月在日内瓦以法文出版。在1869年11月—1870年1月，混入该报编辑部的巴枯宁分子佩龙、罗班等人企图利用它来攻击国际总委员会。但是在1870年1月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设法更换了编辑部的成员，清除了其中的巴枯宁分子，以后该报又开始支持总委员会的路线。

《国际报》(«L'Internationale»)是比利时的一家周报，国际比利时支部的机关报；从1869年到1873年在德·巴普的直接参加下在布鲁塞尔出版。该报经常发表国际的文件。

《米拉波报》(«Le Mirabeau»)是1868年至1874年在佛尔维耶出版的比利时周报；国际比利时支部的机关报。

《人民事业》(«Народное дело»)是一批俄国革命流亡者于1868年至1870年在日内瓦出版的报纸(1870年4月以前为杂志)；创刊号是巴枯宁主编的，从1868年10月起，编辑部(其中有尼·吴亭等人)同巴枯宁决裂并反对他的观点；从1870年4月起，它是国际工人协会俄国支部的机关报，执行马克思和总委员会的路线，登载国际的文件。——第14页。

- 12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13—14页。——第14页。
- 13 拿破仑第三政府企图巩固引起广大人民不满的摇摇欲坠的第二帝国政权，于1870年5月举行了公民投票(全民投票)。提付表决的问题都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提出来，即要对第二帝国的政策表示不赞同，就意味着反对一切民主改革。尽管政府采取了这种蛊惑性的伎俩，公民投票仍然表明了反政府力量的增长：投票反对政府的有150万人，拒绝参加投票的有190万人。政府在准备公民投票的同时，广泛采取了镇压工人运动的措施，对工人组织竭尽造谣诬蔑之能事，歪曲它们的目的，用“赤色恐怖”来吓唬中间阶层。

国际的巴黎联合会和巴黎职工会联合会在1870年4月24日发表宣言，揭露了波拿巴派玩弄的公民投票，并号召工人们拒绝参加投票。在公民投票的前夕，政府以警察捏造的谋刺拿破仑第三的罪名逮捕了巴黎联合会的会员；政府还利用这一罪名在法国各城市里对国际会员

发动大规模的迫害运动。在 1870 年 6 月 22 日至 7 月 5 日举行的对巴黎联合会会员的审判中，完全揭露了这一罪名的虚伪性；但是波拿巴的法庭仅以属于国际工人协会为罪名对在法国的许多国际会员判处了徒刑。

在法国对国际的迫害引起了工人阶级的广泛抗议。——第 14 页。

- 14 指路易·波拿巴于 1851 年 12 月 2 日举行的政变，第二帝国的波拿巴政体即由此肇始。——第 15 页。
- 15 《觉醒报》(《Le Réveil》) 是法国左派共和党人的机关报，原为周刊，从 1869 年 5 月起改为日报，从 1868 年 7 月至 1871 年 1 月在巴黎出版，由沙·德勒克吕兹主编。从 1870 年 10 月起反对国防政府。——第 15 页。
- 16 《马赛曲报》(《La Marseillaise》) 是一家法国日报，左派共和党人的机关报，1869 年 12 月至 1870 年 9 月在巴黎出版。该报经常刊载有关国际的活动和工人运动的材料。——第 15 页。
- 17 指十二月十日会(为纪念该会庇护人路易·波拿巴在 1848 年 12 月 10 日当选法兰西共和国总统而得名)。这是波拿巴派的秘密团体，成立于 1849 年，主要由堕落分子、政治冒险家、军阀等组成。虽然 1850 年 11 月该会在表面上被解散了，实际上它的党羽还继续进行波拿巴主义的宣传，并且积极地参加了 1851 年 12 月 2 日的政变。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173—176 页)中对十二月十日会作了详尽的评述。
- 18 支持路易·拿破仑的掠夺计划的沙文主义的示威游行，是波拿巴分子于 1870 年 7 月 15 日在警察的配合下组织的。——第 16 页。
- 19 萨多瓦之役于 1866 年 7 月 3 日发生于捷克，交战双方是：奥地利和萨克森的军队为一方，普鲁士的军队为另一方。它是以普鲁士战胜奥地利告终的 1866 年普奥战争中的一次决定性战役。在历史上这次战役又称凯尼格列茨(现为格拉杰茨-克拉洛维)之役。——第 16 页。
- 20 1870 年 7 月 16 日在不伦瑞克和 7 月 17 日在开姆尼斯举行的工人大会，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领导人(爱森纳赫派)为表示抗议统治阶级的掠夺政策而召开的。

1870 年 7 月 16 日不伦瑞克大会的决议，马克思引自 1870 年 7 月 20 日《人民国家报》第 58 号。——第 17 页。

- 20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Second Address of the General Council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

ing-Men's Association on the War») 是马克思在 1870 年 9 月 6 日和 9 日之间写成的。

1870 年 9 月 6 日，国际总委员会研究了由于第二帝国崩溃及普法战争进入一个新阶段而形成的新局势，决定对普法战争发表第二篇宣言，并为此成立了一个起草委员会，其成员有马克思、柴克、米尔纳和赛拉叶。

马克思在写这篇宣言时，利用了恩格斯寄给他的各种材料，这些材料揭露了普鲁士军阀、容克地主和资产阶级借口军事战略上的需要并吞法国领土的野心。总委员会在 1870 年 9 月 9 日召开的专门会议上一致通过了马克思起草的这一宣言，并且将它分送给伦敦各资产阶级报纸。这些报纸都采取了沉默态度，只有《派尔-麦尔新闻》在 1870 年 9 月 16 日刊登了宣言的摘要。9 月 11—13 日宣言用英文以传单的形式出版，印数为一千份。9 月底又出版了将第一篇和第二篇宣言印在一起的新版本。在这一版中改正了第一版的刊误，并作了个别文字上的修改。

第二篇宣言的德文本是马克思翻译的，他在翻译时补充了几句专对德国工人说的话，并且省略了个别的地方。第二篇宣言的这个译本发表于 1870 年 9 月 21 日《人民国家报》第 76 号和 1870 年 10—11 月《先驱》杂志第 10—11 期，并且以传单形式在日内瓦出版。1891 年恩格斯在《法兰西内战》的德文版中发表了第二篇宣言；为这一版翻译宣言的是路易莎·考茨基夫人，她在翻译时得到恩格斯的帮助。

第二篇宣言的法译文载于《国际报》(1870 年 10 月 23 日第 93 号)，部分地(全文未登完)载于《平等报》(1870 年 10 月 4 日第 35 号)。

第二篇宣言的俄译文于 1905 年首次发表在由列宁审订的按 1891 年德文版翻译的《法兰西内战》的版本中。——第 20 页。

- 21 1618 年勃兰登堡选帝侯国与十六世纪初由条顿骑士团领地组成的、并臣属于波兰贵族共和国的普鲁士公国(东普鲁士)合并。勃兰登堡选帝侯作为普鲁士的领主也就成为波兰的藩臣，这种关系一直维持到 1657 年，当时勃兰登堡选帝侯利用了波兰对瑞典作战的困难，争得了对他的普鲁士领地主权的承认。——第 22 页。
- 22 指 1795 年 4 月 5 日普鲁士同法兰西共和国单独缔结的巴塞尔和约，这个和约导致了欧洲各国的第一次反法同盟的瓦解。——第 22 页。
- 23 1865 年 10 月，俾斯麦在比阿里茨和拿破仑第三会晤时，争取到了法国对普鲁士和意大利的同盟以及普鲁士对奥地利的战争的实际承认；拿

破仑第三作出这种承认，是打算在普鲁士遭到失败时再插手这次战争，谋取利益。

在 1870—1871 年普法战争开始时，沙皇政府的外交大臣哥尔查科夫在柏林和俾斯麦举行谈判时声明，俄国在战争中将采取善意的中立，并将对奥地利施加外交压力；同时普鲁士政府则答应不给沙皇俄国在东方问题上的政策制造障碍。——第 24 页。

- 24 马克思指德国封建反动势力在拿破仑统治复灭后所取得的胜利。

德国广大人民和欧洲许多国家的人民一起参加了反对拿破仑第一统治的解放战争，然而这一解放战争的成果，被欧洲封建专制国家中依靠反动贵族阶级的统治者们所夺去。以奥地利、普鲁士和沙皇俄国为核心的反革命的君主联盟——神圣同盟，成了欧洲国家的命运的主宰。随着德意志联邦的建立，德国保持了封建割据的局面，在德意志各邦中巩固了封建专制制度，保留了贵族阶级的一切特权，加强了对农民的半农奴制的剥削。——第 26 页。

- 25 《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宣言。告全体德国工人！》(«Manifest des Ausschusses der social-demokratischen Arbeiterpartei. An alle deutschen Arbeiter!») 宣言以传单形式在 1870 年 9 月 5 日发表，并载于 1870 年 9 月 11 日《人民国家报》第 73 号。——第 26 页。

- 26 指 1848 年 6 月 23—26 日巴黎工人的英勇起义。——第 27 页。

- 27 马克思指英国工人发动的争取承认 1870 年 9 月 4 日成立的法兰西共和国并在外交上给予它以支持的运动。从 9 月 5 日起，在伦敦、伯明翰、新堡以及其他大城市举行了有广大劳动群众参加的集会和示威游行；工联在这当中起了积极的作用。参加集会和示威游行的人都表示同情法国人民，并在他们的决议和请愿书中要求英国政府立即承认法兰西共和国。

国际总委员会直接参加了争取承认法兰西共和国运动的组织工作。——第 27 页。

- 28 马克思暗指资产阶级和贵族的英国积极参与了使那些在 1792 年开始对革命的法国作战的封建专制国家结成联盟的事务（英国本身在 1793 年加入了这场战争）；以及英国的执政寡头在欧洲最先承认了法国由于 1851 年 12 月 2 日路易·波拿巴政变而建立的波拿巴制度。——第 27 页。

- 29 《法兰西内战》是科学共产主义的最重要著作之一；它根据巴黎公社的经验，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国家、革命和无产阶级

专政的学说的基本原理。这一著作是作为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致欧洲和美国全体会员的宣言而写的。

巴黎公社一宣布成立，马克思就开始细心搜集和研究所有关于公社活动的消息，如法国、英国、德国的报纸材料，巴黎来信中提供的情况等等。马克思在 1871 年 4 月 18 日总委员会会议上，建议就法国“斗争的总趋向”发表一篇告国际全体会员的宣言。总委员会把起草宣言的工作交给了马克思。4 月 18 日以后，马克思就开始了这项工作，一直继续进行到 5 月底。他先写了《法兰西内战》的初稿和二稿（见本书第 87—207 页和注 96）；随即着手宣言的定稿工作。1871 年 5 月 30 日，即巴黎最后一个街垒陷落的两天以后，总委员会一致批准了马克思宣读的《法兰西内战》的定稿文本。

《法兰西内战》最初于 1871 年 6 月 13 日左右在伦敦用英文印成三十五页的小册子发表，印数一千份。由于第一版很快销售一空，不久又出了英文第二版，印数两千份，在工人中间减价销售。马克思在这一版中更正了第一版的几个印刷错误，并在《附录》里增补了第二篇文件。宣言下面总委员会委员的署名中做了如下的变动：抽掉工联主义者鲁克拉夫特和奥哲尔的名字（他们在资产阶级报刊上表示不同意宣言，并且退出了总委员会），同时增添了总委员会新成员的名字。1871 年 8 月出了《法兰西内战》英文第三版，马克思在这一版中除去了前两版中个别不确切的地方。

1871—1872 年，《法兰西内战》被译成法文、德文、俄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和荷兰文，在欧洲各国和美国的期刊上发表并以单行本出版。

德文本是由恩格斯翻译的，于 1871 年 6—7 月先后发表于《人民国家报》（6 月 28 日，7 月 1、5、8、12、16、19、22、26 和 29 日的第 52—61 号）；1871 年 8—10 月在《先驱》杂志部分地发表，此外，还在莱比锡出版了单行本。恩格斯在译文中做了几个不大的改动。1876 年，为了纪念巴黎公社五周年，出版了《法兰西内战》的新的德文本，在文字上做了一些订正。

1891 年，在为迎接巴黎公社二十周年而准备出《法兰西内战》的德文纪念版时，恩格斯重新校订了译文，并为这一版写了导言；他在导言中，强调指出巴黎公社经验的历史意义和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对公社做的理论总结的历史意义；此外，还做了一些有关加入公社的布郎基主义者和蒲鲁东主义者的活动的补充。恩格斯把马克思写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和第二篇宣言收进了这一版；

此后在各种文字的单行本中，这两篇宣言也都通常与《法兰西内战》一起刊印。

《法兰西内战》的法文译文最初于 1871 年 7—9 月在布鲁塞尔的《国际报》上刊出。1872 年在布鲁塞尔出了法文版单行本，译文曾由马克思加以校订。他在寄给他的校样上做了大量修改，把好些地方重新译过。

1871 年，在苏黎世第一次出了《法兰西内战》俄文第一版。后来铅版印刷的以及胶版翻印的许多版本都以这一版为依据。1905 年，出版了由弗·伊·列宁校订的《法兰西内战》俄文本（敖德萨“海燕”出版社版），这次是根据 1891 年德文版翻译的。列宁校订《法兰西内战》时，在译文中使用了精确的经济政治术语，除去了 1905 年的前一版的大量歪曲和不妥之处，恢复了那些在前一版被沙皇书报检查机关删去的地方。列宁在校订《法兰西内战》第三章译文时做的改动特别大。后来，列宁在他的《国家与革命》以及其他著作中引用《法兰西内战》时，又把所引用的很多地方重新译过（根据 1876 年和 1891 年的德文版）。——第 31 页。

- 30 阿尔丰斯·西蒙·吉奥给苏桑的信发表于 1871 年 4 月 25 日《公报》第 115 号。

《公报》(«Journal Officiel»)是《法兰西共和国公报》(«Journal Officiel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的简称。该报出版于 1871 年 3 月 20 日至 5 月 24 日，是巴黎公社的正式机关报；它是沿用 1870 年 9 月 5 日起在巴黎出版的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公报的名称（在巴黎公社时期，梯也尔政府的报纸也用此名称在凡尔赛出版）。3 月 30 日的报纸是用《巴黎公社公报》(«Journal Officiel de la Commune de Paris»)的名称出版的。——第 35 页。

- 31 1871 年 1 月 28 日，俾斯麦同国防政府的代表法夫尔签订了《停战和巴黎投降协定》。——第 35 页。

- 32 投降派 (*Capitulards*) 是对 1870—1871 年巴黎被围时期主张巴黎投降的人的卑称；后来在法文中，这个词被用来泛指投降主义者。——第 35 页。

- 33 宣言发表于 1871 年 4 月 28 日《复仇者报》第 30 号。——第 35 页。

- 34 《旗帜报》(«L'Étandard»)是波拿巴派的法国报纸，从 1866 年至 1868 年在巴黎出版。该报由于被揭发靠欺骗行为作财政来源而停刊。——第 35 页。

- 35 动产信用公司(*Société Générale du Crédit Mobilier*)是法国的一家大股份银行，1852年创办。它的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用它所开办的股份公司的有价证券进行投机。该银行同第二帝国政府有密切的联系。1867年，该银行破产，1871年停业。马克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的许多文章中揭示了该银行的真正本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23—40、218—227、313—317页)。——第36页。
- 36 《自由选民》(*L'Électeur libre*)是一家周报(普法战争时期起改为日报)，共和派右翼的机关刊物，1868年至1871年在巴黎出版；1870年至1871年同国防政府的财政部有联系。——第36页。
- 37 指1831年2月14日和15日巴黎发生的反对正统派和反对教会的行动，这些行动得到外省的响应。为了对正统派在贝里公爵追悼会上举行示威表示抗议，会上的群众捣毁了奥塞鲁瓦的圣热尔门教堂和以同情正统派闻名的大主教凯朗的宫廷。奥尔良派的政府由于想打击对它抱敌视态度的正统派，没有采取措施来干涉群众的行动；捣毁教堂和大主教宫廷时在场的梯也尔曾关照国民自卫军不要阻止群众的行动。
- 1832年，当时的内务大臣梯也尔下令，逮捕了正统派的法国王位僭望者尚博尔伯爵的母亲贝里公爵夫人，随即将她置于严格监视之下，并对她施以侮辱性的身体检查，目的在于宣扬她的私婚，从而破坏她的政治声誉。——第37页。
- 38 马克思指梯也尔(当时任内务大臣)在镇压1834年4月13—14日反对七月王朝统治的起义中所扮演的卑鄙角色。这次起义是巴黎工人以及依附于工人的小资产阶级阶层，在共和派的秘密的人权协会领导下进行的。在镇压这次起义时，军阀干下了许多暴行，例如，他们曾在特朗斯诺南街上把一所房子里的人全部杀死。梯也尔是起义时以及起义被镇压后对民主派实行残酷镇压的主要指使者。
- 九月法令 是法国政府1835年9月颁布的反动法令。这项法令限制了陪审人员的裁判活动，对出版采取了严峻的措施。在出版方面，规定增加定期刊物的保证金，对反对私有制和现存国家制度的言论实行监禁和课以大量罚款。——第37页。
- 39 1841年1月，梯也尔在众议院提出在巴黎四周建立城防工事(要塞围墙和独立堡垒)的计划。革命民主派认为这是借口加强巴黎防务而对人民运动实行镇压的准备措施。当时曾有人指出，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梯也尔的计划才规定在巴黎东部和东北部的工人区附近建筑特别坚固的大批堡垒。——第37页。

- 40 1848 年 1 月，那不勒斯国王斐迪南二世的军队炮击巴勒摩城，企图镇压人民起义(这次起义成了 1848—1849 年意大利各公国发生资产阶级革命的信号)。同年秋天，斐迪南二世残酷地炮轰墨西拿，因而获得炮弹国王的绰号。——第 37 页。
- 41 1849 年 4 月，法国资产阶级政府联合奥地利和那不勒斯对罗马共和国进行干涉，其目的是扑灭罗马共和国，恢复教皇的世俗政权。由于武装干涉和罗马被围并遭到法军的残酷炮轰，罗马共和国尽管进行了英勇的抵抗，终于被推翻，罗马也被法军占领。——第 38 页。
- 42 马克思指的是资产阶级共和派政府残暴地镇压 1848 年 6 月 23—26 日巴黎无产阶级的起义。对起义的镇压，造成了反革命势力的猖獗，使保守的帝制派的地位更加巩固。——第 38 页。
- 43 秩序党是 1848 年成立的保守的大资产阶级的政党，是法国两个保皇派即正统派(波旁王朝的拥护者)和奥尔良派(奥尔良王朝的拥护者)的联合。从 1849 年到 1851 年 12 月 2 日政变，该党在第二共和国的立法议会中一直占据领导地位。秩序党的反人民政策的破产，被路易·波拿巴集团利用来建立第二帝国的制度。——第 38 页。
- 44 1840 年 7 月 15 日英国、俄国、普鲁士、奥地利和土耳其在没有法国参加的情况下，在伦敦签订了关于援助土耳其苏丹反对法国所支持的埃及统治者穆罕默德-阿利的协定，结果产生了法国同欧洲各国同盟战争的危险，但是路易-菲力浦国王未敢发动战争并且放弃了对穆罕默德-阿利的支持。——第 39 页。
- 45 梯也尔想加强凡尔赛军队来镇压革命的巴黎，曾要求俾斯麦允许他扩大部队员额(按照 1871 年 2 月 26 日签订的初步和约，梯也尔的部队总人数不得超过 4 万人)。梯也尔政府向俾斯麦保证军队只用来镇压巴黎的起义，于是按照 1871 年 3 月 28 日签订的卢昂协定，遂获准将凡尔赛军队的人数增至 8 万人，不久以后，又增至 10 万人。德国司令部遵照这些协议，急忙将法国战俘(主要是在色当和麦茨投降的部队)遣送回国。凡尔赛政府把这些部队安置在秘密营中，施以思想训练，使他们仇恨巴黎公社。——第 39 页。
- 46 正统派是法国于 1792 年被推翻的、代表大土地贵族和高级僧侣利益的波旁王朝的拥护者。在 1830 年，该王朝第二次颠覆以后他们才形成为政党。在第二帝国时期，正统派得不到居民丝毫支持，只能采取等待时机的策略，出版一些批评性的小册子，只是在 1871 年参加了反革命势力对巴黎公社的大进军以后，他们才开始活跃起来。——第 41 页。

- 47 “无双议院”(《*Chambre introuvable*》)是1815—1816年(复辟时期初期)由极端反动分子组成的法国众议院。——第41页。
- 48 在马克思的原稿中是《assembly of rurals》(《rurals》相当于法文《les ruraux》),意即“乡绅会议”、“地主议会”。这是对1871年的国民议会的卑称。该议会的绝大部分议员都是反动的保皇党人;在农村选区当选的外省地主、官吏、食利者和商人。630名议员中约有430名是保皇党人。——第41页。
- 49 指俾斯麦所提出的作为初步和约条件之一的赔款要求。和约于1871年2月26日由梯也尔、茹·法夫尔同俾斯麦、南德意志各邦的代表在凡尔赛签订。根据这项和约,法国把阿尔萨斯和洛林东部割让给德国,赔款50亿法郎;在赔款付清以前,德军占领的一部分法国领土仍由德军继续占领。正式和约是1871年5月10日在法兰克福签订的(见本书第72页)。——第42页。
- 50 1871年3月10日国民议会通过了“关于延期清偿借约”的法令。根据这项法令,凡是在1870年8月13日到11月12日期间立的借约,规定在立约后的七个月内偿清。11月12日以后立的借约则不得延期。法令实际上没有允许大部分债务人延期付款,这就严重地打击了工人和居民中的贫苦阶层,并使许多小工商业者破产。——第42页。
- 51 十二月分子(*Décembriseur*)是指1851年12月2日波拿巴政变的参加者和这种政变行动的拥护者。维努亚直接参加了政变,曾用军队镇压法国一个省的共和派的起义。——第42页。
- 52 根据报纸上的报道,从梯也尔政府决定发行的内债中,梯也尔本人及其政府的其他成员应当得到3亿多法郎的“佣金”。梯也尔后来承认,和他商谈借债的金融界代表曾要求迅速扑灭巴黎的革命。1871年6月20日凡尔赛军队镇压了巴黎公社以后,发行内债的法令遂被通过。——第43页。
- 53 凯恩是法属圭亚那(南美)的城市,是政治犯服苦役和流放的地方。——第45页。
- 54 《国民报》(《*Le National*》)是1830—1851年在巴黎出版的一家法国日报,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机关报。——第47页。
- 55 1870年10月31日当麦茨投降、勒-布尔热失守、梯也尔受国防政府之命与普鲁士人开始谈判的消息传来以后,巴黎工人和一部分革命的国民自卫军举行起义,占领了市政厅,建立了以布朗基为首的革命的政权机关——社会拯救委员会。在工人的压力之下,国防政府不得不答应

辞职，并定于 11 月 1 日举行公社的选举。但是，由于巴黎的革命力量尚未充分组织起来，领导起义的布朗基派与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雅各宾分子之间存在意见分歧，政府便利用这一情况，借助于尚拥护它的几营国民自卫军，背弃了它的辞职诺言，占据了市政厅，恢复了它的政权。——第 47 页。

- 56 “布列塔尼部队”即布列塔尼别动部队，特罗胥把它当做宪兵部队用来镇压巴黎的革命运动。

科西嘉部队是第二帝国宪兵队的重要组成部分。——第 47 页。

- 57 1871 年 1 月 22 日，巴黎无产阶级和国民自卫军在布朗基派的号召下发起革命的示威游行，要求解散政府，成立公社。国防政府命令守卫市政厅的布列塔尼别动队枪杀示威群众，逮捕游行者，下令封闭巴黎所有的俱乐部，禁止群众集会，勒令许多报纸停刊。政府血腥地镇压了革命运动以后，立即准备巴黎投降。——第 48 页。

- 58 *Sommations* 是政府为了驱散示威和集会而采取的一种警告形式。根据 1831 年的法令，这种警告在鼓声或喇叭声中重复三次以后，政府就有权使用武力。

骚扰取缔令 (*Riot act*) 于 1715 年在英国生效，禁止十二人以上的一切“骚扰性集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当局有责任提出特别警告，如果集会者在一小时内不散去，则使用武力。——第 48 页。

- 59 10 月 31 日事件发生时(见注 55)，国防政府的成员被扣留在市政厅中，有一个起义者曾提议将他们枪决，但为弗路朗斯所阻止。——第 50 页。

- 60 见伏尔泰的小说《老实人》第 22 章。——第 50 页。

- 61 马克思引自 1871 年 4 月 6 日《公报》第 96 号上发表的巴黎公社 1871 年 4 月 5 日公告。

马克思提到的人质法令，是公社于 1871 年 4 月 5 日通过的，发表于 4 月 6 日的《公报》(马克思注的是它在英国报纸上公布的日期)。按照这项法令，所有被控告与凡尔赛有勾结的人，在他们的罪行被证实后一律当做人质扣押。巴黎公社想采取这种措施来阻止凡尔赛军队对公社社员的枪杀。——第 50 页。

- 62 马克思引自 1871 年 3 月 21 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第 80 号。——第 52 页。

- 63 授职制 (*investiture*) 是指中世纪封建主给藩属授予封地或授予神职的办法。这种制度的特点，是等级低的人完全听任等级高的世俗封建主和教会封建主摆布。——第 57 页。

- 64 吉伦特派是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大工商业资产阶级和在革命时期产生的地主资产阶级的政党。该党的许多领导人在立法议会和国民公会中代表吉伦特省，因而得名。吉伦特派借口保卫各省实行自治和成立联邦的权利，反对雅各宾政府以及拥护政府的革命群众。——第 57 页。
- 65 《喧声》(«*Kladderadatsch*») 是带有插图的、讽刺性的周刊，从 1848 年起在柏林出版。
- 《笨拙》(«*Punch*») 是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幽默周刊《笨拙，或伦敦喧声》(«*Punch, or the London Charivari*») 的简称，1841 年起在伦敦出版。——第 57 页。
- 66 指 1871 年 4 月 16 日巴黎公社颁布的关于一切债务延期三年偿付并且取消利息的法令。这项法令缓和了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处境，而不利于放债的大资本家。——第 60 页。
- 67 马克思是指 1848 年 8 月 22 日制宪议会否决了关于“友好合同”(«*cordats à l'amiable*») 的法案，该法案规定凡能证明是因革命造成的业务停滞而沦于破产的债务人可延期偿债。于是很大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彻底破产，只好受大资产阶级债主们的宰割。——第 60 页。
- 68 无知兄弟会 (*Frères ignorantins*) 是 1680 年产生于兰斯的一个宗教团体的绰号，这个团体的成员承担了献身教育穷人子弟的义务；在这个团体所办的学校中，学生主要是受宗教教育，得不到什么其他方面的知识。马克思以此暗指资产阶级法国的初等教育水平很低，而且具有教权主义性质。——第 60 页。
- 69 外省共和联盟是由旅居巴黎的外省小资产阶级人士组成的政治组织。它曾号召各省支持巴黎公社，反对凡尔赛政府和保皇派的国民议会。——第 60 页。
- 70 大概指的是巴黎公社的《告农村劳动者》(«*Aux travailleurs des campagnes*»)，这份文件曾于 1871 年 4 月至 5 月初在公社的各报上公布，并以传单形式单独发表。——第 61 页。
- 71 马克思是指查理十世的反动政府在 1825 年 4 月 27 日所颁布的一项法令，其中规定对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被剥夺地产的前流亡者给以赔偿。赔偿总额约十亿法郎，以三厘无期公债支付，这笔赔偿费大部分落到了法国大地主、高级宫廷贵族手中。——第 61 页。
- 72 指将法国分为若干军区的指令和授予各军区司令以处理地方事务的广泛权力；授予共和国总统以任免区长的权力；将农村教师置于省长控制

之下的农村教师法；加强僧侣对教育领导方面的影响的国民教育法。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对这些法令曾有所阐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99—100页）。——第62页。

- 73 旺多姆圆柱是为了纪念拿破仑法国的胜利，于1806—1810年在巴黎旺多姆广场建立的。根据巴黎公社的决议于1871年5月16日拆除。——第63页。
- 74 1871年5月5日《口令报》（«Mot d'Ordre»）公布了证实修道院的种种罪行的材料。在圣安东郊区的毕克普斯修道院里，搜查后发现有把女修道士放在小修道室里监禁多年的情况，并且找到了拷打的刑具。在圣劳伦特教堂发现了一个秘密坟墓，这是凶杀罪行的证据。在公社为反宗教宣传而出版的小册子《教士罪行录》（«Les Crimes des congrégations religieuses»）中也公布了这些材料。——第64页。
- 75 威廉堡（加塞尔附近）是普鲁士国王的城堡，前法国皇帝拿破仑第三被普鲁士人俘虏后，于1870年9月5日至1871年3月19日被囚于此。——第64页。
- 76 在外地主（来自«absent»——“缺席者”）是通常不居住在自己地产上的大地主，这里指的是那些把爱尔兰地产上的收入挥霍于英国的地主，他们把地产交给土地代理人管理，或者出租给靠投机中饱的经纪人，后者再以苛刻的条件转租给小佃户。——第65页。
- 77 *Francs-fileurs*（直译是“自由逃亡者”）是给在巴黎被围时从城里逃跑出去的资产者起的嘲讽性的绰号。*francs-fileurs*的读音与*francs-tireurs*（自由射手，即积极参加反普鲁士斗争的法国游击队员）相近，这就使这一绰号具有幽默性质。——第66、75、110、199页。
- 78 科布伦茨是德国的一个城市，在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是贵族保皇党人逃亡和准备对革命的法国进行干涉的中心。受到封建专制国家支持的、以路易十六的极端反动的大臣卡龙为首的流亡政府就设在科布伦茨。——第67页。
- 79 在巴黎公社时期，公社社员把在布列塔尼召募来的、怀有保皇情绪的凡尔赛部队叫做“朱安兵”，这是把他们比做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在法国西北部发生的反革命叛乱的参加者。——第68页。
- 80 巴黎的无产阶级革命产生了巴黎公社，在这一革命的影响下，里昂、马赛以及法国许多其他城市也发生了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3月22日，里昂的国民自卫军和劳动者夺取了市政厅。3月26日巴黎代表团到

达以后，在里昂便宣布成立公社，但是，为准备选举公社而成立的临时委员会，尽管拥有一些武装力量，由于同人民群众和国民自卫军缺乏联系，终于放弃了自己的权力。里昂劳动者于 4 月 30 日进行的新的发动，遭到军队和警察的残酷镇压。

马赛的起义居民占据了市政厅，逮捕了省长，成立了省委员会，决定于 4 月 5 日进行公社的选举。马赛的革命发动于 4 月 4 日被炮击该城的政府军队所镇压。——第 69 页。

- 81 指杜弗尔在 1839 年 5 月四季社举行武装暴动时期为巩固七月王朝而进行的活动，以及杜弗尔在 1849 年 6 月第二共和国时期在反对在野的小资产阶级山岳党时所起的作用。

1839 年 5 月 12 日以布朗基和巴尔贝斯为首的秘密的共和社会主义团体——四季社——的革命发动，没有依靠群众，而且带有密谋性质；这次发动遭到了政府军队和国民自卫军的镇压。为了与革命危险作斗争而组成了一个新内阁，杜弗尔参加了这一内阁。

1849 年 6 月，在山岳党反对共和国总统路易·波拿巴的活动所造成政治危机日益增长的情况下，当时担任内务部长的杜弗尔，提议实行一系列法令对付一部分革命的国民自卫军、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第 70 页。

- 82 指国民议会通过的《报刊违法行为惩办法令》，它使过去的反动的出版法（1819 年和 1849 年）的条款重新生效，对那些发表反对政府言论的出版物规定了严厉的惩罚，直到封闭；这里还指恢复以前被撤职的第二帝国官员的职位；关于追还被公社没收的财产的手续的特别法；以及没收财产以刑事罪论处的规定。——第 70 页。

- 83 杜弗尔向国民议会提出的关于军法审判程序的法令，进一步缩短了 1857 年军事法典上规定的审判程序。法令确认部队司令和陆军大臣有权擅自进行司法追究，而不必经过预审；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在四十八小时内定案（包括审阅上诉书）和执行判决。——第 70 页。

- 84 指 1860 年 1 月 23 日签订的英法商约。商约规定，法国放弃保护关税政策，代之以不得超过货物本身价值 30% 的进口税。商约授予法国向英国免税输入大部分法国货的权利。商约签订以后，由于英国货大量流入法国，国内市场上的竞争大大加剧，引起了法国工业家的不满。——第 72 页。

- 85 指公元前一世纪在古罗马的社会政治斗争尖锐化时期，在罗马奴隶共和国发生危机的不同阶段上出现的血腥迫害和恐怖局面。

苏拉专政(公元前82—79年)——苏拉是奴隶主贵族的走卒,他在专政时期曾大规模地屠杀与他为敌的奴隶主集团的代表人物。在他的统治下,第一次宣布了公敌名单,凡列入名单者,可以不经审判,人人得而诛之。

前后罗马三执政(公元前60—53年,公元前43—36年)是由三个最有威望的罗马军队统帅分掌政权的专政。前三执政是庞培、凯撒和革拉苏,后三执政是屋大维、安东尼和列庇都斯。三执政的统治是为消灭罗马共和国和建立罗马单一的君主政权而斗争的一个阶段。三执政广泛地采用了在肉体上消灭自己敌人的手段。前后三执政垮台以后,接着就开始了自相残杀的流血的内战。——第74页。

- 86 《巴黎报》(*<Journal de Paris>*)是从1867年起在巴黎发行的周刊,拥护保皇党奥尔良派。——第74页。
- 87 这两段引文是马克思从法国政论家爱尔威发表于1871年5月31日《巴黎报》第138号上的一篇文章中摘出的,该文引用的塔西陀的《历史》中的那段话,见该书第3篇第83章。——第75页。
- 88 1814年8月,英美战争时英军在占领华盛顿以后,纵火焚毁了国会大厦、白宫和首都的其他公共建筑。
- 1860年10月,当英国和法国对中国进行掠夺性的殖民战争时,英法联军劫掠并焚毁了北京附近的圆明园——中国建筑和艺术的精华。——第76页。
- 89 在古罗马,帝王或将相私人的、享有特权的近卫军称为御用军,在罗马帝国时期,御用军经常参加内讧,并常常扶助自己方面的人登上王位。后来“御用军”一词就成为雇佣兵及军阀横行霸道的同义语。——第77页。
- 90 马克思把普鲁士于1849年1—2月根据普鲁士国王在1848年12月5日反革命政变日钦赐的宪法所选举的议会,叫做普鲁士的“无双议院”(*<chambre introuvable>*),因为它同1815—1816年法国极端反动的“无双议院”很相象。根据宪法,该议会由享有特权的“贵族院”和第二议院组成,只有所谓“独立的普鲁士人”才能参加第二议院的两级选举,这就保证了容克地主官僚集团和右翼资产阶级分子在第二议院中的优势。选入第二议院的俾斯麦是该院极右派容克地主集团的首领之一。——第78页。
- 91 《旗帜晚报》(*<The Evening Standard>*)是1827年在伦敦创刊的英国保守派的日报《旗帜报》(*<The Standard>*)的晚报版,1857年至

1905 年在伦敦发行。——第 84 页。

- 92 由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国际总委员会就 1871 年 6 月 6 日茹尔·法夫尔的通告发表的声明，曾收在《法兰西内战》英文第二、三版以及 1871、1876、1891 年的德文版中。声明也曾单独发表在许多报纸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7 卷第 393—395 页）。——第 84 页。
- 93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16 页。——第 84 页。
- 94 指马克思起草的通告信《国际工人协会和社会主义民主同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382—384 页）。——第 85 页。
- 95 《旁观者》（*The Spectator*）是英国自由派的周报，从 1828 年起在伦敦出版。——第 86 页。
- 96 《〈法兰西内战〉草稿》是马克思在 1871 年 4—5 月间写成的。在 3 月 18 日革命后的最初几天，马克思就开始仔细地研究有关巴黎事件的所有材料，收集剪报，从英法报纸上摘录大量的材料。4 月下半月马克思动手写初稿，大约写到 5 月 10 日左右，接着写《法兰西内战》二稿，这一工作在 5 月中结束，随后就开始《法兰西内战》的定稿工作，把它写成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的形式。有关巴黎公社最后一个星期的剪报和马克思笔记本上摘录的材料，没有在二稿中，而是直接在宣言中加以利用。

《法兰西内战》初稿和二稿的手稿，都是写在大张的纸上。篇幅最大的初稿的手稿，看来是完整地保存下来了，它共占 11 张纸，由于两面都书写，故共有 22 页，从第 1 页至第 22 页，除了当中的第 6 页和第 13 页以外，都有马克思标的页码。二稿的手稿，根据马克思标的页码（不是每张纸上都标有）来看，共有 13 张，保存下来的有 11 张（其中 8 张是一面书写，3 张是两面书写）。在保存下来的第五节：《内战的开始。3 月 18 日的革命。克列芒·托马。勒康特。旺多姆广场事件》之前的第四节，看来是手稿的丢失部分。未标明页码的最后三页（见本书第 201—207 页）主要是对二稿的个别地方的修订。马克思在进行《法兰西内战》的定稿工作时，通常用垂直线和斜线把初稿和二稿中已利用过的地方划掉，所以初稿和二稿的手稿中大部分地方都划有这种垂直线和斜线。只有马克思用横线划掉的辞句，本版才未收入。两部手稿中有许多在工作时标用的标记，括弧、方括弧等，本版均未收入。

马克思在他的草稿中摘引或者提及公社的指令和公告时，通常都是按照它们发表的日期或者在伦敦见报的日期来引用。

《〈法兰西内战〉草稿》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以及这两位马克思主

义创始人逝世后长时期内未发表过。初稿的一些片断最初发表在 1933 年 3 月 14、18 日《真理报》第 72、76 号上。初稿和二稿的全文第一次用原文（英文）和俄译文发表在 1934 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 3（8）卷中。——第 87 页。

- 97 比桑瓦耳会战（又称蒙特列特会战或蒙瓦勒里安会战）是在巴黎被围四个月后于 1871 年 1 月 19 日发生的。这是特罗胥组织的从被围的巴黎的最后一次出击，其目的是要彻底摧毁国民自卫军的力量，挫伤它的士气并以此让居民和军队相信继续保卫巴黎是不可能的。这次出击缺乏应有的准备，出击时进攻部队的行动不协调，也没有必要的预备队。尽管法军表现很勇敢，但是出击在所有地点都被击退。——第 89 页。
- 98 1870 年 10 月 5 日在古·弗路朗斯领导下，国民自卫军工人营在巴黎市政厅前示威，要求国防政府举行公社选举，采取措施巩固共和国，并与入侵的敌人坚决斗争。政府拒绝了这些要求并且规定国民自卫军除非得到命令不准集会和武装示威。

关于 1870 年 10 月 31 日起义，见注 55。——第 90 页。

- 99 指根据 1850 年 5 月 31 日法令实行新的选举资格限制，这项法令是法兰西共和国立法议会根据以梯也尔为首的秩序党提议通过的，秩序党被民主派和社会主义者在 1850 年 3 月和 4 月的议会补充选举中所取得的胜利吓坏了。新的选举法打击了城乡工人和贫苦农民，它规定只有定居三年并直接纳税的人才能参加选举。法国的选民因此减少了 300 万左右。

1850 年选举法通过后不久，议会就把共和国总统路易·波拿巴 1850 年的年薪由 60 万法郎增加到 300 万法郎。——第 94 页。

- 100 诺曼第的工厂主为了顺利地同英国工厂主进行竞争，企图削减纺织工人的工资，这在 1868 年底—1869 年初引起了索特维耳-勒-卢昂纺织工人的大罢工。罢工工人向国际请求援助，国际总委员会通过伦敦的工联和法国的工会为罢工的工人募款。正如马克思在《总委员会向国际工人协会第四次年度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所指出的，虽然罢工失败了，但是它促进了诺曼第纺织工人的组织和团结，造成了卢昂、埃耳伯夫、达尔讷塔耳等地的工会的建立，并且巩固了英法工人间的兄弟联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421—424 页）。——第 94 页。
- 101 《号召报》（*«Le Rappel»*）是维·雨果和昂·罗什弗尔创办的左翼共和派日报，从 1869 年到 1928 年出版。它曾尖锐地抨击第二帝国，在巴黎公社期间它主张支持公社。——第 95 页。

- 102 指 1839 年 5 月 12 日布朗基派四季社的武装暴动。——第 96 页。
- 103 马克思手稿中的笔误，杜弗尔和维维延进入卡芬雅克政府，分别任内务部长和公共工程部长，是在 1848 年 10 月 13 日。1849 年 6 月 2 日，杜弗尔是在奥迪隆·巴罗内阁中任部长。——第 96 页。
- 104 指普瓦提埃大街委员会，即所谓秩序党的领导机关。在这个委员会中占优势的是以梯也尔为首的奥尔良派。——第 96 页。
- 105 马克思在讲到 1847 年“自由联盟”时，是指 1846 年选举后法国众议院中形成的所谓“进步保守派”。这一派别的主要活动家是奥尔良分子日拉丹、托克维尔、杜弗尔等。“进步保守派”要求基佐政府实行一系列符合大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改革和在一定程度上扩大选举权以巩固七月王朝。他们反对基佐，揭露基佐政府成员所干的卑鄙勾当。
- 自由联盟 是 1863 年立法团选举时在共同反对帝国的基础上形成的资产阶级共和派、奥尔良派和部分正统派的联盟。1869 年竞选时曾企图重新组织自由联盟，但因 1863 年加入这一联盟的各党派间发生分歧而遭到了失败。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茹·法夫尔、茹·西蒙等）于 1869 年主张同保皇派结成联盟，他们支持奥尔良分子杜弗尔为候选人，但是，杜弗尔没有当选。——第 97 页。
- 106 暗指当时任内务大臣的梯也尔在残酷镇压 1834 年 4 月 13—14 日巴黎的共和党人起义中，特别是在血腥屠杀特朗普斯诺南街居民中所起的作用（见注 38）。——第 99 页。
- 107 指按照 1851 年 12 月 2 日波拿巴政变的方式行事。——第 99 页。
- 108 1871 年 4 月 6 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第 96 号。——第 100 页。
- 109 1871 年 4 月 6 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第 96 号。——第 100 页。
- 110 十五人委员会 是国民议会为配合梯也尔政府同革命的巴黎作斗争而于 1871 年 3 月 20 日建立的组织。参加委员会的主要成员是保皇党人，也有支持梯也尔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委员会曾号召外省组织志愿军与公社斗争，但没有得到支持。公社失败后，委员会停止了活动。——第 101 页。
- 111 马克思大概是准备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利用这些说明保皇党人在凡尔赛国民议会中的阴谋的例子。在这一时期马克思所做的报纸摘录中，有关于奥马尔公爵及其兄弟茹安维尔亲王在凡尔赛的阴谋活动，关于波旁系和奥尔良系合并的传闻，以及关于把法国王位让给奥马尔公爵的计划等资料。——第 102 页。
- 112 1871 年 3 月 30 日《巴黎公社公报》第 1 号。——第 103 页。

113 朱安叛乱(*Chouannerie*)，指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期间保皇派的叛乱。这次叛乱于1793年3月在万第省开始，后来又蔓延到布列塔尼和诺曼底两省。叛乱者主要是被反革命的神甫和贵族唆使和操纵的一部分当地农民。1795—1796年万第和布列塔尼的叛乱被平定，但在1799年和以后几年仍有人试图再次发动叛乱。——第104页。

114 “市警备队”(从1871年起改称共和国近卫军)是1830年七月王朝政府为了镇压革命运动在巴黎建立的军事化的警察(包括步兵和骑兵)；在1871年它是凡尔赛反革命军队的一支突击力量。

朱阿夫是法国的一种轻步兵(“朱阿夫”的称呼来自阿尔及利亚的一个部落的名称)。朱阿夫兵最初是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由阿尔及利亚当地居民组成的殖民地部队，后来由法国人组成，但是保持原先的东方服饰。教皇的朱阿夫兵指教皇警卫团。它是仿效朱阿夫兵组织和训练的，并且由法国贵族青年的志愿兵组成。在意大利军队占领罗马并废除教皇的世俗权力之后，教皇的朱阿夫兵于1870年9月被调往法国，改编为“西方志愿军团”，并且在卢瓦尔第一军团和第二军团的编制内参加了对德军的战斗。战争结束后，这个军团曾参与镇压巴黎公社，以后被解散。

朱安兵——见注79。——第105页。

115 1840年，由于俄、英、奥、普和土耳其缔结了帮助土耳其苏丹对付埃及帕沙穆罕默德-阿利的伦敦公约，支持穆罕默德-阿利的法国，面临着在外交上陷于孤立和欧洲各国结成反法同盟的威胁。法国政府被迫放弃了对穆罕默德-阿利的支持，而这意味着法国政策在近东遭到严重失败。由于这个让步，法国政府才得以参加签订关于在和平时期禁止外国军舰进出黑海海峡的1841年伦敦公约。这个公约于1841年7月13日由俄、英、法、奥、普的代表为一方，土耳其的代表为另一方共同签订。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英文第三版中，举出上述的第一次伦敦公约(即1840年公约)作为法国外交失败的例子。——第105页。

116 《形势报》(*«La Situation»*)是1870年9月至1871年8月2日在伦敦用法文出版的波拿巴派日报；它对国防政府和梯也尔政府持反对态度。——第107页。

117 维也纳条约是参加反拿破仑战争的各国由于维也纳会议(1814—1815)的结果而于1815年5—6月间在维也纳签订的。为了恢复各正统王朝的统治，维也纳条约违背民族统一和各民族独立的利益，任意修改了欧洲的地图。

巴黎条约 是指 1871 年 2 月 26 日法国和德国间签订的初步和约。——第 111 页。

- 118 指 1814 年拿破仑帝国复灭后和 1815 年拿破仑短期重掌政权而被再次推翻后，法国被迫同第六次和第七次反法同盟的参加国——英国、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签订的两个条约。

根据 1814 年 5 月 30 日缔结的巴黎和约，法国几乎丧失了在共和国和帝国时期征服的全部土地，除北部、东部和东南部边境上的一些小块的领土外，回复到 1792 年 1 月 1 日的疆界。

根据 1815 年 11 月 20 日缔结的巴黎和约，法国丧失了 1814 年巴黎和约保留下来的北部、东部和东南部边境上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据点。为了巩固复辟的波旁王朝的君主制度，法国东北部的边境要塞由 15 万同盟国军队驻守到 1818 年底。——第 111 页。

- 119 马克思是指普鲁士在 1806 年反拿破仑法国的战争中被击败以后（这次失败表明了普鲁士封建农奴制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的腐朽性），于 1807—1811 年实行了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改革。由于这些改革，农奴的人身依附废除了，但是所有的封建义务仍然保存着，只有征得地主的同意才能进行赎买；普鲁士实行了有限的地方自治，改组了军队和中央国家管理机关。——第 112 页。

- 120 塞瓦斯托波尔的英勇防卫战，俄军攻下土耳其要塞卡尔斯以及联军在波罗的海的失利，使俄国得以在巴黎和会（1856 年 2—3 月）上玩弄外交手腕，利用英、奥、法之间的矛盾，大大地减轻了结束沙皇俄国战败的克里木战争的和平条件；大大地限制了割让与土耳其的领土的范围，俄国保留了它在高加索的统治和在阿速夫海设置舰队和要塞的权利。和会决定结束奥地利对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占领，这给奥地利在巴尔干的扩张造成了相当大的困难。

马克思所说的沙皇政府在克里木战争失败后实行的改革，是指 1861 年的农奴制改革，地方管理方面的改革（1864 年地方自治局改革和 1870 年市政改革），1864 年的采用新诉讼法以及财政制度的改革。实行这些改革是俄国向资产阶级民主制过渡的重要步骤。——第 112 页。

- 121 “无俸法官”（*«Great Unpaid»*）是英国对担任调解治安法官之职，但不领一文薪俸的人的谑称。——第 117 页。

- 122 《口令报》（*«Le Mot d'Ordre»*）是共和派左翼日报，从 1871 年 2 月 3 日起在巴黎由昂·罗什弗尔编辑出版。3 月 11 日被巴黎总督维努亚

勒令停刊，在巴黎公社时期于 4 月 8 日复刊，一直出版到 1871 年 5 月 20 日。该报尖锐地抨击凡尔赛政府和国民议会中的保皇派多数，但是它并没有完全站在公社方面，它曾反对镇压巴黎反革命分子的措施。——第 118 页。

- 123 关于公社派一个委员会调查枪杀国民自卫军情况的结果的报道，载于 1871 年 4 月 29 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第 119 号和《口令报》第 65 号。马克思引用的是《口令报》发表的关于委员会报告的报道。——第 118 页。
- 124 《纽约每日论坛报》(《New-York Daily Tribune》)是一家美国报纸，1841—1924 年出版，在五十年代中期以前是美国辉格党左翼的机关报，后来是共和党的机关报。马克思于 1851 年 8 月至 1862 年 3 月曾为该报撰稿。为该报写的文章，很大一部分是马克思约恩格斯写的。在欧洲的反动时期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这个当时发行很广的进步报纸以具体材料来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病态。在美国国内战争时期，马克思完全停止了撰稿。马克思所以和《纽约每日论坛报》断绝关系，很大的一个原因是编辑部内主张同奴隶主妥协的人的势力加强和报纸离开了进步立场。后来该报的方向更日益右倾。——第 118 页。
- 125 工商会代表的声明，马克思是从 1871 年 4 月 13 日《号召报》第 669 号上摘引的。

巴黎权利共和联合同盟 是 1871 年 4 月初在巴黎成立的资产阶级组织。它企图在凡尔赛和巴黎之间进行调停，建议在承认共和国和巴黎市政自由的基础上达成协议，以便用和平方式取消公社，结束内战。

共济会会员的示威是指 1871 年 4 月 29 日巴黎共济会会员到城防工事处要求凡尔赛军队停止军事行动的示威游行。4 月 26 日和 29 日，公社为了得到中小资产阶级共和派的同情在市政厅和共济会会员（他们反映了中小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政治观点）举行了会见。由于共济会会员的停战建议遭到梯也尔的拒绝，他们在这两次会见中声明支持公社。在 4 月 29 日的会见之后举行了上述的示威游行，公社派代表团参加了这次游行。——第 119 页。

- 126 马克思引自 1871 年 4 月 17 日《号召报》第 673 号的巴黎权利共和同盟决议。——第 120 页。
- 127 马克思指的是《市镇通报》(《Moniteur des communes》)。这是公社时期在凡尔赛出版的法国政府报纸，以梯也尔政府《公报》的晚版附刊形式出版。——第 120 页。

- 128 马克思指的是 1871 年在里摩日出版的法国共和派报纸《共和保卫报》(«*La Défense républicaine*»)。——第 121 页。
- 129 大概是指 1871 年 5 月 6 日《复仇者报》对 1871 年 4 月 30 日市镇参议会选举结果的评价。
- 《复仇者报》(«*Le Vengeur*») 是共和派左翼日报。从 1871 年 2 月 3 日起在巴黎出版；3 月 11 日被巴黎总督维努亚下令查封。在巴黎公社时期于 3 月 30 日复刊，一直出版到 1871 年 5 月 24 日。该报曾支持公社，刊载它的正式文件和各次会议的报道。——第 121 页。
- 130 马克思指 1858 年 2 月 19 日立法团通过的《嫌疑犯处治法》。它使政府和皇帝有无限权力把一切有敌视第二帝国体制嫌疑的分子，流放到法国和阿尔及利亚的任何地方，甚至驱逐出法国领土。——第 121 页。
- 131 由议员格雷波交给国民议会的里昂市镇参议会的呈文，要求停止内战以及凡尔赛同巴黎议和。它同时建议明确划清议会和巴黎公社的权限，把公社的活动限制在市政问题上。——第 121 页。
- 132 指帝国时代在政府当局的强大压力下于 1865 年选出的市镇参议会。——第 122 页。
- 133 城市联盟（全名为共和城市爱国联盟），是害怕巴黎公社失败后王朝复辟的资产阶级共和派在 1871 年 4—5 月间酝酿成立的组织。联盟临时委员会在巴黎权利共和联合同盟的积极参加下决定 1871 年 5 月 9 日在波尔多举行市镇参议员代表大会，以设法停止内战，巩固共和国，并正式成立联盟。但凡尔赛政府禁止召开城市联盟代表大会，临时委员会随即停止了活动。
- 1871 年 5 月 6 日的《号召报》上曾发表了原拟召开的城市联盟代表大会的纲领。——第 122 页。
- 134 1871 年 4 月 13 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第 103 号。——第 128 页。
- 135 马克思引自 1871 年 3 月 31 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第 90 号发表的公社选举委员会总结。——第 128 页。
- 136 1871 年 4 月 5 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第 95 号。——第 129 页。
- 137 由于传出色当战败、巴黎发生革命、帝国于 1870 年 9 月 4 日崩溃这些消息，法国许多城市发生了工人的革命武装起义。其中如里昂、马赛、土鲁斯等城市成立了人民政权机关——公社。各省的公社，特别是里昂的公社，尽管存在的时间很短，都采取了一系列重要的革命措施（取消警察官僚机构，释放政治犯，实行非宗教的教育，对大资产者征税，无偿发还小当铺的典当物品等等）。国防政府残酷地镇压了这些地方公

社。——第 132 页。

- 138 1870 年 10 月 31 日的革命事件表明国防政府的地位不稳，国防政府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于 1870 年 11 月 3 日在巴黎举行了信任投票。虽然巴黎很大一部分居民投票反对政府的政策，但由于国防政府对居民施加压力，不断进行蛊惑性宣传，利用实际存在的戒严状态等等，它还是获得了多数票。——第 132 页。
- 139 马克思引自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 3 月 22 日告巴黎市民书，这一号召书曾以布告的形式发表，并载于 1871 年 3 月 25 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第 84 号。——第 140 页。
- 140 马克思用这句话表达一篇反映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在缴付赔款问题上的立场的文章内容；这篇文章载于 1871 年 3 月 24 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第 83 号。——第 144 页。
- 141 见注 71。——第 144 页。
- 142 1848 年 3 月 16 日第二共和国临时政府决定对每一法郎直接税加征 45 生丁的附加税。这种附加税的全部重担都落在农民身上，在农民中引起了极大的不满，大地主和天主教教士便利用这种不满情绪煽动农民反对巴黎的民主派和工人，使他们成为反革命的后备军。——第 144 页。
- 143 见注 72。——第 145 页。
- 144 大概指外省共和联盟（见注 69）。——第 148 页。
- 145 “友好合同”——见注 67。——第 148 页。
- 146 1789 年 6 月 20 日，针对路易十六政府企图破坏自行宣布为国民议会的三级会议开会的做法，第三等级的议员齐集于凡尔赛的网球厅，宣誓不制成宪法决不解散。网球厅的宣誓是成为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奏的事件之一。——第 150 页。
- 147 指巴黎无产者-实证论者协会。协会的纲领带有奥·孔德的资产阶级哲学的倾向。1870 年初，总委员会考虑到协会的工人成分，接受它为国际的一个支部；同时对协会的纲领做了尖锐的批判。——第 151 页。
- 148 法伦斯泰尔——按照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沙·傅立叶的学说，这是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消费协作社的成员们居住和工作的场所。
伊加利亚——空想共产主义的代表埃·卡贝在他的社会哲学小说《伊加利亚旅行记》中所描述的幻想的共产主义国家。——第 152 页。
- 149 马克思引自 1871 年 3 月 21 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第 80 号。——第 154 页。

- 150 马克思引自 1871 年 4 月 1 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第 91 号社论。——第 156 页。
- 151 引自 1871 年 4 月 19 日巴黎公社宣言《告法国人民书》，宣言发表在 1871 年 4 月 20 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第 110 号。——第 156 页。
- 152 告各省宣言——见注 151。——第 160 页。
- 153 见注 151。——第 160 页。
- 154 共和国保卫者总协会是 1871 年 2 月在巴黎成立的资产阶级民主组织，它的目标是为共和国而斗争。协会支持公社并指责凡尔赛政府的政策。这里所引的该协会的决议载于 1871 年 5 月 9 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第 129 号。——第 161 页。
- 155 沙·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1748 年日内瓦版第 2 卷第 165 页 (Ch. Montesquieu. «De l'esprit des loix». Genève, 1748. Tome second, p. 165)。——第 161 页。
- 156 1871 年 3 月 20 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第 79 号。——第 163 页。
- 157 沙·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1748 年日内瓦版第 1 卷第 204—206 页。——第 164 页。
- 158 1793 年宪法 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雅各宾革命专政时期国民公会所通过的法兰西共和国宪法。这是十八和十九世纪资产阶级宪法中最民主的一部宪法。——第 164 页。
- 159 马克思引自 1871 年 4 月 2 日公社执行委员会的宣言《告巴黎国民自卫军书》，这篇宣言载于 4 月 3 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第 93 号，并以布告的形式发表。——第 167 页。
- 160 米里哀尔的话引自 1871 年 4 月 4 日《复仇者报》第 6 号。——第 167 页。
- 161 1871 年 4 月 28 日《复仇者报》第 30 号。——第 170 页。
- 162 在特朗斯诺南街屠杀共和党人和九月法令——见注 38。——第 173 页。
- 163 指 1814 年和 1815 年以英、奥、普、俄为首的第六次和第七次反法同盟对法国的入侵，其目的在于推翻拿破仑第一的帝国，并让波旁正统王朝复辟。——第 178 页。
- 164 里昂、马赛、土鲁斯的公社——见注 137。——第 187 页。
- 165 指十九世纪中叶在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发现的金矿对发展国际贸易的影响。——第 191 页。
- 166 马克思讽刺地影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一句成了君主专制制度的座右

铭的名言：“朕即国家”。——第 194 页。

167 见注 125。——第 199 页。

168 1871 年 5 月 10 日缔结的法兰克福和约确定了法国和德国媾和的最后条件。这一条约肯定了 1871 年 2 月 26 日初步和约中法国把阿尔萨斯和洛林东部割让给德国的规定。根据法兰克福条约，法国支付赔款的条件更苛刻了，德军占领法国领土的期限也延长了，——这是俾斯麦帮助凡尔赛政府镇压公社的代价。法兰克福和约掠夺了法国，使德法之间未来的军事冲突必不可免。——第 199 页。

169 大概指严格限制市镇参议会权力的 1831 年《市镇组织法》和禁止各地市镇参议会建立联系的 1855 年《市镇组织法》。

关于在波尔多召集市镇代表大会的计划，见注 133。——第 200 页。